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类

## 前 言

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影响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不仅他的事业和思想仍对当今的中国发生着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可以说，从邓小平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艰辛开拓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继续与发展。

近年来，国内的政治文化生活重新出现“毛泽东热”。一是对毛泽东的评说再次成为社会各层各界的热门论题之一。二是披露毛泽东生活的纪实作品和研译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面世。就学术界而言，专职研究毛泽东的队伍正在由游勇散兵聚合为集团力量，有关毛泽东的专题思想和综合思想的研究会、室、所在全国已达数十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不断扩大，许多刊物辟有专栏发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专司此职的研究期刊先后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集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与前几年相比较，应当说，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思路上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也波及到了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辩理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辟蹊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者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分析性的研究之外，加强了综合性的研究。随着有关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选集和专题文集的陆续出版，研究工作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献资料。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和专论文章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白。宏观研究、体系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高等院校的广大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在系统化、体系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毛泽东军事哲学新探、毛泽东思想概论及至毛泽东思想辞典之类的出版物呈方兴未艾之势，大量涌现。

就研究对象而言，在对毛泽东正确思想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错误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研究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倾斜。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的思想以及改革的思想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在研究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理论时，通过剖析其早期思想来研究其晚年错误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做这样联系的研究，如果不简单化、不绝对化，是有利于深化认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理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与由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开辟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研究者的兴趣，并且愈来愈成为研究的重点。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毛泽东观。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和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论著的传播，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对毛泽东开拓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反差。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积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就宏观的区别而言，大致存在这样四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全面肯定论。不仅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还肯定毛泽东晚年的严

重失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错，只是在实践中没有区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应当坚持这个理论。

二是全盘否定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无限夸大建国以来的挫折和失误，并把它归罪于毛泽东个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君主、偏执狂、迫害狂，缔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多持这种观点。

三是功过参半论或“功死过活”论。认为毛泽东有功亦有过，或功大过也大，他的功已成为历史的铺垫石，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忘，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随着时代的前驶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将会成为历史批判的对象。

四是功大于过论。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论断，即认为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诸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是一个客观的、公允的、深得党心民心的评价，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广大理论工作者都赞同这一评价。

以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主要是从政治价值而言，但也包含了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估，因为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与理论评价是很难分开的。我个人持上述最后一种观点。就我们5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而论，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和党带来的苦难，个人的成长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研究毛泽东、评论毛泽东不能凭着感觉走，必须用冷静的理性去排除感情的纷扰，克服主观臆断，防止情绪宣泄，客观地评价他的功过，科学地分析他在艰辛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创造与迷失。在1981年宣传《历史决议》时，我曾写文章反复阐释过“功大于过”的论断。我认为，毛泽东是个“世界级”、“冠军型”的伟大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会发生巨大的、久远的影响。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哲学家、大诗人，他与古今中外属于这些系列的伟大人物并驾媲美，毫不逊色。不少伟大人物都有过失或污斑，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参与创造历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无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害，但是归根结底，他是功大于过。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文中，我解释说：“因为第一，功过的分量显然不同，他领导创造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的篇章；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第二，功过的时间显然不同。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算起，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谁都承认，在前四十年，他的功绩是主要的，只是在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才是主要的。把这两者相比较，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功过的历史影响显然不同。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将使中国人民世代受益。以他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努力纠正，而且，其理论根据还是他过去倡导的那些正确的思想。这几年所实行的一切，就思想路线方面来说，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后是能得到彻底纠正和克服的。因此，《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绝不是夸张或溢美之词。”历史又过去了将近10年。尽管对《历史决议》有种种诘难，对毛泽东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我认为上面的分析的基本论，久还是能经受住历史风雨的考验的。不是讲“中国魂”吗，毛泽东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国魂”。

对毛泽东的其他三种评价，我是不能苟同的。全盘否定论首先是政治的偏执和逆向，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渎。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狂躁之论，毫无科学的求实精神可言，其谬误显然，不屑辩驳。

全面肯定论是60—70年代固定观念的长期积淀。这种观，久把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割裂，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实践背离理论，如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背离了那时刚刚提出的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是，他晚年的主要错误不是由于实践背离理论产生的，如“大跃进”的实践与“大跃进”的理论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产物。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言，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的要害，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带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消除社会的阴暗面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这个理论作为一种体系，从总体上说，悼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10年浩劫的情景历历在目，很难说有什么正面价值，必须坚决否定。对这种错误理论的否定，既不会动摇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不会影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再则，否定这个理论，也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晚年所有全部的思想理论，因为即使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内，尽管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受这个错误理论支配的，但其间也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例如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警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保证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等。这些思想，有的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不失其某种战略价值或科学意义；有的则没有任何联系。这样一些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高度重视。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明，对毛泽东晚年的有些思想还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开展深入的研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要否定诸如上述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恰恰相反，还应当继续从中汲取教益。将毛泽东晚年的那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剥离、区分得越彻底，对后者的批判才能越深刻，也才能真正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全面肯定论者认为，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软弱无力和缺乏一贯性，就是由于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这几年的历史实际。这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因素发生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可以说是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实际的认识。比较多地注意反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对的，而忽略了会因此产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认识倾向，则是深刻的教训。但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也不是要继续高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混淆。

“功过参半”或“功死过活”论，亦非科学之论。毛泽东的功过并非半斤八两，已有前述。他的功绩，已成为共和国历史的奠基石。因此，只要共和国存在，就要不断地宣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伟大功绩，让世世代代继承革命遗志，发扬光荣传统，高擎社会主义的旗帜。随着历史的前进，对毛泽东的错误无疑还会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这不应该是政治上的鞭打嘲骂，而应该是科学的理性反思；不应该是片面夸大、否定一切，而应该是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把对他的错误的正确认识变成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是他在50多年前讲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也已作古。套用这句话是想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应当给以总结。就文化现象而言，也可以说，古代孔夫子，现代毛泽东，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人。对毛泽东给以总结，就包括对他在艰辛开拓过程中的理论创造与迷失的研究。研究孔夫子的学问，称为“孔学”。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问，也可称为“毛学”。这种类比也许有简单化之嫌，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并非妄议。“孔学”被研究了二千年，“烟火”未断，长盛不衰。“毛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定将前途无量，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共存。“毛学”作为学问，同其他学问一样，是不会被穷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献的挖掘，它的某个侧面或某个思想理论会不断地被突出出来加以研究，获得新的成果，推陈出新，常研常新。

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提出“毛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又在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81年的《历史决议》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明确态度。在政治上，我们党是反对对任何人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但是，把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理论及生平事业作为学问进行研究，并不是“个人崇拜”。不能把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与作为科学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

前已指出，近年来对毛泽东理论的探究有新的突破。就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而言，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使这一长期未被深入研究的理论获得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某些文章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为好似“天国乐土”，有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不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的倾向，但是，这些研究者率先对这个理论进行反思，给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笔者也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很不成熟的研究，发现毛泽东的“新民主

主义社会论”既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同时又存在一些理论罅漏，充分认识这个理论的价值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理论绝对化、偶像化则是不对的。在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成为历史，要求再回到40年前去搞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历史的。当然，这个理论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理论模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有责任继续研究它、发展它。在近作《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一文中，我初步地阐述了上述观点。这也使我感到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是可以推陈出新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对毛泽东在开拓过程中的理论迷失的研究，近来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新概念。这是一个有益的理论探索。它表明了理论工作者敢于突破禁区、创立新说的巨大勇气。对于毛泽东的晚年，我也认为需要开展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新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却又感到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有些研究者是这样界定的：“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内容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这个概念跨越的年代，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开始，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

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这样的界定，我以为至少有两点需要认真研究。

第一，怎样理解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理论意义。毛泽东的研究者都知道，毛泽东思想除了有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层含义之外，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正确思想。《历史决议》对此有明确的定义，也论列了它的主要理论内容。相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而言，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一般称之为“毛泽东早期思想”。这里既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更不可能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早期思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清楚的、明确的。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从逻辑上说，显然是相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不属于这两者范围的，统由“毛泽东晚期思想”囊括。既然如此，对它的界定，按照常理，就不应当与前两个概念存在包含关系。但是，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却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包含关系，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在1956年4月以后的其他正确思想理论这一大块，既属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叉呢？因为这两者定义的逻辑不一样。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从思想理论的性质来界定的（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都属毛泽东思想），无明确的时间下限。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则以明确的时限为主要标志（因为名为“晚期”，回避不了时间性），这就不能不与毛泽东思想概念发生内涵与外延的两重交叉。如果撇开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把这些概念作为一个系列概念来看待，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是，正由于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系列（不把它们看成系列概念，在逻辑上说不通），因而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就似违背了逻辑常理（形式逻辑要求它们互不交叉）。

第二，不能低估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据目

前的界定说：“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区别何在？界定者没作具体分析。但从其界说可以了解：“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只包括他的正确思想，因而谓之“有严格的区别”。但是，如上所述，这两个概念由于存在相当一部分的重合关系，因而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别开来。不仅如此，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1956年4月以后他的其他许多正确思想，都统属于主要指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之下，不管界定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样界定的结果必然有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误为错误思想之嫌，因为这些思想理论的光焰被厚厚的黑云压盖了。近赤者易显红，近墨者易显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放入毛泽东思想这个系统来探讨，其积极价值易被光大。反之，把这部分内容纳入以错误思想为主导的“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系统来研究，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就不像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那样得到充分认识。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应。因此，目前这样的界定，不仅无助于人们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而且可能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和对这部分理论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科学价值的研究。

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出和界定，可能主要是就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来考虑的。对于这个概念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系列关系以及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作调换角度的设想。科学研究既然提倡多角度、全方位，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上述意见供研究者参考。就笔者所知，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是曾经酝酿过“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的。因为有上述矛盾难以解决，后来放弃了这个概念。近来重新提出这个概念，尽管作了目前的一些界定，仍然没有释开上述矛盾。依笔者愚见，《历史决议》使用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提法，尽管不是定义式的语言，但却是较为准确、不会引起歧义的用语。

当然，如果认为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有利于研究毛泽东本人晚年思想的话，我以为，这个概念也不是绝对不可使用的。但是，这首先要确定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何时算起）。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取得共识。目前至少有三种意见：一是起自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二是起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后；三是起自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比较之下，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其次，这个概念要慎用。因为毛泽东的晚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晚期有很大不同。马、恩、列的晚期都不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问题，甚至还在继续发展这一科学理论。因而也不存在将其晚期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区分的问题。毛泽东则不然，他晚期大部分时间的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尽管他主观上是想捍卫、继承并以为是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因此，像马、恩、列那样，简单套用晚期思想来研究毛泽东，在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这是毛泽东与马、恩、列晚期的一个重要区别。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个区别。

承蒙中共党史出版社将我这几年来研究毛泽东的近20篇文章以《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为书名结集出版，不胜感谢。收入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基本是原发表作，编选时对有的文章作了若干文字性修改。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对毛

泽东的某些思想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不当之论，在所难免。就算一家言，作为纪念党成立 70 周年的汇报，并求教于广大读者。此篇前言文字也是仓促之作，简单地回顾了国内近年来的毛泽东研究状况，发表了上述感言。书中乖戾衅误之处肯定不少，切盼批评指正。

作者，写于 1989 年共和国 40 周年大庆之日



## 增订本序

“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泽东。”这是近年来知识界内广为流传的话。乍听起来，似不顺耳；但细一琢磨，也不无一点道理。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巨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璨群星的杰出代表，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有许多共同的品德和业绩为世人称羨，又有不少各自特殊的优点和长处为后代们敬仰。这两句话，既可看做是就他们的共性而发的，也可视为系就其特点而赞的。

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逝世时曾经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不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简单类比，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尽管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仍然感觉到了再拥有一个具备他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哲人智慧的思想家、理论家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是介绍毛泽东的最早作品。最近见到一个材料说，还在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上，一个署名为“赫”的作者就撰文介绍了毛泽东。在“赫”的将近7000字的文章里，尽管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的介绍不准确，讹误不少，但作者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宣传的，并着意刻画了他的传奇性、色彩。文章直写到毛泽东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为止。这个材料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介绍、研究、宣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时间，由1937年提早到了1935年。第二，过去研究者们总认为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并不欣赏毛泽东，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外国人早于中国人的话，那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则是中国人最早驰骋的疆场。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延安时期起，自1940年以来，截止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宣传、学习和研究方面，约有文章10000余篇，著作（包括各种小册子）1300余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多年来，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已被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了。无论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高度与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截至1991年底，已发表的论文达6000多篇，出版的专著有300多本。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出版发行的渠道多元化后精确统计甚为困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数来了解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状况。据笔者所知，为了迎接1993年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各地出版社从1990年以来都在积极组织书稿，推出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各种书籍。届时，一个新的“毛泽东出版热”将像钱塘江潮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其可能产生的推动毛泽东研究的效应来说，当属可喜可贺之事。

在这本集子初版的前言中，笔者曾提出建立“毛泽东学”（简称“毛学”），

即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开展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同道者、研究者和读者的赞同。不管这个提法合宜与否，“毛学”事实上已经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发表的10多年来，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道德与文章、早期与晚年、正确与迷失、贡献与错误，已经被作为学问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请参看本书的终卷篇之一《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随着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到来，“毛学”将再次成为热门学科。

随着研究工作的全面推进，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一个兴奋点。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这一课题既有异常的复杂性，又有鲜明的现实性。对笔耕者来说，是块很有潜力的“可耕地”。但是，要耕耘它，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花大气力。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重方法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个“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思路对头，方法对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对所研究的大小课题都作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而不是罗列现象，剪裁历史，那么，经过一番艰辛劳作，加上“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在这块“可耕地”上是可望获得丰收的。

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为根本准绳。这既是一条首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无论是国内的政·治风波，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回流”，都证明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周而是站得住的。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想动摇它，没能得逞，全党、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这个决议。我们国家、我们党所以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条，也得益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试设想，如果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拨乱反正，继续“文革”路线，行不行？当然不行，人民不会答应。按照“文革”路线，根本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同样，如果1981年的《历史决议》搞“非毛化”，像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那样，又将怎样？那也不会有中国的今天。近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分裂、大雪崩就是明证。仅此而言，我们也要感谢有这么一个好的《历史决议》。当然，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会有对《历史决议》的评价提出异议者。作为学术问题，不同的观点、意见在一定范围内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表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能获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的认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又都可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求得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获得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很不容易。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从政治大局出发，十二分地珍惜这个历史成果。因此，深入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

对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研究中尤其需要采取分析的方法。所谓“剥离”，就是分析的形象说法。提出“剥离”，其前提就是承认正确与错误处于交织并存状态。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可能有

这种情况，既没有 100% 的正确，也没有 100% 的错误。但是就其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影响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毛泽东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他的思想才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思想指导与错误的思想指导互相交织着向前发展，此起彼伏。这就构成了“文革”前 10 年间他的思想由正确走向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纠正以后又在阶级斗争方面犯错误的发展曲线。怎样把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加以区别，这就需要分析和“剥离”。在“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错误的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但也不能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就没有一点正确的思想。事实上，在这 10 年间还是有不少正确的或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的，有的甚至还被包裹或镶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有游离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外的。这就更需要进行分析或“剥离”，不能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否定掉，不能在抛弃错误的理论体系时把包裹着的合理内核因素也扔掉。

应当指出，“剥离”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剥离”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对经过“剥离”之后取得的合理的内核因素也还要继续进行分析，甚至改造，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比如，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就属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提出“和平解放”、“和平演变”问题稍早一些。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则是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不久。虽然毛泽东主要是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反苏反共逆流，从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背景、大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但也不能说这与对庐山会议错误开展的党内斗争的认识没有一点关系。当时，毛泽东是把庐山会议的斗争看成“帝、修、反大合唱”在党内的反映的。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后来又与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以致到发动“文革”之后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容（这就是当时特指的“反修防修”等）。但是，从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他始终关注世界形势格局的变化及思考问题的视野来看，它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容。因此，一方面，要说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完全不属于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另一方面，把反“和平演变”思想简单地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等而视之，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实际。还要看到，一方面，毛泽东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充分显示了他那深邃的战略眼光，无疑是个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法，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邓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思想拿过来加以宣传，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审视，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重要国策。现在，我们党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复过去那些不正确的作法，而是更加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这看成是真正

能够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路线。

在毛泽东晚年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些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概括这些思想的历史根据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源于毛泽东 1963 年 5 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加写的一段话。“前十条”贯彻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是一个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文件，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却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实践论》的观点。这种矛盾现象怎么解释呢？既不能因为他概括这些思想的直接根据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否定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因为这些哲学理论是正确的，就认为当时作概括的历史根据也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不仅是毛泽东，在古今中外的一些其他思想家那里，也不乏这种矛盾现象，因此作结论不能简单化。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理论的概括，一个思想的产生，往往不是即兴之作，不是根据某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来的；而多半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孕育，到了某个时候，通过某件具体事情被引发出来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有些思想早在抗战时期就萌生了。在 1939 年 9 月关于动员延安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当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我们做好了计划，提出了口号，但这还只是思想，不是现实的东西，只能想象和思考，而不能手触和目视，就是说，它还只是精神而非物质。现在呢？现在已经变成一粒粒的小米、黄米，一个个的西瓜、南瓜，还有蜜甜的梨子、血红的西红柿；现在不仅手可以接，眼可以见，而且嘴可以吃了。“这就告诉我们，一种思想，只要有根据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到了 1956 年 2 月，毛泽东找国务院工业部门负责人进行经济问题调查时，再次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从物质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1963 年 5 月，即在修改“前十条”期间，毛泽东讲哲学的兴致很高。他在当月的杭州会议上有一段讲哲学的长篇谈话，其中心就是继续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问题。他说：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不对；人民大会堂还不是由工程师、工人变成的。物质变为精神，精神变为物质，如此反复，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可以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内容，不仅是概括发挥了这次会议的讲话以及另外一些讲话的精神，而且可以说是自 1939 年以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积淀的结晶。理论的根往往是又深又长的，它不单纯是某个时期某个实践的升华。它既可以是对长时期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的反思，也可以是其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视为根据 60 年代初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而提出的。

真理与错误有时只有一步之隔。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变化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一步”而进入误区的。同样，现在分析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变化，如果不把握住这“一步”之别，也会混淆其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界限。前些年有一种说法，认为《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部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误解了《正处》的基本观点，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作为其前提的。《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党的八大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它关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正处》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诚然，在《正处》修改过程中加写了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毛泽东已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为关于长期性、曲折性和有时呈现激烈性的说法，只是一种对阶级斗争的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承认阶级斗争的这几“性”，并不就意味着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时也可以表现出这些特点。近两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正处》发表3个月之后的1957年10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正处》发表到八届三中全会的这3个月，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3个月。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毛泽东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越，超过了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陷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当然，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分，我们党也是在历史前进了几近1/4个世纪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要遵循《历史决议》，努力弄清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变化轨迹，才不致混淆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思想路程。

以上强调将毛泽东晚年的正确与错误加以区别，不单纯是为了更多地发掘、肯定其积极方面的价值。主要是体现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对于其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一个辩证的否定态度问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倒垃圾”、“泼污水”，何况对“垃圾”、“污水”还有一个再处理，变废为宝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找到正确实现的方法而发生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看待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它的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例如，第一，它至少告诉我们，“走了岔道”。离开基本正确的轨道走了10年“岔道”，付出的代价够沉重的了。此路不通，不能再走。否则，就是无视历史的惩罚，拿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幸福开玩笑，这就受了益。第二，具有物极必反效应。“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有跌了大跤、吃了大亏，才能对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认真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人们常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也就是错误的反面“贡献”。所谓“错误是正确的先导”的实际含义也就在这里。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任何情绪化的宣泄），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际上对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错误都应如此），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历史是以滚动方式曲折前进的。一个时期，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被突出出

来；但过一个时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可能直面行进在历史道路上的人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强调的侧面和重点都会因时、因地、因情况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认识不能不受历史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时的强调某个侧面，就不能脱离对该事物的总体的认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的突出，就不能离开对其总体的评估。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不能不分析历史前进的特点，注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研究毛泽东本身不是目的。从理论方面说，研究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了在长时期内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东欧、苏联剧变后，我们国家没有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归根结底，是由于这 10 多年来的路线正确，尽管在某些政策上和许多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甚至有很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从主流看，路子是走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错误的必须努力纠正，正确的必须坚持。没有这两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的路线的正确性的认识不会有那么深切。有了这两年变化形成的巨大反差的比较，使人们一方面更加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形势的严峻性，同时也更加坚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提高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党探索出来的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追根溯源，最早还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期曾经努力开辟的，但是他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趋向，并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大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超越了毛泽东。

同时，这 10 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为远了，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讲得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认识中不仅由短变长（因为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更无法预测），而且其所要实现的日标由高变低了。如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主要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再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包括承认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由只承认《哥达纲领批判》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必要，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料不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仅此而言，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从理论到实践，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如与共产主义的日标似乎越来越远了），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这 10 多年来，就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所表现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而言，与党史上由内战时期到抗战时期的转变有某些（而不，是全部）相似之处。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作这一历史的比较旨在说明，当年的毛泽东正是在历史性的转换关头，高瞻远瞩，以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理论分析力，总结党的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巨著。今天，我们党也需要有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及其经验教训的理论巨著，需要有新的《实践论》、《矛盾论》，需要有像《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巨著。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一个巨大的理论责任感就是，为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应有的奉献。

这本集子再版，增加了几篇文章。有的是前些年写的，有的是近几年的新作。另外，凡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均以 1991 年的第 2 版为准。全书 20 多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一些粗知浅见，甚至也难免有愚知陋见，欢迎广大同道和读者不吝赐教。如果说本书的初版是献给培育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亲爱的党 70 周年生日的礼物的话，那末再版增订本则是献给传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敬爱的导师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诞辰的一份微薄的纪念品。

写于 1992 年元旦

## 新增订本序

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印行 25000 多册，据说都已销售完了。这次重新增订再版，除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作了校改外，主要增补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至今年初写的 10 篇文章。

按惯例，一本书再版，作者要唠叨几句，我也难以摆脱这个定势。

这次再版，讲三点想法。

### 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确实博大精深

说实在话，一个时期，我不爱用“博大精深”四字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伟大性。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被用得太多、太绝对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感到，尽管这是一个“陈词”，但还是不得不用。

第一，毛泽东不仅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留下的论著、讲话等各种文稿估计达数千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著作有特殊的魅力。读他的书韵味无穷，能使人浮想联翩，开阔思想，启迪智慧。不用这个词，似不足以表达那种感受。

第二，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并不排斥承认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因为就“博大精深”一词的本意讲，只是形容知识渊博，思想精邃，并不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关于认识是否完全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博深”性与思想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不是一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博大精深”，使其几乎成了“绝对真理”的代名词，那是一种狂热。在狂热之下，不讲科学。混淆概念，不足为奇。经过拨乱反正，在已经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伟大与迷失区别开来之后，再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通过透视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而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某些“真理的颗粒”，会真正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理论的“博深”性。这种“博深”性不等于真理性，不是要把毛泽东那些错误的东西也说成正确的。我想，只要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那么，说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就既不是一句溢美之词，也不会引起其他歧意。

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 1993 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再次达到了高潮。据悉，这一年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 5000 多篇。出版的有关著作达 600 多种，1994 年，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在继续。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仍然不少。1995 年发表的论文仍有 1000 多篇，出版的著作仍有 70 多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然，对毛泽东的研究数十年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这有许多原因。首先它无疑与我们党和国家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著作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一点，仅靠外力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学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即我在前几年讲过的“毛泽东学”。在不少学人看来，“毛泽东学”好比一座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可供长时间地开采和加工。生产和研究。因而，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不时地掀起高潮或热浪。

### 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河对岸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



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言，9 厂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卷、《毛泽东文集》2 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 卷、《毛泽东外交文选》1 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 卷，还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3 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 800 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 卷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因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

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或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或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面世。但是在大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经过慎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的指导思想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

### 三、应当继续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这些年来人们关注、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产生困惑，不能正确对待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

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偏向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虽然是个别的，但近来海外诽谤毛泽东的出版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进来，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种偏向是以毛非邓（至于那些既非毛又非邓的，属另一种性质问题，当作别论）。在 80 年代末的动乱之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包括对苏联、东欧紧接着发生的逆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以及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实际上，小平同志也在反思。1989 年 6 月 9 日他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反思之作。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基本路线、战略目标都没有错，应当“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后来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集中地表达了他反思后的新认识、新结论。这种反思是科学的、正确的，代表了全党反思的主流。也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偏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讲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只抓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不符实。特别是这几年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些方面出现滑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强有力的遏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发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尽管矫正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实践的问题。党的各项工作跟上去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糊涂观念就容易消弭。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的。

一是要继续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晚年有错误，并且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是上了 1981 年的《历史决议》的。对这一点要十分明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根本没有否定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言，那是对立的，两者是否定关系。但是，就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而言，两者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书新增补的几篇文章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对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困惑，除了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保留看法，这是一种情况外，还有的，就是对现实与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虽好，但与现实很难对上号，因而怀疑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这个理论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上的混淆，即把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这是要加以区别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工作实践，并不完全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那些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一概都在克服和纠正之列。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1 页。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言，并不存在什么反差；至于讲那些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关系，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那些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地转化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里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全身心的投入。又要有能正确地体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系列具体要求的、到位的方针政策。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些中间环节上。这正是难点所在。也是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还需放开历史的视野，既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性，更要看到两者的共同性。就纠正前述的不同偏向来说，无疑需要强调不同的侧面。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而言，则应当强调两者的共同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历史的现阶段来说，两者的差别性比较明显。但就历史的宏观而言，两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几千年，称得上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能够治国平天下（实指安华夏）的，在古代要数孔孟之道。微观地看，孔学与孟学有无区别？当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是继承与发展中的区别。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不是两者的区别，而是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即孔孟儒学这个思想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治国之道，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在近代，虽有孙中山的理论，但不能与之匹敌，未能实现其治国安邦的宏愿。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张地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古有孔、孟，今有毛、邓”，后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对于科学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促进政治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纪念。增订再版拙著，也算是再次表达点心意吧。

本书尽管重新增订再版，但不妥之处可能还有，包括本篇感言可能也不尽恰当，衷心欢迎指正。

写于 1996 年春节前夕

## 导 论

### 科学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 32 年伟大而不平坦的历史道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实践的反复检验，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饱尝过沉痛的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同志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总结，发表了许多启迪思想、富有胆识的深刻见解，对党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很有帮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正确意见，吸取了这几年总结历史经验的一切好的成果。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一首咏庐山的名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痛定思痛，回顾历史，一时难以排除感情的纷扰，把建国以来历史中的错误看得过重了，不能得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以冷静的、理智的头脑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严格地解剖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说过：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这三句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也是我们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次发表的《历史决议》正是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了深刻的总结，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 一、站在人民群众的豆场上，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成就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仅古代的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同样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在我国，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就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作为新中国的创造者，都参加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也是为了这一伟大事业，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起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因此，回顾历史，首先应该把我们国家32年的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斗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只有站在国家主人翁的立场上，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因个人不幸遭遇所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

《历史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它把我们党的事业看做是人民的事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看做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并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评价历史、衡量是非的尺度。

这样，对于建国以来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客观的，它揭示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面貌；

这些结论是积极的，它将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历史决议》指出，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历史决议》对32年来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了概括。这些成就，是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客观事实。当然，这些成就还是初步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人们期望的还有很大差距，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过去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把落后当先进，这样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随着我们自己的弱点、落后面的不断暴露，随着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挫折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于是就忽视和否认我们的成就，把自己的国家看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国家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在一些方面是落后的，但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要作具体分析。我们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一样，把一些不可比的东西拿来进行简单的类比，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不反对比较，我们赞成拿客观条件大体相同的对象进行合理的比较，以便从有启发性的对比中帮助大家分析问题。拿我国同原来在许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的印度相比较是合情合理的。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或解放的，有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不

同的地方，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对比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哪种社会制度优越，看出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

印度经济专家拉马斯瓦米 1980 年到我国进行访问，对印度与中国 30 多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作了一番比较。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在 1949 年，中国远比印度的条件要差，但是到了 1980 年。因这两个大国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例如：粮食产量，中国是 33000 万吨，印度只有 14000 万吨，而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还多 3000 万公顷；钢，中国是 3300 万吨，印度只有 800 万吨；煤，中国是 60000 万吨，印度只有 12000 万吨；石油，中国是 10600 万吨，印度只有 1200 万吨；发电量，中国是 2820 亿度，印度只有 1030 亿度。就人民生活而言，这位专家说，按人口计算，中国的平均收入两倍或三倍于印度；尽管在印度上层社会中占人口 10% 的最有钱的人的生活远比中国人富裕，但是印度其余 90% 的人的生活，则是明显不如中国。另外，据有关方面统计，从 1949 年到 1979 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增长 40 倍，印度只增长 4 倍多；我国的农业生产增长 2.7 倍，印度只增长 1.2 倍；1979 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为 260—270 美元，印度只有 183 美元；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中国为 332 公斤，印度为 201.2 公斤。当然，应该指出，印度也有它的长处。这些年，印度人民在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现代化工业、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等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比较从来都是相对的，也是有局限的。我们不能据此轻率地去作什么全面的结论，但是，从这一比较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和印度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很大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我们建国 32 年来的成就不能低估，不要自己小看了自己。消极悲观、妄自菲薄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决议》说，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党和人民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历史决议》中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通过上面的对比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实事求是地肯定这些成就，不是为了炫耀或宣传，而是为了肯定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肯定我国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已经占有的阵地，也是继续前进的基础。我们要百倍地珍惜业已取得的成就，并努力去发展这些成就。

---

以上关于我国工农业方面的几个数字，是印度专家访华期间所了解到的。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 1980 年的有关实际数字是：粮食，31822 万吨；钢，3712 万吨；煤，62000 万吨；石油，10595 万吨；发电量，3006 亿度；自行车，1302 万辆；手表，2216 万只。

## 二、以历史的分析态度，辩证地 看待历史的曲折

《历史决议》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32年间，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犯过错误，国家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应当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曲折呢？

首先，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历史发生曲折是不足为怪的现象。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往返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估计历史的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神，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要求不走一点弯路，不发生一点挫折，这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认识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世界历史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100多年来的发展经受了不少的挫折。就拿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一段历史来说，就经过了几起几伏。社会主义的力量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了胜利。就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是也有几个国家发生过政治动乱、经济崩溃的危机吗？在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甚至已经得而复失，同这些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比较巩固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内乱，社会主义制度巍然屹立，就充分说明了它在我国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历史的曲折毕竟不能逆转历史前进的方向。

其次，我们国家所遭受的挫折，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但是，经过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并且决定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这不是任何外力强加于人民的，而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极端的革命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所遇到的很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顶见的。没有经验，摸索着前进，有时就成功，有时可能难免发生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总的来说，我们的指导方针没有大的失误，并且探索出了在我国胜利实现和平赎买的独特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也曾希望找出一个好的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政治矛盾，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缺乏认真的研究，在发展进

---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3页。



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酿成某种严重的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党没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分析，却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老经验，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看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且照搬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这就导致了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后发展到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于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我们既缺少经验，也缺乏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其他方面的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这就造成了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这些失误和挫折，无疑给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应当把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挫折，同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压迫人民，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危机区别开来，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划清了这个基本界限，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历史曲折。第三，对错误和挫折的不同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建国以来错误和挫折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历史决议》对这些错误和挫折作了深入的分析，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区别：（一）把全局性的错误同局部性的错误加以区别。作为全局性的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运动。其他如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比大革命”以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只发生在一定范围内，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二）把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在 10 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使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被中断，这也是不能抹煞的。（三）把纠正错误不彻底同没有纠正错误的情况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除了没有认识到的以外，只要认识到了的，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决不是一点没有纠正，政治方面，1962 年前后，既给“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又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摘掉了政治帽子。经济方面的错误，在 1958 年底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只是由于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被打断了。从 1960 年冬以后，我们党以巨大的努力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当然，那时的纠正是不彻底的（没有认识到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但不承认我们党为纠正认识到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是不应该的。错误有大有小不一样，知错不改和知错就改也不一样。

第四，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当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看待。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错误本身是不好的，但只要认识了错误，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变为宝贵的财富。过去发生的几次大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制度上的弊病，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从而使我党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就是深刻地认识了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就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改变长时间以来流行的对待错误和挫折的形而上学观点，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财富的一面。向错误学习决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善于思索的人才能领略它的深刻意义。历史的灾难必定会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必将使我们在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得到补偿，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 三、分清是非功过，科学地评价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

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评价问题正确地解决了，其他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都好总结。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各项重要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成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错误也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犯的。一切重大的功过是非都与他的作用分不开，因此，《历史决议》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革命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革命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发生着巨大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都是在他的思想哺育、教导、熏陶下成长的。他开创了一代学风、一代文风，至今我们常用的许多科学的政治语言都是由他倡导开来的。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那么巨大的历史功勋，尽管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他的战友、学生、后继者，要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又必须对他的功过是非加以评价。《历史决议》就是抱着这样崇敬的心情和审慎的态度，努力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方面同错误的方面区别开来，使我们党对他的评价成为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

首先，既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又严肃地指出他的历史错误。《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历史决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发展的历史同他的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上，论列了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同时也论列了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所犯的错误。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煞他的巨大功绩。《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大于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第一，功与过的份量大小不一样，就拿他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绩来说，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第二，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毛泽东同志从开辟井冈山道路以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前40年被公认为立了大功，在最后10年犯了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第三，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一样。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中国人民将世代地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至于他晚年错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陆续纠正，而且还是根据或通过发展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因此，《历史决议》说“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绝非夸张之间。

第二明确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划清界限。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是不应该的，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同样会由混淆是非而导致混淆敌我。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目的不同。毛

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毁灭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党。第二，活动不同。毛泽东同志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但其问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则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的罪孽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第三，指出错误的责任，但着重于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历史决议》中是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既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归咎于谁的责任了事，也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品质特点来说明，而应着重于分析历史环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当时是告诫别人的，现在对于他自己也应当取这种态度。

《历史决议》根据这个精神，不仅指出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国内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他的错误在于时这些问题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应该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扩大到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修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和党内范围，并把它同党内的意见分歧混为一谈。他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他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是指我们国家漫长的封建历史、专制主义的遗毒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使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成了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滋长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也就很难加以制止了。

第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加以区别，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历史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结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强调毛泽东

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今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论列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一要坚持这些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论点，曾被概括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决议》既分析了它的谬误，也指出了它在实践上的危害。这个“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必须坚决摒弃。由于这个“理论”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专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这个术语也不宜继续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同志基于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但是他本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那种革命进取精神，还是不应当否定的。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也不等于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仅巨前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而且将来也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理想而进行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这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历史决议》明确地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指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庄重宣言。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其错误坚决地加以剔除，对其正确的东西热情地加以保护，从而既科学地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又正确地维护了他的光辉形象。《历史决议》的这种分析，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党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四、从实际出发，郑重地改变一些重要的历史提法，进行新的历史概括

总结历史经验，决断历史问题，除了要评价历史事件，分清历史功过之外，还要对以往的历史概念、历史提法进行审查和检验。列宁说过：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历史实践是检验历史理论的法庭。一切过去的历史认识都将在它面前重新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不完全的予以补充，不科学的使之科学化，使一切新认识都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的确切表达上。《历史决议》正是这样，在回顾党的发展历史的时候，改变了一些过去常用的历史提法，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历史概括。

（一）正式恢复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政权形式所作出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从实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对它的性质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其二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在我国具体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形式，这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两个概念是并用的。十年内乱期间，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被废弃了。这段历史曲折，从反面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提法，因为仅从概念的表述上，它就能明白无误地照顾到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使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职能，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上任何曲解和片面性。

（二）明确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个提法与过去说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它把这一历史阶段的特征表达得比较明确。因为过去的说法从表述上来看，只说明是一个“过渡时期”，而没有说明是从什么状况到什么状况的过渡。马克思、列宁曾把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一阶段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我们国家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是在半殖民地个封建的条件下发展了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走过的历史之路。《历史决议》把这一阶段概括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当然，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形态，也不意味着在这期间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特点所形成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新民主主义就其整个的情况而言，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

---

《列宁先集》第3卷第39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5页。

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中也说，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事实上，自从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全面展开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因此，那种把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截然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对的。此外，承认这一阶段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我们把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以后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矛盾。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方面，它表明我们“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这个称呼也决不是空招牌”。我们说过渡时期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就它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就社会主义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成分中处于领导地位而言；说这个时期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就它的政权形式的某些特点和有五种经济成分存在而言。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侧面加以强调的结果，没有根本的质的区别。

（三）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历史决议》写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表述吸取了党的八大决议的成果，也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一致起来了。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无论是讲基本经济规律，还是讲主要矛盾，所要概括的内容都是一个，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历史决议》的这个表述还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它直截了当地揭示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要使生产满足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历史。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它被异化了，靠牺牲一部分人的需要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就愈益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人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征服自然、满足需要的能力。因此，像《历史决议》这样来表述主要矛盾，就直接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第二，它明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生产的目的不同。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者成了生产的主人，生产的目的就不再是满足少数剥削者的需要，而是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就是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历史决议》的表述把生产发展的目的性和迫切性明确地反映出来了，有利于克服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性的各种错误认识，提高我们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的自觉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4—705页。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0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6页。

历史的总结所持的态度是极其郑重的，它既没有掩饰任何一个重大错误，也没有去追究任何个人的历史责任。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阶级的政党都不可能做到的。它充分说明，我们的党无愧于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无愧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学习《历史决议》，应当充分地认识我们党的这种严于解剖自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把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历史决议》精神上来，不要再去纠缠一些细枝末节而模糊自己的视线。我们应当像《历史决议》所号召的那样，全党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本文曾获《红旗》优秀理论文章（1979—1983）奖，原载《红旗》1981年第14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 第一编

###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调查 研究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根本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基本经验。

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是很难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贡献，对于追思革命导师的功业，使我们后来人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很有裨益的。

## 一、调查研究是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

认识社会要进行调查研究。马克思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最早的调查研究还可以说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1842年到1843年，莱茵省会议关于林木盗窃、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等问题的辩论，使他第一次去接触社会问题。而对于故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考察，则成了他转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不仅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时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注重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实际调查，不仅高度地评价了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且1866年，他曾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大纲，指示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按照大纲进行调产统计：1880年，他提出过一张《工人调查表》，列举有关工人的生产、工作日、工资所得、工场劳动环境、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等方面的99个问题，对于全面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在被贫困和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艰难条件下，花费40年的心血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在科学史上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他搜集和阅览了浩瀚的经济文献和统计资料，包括那些被英国议员们用作手枪射击靶子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考察和研究了农业化学、农艺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地质学、货币上、技术史等一切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学科；研究并做过笔记。摘录的书就有1500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此外，还密切地注视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他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填密、彻底的考察和研究，使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他的伟大战友恩格斯以及伟大的列宁也是对社会状况和在科学研究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提倡调查研究当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始。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历史情况也作过大量的调查，积累了许多统计资料和其他材料。这才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利用他们的调查资料以及他们的理论成果，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来为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服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同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调查者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不同，而且调查方法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调查研究置于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列宁提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的思想，要求“从事实的全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他们所阐述的这些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

---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页。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第23卷第279页。

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仅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认识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调查研究是根据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去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正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调查研究，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教育干部的方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经历艰难困苦走向胜利的方法。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科学，为各国的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只能是一般的指导原则，而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各国的革命者都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以后他还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回答俄国革命问题时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种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但在近代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跟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力量没有取得民主的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其特殊，革命过程极其复杂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无论在每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任务。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怎样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呢？这就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国情，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又说：“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马屯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105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没有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实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政策就不可能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就是说，不仅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也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前期，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客观实际不做或者很少做调查研究。当然，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任何人都会有一个过程，中国革命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夺取胜利。但是，如果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即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那么，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就会缩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严重的挫折，固然反映了全党当时的幼稚状况，但是，就造成这两次挫折的主要领导人说，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不做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因而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拿陈独秀来说。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他连任党中央的五届主要领导人期间，既没有深入工农下层群众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调查，也没有从当时已有的社会历史资料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他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应该由谁领导、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许多观点脱离中国实际。他提出“二次革命”论，就表明他在根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之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不同。他也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在农民运动兴起以前，看不到农民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在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又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反而主张强行解散农民的武装，当蒋介石已经暴露出反共面目之后，还声称要“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等等。他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致了惨重的失败。毛泽东同志批评陈独秀不做调查研究时指出，蒋介石手里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中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

比起陈独秀来，学生出身又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更是缺乏调查研究。1924 年大革命运动初起时，他刚考入湖北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 年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 4 月回国后，既不愿意到展现革命希望的农村根据地去，也不愿意到劳动条件艰苦的基层工作。从 193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直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结束他的“左”倾错误领导的整整 4 年间，他在国内只呆了 9 个月。从他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在 10 年里，国内生活的时间总共也只有 3 年左右。他脱离中国实际，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唬了不少人。据说，他把一些“本本”背诵得烂熟，曾狂妄地认为：半部论语能治

---

在 1926 年 12 月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126—1127 页。

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他目空一切到了极点，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但是这不能使他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任何实际斗争，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研究，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像他这样对于“中国是个什么东西”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通过调查研究来懂得的人，怎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呢？怎么谈得上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与陈独秀、王明这些人完全不同，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他的同时代的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一个显著优点。还在求学期间，他就利用假期，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做社会考察。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使他对自已国家的状况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自己却执拗地要留在国内。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很不够，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过，在他早年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他能运用书中的道理，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实际的阶级斗争。从1921年参加建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几乎每年都用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穷酸秀才，钱粮师爷，县衙狱吏，商会会氏，破产地主，学校教员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的调查报告和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这些调查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像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是极其罕见的。

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但是，他也很重视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即使在偏僻的山沟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动乱的条件，他都尽可能地搜集马列著作阅读。1929年11月底，他在汀州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要求赶紧寄来“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出版物。到达延安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读物，刻苦奋发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所进行的实际的社会调查和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再加上这样坚毅的理论准备，使他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从而实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艰难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卓越领导人也都是这样通过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含辛茹苦的奋斗着。

当然，深入实际的社会调查不是调查研究的全部，但是现在所说的调查研究，首先是指这种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对于革命工作来说，这是最具有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11页。

决定意义的。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注重社会调查，而且号召全党开展社会调查。地方工作要做社会调查，军队工作也要做社会调查。无论在井冈山时期，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他都十分强调这一点。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广大干部逐渐养成了做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显著提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得到很大增强，为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也与注重调查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面对着腐败的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的许多领导人率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负责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迅速扭转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使经济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而且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通过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努力摸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60年冬以后，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都凝聚了全党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但是，同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情况相似，党在一段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使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开创了调查研究传统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一度丢掉了这个传统。他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1958年搞“大跃进”犯错误是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犯错误的原因之一，也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体制、农业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干部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使我们国家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出现了中兴繁荣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要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 二、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活动 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它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革命实践，离不开对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就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也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进行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进行的调查研究毕竟又有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于，在马克思那里，调查研究主要是个人用于进行理论创造，毛泽东同志则把调查研究进一步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在于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和统计材料之类进行研究来形成革命理论，如列宁所说的，“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就毛泽东同志开辟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方面的理论来看，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亲自调查，即社会调查而形成起来的。因为在中国，如他本人所说，没有“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关于农民问题。在马列著作里，对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和在夺取政权后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问题，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中国这样以农民人口为主体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怎样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呢？怎样具体分析农村各个阶级和不同阶层农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呢？这就不仅需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农民的各种文献资料，更需要对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同志出身农民家庭，长在农村，对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在15岁阅读中国的文史书籍时，就发现书里没有写种田的农民。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即使在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没有间断对于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1925年他回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发现贫苦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1926年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不仅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还把学员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提出租率、利率、工价、田赋、主佃关系、厘金杂税、农产价格、抗租减租、抗粮情况、地主之来源、直至民歌、成语等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他还组织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把学员们写的调查材料加以编选，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问题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之中。他在《丛刊》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当拿了这一

---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7页。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调查来”。

1926年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主管农民运动后，更是把精力倾注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当蓬勃高涨的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污蔑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后，他毅然回到湖南走访了5个县，做了32天的实际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唯一全面调查过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领导人。通过实地调查，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革命兴起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也认识到了党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又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这次调查，不仅对他形成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而且对他一生的实践和理论活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不是第一个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是由于他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这样长期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民革命斗争有这样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因而在他当时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能够最鲜明地论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右倾危险。他根据正在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需要加强领导的客观情况，针对党内出现的放弃资产阶级对农民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倾向，明确地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迎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下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下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不怵得这一点。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明白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封建地主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然而要动摇这个基础，“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不是一般地承认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不是宠统地把不同阶层的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是通过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抽象地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重大作用，而是着重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中论述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思想，奠定了中国

---

《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通过组织城市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其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同样是首先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北伐战争开始后，党才比较多地注重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并没有明确要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党组织武装的反抗，先后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揭开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还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革命实践提出来的，也是全党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就毛泽东同志来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首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又不能不归功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的注重。八七会议后，他在回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途中，曾翻山越岭，过平江，到修水一带调查访问，了解当地农民和党组织的情况，为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第一手材料。在部署秋收起义的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他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便对那里的情况发生浓厚兴趣。这些情况帮助他在浏阳文家市决定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时，正确地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大城市不是我们立脚的地方，我们要找一个群众基础好，地势条件好，几万敌人也无奈我何的地方。到达宁冈后，经过分兵转战湘东、湘南，以及对湘赣边区各处的实地调查和比较，认为井冈山地势复杂险恶，周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弱，再加上有群众基础和地方“党的组织，实行武装割据是有条件的。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个情况说：“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要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怎样打游击？书本上没有，外国经验没有。北伐战争也是正规战。只有在实践斗争中学，通过调查研究来学。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王佐、袁文才那里了解到井冈山过去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地主武装围剿他几十年，也没有打垮他。他所以站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个故事给他们很大启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可以把朱聋子的办法改一下，不但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在战争实践中，红军战士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地创造了开展游击战的许多战术。例如，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这些战术远远超过了朱聋子的“打圈”战术。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战术加以总结，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从而形成了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完整理论。

（三）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八七会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革法？没有形成结论。在外国，只有苏联实行过，这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有，消灭地主富农。共产国际代表主张中国也实行土地国有。“左”倾错误领导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教条主义地生搬外国经验，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

全归组织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开始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但是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使错误的认识不断得到纠正，最后日趋完善。

在八七会议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表示过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的意见，但是两天以后，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的主张。上井冈山后，土地政策成为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为了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同志上山不久就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通过这两个调查，初步地了解到了湘赣边界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对于中间阶级的打击“过重”了；他们反叛革命，依附豪绅阶级，使贫农陷于孤立，于革命斗争不利。毛泽东同志说，“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可以考虑“向白耕农让步问题”，但由于没有讨论研究，“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一个月后发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就是根据中央办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1929年初，党的“六大”决议传达三井冈山，同时根据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上述规定。这年4月颁布的兴国县《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开好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率领红四军前委派来的同志向代表们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他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下没收”；对富农“不没收其田地”，也“不派款”，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井冈山、兴国县的两个《土地法》和闽西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为正确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表明了党对于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

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是毛泽东同志发展土地革命政策的两个十分重要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内容丰富，解决的问题也较多。首先是关于工商业问题。当时有的地区还有“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的“左”的影响，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政策，党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未做过认真的调查。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即使能规定某些正确的原则，也“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因此，他在1930年5月“下大力”进行了寻乌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写下了8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其中“寻乌的商业”一章，长达3万余字，是他进行城镇调查唯一系统的材料。这次调查使他了解了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的剧烈情况。这次调查之后，保护工商业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其次，关于富农问题，

---

1927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页、71页。

见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

这是土地政策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在政策的制定上，党既有一个认识过程，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左”的或有的错误倾向，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显表现。寻乌调查之前，对待富农只规定抽多补少的原则已反映出缺点。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富农在抽多补少时只拿坏田，不抽好田，这种“肥瘦分配的斗争”，既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也是“土地斗争的中心”问题，于是决定“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项原则进一步限制了富农，有利于贫农，正确地引导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展开。寻乌调查尽管还没有把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严格区别开来，也不可能不受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经验提出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对富农的政策还是比较适当的。1931年王明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他们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使土地革命斗争出现了较大的反复。1933年的查田运动，也不可能没有“左”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尽力对“左”的倾向加以限制。他深入调查研究搞试点，根据土地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区别，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为了巩固地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利益，首次提出了“富裕中农”的概念，以稳定富农与中农交界的那一层人，使他们“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接着在10月颁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又规定了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具体标准，以及从剥削时间和剥削分量上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数量界限。所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的错误的发展。第三，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还深入地了解了农村的剥削状况。在寻乌地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的方式竟达20多种。毛泽东同志说，他历来疑心书上记载的“卖妻鬻子”的话，这回特别过细地作了调查，结果几个村子确有其事，说明“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在兴国调查中，继续了解农村的剥削状况，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使他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一方面，地主、富农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另一方面，贫农和中农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仅占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还作了一系列土地问题调查，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不断完善起来。在调查中，他发现到处存在的“荒田现象”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有关，提出：过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这就彻底纠正了“土地国有”的规定。1932年，他根据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于农村的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作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4页、22页。

1933年6月14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见1933年10月《斗争》第32期。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26页。

了明确的政策规定，解决了党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样，经过前后六七年的调查研究，按照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说法，才算认识了中国农村。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后党的政策虽经几次变化，但基本上没有离开这条基本的路线。

（四）关于根据地建设。这是工农武装割据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军相区别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十分熟悉，深知建设根据地的重要。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他还让部队讨论，王佐、袁文才的武装在井冈山能够长期存在，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就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怎样建设根据地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实际调查时，也把根据地建设问题列为重要内容。

根据地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在井冈山调查时期，毛泽东同志发现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没有解决好民主政治的问题。各级革命政权建立了，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宣传教育的缺乏，还不习惯使用民主权利。一方面，执行机关代行权力机关的职权，工农兵政府权力独揽，由群众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党组织包办政府工作，直接发号施令，把政府机关搁在一边。根据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要把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建设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党的领导要避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很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之后，他的工作上要在苏维埃政府方面，使他比过去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权建设问题。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特别是兴国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调查，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除了工作方法外，有些人还不懂得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因此，他在《今年的选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等文章中，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群众自己建设和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苏维埃政权的宗旨是，“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与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既要用全力去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又要用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改良群众生活。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应当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他认为，尽管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但是，如果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不注意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那么，扩大红军，动员支前等工作都是搞不好的；长冈乡、才溪乡的工作人员所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73页。

1934年4月10日的《乡苏怎样工作？》。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创造了一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使群众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同他们呼吸相通的。因此，他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当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真心实意地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组织犁牛合作社到老婆生孩子，都要关心。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形成为任何力量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根据地建设，除了政权建设外，还包括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任务。在中央苏区，为了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除进行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外，还利用养病休息期间在长汀和瑞金等地进行了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就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这些调查，他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在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等战争胜利了，有了和平环境再搞；也有的把经济建设看成一切任务的中心，忽视了革命战争的环境。毛泽东同志认为，把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调查中了解到的许多生动事例表明，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既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又能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二是三种经济成份的关系。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当时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国营经济力量较小，合作社经济在不断发展，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迅速改变，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三种经济成份采取的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也成了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把根据地建设成为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同志基于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的上述理论思想，当然不能囊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但是，不难看出，上述的理论思想在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思想中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当时提出的这些理论思想还有待于后来丰富发展、系统总结和进一步理论概括，但是却已经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些理论思想创造性解决了主要群众是农民、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主要斗争方式是工农武装割据这样一些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323 页。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8—139 页。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0 页。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3 页。

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 三、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 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活动，一方面，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对于调查研究实践的总结，使他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使之成为有丰富思想内容的科学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一）认为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说，把调查研究方法提到认识论高度来认识。方法论和认识论是统一的，方法论是由认识论派生出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尽管使调查研究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他们论述调查研究的作用时，仍然把它作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来看待。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引向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与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着，对它的作用的认识有了发展。毛泽东同志使调查研究成为一种理论，营先就在于从哲学上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前提。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情况办事，就是要求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使主观符合客观，获得正确的认识，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早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他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了。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同对于调查研究的这个新认识密切联系着。他说，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意义，“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在这里，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第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论文，也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文献。正是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专门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口号。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对自己多年从事和倡导的实际调查工作的深切体会的理论概括；也是对那些不做调查研究，致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严重教训的深刻总结。它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把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错误思想路线，代表了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正确思想路线，即文章中所说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年以后，他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所起草的《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对“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使之更加周密和完备。这两个口号就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表述而言，说明调查研究已经不能仅仅看成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应当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却没有接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并且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还把它斥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左”倾错误领导反对调查研究，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明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弄懂弄通。1941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批判“左”

倾错误领导时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认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没有发言权的。……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他还明确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同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并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在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转发邓子恢同志的调查报告写的批语中进一步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963年5月，党中央在《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问题，号召各级党委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把调查研究的意义提到了过去从来未有人讲过的理论高度。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调查研究事实上成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二）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党把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问题提出，跟党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大致在同一时期。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既强调了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同时在论述红军的工作方法时接连三处谈到要经过“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文献之一。在随后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时候，也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思想。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几乎同时提出，这难道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吗？恩格斯说过，某些必然的东西总是在表面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隐蔽地存在着。在提出者那里，尽管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这一点是明确的。陈毅同志当时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写的“九月来信”中也是将切实做调查工作列为红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条。毛泽东同志以后在讲调查研究的时候，也总是强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经过10多年的思想孕育，到了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便将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关系，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发。一方面从认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18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39页。

见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48—549页。

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识论上深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样，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这样说，不仅因为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因为在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除了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工作任务外，从认识论上来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说这两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不仅是说的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说的同一个认识过程。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法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通过阐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并且把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当做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做的重大发展，它表明党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三）认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既有思想建设，也包括有作风建设。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同志虽然在20年代末期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思想路线没有得到清算，直到40年代初期，在党内还存在着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许多同志不愿意迈开他们的双脚到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中去，不愿意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夸夸其谈；坐在机关里想当然地发号施令。有的人工作了三年五载，不仅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状况全然不了解，就是对于所在单位的“下情”，也若明若暗。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他在列举主观主义的表现时，把不做调查研究列为主观主义第一条。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把这种作风看成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因此，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并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环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为一派新风，并有力地推动了其他作风的转变，使延安时代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说的“延安作风”，一个根本的内容就是指实事求是，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

---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是。建国以后，在 1958 年的“大跃进”时期，这个好的党风遭到了严重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它的对立物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等。1961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也包括有重新整顿党的作风的意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口号的提出，从党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历史上实行调查研究的好的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还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同志做出榜样，在开会之前，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党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各级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深入基层，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使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并且说：“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事实正是这样，1961 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之后，在某些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有了一定程度的端正，党的作风也有较大的转变。到 1965 年底，基本上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使党的经济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丰富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的内容。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他们对研究工作所持的严谨态度，成为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代楷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时，坚持了他们主张的科学态度，明确地提出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面前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客观事实本身中引出结论。1961 年 3 月，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那封信中指出：“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伯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是对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并使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眼睛向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恩格斯不仅是进行理论的调查研究的楷模，而且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的伟大榜样。他对英国工人的苦难和斗争，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进行了 21 个月的全面的详尽的调查研究。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社会主义文献中绝无仅有的调查报告的杰作，被列宁称之为“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恩格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与他对工人群众怀有满腔的热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工人群众之中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过：“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

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恩格斯是这样地做了，他的这种虚心向劳苦群众学习的调查态度是永放光芒的。毛泽东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亲身体验，把对待劳动群众的态度问题不仅作为世界观问题提出来，而且看成是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他明确指出，只有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才能做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他每次做调查研究都把被调查的群众当做“可敬爱的先生”，采取“恭谨勤劳”的谦虚态度，因而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他要求做实际调查的同志都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在1963年5月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那个文件中，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指出：“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党的调查研究活动开展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对于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走马观花”，四处巡视，做了解全局的面上的调查；“下马观花”，深入基层，做“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并用这两种方法，可以使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很有帮助。在这两种方法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下马观花”，深入基层的方法更为重要。因为“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毛泽东同志还提倡“开调查会”，这是调查者跟被调查的群众直接讨论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对于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有时能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些方法，既是他个人进行实际调查的经验总结，也是经过全党同志实践反复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使调查研究的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异彩，成为绚丽璀璨的奇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一文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共产党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努力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党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取得了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伟大成就。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缺乏实际经验，还不可能完全避免盲目性。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调查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党还将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8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当然，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工作的范围由局部地区转向了全国，革命的任务由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转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环境由落后的、单一的、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态进到拥有相当水平的社会化生产，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代，因此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方法和手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把思想观念和观察视野完全不变地继续停留在一个世纪或者半个世纪以前，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要求的；仅仅满足于过去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是与新的历史条件不相适应的或者不完全适应的。特别是我们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各项改革的艰巨任务，不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很难获得成效的。正如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样，新的历史条件也要求党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把毛泽东同志为党所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相信，只要坚定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采取一切先进手段和现代化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那末，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同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发展，也一定能够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

（写于 1983 年 1 月，主要内容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 年创刊号）

##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抗日 战略方针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是八路军长期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它对于发挥我军优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完备的。同任何重要思想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一样，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思想也经历了提出和演变的发展过程。

## 一、对红军抗日作战原则的最早规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举国抗战的形势已经出现。中共中央在以中国工农红军名义请缨杀敌、要求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的电文中，开始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说：“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非常拥护，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故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当时，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正赴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红军改编等问题举行第四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顽固立场，谈判未能取得结果。7月28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与党中央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7月29日，周恩来、博古等从延安到红军前总所在地云阳，与聚集在那里的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商谈红军改编问题。8月1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电周恩来，称蒋介石密邀中共领导人速至南京商讨国防大计。同日，毛泽东、洛甫电告周、博、林，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洛甫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几个电文，大体上说明了洛川会议以前毛泽东关于红军抗日作战方针的基本思想。

## 二、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方针的讨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抗战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是抗战开始后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对于领导全党适应新的形势，实行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聚集上一堂，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箝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阶段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敌后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说：单从红军数量上讲，不能解释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但从红军的声望与地位看，是能实现的，要用最大力量争取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这里的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及便利游击战争。

与会者都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主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不作正面战斗、多行侧面战斗，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动摇的。在会上，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并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的基本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勿庸讳言，会上也有些不同意见，一个是关于开赴前线出兵的多少和早晚的问题，再就是如何看待抗战中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对后者，大家的发言更多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到运动战，虽然指出了要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的问题，但他着重强调应以分散游击为主，对作战方针的这一面讲得较多，较为充分。看起来，这是讲的作战形式问题，但无疑体现了他长期形成的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的思想，也说明抗战伊始，他就充分意识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这是毛泽东对洛川会议和整个抗战历史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他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之处。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也应当指出，其他同志发言指出要配合以运动战也不是不应当考虑的。他们说：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指出不应忽视运动战的作用。这种意见，反映在对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主张提“游击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等，从这样的表述上就不难看出，这些同志都是主张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加以结合的，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这次会议时间较短。由于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部队开赴前线，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

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对洛川会议上关于战略方针表述的不同意见，一直是作为抗战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来看待的，重新回顾党的这段历史，回

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史，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组织上说，党的会议上的不同意见都属于党内正常现象。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和红军的发展，而且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样的争论不能说具有路线斗争的严重意义。

首先，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提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不反对红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上述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他说过：对红军出发，无根本上不同的意见，无原则分歧。还说，战略原则是依据现时情况定的，基本上保证不吃亏，而且扩大。如果技术条件改变，它自然是可改变的。目前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成立游击支队，对敌起箝制作用，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这说明毛泽东也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没有反对其他同志对运动战所提的补充意见。

其次，“游击运动战”一类提法，并不始于洛川会议。追根溯源，最初还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1937年8月5日，他和洛甫（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谈红军的参战任务说：“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箝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以出击侧面的扰乱箝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这个电文对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是正确的。在我党文献中，这可能是首次使用“游击运动战”的概念。它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没有将这些概念作严格区别，也没有对使用不同概念赋予严重意义。洛川会议上一些同志不过是袭用了毛泽东半个多月前使用的提法，他们在袭用时也不可能赋予它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涵意。

第三，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洛川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华北军分会10月8日训令，只是批评它指责中央有“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和它事先不向中央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未批评“训令”中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还说军分会训令的精神与洛川会议的方针不相冲突。在这次会上及会后，党的领导人还继续使用这个提法。任弼时在193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谈到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时指出：“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还说：“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型关的胜利。”这说明当时认为的作战方针上的两条路线是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加以对立的，运动战同游击战一起都是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它给以批评。这样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

---

在1937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下报告中央是下好的。”

《任弼时选集》第189页。



### 三、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对八路军 作战原则的强调

洛川会议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几经协商，这个时期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阎锡山，同意了八路军开进我党事先提出的地区。1937年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甫，汇报八路军开进预定地区的地理形势时说：晋西北山势较薄，转向吕梁山脉倒更好；恒山山脉绵延至桑于河右岸，颇利敌后游击；五台山脉势最高峻、蔓延极广，南北东西均不易突入，机械兵团尤难；太行山脉沿正大路两侧山势极险，亦极利游击，与大岳山脉连接最便转移。这说明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一二师开赴晋西北、随后一二九师开往晋东南的指导思想，符合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

但是，八路军开到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作些战斗？这是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来需要我党抉择的问题。就毛泽东来说，在洛川会议后，他从我党我军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开创广泛的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下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当时正值大同弃守，阎锡山为挽回晋北局势，准备在乎型关集中14个团的兵力与敌会战，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及师直机关集中在平型关大营一带，准备相机袭击敌之左侧。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9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对一一五师配合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署发表意见说：“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态，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时任一五师师长林彪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种建议提出异议，认为在敌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役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

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在电文中，他表示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当然可以，“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这个电文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个电文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两个侧面的说法确有不够精当，准确和辩证的地方，容易造成似乎在强调一个侧面否定另一个侧面的误解。尽管如此，这些说法仍然比他在洛川会议上的说法更进了一步。

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彭、任、周的电报中提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时，他说：“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他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这些电文，主要反映了毛泽东在平型关战役前对如何贯彻红军作战方针所强调的重点。但是，开赴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将士的心情，与毛泽东所强调的重点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肩负的责任、身临的环境以及应发挥的作用均不一样。不同的客观存在，不同的“角色意识”，自然会有某些不同的意见。

当时华北包括晋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斗力极差。在大同，阎锡山集结重兵20万，日军不过5000，尽管40比1，还是弃守。八路军总部的一份电报谈到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说：国民党部队在平绥线作战完全不发动群众，不能机动，不搞侧击，不愿包围迂回，更不敢深入敌后独立作战。因此，较强者只能上守挨打（如汤、卫部），较弱者稍挫即惧（如傅部），狡猾者回避战争（如高桂滋部），老朽者闻风而逃（如李服膺及大部晋军），动摇者甚至引狼入室（如刘汝明），以至一点一线突破，环以包围切断，可使全阵动摇，部队溃散，大批辎重如大同弹药弃之，于是，敌军得以少数部队配备机械兵团攻城略地，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到9月中旬，日军已进占冀、察、晋、绥各省许多城镇，直指豫、鲁等省。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抗战悲观论、对日恐惧症像瘟疫一样地传染开来。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寄予厚望。我八路军将领忧国心如焚，参战情更切。彭德怀回忆说：八路军

进入山西，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他本人从八路军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战头一仗中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到了雁门关下的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彭德怀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就这样，身处抗战最前线的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研究了平型关战役计划，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作战。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支队出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师率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

#### 四、平型关大捷对毛泽东形成关于八路军 抗日战略方针的完整表述的重要影响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董必武从武汉致函毛泽东说，国统区人民赞扬八路军的胜利，它“不仅与平汉、津浦两路战事成相反的对比，即与上海方面相比亦令人看出八路军的不同”；新闻界“见到我们的人一开口就说，‘晋北得你们，八路军打得顶好’。”率部在陕西富平待命入晋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纪录了我军将士的反映。9月26日，他写道：“接朱、彭电：我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汽车、小摩托车、山炮、弹药甚多，被包围而继续顽抗之大批日本兵，全被我击毙”，“这是红军参战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穷的：1、证明我党的主张正确；2、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配合阵地战，抄袭敌人，才能胜算；3、证明唯武器论的破产；4、单纯的防御只有丧失土地。捷报传到部队中，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10月1日，他还记道：今天“开拔，沿途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更加提高”。董必武的信札和陈赓的日记是有代表性的。它们说明平型关大捷确实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对提高八路军的声望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运动战的胜利，也鼓舞了毛泽东，使他对把握作战方针的两个侧面的结合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逐渐地形成了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一个表述更为全面、完善的战略方针。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彭，表示“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说：“目前长城抗战是暂时的，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这个电文，对配合作战的态度比起平型关大捷前来很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已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战略方针的雏形。

10月5日，忻口战役打响。周恩来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毛泽东致电周、朱、彭，“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共商决定之作战计划”，指示：我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还提醒林贺两师“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这说明毛泽东已同意我军主力用于打仗而不是做地方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毛泽东的思想还在进一步变化。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他对集中主要兵力作战这个侧面越来越加以强调。

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忻口战役的“作

战问题之补充意见”，指出：“山西我方兵力数量在十五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他指示：一一五、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主力不仅要适时袭击大营、砂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出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还指出：“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枝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这个电文对于打大仗所表现的气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并告周、朱、彭、任等八路军将领，在指出“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明确指出：对游击战的部署与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这就修正了9月17日和刀日所说的今日红军在战术性的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的观点，进一步孕育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

10月25日，忻门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之际，毛泽东急电朱、彭：“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大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大路”；“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工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支队作战为有利”。随着对八路军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愈益强调，同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第一次改变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指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太原失守后，山西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11月13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转恩来等人，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还对八路军各部队如何打几个小胜仗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向对上述部署不甚理解的同志进行解释。他说：（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下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

（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勿）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这几条解释，正确他说明了八路军战略方针中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分散兵力发动群众与集中兵力进行战斗的关系，较之以前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日寇继续南进，为了遏制民族投降主义、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毛泽东越来越要求八路军多打些运动战。12月5日，毛泽东和回到延安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联名致电朱、任说：对进攻冀察晋边之敌。“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12月29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等前方将领，进一步指出：在此次敌南进过程中，我军须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条件下打二三个好的胜仗，要及时完成必要的作战准备，以免临事仓皇。

正是基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所引发的以上一系列的认识变化，在1933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华北抗战的经验，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提法，发展了洛川会议上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比起其他各种提法也都全面和准确。它既强调了游击战争这个战略基点，又兼顾了运动战这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6页。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还将这个方针表述为“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 五、关于八路军的抗日战略方针 研究的几点评说

以上从思想上的角度论列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略方针的提出、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丝毫无意于贬低毛泽东在抗战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杰出作用。这里只是想通过具体事实说明：

第一，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的思想也是发展的，变化的。用凝固的、无变化的形而上学态度未看待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提法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提法。虽然基本精神相同，但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从认识史的角度说，这两个提法表述上的差异，反映了毛泽东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发展过程。当然，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思想是战略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任何忽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抗战初期的实践表明，要开到前线的八路军不集中兵力打几仗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从长远利益着想，从警惕蒋介石假手杀人的阴谋来考虑，少打甚至不打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又要看到另一面，不尽快打仗，国民党不准，全国人民不理解，八路军将士也想不通。平型关大捷以后的一系列战斗证明，在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把握有利条件，集中兵力进行必要的运动战。才是正确的方针。这也是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过的思想。八路军从1937年9月出师直到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这段时间内，主力部队事实上是以集中作战为主，并进行了部分的运动战。这是适应了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是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的灵活运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作战方针所作的完整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是对这个时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四，应当充分认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前后认识上的变化，说明此战不仅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对统一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正确地看待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最后形成关于抗日战略方针的科学表述，起了推动作用。这可以说是平型关大捷的理论意义。

第五，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进步过程。诚然，在洛川会议上和会后，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强调打大仗，这有片面性。但是，这个认识上的偏颇不属于路线性质。况且，通过抗战的伟大实践，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军抗日战略方针的认识在基本一致前提下的不同侧面的有所偏重都趋同了，大家的认识都统一在《论持久战》的表述中了。自此以后，在参加过洛川会议的领导人中间再没有出现有关作战方针的争议，尽管一个时期对有些作战问题的认识不完全一致。这是抗战中我军能够取得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

##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发展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这个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同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选集》1至4卷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历史，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非常丰富。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横向的研究还是纵向的研究都已相当深入，从不同的角度、方面论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著作都相当不少。本文试图着重截取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进行断代研究，以期进一步揭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典型时期思想发展的具体分析努力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笔者看来，抗日战争中期的1939年到1941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不仅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且他的许多分析和论述，在理论上异常地丰富、充实和逐渐地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自此之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本文结合《毛选》修订本（即1—4卷第2版）的出版，在介绍毛泽东统一战线基本思想的时候，着重对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作些初步分析。



## 一、抗战中期以前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墓本思想

毛泽东很早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开创者之一。

本来，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方面的实践和思想不是同时发生的。从党的发展史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先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实践，从毛泽东个人的情况看，他的统一战线的实践和思想也是先于武装斗争的实践和思想的。

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了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任务，对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意向。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但参加了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和《北京政变与商人》二文，初步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出：

“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

党的三大以后，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实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以后就是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进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七七事变后又开始了抗日战争。与这段革命史的历程相同步，在1939年至1941年前，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经历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的大一统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开始以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参与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全过程。从20年代中期起，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就在党内渐露锋芒。这以后，通过对以上几个阶段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发展与挫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统一战线思想逐步得到展开。他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9年11月）等著作都是阐发其统一战线思想的名篇。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基本观点：

（一）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通过共产党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著作中无疑讲得很多，但就是在20年代中期他也有明确的认识。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坚决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当时的国民革命就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反帝

---

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是瞿秋白。1923年2月，他在《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文中，介绍共产国际之策略的问题时说：“励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起来，各派联合向资本界作战”。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77页）

《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反封建的大革命，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强调了要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与大革命后期放弃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此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连续发表过4篇大作，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前已提及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日和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这是他最早研究农民问题的。篇重要著作，奠定了他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阐发了中国农民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伟大作用。

（三）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也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这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作出的正确结论，即使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阶段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没有动摇，仍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工农民主的统一战线之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对待革命的态度很不一样，即使在其上层对革命的态度有所变化时，毛泽东仍坚持认为应把它视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

（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排挤，在一定程度上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应该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条件下，不可能始终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会发生动摇甚至变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虽精彩地分析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恐状态，但是对其两面性的深刻认识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动，毛泽东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严厉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党的任务就是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

（五）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时，不可能完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会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感到恐惧，甚至不惜采取欺骗、诱感与打击的破坏政策，作为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这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了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争取上部分大资产阶级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时常提防它们反抗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

（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排斥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放弃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去迎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私利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鉴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毛泽东非常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

环。”在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王明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强调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七）在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把资产阶级视为统一战线的伙伴而不是敌人；所谓斗争，就是搞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开展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为武装斗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在总结了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教训之后，在抗战初期逐步明确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后，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形成了共识。

毛泽东统一战线的这些基本观点，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时他发表的《发刊词》中已经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规律”，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实践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远没有完结，它还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随后，抗日战争历史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样，上述思想也可以视为他随后即将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起点。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 二、抗战中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历史条件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抗战史上统一战线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变化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它为毛泽东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

从统一战线的外部形势看，首先是日本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统一战线发生着直接的影响。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瓦解抗日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

其次，英、法、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统一战线的走向。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它们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1940年夏天日本已暴露了即将对南太平洋英美殖民地入侵的企图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它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

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他是在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

从内部关系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全民族的最大的广泛性。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共两党曾经是结盟同志，又是冤家对头。自1924年大革命以来，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卢沟桥一声枪响，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两党才释开过去的仇怨，重新携起手来。但是，两党实行抗战的路线是不一样的。蒋介石国民党由于继续坚持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一党专政制度，顽固推行单纯依靠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国民党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3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20万人，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这下会不反馈到统一战线中，对其内部关系发生影响。

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的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再加上

---

毛泽东1940年10月29日致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电。

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绥靖主义”潮流的渗透，国民党当局政策的重点迅即发生了逆转，并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随后，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武装磨擦事件，袭击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更有甚者，先是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在华北以进攻山西新军达到顶点，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从1940年10月的何、白“皓电”开始，到1941年1月制造血腥大屠杀的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这是整个抗日战争阶段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特殊岁月。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几乎濒于破裂。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发展史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国共两党合作还是完全分裂，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相对他说，矛盾比较单纯些，对处理这样的关系，我们党从没有经验到逐渐地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能够应付了。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还积极抗日，能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并且发动了反共的武装冲突以后，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子的新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某种契机，那末经过20年左右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向成熟的共产党人，则有力量使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风风雨雨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大党。她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而且在到达延安以后，经过研究和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也有了透彻的了解。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卓识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了全党普遍的认同。他已经是全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他对于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早有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能审时度势，提出对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从而领导全党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粉碎国民党以制造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他进一步总结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发展了打

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提出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使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系统比、完善化。

### 三、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一：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另，并进一步加以区别

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讲，实质上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人口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是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从大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无不与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1925年1月的党的四大虽然开始看到有“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却并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然已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当时的认识并不牢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及这个问题时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才正确地认识清楚。这是讲的这篇著作的1940年的修改稿。在1939年12月写作该书初稿时，诚如他在1940年致萧向荣的信中所说：当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因此，《共产党人》杂志1940年第4、5期发表的该书初稿只是一般地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而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即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还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看法），因而没有将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是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作了份量比较重的评论。

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无论从提法到内容分析都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了。这个变化首先反映在1940年3月11日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之中。这是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是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深刻总结，全面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堪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献里，毛泽东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162页、161页。

《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第8页。

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低限度。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做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

根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修改。这就是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从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该文可以看到，其修改是不小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大资产阶级明确地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分出来，并将其纳入于买办阶级。这样，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就是“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个修改稿还加上了对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的一整段文字，删改了将大资产阶级放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妥当分析的有关文字。建国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建国前的修改稿，只是在文字上又作了些改动，使表述更加准确。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并对大资产阶级作进一步分析的新认识，还反映在对《（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修改上。《（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写作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两个多月。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号刊载的原发表稿总结统一战线的规律时讲了5条，对资产阶级没有作明确区分。建国初的《毛泽东选集》收入该文时对此作了修改，除了其他的文字性修改外，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增加了对大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的第3条，将5条规律改为6条规律。新增加的第3条就是根据1940年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形成的认识写的。这一修改也说明，这个认识的变化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的飞跃。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弄清资产阶级的的问题，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还向在国统区工作的南方局、东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他还提出，对这个问题分省调查时，要为被调查的每人立一小传，包括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与此相联系，调查对象还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各总司令、军长、师长三级军官在内）。毛泽东对于阶级调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想先从经济、军事两方面着手，将来扩大到政治、文化方面，最后汇总为名人录，供召开党的七大作研究用。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页。

毛泽东请周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李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饶漱石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对资产阶级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军界、政界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卫立煌等，在经济界是陈嘉庚等。对这些人，我们要研究，要代为立传。在毛泽东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左中右三派，而以两面派为多，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对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问题上也分为三派：（1）右派，即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是半身不遂；（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但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提出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这是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又一个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这以后，毛泽东继续注意研究资产阶级问题。即使是在何，白“皓电”、“齐电”之后，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仍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别。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对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并说，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这样，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相应地产生了对两个部分的正确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以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党却牢牢地把握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自乱方寸，这是与毛泽东在抗日斗争形势下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分析及其采取的正确政策分不开的。

#### 四、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二： 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扩大 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

对待中间势力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倾向之间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中间势力，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势力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土地革命时期却提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在1932年1月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要求把中间派别作为“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他们拒绝与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和其他反蒋势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坐视其反蒋失败，从而使中央苏区陷于严重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始终反对王明中央拒绝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左”倾政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上述“左”倾政策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1937年11月12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即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团。”“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这是毛泽东较早地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在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其顽固派不断在河北、山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冲突，毛泽东更加强调对中间分子要加紧工作，提出要把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统一战线中来，每个革命同志都去办“小统一”“战线”使其愈多愈好，“许许多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础，组成大统一战线”结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统一战线。

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发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了萌芽。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419页。

毛泽东1939年9月18日在延安纪念“九一八”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视为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份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命的指示中对这个思想的初始表述是：极力孤立一切向我进攻的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即《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下同）中，不仅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而且对这三种势力的基本倾向作了较深层次的剖析，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他指出：中间势力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保持勉强的中立，有些则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他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3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蒋介石指使韩德勤酝酿苏北战争期间，1940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观念在全党逐步地树立起来，并成为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

其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毛泽东很重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人员分配上，他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规定这样的比例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为了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则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顽固派。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毛泽东分

析政权性质时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这种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三三制”政权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重关头，为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政权政策的作用，指出：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苏北一些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在有的机关中还可以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和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总结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政策，“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行“三三制”政策，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

第三，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对象，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

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抗战时期比土地革命时期宽广得多，在打退反共高潮之后又比在此以前扩大了许多。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个多月后，即1940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两个月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等等。毛泽东谈及这个变化时说：中间势力的成份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把国民党中夹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中间势力。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51页。

参见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页。

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我们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概念的内涵，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都起了重要作用。在 1940 年 5 月 29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朱德介绍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情况。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讲话肯定朱总司令说得很对，指出不但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对中间势力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注意了争取友军、瓦解顽军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对我党的自卫立场表示理解甚至同情，在军事上表示中立不介入。1940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各部的军政首长，要求他们根据华北（国民党朱怀冰 3 个师打八路军，由于火线上的统战争取，其中 1 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保安队和八路军交战，由于加强了对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联络，预三师则在旁观观望不助）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亲自出面作统战，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氏江和宋子文系统陈泰运部严守中立）的经验，运用各种方式陈明利害，晓以大义，把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备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不仅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的一个重要总结。中间派在过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自此以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地形成一股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的政治势力。

---

见毛泽东 1940 年 11 月 16 日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83 页。

## 五、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三： 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

中国的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说，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方面说，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不仅为制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使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国民党顽固势力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所谓国共两党关系，说到底就是共产党同以当权的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

我们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至抗战期间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大革命后期发生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后期又发生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抗战开始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了在对待与国民党关系中的上述错误，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又联合又斗争，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来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党领导下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巩固与发展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但是，在皖南，负责东南局和领导新四军工作的项英，受到抗战初期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搞片面的联合而放弃斗争，这是造成我党和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的最根本的主观原因。

自 1939 年 1 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就在研究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的问题。他总结了我们党 10 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异常地深化和细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联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一）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刚闭幕时，毛泽东就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作了阐释。1939 年 2 月 5 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从哲学理论上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更重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当然，如果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着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就只有拿机关枪、刀子去斗争，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

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者关系的辩证法。1940 年 7 月 6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还就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的不同意义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

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力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那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那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这是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的这种多层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不仅概括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情况，也为随后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所证实。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这个总结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变化多端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1940年10月19日）之后，面对其十分嚣张的政治进攻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对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还有对某一个具体的顽固派如阎锡山的反共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正是坚持了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又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

## （二）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愈益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还不放下抗日旗帜，欲联合其他各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觉醒的人民大众，极力摧残各种进步势力，尤其是打击共产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这种两面政策尤为鲜明，上述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而提出的。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后，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充分发挥，并把这个政策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实行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1940年11月21日和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

---

毛泽东 1940 年 12 月 4 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48 页。

毛泽东 1940 年 9 月 23 日关于对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在蒋介石的“手令”（即1940年12月9日的限期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告）发出后，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年1月17日发布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为了打退国民党的政治攻势，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电中指出：我们应紧紧捉住蒋介石1月17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根据这样一些思想，我们党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迅即发生了有利于我党和全国抗战的巨大变化。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 （三）阐述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末这个斗争怎么掌握？这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自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磨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

这个思想是从提出斗争的自卫原则开始的。1938年底，国民党政府要调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进驻陕北。12月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等，明确指出：绝对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边区之企图。过去已打过八九仗，都是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这一年5月5日，他在延安后方留守兵团的军事会议上指出：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

---

参见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磨擦去，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于会议上提出了“磨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磨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磨而不裂”。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首次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的“报告提纲”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三有”原则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是我们党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展华中的军事战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比，他的这个思想愈益明确和强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夕，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0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又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1940年1月28日的党内指示中还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其在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和东南局，要他们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他们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毛泽东甚至作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并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

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当时我党领导的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根据地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唯独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未作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结果遭致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时指出：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针，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后来毛泽东关于“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的思想，就是总结了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作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到，经过对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的长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

---

见毛泽东 1940 年 11 月 3 日致周恩来等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0 页。

## 六、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卓越地运用抗战时期已经成熟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与国民党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斗争，抗战胜利，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是，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濒于破裂。新的民族矛盾和已经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为了反对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人民结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目标，与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基础。它把各少数民族、各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蒋介石政权空前孤立，分崩离析，最后从大陆上垮台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在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又有了新的的发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毛泽东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作了重要阐发。例如：

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作用，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他还论述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即党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原则，阐发了党的谈判立场。他反复强调，在国民党经过周密布置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之后，绝对不要对与国民党的谈判存有幻想，绝对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必须“坚决依靠人民”，“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人民，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有时也要作必要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也不要迷信，“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随着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格局的变动，毛泽东论述了统一战线成份的可变性，强调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层次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亲美派，还属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但随着内战的爆发，它们已完全变成了革命对象。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是反对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产党领导，赞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3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页。

因而仍是统一战线的同盟者。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将应采取两重政策。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发展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团结、利用政策；另一方面，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反封建的土改运动的完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的主要形式”。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所谓劳动人民，系指“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内的一切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们。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人民大众”概念的内涵。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诚性和长期性。他反复指出，对于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他们。“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做出成绩来”。这是长期共存、肝胆相照思想的最初萌芽。

这个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最重要的成就是解决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在抗战前期，蒋介石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我们党多次提议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国民党始终不同意。所以抗战中尽管组织起了统一战线，但没有固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形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力量强大了，国民党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但一段时间内毕竟有了一个形式。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党接过“政协”这面旗帜，将它作为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在中共中央 1948 年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提出了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的号召。1949 年 6 月新政协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在同年 9 月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上，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性的统战组织。

在作为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伟大作用。他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样，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温毛泽东的这些具有巨大理论价值

---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3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87 页、128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3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72 页。

的思想，无论对于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关系，还是对于观察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有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各样法宝，像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必将能够更早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原载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 卷第 2 版讲座》）

## 抗日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辉煌\_\_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一百年蹂躏之后取得的反对外来侵略者斗争的首次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严重挫折后转危为安、由弱变强的重要历史契机。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革命实践的巨大发展相对应，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就已初步形成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经过抗日战争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在党的七大获得全党拥护，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阶段，是毛泽东思想走向辉煌灿烂的重要历史阶段。这里从思想史的角度作些论述。

## 一、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巨大发展的背景、基础和原因

还在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就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应当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说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将来会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那时，毛泽东虽然自认为他对马列理论的把握还没有成熟。不宜宣传，但是到了抗战后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在八年抗战时期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呢？其背景、基础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革命的曲折路程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为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之”字形，而不是“一”字形。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他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使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走向辉煌有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回顾这段历史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什么呢？到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长时间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从认识与实践的角度多次讲的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规律。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来看，这就是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揭示。他详细地论述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这就回答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路程为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实践经验，因而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复杂矛盾关系和党在抗日战争的多方面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现实土壤。

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的重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一

---

毛泽东 1938 年 8 月至 9 月对抗大毕业学员的两次讲话。毛泽东 1941 年 9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3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5—826 页。

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

就国民党来说，它既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民族利益冲突，因而有抗战的一面；同时由于对日作战的失败和惧怕民众与仇共情绪的增长，因而又有对日妥协的一面，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吏甚至公开投降，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成立了傀儡政权。

就共产党来说，尽管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实际上肩负着两面斗争的任务。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它的主要力量放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上；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同时还要使抵御内阍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此外，还要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使其成为抗战堡垒的同时，使之成为全国“民主的模范”，让中国人民懂得边区“是通向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唯一道路”就国共之外的政治力量来说，在日军入侵和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治势力，从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到各种地方实力派和各种倾向的小党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空前活跃起来，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和组合。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和矛盾也在激烈展开。尽管中华民族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有可能也有必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根本上支持中国抗日，但一度与德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它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又主要采取支持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的异常特殊性和矛盾的异常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深远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矛盾，在善处自己的同时善处各类同盟者，纵横捭阖，应付变幻万端的政治风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正是对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必然结果。

第三，抗日战争期间，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较为稳固和安定，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有较多的时间和较为便利的条件学习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修养不够。因此，尽管党在早年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艰苦卓绝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但由于在指导革命的理论上的幼稚，仍不能不导致严重失败。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马列著作特别是全译本的重要著作较少，不可能对马列理论作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做了充分的理论研究之后再投入革命斗争，只能是边干边学，在于中学。毛泽东说，“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他早年读马列著作较少，深感“为荒学，甚为不安”

---

见毛泽东 1939 年 1 月 18 日在陕甘宁边区的报告，1938 年 7 月 12 日同世界学生协会代表的谈话。

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 页。



大革命失败后，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戎马倥偬，出生入死，更无条件读书。应当指出的是，他读马列书少，不等于他运用马列理论的水平不高。他读马列书有别人难以企及的优点，即善于把握真谛，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去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因此，在革命转折关头，他能够实现革命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

但是，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动辄以“拿本本来”吓唬人，以会背诵马列词句当资本，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狂妄地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讥讽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是“狭隘经验论”，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出领导核心。

为了批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需要用大量马列著作来武装自己，“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与日本侵略者的大小战争频繁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时起时伏，但延安毕竟有了相对安宁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毛泽东发愤读书，有时通宵达旦。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著作和有关读物，他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对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和阐释马列理论的读物，他反复地阅读多遍，作详细的批注。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还号召全党认真读书，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三年读40本马列著作，并开列了阅读书目。

抗战时期，全党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也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花费时间最多、阅读书量最大的时期，也是他写作著述最丰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经过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走向辉煌，不能不说与他本人和全党高级干部联系中国实际大量研读马列著作有密切关系。这是其发展的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渐趋紧张。毛泽东深感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还没有完全摆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那样惨重损失，毛泽东事先未估计到，这使他不仅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更为痛切的感受。“左”和右看似两极，但像项英那样由一个时期犯“左”的错误转到又犯右的错误，则说明“两极相通”，都源于不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就不断采取措施为开展整风作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1942年开展全党普遍整风。当时正值根据地进入抗战以来财政经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认为，开展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干部

既可以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还能振作精神，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学习马列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党的历史路线的讨论，在政治上明辨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基本是非，认清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思想作风上有了根本转变，纠正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确立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这次整风运动为党创造了巨大的理论财富，既在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之后，又通过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整风运动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既为顺利召开党的七大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巨大发展的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 （一）建立起了哲学理论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以来撰写的政治论著，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他的许多独特分析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他的不少名著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但是，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他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此前写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从军事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先导，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才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飞跃。对毛泽东来说，这就是实现了由萌生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到建构有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

《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如果说这以前毛泽东尽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写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哲学论文，但人们还难以将他称之为哲学家的话，那末，“两论”的创作则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之花再度盛开。最引人注目者有三：一是提出以“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的“思想方法论”，第一次将马列著作中分别使用过的提法，联系起来固定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二是提出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这不仅使长期只被视为方法论的群众路线具有了认识论意义，而且使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历史唯物论基础，三是继写作《实践论》后。毛泽东继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在党的七大，他又提出了人所共知的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思想，后者即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三个标准”思想的提出，从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已高度贯通。

### （二）形成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即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

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阐明了基本原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一系列文献，包括经他审定的1944年留守兵团《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等强调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原则是党

---

见毛泽东1939年4月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42年11月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页。

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人民军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就无敌于天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太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表明了人民军队和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

对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作了重大发展。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批判了“唯武器论”，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提出人民战争要建立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实行全体总动员的战时体制，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

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作了阐述。在抗日战争行将爆发之际，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时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展开后，他进而指出，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采取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并将游击战争提到重要战略地位，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他还阐发了要以局部优势击破敌人局部劣势，转而造成全局优势的作战方法，此外，他还总结了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一系列指挥原则，将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分析得淋漓尽致。

### （三）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内部充满复杂斗争。特别是1939年至1941年，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毛泽东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这些斗争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和在指导与总结这两次斗争中写出的一系列著作，对抗战新形势下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作了分析，正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规定了同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其一是从理论和实际政策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加以区别，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底限度，成为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盟。毛泽东对抗日形势下各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既要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还要不断发展阵地，具体办法可以“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或“暂

时不奏不斩”，一切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置。这使共产党人在复杂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能保持清醒头脑。

其三是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是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抗战形势发展的重要关键。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位置；随着形势变化，要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对待。这对孤立顽固派，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其四是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要有区别地以斗争求团结；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但要力争取时局的好转而努力等。

#### （四）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提出过若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个理论发展成为完备形态。

从思想史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战期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1939年底以前，可视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酝酿阶段，针对抗战爆发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见分歧，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开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基本观点。一是认为中国革命要经历多个阶段，中国目前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帝国主义存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是发展到社会主义。二是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作了理论概括。三是提出要实现革命转变，首先必须进行好当前阶段的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如同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四是指出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和1939年先后发布了两个“施政纲领”，努力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做出个榜样。这时虽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无论在理论的认识还是边区的实践上，都已呼之欲出。

从1939年冬至1945年党的七大，这可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确立和展开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的诞生和确立。在后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这些著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并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转变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全面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指出：中国的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其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

专政，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由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以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实践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进一步分析，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我们要搞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可怕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无害有益的。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重大发展，是特别强调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在一些书信、讲话中不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不能解决这些，“共产党就要灭亡”，“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因此，《论联合政府》写道：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 （五）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的领导人和活动家立即投入大革命洪流，忙于进行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没有能对党的建设理论作更多思考。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可以说是抗战以前关于党的建设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抗日战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局面，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以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适时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向全党提出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的任务。《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该文回顾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提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整党运动。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了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好方法，为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化的党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以及党的其他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抗战时期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这样四点：首先，强调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正确

---

毛泽东 1945年3月3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 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信，毛泽东 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招待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作的结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

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其次，强调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层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要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做到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在思想上入党。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第四，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在总体上实行了这个正确方针，使整风斗争健康发展，帮助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全党，增强了各个方面的团结。这是整风运动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丰富。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经过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上述几个方面理论的成熟性，是毛泽东思想整体理论成熟性的具体体现。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独特创造敬佩有加到了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理所当然。七大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辉煌的里程碑。

### 三、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向辉煌的启示

回顾抗日战争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能得到什么启示呢？辉煌的历史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是久远的。

第一，毛泽东思想既是政策的，也是理论的。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载体的毛泽东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属于政策方面的文献占很大比重（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更为突出）。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会呈现这个特点呢？这是由党的理论的性质决定的。党的理论，不能是书斋中的理论，不能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而应当是作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它从党和人民的实践中来，又指导党和人民的实践。党制定的各项政策，则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向转化的中介。一方面，理论通过政策的中介去指导人们的实践，因而政策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即理论的具体化或实证化；另一方面，人们的实践经验通过政策的中介上升为理论，因而政策也是实践转化为理论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经验通过政策得到初步概括，然后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一般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特殊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不是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是靠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靠成为理论和实践之间双向转化中介的政策。所以，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的言论的异常丰富正反映了党的理论的特点和优点。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仅属于政策而没有形成为理论的观点，是不懂得党的理论的性质所致，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端正对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和政策对理论的意义认识，对于今天正确评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仍是有意义的。

第二，毛泽东思想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毛泽东思想从历史来看，是在抗日战争中成熟。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揭示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完全成为历史。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是各个方面历史的具体与历史的抽象的统一。就具体事物言，抽象（一般）存在于具体（个别）之中，两者不可分。但就理性认识言，抽象可以从具体中分析出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如此。说明历史现象的，不能不带有暂时性；揭示历史本质的，会长长期起作用。因此，越是属于具体层次的，就越会成为历史；越是属于抽象层次的，就越具有久远性。具体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就其与当时历史斗争情况紧紧相连的一些具体论点和论述而言，无疑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个时期概括起来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及被称之为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还有上述若干基本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毛泽东著作的许多名言、名句、名文，至今还是那样振聋发聩，针贬时弊，无可替代。这就是科学理论的魅力。正因为毛泽东思想还是现实的，所以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回顾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对这一点会感受尤深。

第三，毛泽东思想既是理论的，也是方法的。人们熟悉恩格斯的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



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讲整个世界观是方法，不仅指通常所讲的辩证法是方法，也包括唯物论是方法；不仅指辩证唯物论是方法，也包括历史唯物论是方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不仅在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把它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而且在抗战时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多次指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列宁“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着力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方法论系统。这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因此，毛泽东思想包括理论和方法，其中有的理论本身就是方法。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工作方针，简单他说也就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毛泽东思想所以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说到底就在于它的根本理论、也是根本方法——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常青的科学方法。

第四，毛泽东思想既是有体系的，也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抗战后期发展成为体系的。经过整风运动制定的《历史决议》，已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精辟分析，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刘少奇、张闻天、陈毅等发言也深刻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是同任何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它不是封闭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十分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抗战时期仍处在不断发展中。因而他对待自己写的著作也采取要随历史的变化而加以修改的态度。前述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就是如此。在1939年10月写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和12月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初稿时，还没有将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别出来，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个认识发生了变化，到1940年3月以后才将这两篇著作中的相关提法作了重大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名作，但是其中讲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并不全面，后来也作了修正。再如《矛盾论》也是这时期写的，但他不甚满意，后来公开出版时作了很多重要修改，这都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如果我们将反映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的文章同其原始稿一一对照，就更能看出这一点。

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不仅仅是指它的具体观点，更主要的还指它的总体理论。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具有开放性。毛泽东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如同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们去世后上百年、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数十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一样，也不能要求毛泽东为解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它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半个世纪过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视角看，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是从毛泽东思想的辉煌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辉煌。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去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伟大的胜利。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

##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在28响礼炮——仿佛是向中国共产党经历的28年艰苦卓绝革命斗争致敬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比预期的要快，装备劣势、兵力弱小的人民解放军仅用3年时间打败了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感怀。但伟大胜利的提前到来也孕育以忧。胜利太快，使建设新国家的许多工作准备不足，包括实现革命转变，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产生的伟大理论。它的革命精神和正确思想指引着新中国进行革命转变，对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的某些不足也对建国以后历史的曲折发展有一定消极作用。

## 一、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要经历的特殊阶段。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前途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但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与联系，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不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其主要精力在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对于革命理论问题既没有闲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系统的全局性的思考。但自遵义会议确定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便总揽全局。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研究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包括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最早明确地提出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思想是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准备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政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在说明政策的变化时阐述了革命转变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民主主义革命何时转变力社会主义的革命，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像毛泽东这样明确地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以后，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 年 5 月至 1939 年 9 月是毛泽东建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亦图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方面结束了长期内战的分裂局面，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生机；另一方面，中同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见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之间的斗争仍很尖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思想，逐渐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 中国革命要经历多个阶段，但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1938 年 5 月，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问说：中国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及至帝国主义被推倒了，那末世界都是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单独向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中国的前途也一定是社会主义。”

(2) 要实现革命转变，首先必须进行好当前阶段的革命。在 1937 年 5 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并且明确指出不流血的和平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1939 年 9 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再次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60 页。

毛泽东 1938 年 5 月 11 日的谈话。

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做的”。他十分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执行正确的政策，团结一切爱国的、抗战的各个阶级、阶层，努力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3) 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1938年7月，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我们国家有独立的政府，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向前发展。农工商业由国家与人民合作经营，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土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科学与文化部能提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样的国家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初步地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轮廓。

**第二阶段：1939年12月至1945年党的七大，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确立阶段。**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形成，以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这两篇接连发表的重要著作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首次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而建构起了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分析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与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的两个部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从革命转变思想理论的视角而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从而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研究革命转变问题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

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

---

毛泽东 1939年9月24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 1938年7月2日与世界学联代表的谈话。

总纲。这里，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两者不可截然分开。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地区（例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建立包括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

### 第三阶段：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对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和1948年4月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对《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作了重要补充和发展。1948年下半年以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日益迫近，革命转变问题即将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深层次的思考。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在纪念七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毛泽东都深刻地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即使革命转变具有了多种涵义，也使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革命转变首先是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原来估计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就取得了胜利，提前两年实现了和平。在毛泽东看来，有了和平就有了转变的基础，没有和平什么也谈不上，连年战乱的局面结束了，这就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为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起码的政治环境。

革命转变同时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是创造新世界。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事业，成为全党工作的首要的中心的任务。“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做经济工作。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础。

革命转变也是党的工作重心中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的出发地，要有由乡村转变到城市去的精神准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着要乡村时就在乡村，当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准备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深刻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

---

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1098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7页。

要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不难看出，实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是实现革命阶段转变的前提。

革命转变也包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早在1943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在1944年5、6月，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1945年4月，在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随后，在赴重庆谈判时的参政员茶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光辉思想。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初步地阐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转变的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实现前者的转变，作为实现后者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同步目标，这就是说，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的思想，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思想的深化，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衡量标准。

革命转变，归根结底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以上几方面的转变，在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在上述讲话和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

——中国工业异常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据抗战前统计）。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同情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份构成。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双重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刘少奇在1948年12月阐述毛泽东的思想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过渡的性质不能长久，可能是10年到15年时间。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也讲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

这样，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方面地展开了作为革命转变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来看，他的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它的基本精神载入了作为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

---

毛泽东 1940 年 3 月 4 日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讲话。

见刘少奇 1948 年 12 月 25 日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的报告。

## 二、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革命转变理论的著于比较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入北平。毛泽东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战争问题上，指挥人民解放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刘少奇没有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对革命转变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赴天津地区指导工作，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阐述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若干政策。他在天津的十几篇讲话和后来访苏归来的一些讲话中，虽然主要是在解释和发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是对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以及如何实现革命转变等问题也有不少看法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这些看法，有的改变了他在此以前的一些观点，有的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有的与毛泽东讲的角度不大相同，有的则是毛泽东没讲的新思维。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对革命转变问题都是在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正是为了完善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刘少奇的一些看法，既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些思想是否能视为种下了两人后来思想产生分歧的根子，也不是不可以思考的。从研究刘少奇的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是刘少奇的思想理论放出异彩的又一个活跃期。从研究革命转变理论的视角来看，它也增添了某些新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上，有以下一些不同层次的区别。

（一）关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作为城市工作问题讲的。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敌人肃清了，秩序安定了，造成了一定条件、环境，能使我们从事经济建设。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同年9月，刘少奇在北平高级干部会议上作访苏报告时还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在建国前夕，对于经济建设在革命转变中的地位讲得如此高屋建瓴、斩钉截铁，是十分难得的。30年后，这个思想在新时期党的领导人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时，几乎连措辞带语气都得到了历史的回应。

（二）关于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毛泽东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适当发展，对于资产阶级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视角出发，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原理，在理论上对“利用和限制”政策进行了论证。他说：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主要方面。还说：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展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明确指出：“资本

---

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刘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大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家是个生产力，农民是个广大的生产力，手工业也是生产力，国家生产也是生产力。这些生产力都要提高。”一个“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一个“资本家是个生产力”，这两个观点是刘少奇从中国资本主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他提出了“剥削有功”论。从伦理主义的立场来看，关于“剥削有功”的一些说法不尽周全、慎密、完善，可能会产生某种逆反刺激；但是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思想的根本点是立足于生产力标准这个尺度的，因而无可厚非。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恶是历史的动力”观点的另一种表述。

（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对这一表述作了修改，增加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一语，对历史前提进行了限制。这个修改比原来的论断准确一些。）刘少奇在1948年9月会议上曾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在修改张闻天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时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他在天津的讲话也是宣传这个观点的，没有提出疑问。但是到了同年7月，他以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身份写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却有了不同的提法。他写道：“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在原稿上还有一句，‘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正式稿删去了。——引者注）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刘少奇批评的观点不大可能是冲着毛泽东的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但文字表述却很相似。其实，这也是刘少奇本人在1948年9月会议讲话中的观点。在全国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的1952年6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时，刘少奇又同意了这个论断，并没坚持致斯大林的报告上的观点。当时对新中国建设的道路还处在探索中。现在，从这个报告的原始提法及其修改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在一个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

（四）关于对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经常谈论对待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并以联合为主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讲的很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只讲到对待资产阶级既要联合又要斗争。刘少奇则明确地认为对资产阶级要实行以联合为主的政策。他说：对资本家有斗争有联合，今天重点是联合，不要把它通通斗争掉。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点摆在联合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他还指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虽然也讲过，但结合建国前后两个人思想发展变化的轨

---

刘少奇 1949年5月10日在唐山冀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见刘少奇 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党政军民干部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 1949年5月19日在干部会上的讲话。

迹来看，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策略上来分析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刘少奇在这个时期则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认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可能是两人对待资产阶级态度的基本分歧。

（五）关于“四面八方”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提出的。原来的侧重点是在强调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兼顾各方，各得其所。4月18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上的讲话中已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他说：毛主席要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两方、内外两方、公私两方、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以后，刘少奇在天津和北平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讲解“四面八方”政策时，除了讲“全面照顾”之意外，更多地是从“互相限制”的角度加以解释。他说：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政策，劳资两利也是一种限制政策。双方要顾，就是相互限制，也是相互斗争。例如，税收是你们限我们一下，我们也要限你们一下，既要允许工人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也要允许资本家向工人作斗争，使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生产。我们说双方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样才能做到劳资两利。光工方有利或者光资方有利都不成的。应该叫“劳”、“资”两利，同时也要“公”、“私”兼顾。显然，刘少奇的这种解释已经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了，这里有一个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更多地是着眼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个倾斜政策。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确定“劳资两利”的方针，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利润。我们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则更多地是从“资本家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来阐释这一政策的，因而基本上是把“四面八方”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看待的。

（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对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在建国后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说过，“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相比之下，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则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他强调了转变的两个条件，一是只有“生产过剩”了，国家工业充分发展了，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在1949年5月的两个讲话中说，从现在起，就搞到中国的工业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那时私人资本的视极性用

---

《炎黄子孙》1988年第5期发表薄一波在该杂志创刊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讲了“剥削越多越好”之类的话后，毛泽东赞同讲话精神，但感到这样的话不大好听，不一定这么讲。于是讲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并托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这样提，当然好”。从目前查阅到的文献看，毛泽东讲“四面八方”政策下是在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之后，而是在这之前。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一方面讲“四面八方”政策，另一方面讲“剥削有功”论，直到1949年8月访苏归来后在东北高干会上还继续这样讲。可见，“四面八方”政策下一定是针对“剥削有功”论提出的。

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在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1949年6月4日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刘少奇1949年8月28日往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页。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

完了，那时我们就限制让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6月的一个讲话中还指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械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二是使资本家不害怕社会主义，愿意捐献资产给国家，实行和平转变。（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是从现在限制一下好呢还是将来革你们的命好呢？还是今天限制一下好。和平转变，就是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并让你发挥作用。如果你很能干，工厂还归你管。你感觉少了，国家还可以拨厂归你管。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10年退不完股，到那时就可以动员将股票献给国家。会有一部分资本家跟着我们共产党一道走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刘少奇阐述的这两个条件，前者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后者讲的是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虽然这里的思想还缺乏规范的表述，而且“生产过剩”的说法过于空泛，但是关于由国家收买资本家股票的设想与建国后的赎买定息政策的思路是一致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刘少奇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上述思想，既源于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有的思想比毛泽东深刻，但有的思想却不如毛泽东正确。各有千秋，又各有长短。将毛泽东的思想和刘少奇的思想进行多侧面的比较研究，是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挖掘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财富的重要内容。

---

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2日在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1949年5月10日在唐山冀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罅漏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模式。但是，由于这个理论还未充分展开加以论证，全面实践的时间比较短促，许多经验还未来得及进行总结，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对中国数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重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进行再认识，一方面，更加领略到了它那耀眼的理论光辉和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感觉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理论还存在一些罅漏。现把个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提出来，同读者讨论。

第一，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的模糊性。《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因而也意味着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理论提出之时直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此都没明确。就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没收官僚资本而言，似乎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是“一身兼二任”，也是“毕其功于一役”。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起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有两种理解，这就导致了建国后党内最初认识分歧的由来。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论。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与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不一致的，即把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事业视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同时又认为同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出现了理论上的脱节或矛盾——主要矛盾下决定主要任务，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上的二元化，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特点，也反映了毛泽东努力突破传统观念但又没能完全摆脱的矛盾认识，从中国经济的异常落后状况而亨，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把进行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承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言，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不认为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认识又与对于革命转变起点的不明确有一定关系。如果是认为“立即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疑应当成为主要矛盾；如果是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再进行转变，那末这个矛盾就不应当视为主要矛盾，当时认识的模糊性，反映在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认知上不能不表现为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不能长久的。毛泽东是彻底的一无论者，建国后不久即改变了这个认识。这种二元化状态成为后来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个认识原因。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没有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却明确地认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

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这是他认识的一次偶然的偏离吗？不完全是。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的结论的讲话中，他继续强调，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到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认识又变了。无独有偶。民主党派负责人施存统也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毛泽东转而批评这种看法，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表明这个认识还在起作用。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的摇摆及至偏离正确方位，是导致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旨在作为一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环节和过渡形态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过渡的时间作过15年至20年甚至30年的估计，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里，是专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吗？恐怕不能下此断语。如果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后，那就是说，这个历史阶段不应当是太短暂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但这过渡性也应当是不太短暂的历史阶段，把过渡性理解为短暂性缺乏历史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没有指出其较长时期的过渡性特点，因而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同它的理论一样像闪亮的流星似的匆匆消逝。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上述罅漏，比起这个理论的巨大贡献来说无疑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瑕不掩瑜。指出这个理论的罅漏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说研究者们不要把它绝对化。在中国，作为革命转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革命转变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却是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继续研究它、发展它。

（写于1989年春，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 第二编

### 建国初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到过渡时期总路线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是究竟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一般人不清楚，就是以它为大目标并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那时也下不甚了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源有两个：从理论思想来说，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还有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就实践模式而言，则是苏联铸就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毕竟是原则的、抽象的、并带有主体的想象成份。30 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认为这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计筑成的社会主义大厦，没去怀疑过它的规格与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并且无限向往。1938 年 4~5 月间，毛泽东给陕公、抗大的学生发表演讲谈及苏联社会主义时说：现在中国县长月薪不过 200 元，而苏联工人有 500 元的进款；苏联从前非常朴素，现在却富裕得很；每个人可当大学生，不论马夫、伙夫、农人都可以天天看电影，可以学科学，可以每人有汽车。他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说，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想要多少衣服便有多少，你要帆布床便给帆布床，家里小孩子多便多要小桌子。为什么能那样？因为丰富得很，所以能解决问题。苏联今天还不是这个样子，只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一家八口，两个人做工，得 300 元；五口人家两个人做工，也得 300 元。这是不平等。人手少，病多，小孩子多的便吃亏。苏联的社会还不能平等，因为没有这样多东西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都好办，那便到宿营地了。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形象描绘。现在看来，虽然它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点——公有制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平等，但毕竟比较粗俗，也有些漫画化，对苏联的描绘理想化了，与苏联 30 年代的实际不完全相符。毛泽东当时没到过苏联，难免有上述局限。但就是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回到国内后也大都是这样介绍的。在 30 年代，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幼稚阶段，既有几分天真烂漫，又不能不带有某种表面性、片面性和盲目性。这种认识影响了我们党几十年，直到建国初期还未超脱出俗，尽管已有了一些理论性的表述。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起点。

如果说对于社会主义蓝图，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可能有更多的独立思考，那末对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则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性。《新民主主义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它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而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论，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继续阐发并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转变作了重要准备。

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既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意味着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最初曾拟名为《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后来几经修改才去掉了“新民主主义”的定性称谓，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没有改变。《共同纲领》实质

上是一个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它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政策。后来，刘少奇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没有提出另外的构想，其主旨是强调贯彻《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建国头三年，中国共产党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尽管其间一部分党内同志有些急躁情绪和糊涂观念，但党中央领导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七届三中全会统一了党内认识，带领全国人民经过3年时间，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候，毛泽东与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并于1953年向全党正式提出，1954年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不同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又一个设想。它的提出和实行对于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它的功过得失，人们见仁见智，大相径庭。

这里就三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关系

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等同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表述不同，二是“对立论”，或“否定论”，认为两者水火不容，后者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倾，是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否定。

在我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部分，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部分。

两者的相同性在于：第一，两者的过渡性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以及党的各种文献中都是这个看法，没有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过渡时期的意见。第二，两者的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和目标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也要求使中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第三，两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讲新民主主义社会时说过，我们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可以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强调和平改造，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实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第四，两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规划时间是一致的。过渡时期规划的时间是明确的，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宣传提纲》的解释，是三个五年计划加上经济恢复的3年，即18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延续时间，在党和政府的正式决议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有关的谈话中所讲的时间大体相同，即15年至20年。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的询问时甚至表示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这可能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延续时间的最长的估计。直到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时还说，“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意即在20年内还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之间还存在重要区别。仅仅看到两者的一致之处而忽视其区别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区别，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没有提出的必要，毛泽东也没有必要在总路线提出的同时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了重要改变。

第一，对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的认识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是二元的。一方面认为我国经济基础落后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另一方面又提出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当时在理论认识上是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重的。建国头三年也是按此精神来宣传两者关系的，尽管在实际上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不能不说有了某种变化。就总路线的正式表述而言，确实是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并提的，在解释总路线时还强调国家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



“两翼”，但是，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使两者的关系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讲的相比较，有了明显的倾斜。这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越来越置于经济建设任务之上，认为这是“纲”，是“主题”，提起了这个“纲”，包括经济工作在内，“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总路线也可以说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总路线理论的实际重心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党的工作重心也更加转向阶级斗争这方面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作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而是抓作为“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明确他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可以说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了。

第二，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态度和政策变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中的个体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基本的经济成份。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将允许存在和发展，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采取限制政策，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利用”。新解放区的土改结束以后，这个看法开始变化，认为农业个体经济面临两极分化和两条道路的选择，主张在土改之后“乘热打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总路线提出后（实际上在三反运动后）逐渐地升了级，不仅讲利用、限制，还讲改造、消灭。在强调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时，毛泽东就指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意即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对象（尽管按人民内部矛盾方式来解决）。一年之后，明确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所谓“改造”，就是以和平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在后来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指出，总路线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也绝种。这些说法明显地改变了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不消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经济政策。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的时间起点和实施步骤变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在讲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转变、过渡是15年、20年之后的事，1949年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1950年6月，他在政协会议上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个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国家将稳步前进，“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说法开始变了。在9月的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119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

书记处会议上，他解释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以后，毛泽东不断宣传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并批评“将来突然转变论”。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针对“确上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指出：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不采取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根据“现在逐步过渡论”，就没有一个像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种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即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过渡时期就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没有的一个新观念，这个思想观念的大变化不能不使人产生突然感。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 二、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改为过渡时期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建国之初虽然已有 10 多年历史，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则仅仅是开始。为什么毛泽东不强调贯彻这个理论，并要改变这个理论的实践呢？过渡时期总路线尽管有一个酝酿过程，从有关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材料说明这个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但是从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毛泽东提出这个思想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的思想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党史界正在展开深入的研讨。这里只能作些初步的大概的分析。

第一，建国以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毛泽东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由新民主主义阶段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提出或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原来说 20 年转入社会主义和在很远的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是就完成这些任务的下限时间或终点讲的，至于何时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建国以后，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没收，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提倡，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出已经逐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但这些工作的进行无疑促进了这个思想观念的形成。那几年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或提前完成，也使毛泽东感到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在 1958 年春天的成都会议上，他回顾这段历史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 1953 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那时作的 80% 是社会主义的，20% 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这把他的一些深层想法讲得比较清楚。关于过渡时期的《宣传提纲》解释说：在头三年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它的领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 1953 年起，我国已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第二，经过同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与斗争，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对相对他说，也就过重地估量了其消极破坏作用，忽视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变化是提出总路线后最带有实质性的变化。刘少奇在 1951 年 7 月 5 日对中央党校学员的报告中讲到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时说：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一些，并采取激烈一些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对资产阶级的表现的认识，正是毛泽东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七届二中全会尽管指出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号召全党要有一定的警惕，但毕竟只是抽象的认识。建国伊始，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暴露无遗。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

件下，人民政府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使其陷于完全的孤立，在社会上“变为臭阶级”。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也感到无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国家“计划他”。这样，便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去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政策。

第三，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而提出的，其实，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列宁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十分严重。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列宁根据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俄国的具体条件，改变了他原来对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作用的认识。后来斯大林改变新经济政策，恢复列宁1921年前讲的过渡时期理论，在苏联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列宁1921年前的和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为根据的。中宣部的《宣传提纲》在说明总路线时也主要引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这方面的言论。这与建国初期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著作不无关系。1955年9月，过渡时期的提法由“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是沿用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还表明毛泽东已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不再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1956年初，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超前实现之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以斯大林的“小过渡”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的。斯大林在1930年7月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之后说：“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很明显，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将“进入”与“建成”加以区别，其理论根据亦源出于斯大林（当然，这个区分是正确的）。

第四，哲学观点上的变化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理论根据。抗战初期，毛泽东在抗大讲演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建国之后，毛泽东对“两论”进行了校正、修改，分别于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发表。对《矛盾论》，毛泽东作了较大修改。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改动，是更加强调客观事物的可变动性和转化性，批评僵死的、凝固的观点。人们熟悉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之名句，正是修改时添加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时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验的总结。就解放战争言，毛泽东很强调部队打仗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认为这是打败蒋介石的重要方法，也是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在占领南京后，毛泽东还强调要乘胜追击，革命到底。这些都是正确的决策。《矛盾论》的修改不能不时这些经验作哲学概括（这个概括无可非议）。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使用“不断革命”的概念，但这个思想已经有了。所谓“乘热打铁”，即是其通俗表述。周恩来在解释过渡时

---

毛泽东195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页。

期总路线的提出时说：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谈及建国初期的有关情况时说：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道出了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之一。

第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伟大的创造性理论，但是，它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某些论述却存在漏隙，例如，关于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则不明确。既然不明确，就可以有两种理解。总路线提出前，刘少奇是作后一种理解。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属前一种理解。这就是党内最初的认识分歧的一个由来，再如，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毛泽东是不确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新资本主义社会。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他还说：蒋介石是半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到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他又批评这种提法，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他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建国以后，既掌握政权，又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就存在一个发展方向问题，也有一个明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他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表明他又回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为了成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强调“新资本主义”有策略的考虑，那末建国之后，持这种观点，真的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难以容忍了。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 三、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改为过渡时期的变化

了解了毛泽东认识嬗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原因，有助于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的、公允的评价。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世界形势看，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在走下坡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两大阵营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战略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敌对立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的世界格局，也是促使中国明确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的一个国际因素。就国内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奄奄一息之状，国家不扶植就无法生存。改造使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既是要逐步消灭它，也是在为它找出路。因为它的种种表现似乎说明它的生命力已经完结，很难还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的事物往往只有当它不存在时才能看出它存在的必要。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但历史的现阶段又不能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死而复生”的命运（当然，“复生”不是让其自由发展，而是让其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补充）。从那时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然处在孩童时期，就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这个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难以跨越的。

第二，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并非是理想蓝图，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雏形，前已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就有缺陷。从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史来说，当时只有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当时的工业化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的单项指标，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综合指标。因此，就是彻头彻尾地搞2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任务。5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远没有80年代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而提出的理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用80年代的理论认识去构想50年代的蓝图是不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代替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可以说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体相同又有所不同的两种设想、两个方案，它们都有各自的短处，但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力实践中的夫误不一定是同步的。就1953年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而言，虽然不一定是唯一性选择，但直到1955年上半年，不仅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较顺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如果将这三年的实践坚持下去，按照既定规划，三大改造以逐步渐进的方式进行15年，其后果也许不一定比原先构想的15年后突然一举转变的“理论模型”差很多。当然，这只是假设。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主要发生在1955年7月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后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这个人为掀起的高潮是可以避免的，它不是总路线提出的必然结果。

第四，过渡时期总路线无疑孕育着求纯、求快的“左”的倾向，也不排

除后来的“左”的错误与它有一定的逻辑联系。但是，它的提出并没有构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还处于量变阶段，虽然也发生了像1955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这样的方针性错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既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也使党的失误在这之后逐步发生了由局部性质到全局性质的变化。当然，1958年“大跃进”后的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有反复的，犯了错误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能努力纠正错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才长期、全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

研究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有一个如何处理评价历史功过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关系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对一个事物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其普遍适用性。两者的结论既可能同向、同步，也可能不同向、不同步，甚至发生较大的反差。研究的参照系不同，探求的功能及其效用不同，得出的看法即使不同向、不同步也属自然之理。研究者只要正确地把握其区别与联系，对两者的评论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形成一个较为辩证的全面的看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就建国初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变化，谈了以上粗浅看法，以期与同行们切磋。

（写于1989年春，改于1990年夏）

## 重读《论十大关系》

### 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摸索

我们被历史带回到本世纪的 50 年代。

新中国成立才 7 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在全国出现，迅即使改造工作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历史的转变时期。

这个转变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下寻常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将进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任务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开战，由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一个时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

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一则由于没有经验，二则由于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解决民主革命的政治遗留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因此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同志作过多次表示，认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解放后，3 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就是说，第一，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抄”；第二，毛泽东同志对“抄”不满意。搞社会主义建设从 1953 年执行“一五”计划算起，已有了 3 年实践。苏联的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了它的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同志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 年 10 月到 1956 年 1 月，他研究农业的发展问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批按语，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些文献虽然带有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

1956 年 2 月中旬到 4 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还阅读了斯大林 1946 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

---

见中共中央 1956 年 3 月 30 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8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共中央 1956 年 3 月 30 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8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苏联从 1921 年到 1940 年内，增加了 1400 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好点、快点。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 5 月 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这是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个成果的意义是深远的。正如他后来所说：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 二、提出工农业“并举”，主张企业 要有点“独立王国”

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经济关系的有五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化与农业这两个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的建设道路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也是这篇讲话中首先阐述的关系。

中国原来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改变落后面貌，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工业，必须发展重工业，这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工业，怎样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办法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两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重、轻、农三者的关系不协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缺乏生活用品，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一些东欧国家盲目照搬苏联的这个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发生的政治动乱，经济问题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国家是个有几亿农民的大国，农业问题不解决好，整个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牢固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毛泽东同志对农业问题研究之后，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他提出的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就是从中国这个大农业国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来的。尽管在这篇著作中没有明确形成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表述，但是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就是“并举”的思想。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并举”思想，他说：“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这篇著作中提出的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

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另一个重大经济关系，实际上涉及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因此在听取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的汇报过程中，他就强调了要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3月初听取汇报，谈到发展地方工业时，他说：地方工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4月24日，在听取“二五”计

划汇报时，他总结了六个关系，即《论十大关系》中的前六大关系。在谈到地方与中央关系时，他说：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谈到了统一与分散的问题。他说：最近这几年，有一种偏向产生，就是集中过多了。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还说，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准备在几个月之内搞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是一直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在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这可以说是，根据这篇著作的思想，我们党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没有展开。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在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阐述。他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问是不要了，不过形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随便这么讲，不是很正确的语言，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么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请大家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一长制的批评，被实践证明既有合理内核，又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撇开这点不言，他在讲十大关系思想的过程中，就提出企业自主权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这说明在30年前他已经在叩击改革的大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三、分析五大政治关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讲了五大政治关系。这五大关系实际上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范畴。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这个思想已经孕含其中了。一方面，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来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分析，提出了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时，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另一方面，从这篇著作本身来看，他提出“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就是“要分清敌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他四种政治关系和五种经济关系，多属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反映，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他许多关系，大多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以主要篇幅阐述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原则。

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理论上的矛盾关系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矛盾的抽象。在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绝大多数矛盾关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这个事实表明，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开始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又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后的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等等，多属于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遗留问题，因而多属于敌我矛盾范围。随着这些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对敌斗争就不再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题目。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正确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主要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

《论十大关系》中的十大矛盾，从政治上讲，正是我国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两类三层”矛盾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这之后，随着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也更加深刻。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从思想史这个视角来看，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的进一步总结，也是对《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

#### 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首先，它体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虽然在这篇著作中还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提法，但这个思想是突出的。探索任务的提出，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寻找“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正式提出这个指导思想原则，是包括了对这篇著作中的这个思想的科学抽象。

其次，它确定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尽管没能正确地贯彻这个方针，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了“左”的错误，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个基本方针开始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它目前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第三，它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哪儿入手？主要矛盾是什么？《论十大关系》都抓住了。无论是五大经济关系，还是五大政治关系，都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五大政治关系，虽然不属于经济问题，但只有把这些关系解决好，严格区分革命与反革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各种矛盾，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在发表这篇讲话之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探索过程中跌了大跤子，摔了大跟头，但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的探索作了认识上和经验上的丰富的积累。

最后，它开创了一个好的探索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前已指出，若从对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算起，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前后达半年左右；若仅算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也有近两个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他的思想形成过程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思想。调查研究也是他一贯倡导的方法，在他后来的实践中，忽视了这个问题，导致对一系

列重大政治经济关系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分析，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确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所开拓的探索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原载 1986 年 9 月 1 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 略论 1956 年至 1957 年 春天的思想解放

长期以来，1956 至 1957 年春天被认为是闹风潮的“多事之秋”。其实，这近一年半时间揭开了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是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最民主、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又与思想的大解放有密切关系。当时，我们国家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历史大转变中。与此相适应，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这个思想解放的大潮，为我们党在那个时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重新研究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状况及其特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原则，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获得一定的历史启迪。

## 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与思想解放

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形成的原因是颇多的。这里不准备作全面分析。在诸多原因中，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能否说，这次思想解放大潮还是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滥觞，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的认识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56年春天直到匈牙利事件以前，我们党虽然不完全同意苏共二十大的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和平过渡等一些观点和做法，但对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献中，我们党不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及从中应当汲取的教训，而且对于苏共中央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勇敢决策表示了某种欢迎和支持。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是深远的。它的负面作用在后来中苏论战的许多文献中已经论及。其中某些分析看来不一定科学，那就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这里谈谈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面作用，这就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在一个重要方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继延安整风之后获得了又一次思想解放。40年代延安整风的主要锋芒，虽然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但是通过整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实际上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对苏联革命经验的迷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过，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50年代，我们党欢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当然，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只是要否定他的严重错误。在党的八大期间，党的领导人会见外国代表团时多次强调了批判个人崇拜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的同志时说：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团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为什么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会形成思想解放的大潮呢？

就世界各国共产党而言，是因为：一方面，斯大林破神化为真理的化身，对他奉行“句句是真理”和“凡是”之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推行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政策，把兄弟党关系变成了父子党、猫鼠党关系，这对于维护尊严、渴望平等的党来说是很难容忍的。批判了个人崇拜，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呼吸到了自由、解放的新鲜空气。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还有更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

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看，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他既出过一些好的主意，对中国革命有过积极影响，也进行过不正确的干预，发生过消极作用，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统治中国党达四年之久。第二次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执行斯大林的旨意，放弃党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害怕中国内战引发世界大战，把中国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阻止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打仗。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还怀疑中国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怀疑毛泽东搞民族主义，是“半个铁托”、“准铁托”，直到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之后才摘了这个“帽子”。

从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来看，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表现了严重的沙文主义。他最初不愿与毛泽东会谈，不愿意取消同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重新签订友好条约。后来虽然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但实际上仍把东北、新疆当做苏联的“两处势力范围”，坚持要在那里办“四个合营企业”。毛泽东对这次在莫斯科开始一段时间受到的冷遇很恼火。后来他说：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从对中国建设的援助方面看，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派出大批专家、顾问帮助中国建设，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少数苏联专家、顾问以老大自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强制推行苏联经验，也对中国建设发生了不好影响。我国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由于缺乏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唯苏联经验是从，唯苏联专家之命是听，机械地照搬照抄，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对于斯大林的哲学理论，我们党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毛泽东多次指出：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或者说，大体上不懂辩证法。他虽然提倡辩证唯物主义，但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往往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写的著作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只讲事物的联系，不讲是什么样的联系；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不讲对立面的转化，不承认任何对立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有些观点是针对着《矛盾论》的，苏联人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有的条目，如关于同一性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有很大意见。但是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批判以前，这些意见是无法提的。不仅如此，从大局出发还得维护斯大林的权威。这种抑郁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谈到自己矛盾的心情时说：我也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恐怕不仅毛泽东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有这种复杂的心理。

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使人们了解到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没有了“紧箍咒”，感受到了思想的巨大解放。

## 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新认识

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通过对斯大林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样几个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

###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在理论上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没有把这些矛盾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批评这种否认矛盾的观点时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党中央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接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矛盾，这样的矛盾就会有不同的性质或类型。就国家政治生活而言，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呢？

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则混淆矛盾。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30年代后半期对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加区别，把党内的、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现象，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把自觉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思想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根据长期的传统观念，不讲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任何分析，资本主义

的所有一切都被看成似乎是绝对的坏东西，是万恶渊藪，社会主义被看成天然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立即让资本主义“绝种”。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和管理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非不能发挥作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议论。

在党的八大以后，民建负责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工商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和上海搞地下工厂的情况。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发表讲话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多一些。1956年6月，他会见一个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作比较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在毛泽东讲了前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发挥。他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57年3月，他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他，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议论，虽然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是，他们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由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直到今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他们的议论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在30多年前，他们能够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

### （三）关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问题

前已指出，毛泽东对于照搬苏联经验的说法很不满意，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1956年春天，他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作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中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照搬苏联经验的盲目性和奴隶性。其一是说生物学家胡先啸不赞成李森科的主张，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科学院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其二是讲在 1953 年苏联有一本杂志说，吃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理由是蛋黄胆固醇高，还说喝了鸡汤会促成血管硬化，但后来又有杂志发表文章全翻了案。第三个例子讲，我们国家设文化部电影局，而苏联过去是电影部文化局，有人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了，才不吭声。毛泽东批评这种现象说：不管谁放的屁，也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随后，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所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毛泽东说，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批判地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人家的东西，有的能照办，有的不能照办，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经历了从照搬苏联经验到独立思考、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革命时期，这个觉悟过程花的时间较长。建设时期，虽然觉悟得较早，但是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花的时间也不算短。1956 年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仅仅是探索自己道路的开始。

### 三、1956年至1957年春天 思想解放的历史启示

上述思想的“解放”，归纳起来，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这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列宁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领导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并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再认识。1956年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在这次再认识中，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56年的思想解放大潮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许多变化，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随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但是，这次思想解放却给我们以重要的历史启示。

**第一，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不可分离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思想解放。**

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要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种成见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我们所讲的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从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为了实现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思想解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即是说，思想解放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思想解放，愈能实事求是。

历史的逻辑也是如此。在党的发展史上，几次确立、端正或完善思想路线，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延安整风破除对教条主义的迷信，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1956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是如此。如上所述，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获得那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比较过去的认识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党是在破除了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才独立思考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的。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来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但是1956年的许多认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在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分离的时候，例如1958年鼓吹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说明，一方面实事求是要以思想

解放为前提，另一方面思想解放也要受实事求是的制约。否则，像 1958 年那样的所谓“思想解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所要求的思想解放，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是胡乱思想。它只能糟踏思想解放的名声。因此，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不可分离性是双向的，在当前，我们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为了要进一步地实事求是。

第二，思想解放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不坚持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建设民主政治。

我国是一个民主意识十分薄弱的国家。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既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也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是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民主权利又不能不受到客观环境和革命需要的限制。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对于旧社会来说，显示了人民群众享受民主的巨大优越性，尽管政治民主体制还很不完善。这正是在 1956 年能够形成思想解放大潮的历史环境。没有民主政治的土壤，是不可能思想解放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反过来又能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例如，在 1956 年，我们党的领导人思想比较解放，对于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思想。当时周恩来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考虑了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当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 30 日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时也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他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后来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这些思想大都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它正说明了民主政治与思想解放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的。回顾历史，瞭望今后，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三，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坚持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思想解放属于思想路线的范畴。解放思想，端正了思想路线干什么？在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国家，要使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科学地坚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同样也离不开思想解放。思想不解放，搞改革、搞开放，是根本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56 年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具有的改革、开放的特点，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例如，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所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8 页。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政策（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等等，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特别是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所做的重大突破，是那时思想解放的一个巨大收获。

历史前进了 30 多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包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 1956 至 1957 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归纳为一点，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必将越走越宽广。

（原载《新长征》1989 年第 1 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改动）

##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 ——中国共产党在 1956 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目前正经历着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次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 1956 年前后。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1956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本文试根据党的文献对此进行初步研讨。



## 一、探索任务的提出和思想解放的潮流

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突发，使原来估计为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在1956年超前实现了。在当时看来，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说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就发展生产力来看，还没有完成过渡时期规定的工业化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取得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于我国成立的其他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是采用苏联模式。这样，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虽然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消极作用。尽管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中央领导人对于苏联经验已有一些辩证的思考，但是在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少单位及其领导人那里，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号召的影响下，实际上存在着那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凡斯大林讲过的都不能违背，凡苏联的经验都不能更改。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心情不舒畅”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只有到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才从思想上获得了解放。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苏共二十大第一次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使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党的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见外国党代表团时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时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通过时斯大林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主要对这样几个问题获得了“解放”。

（一）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

---

毛泽东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 1956年6月28日在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

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党中央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接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混淆矛盾。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中央领导人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自觉地把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国家允不允许不同学术观点自由讨论？斯大林在世时，苏联是不允许学术观点自由讨论的。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他们支持李森科学派，反对摩尔根学派，由斯大林直接干预，由苏共中央出面作讨论结论，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行政措施。苏联这种作法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发生了某些影响。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的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这之前，他还表示过，即使对他写的著作，对任何领导人的学术思想有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些看法充分表达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苏联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宣布“双百”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四）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议论。

---

毛泽东 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党的八大以后，除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 7 日讲了关于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话之后，在同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 52 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批准它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 1957 年 3 月 21 日，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议论，虽然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是，他们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由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直到今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他们的议论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在 30 多年前，他们能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

（五）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不要加以分析？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认识苏联的经验。1956 年春天，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作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还指出：不管谁放的屁，也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经历了从照搬苏联经验到独立思考的过程。革命时期，这个觉悟过程花的时间较长。建设时期，虽然觉悟得较早，但是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花的时间也不算短。那个时期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仅仅是探索自己道路的开始。

上述思想的“解放”，归结起来，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这次再认识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有了不少新的理解，获得了不少新的观念，对探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起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

## 二、1956年前后探索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贡献

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 （一）关于对国情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超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入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

党的八大总结建国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 （二）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工农业关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

---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建国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一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 and 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一个平时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这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

---

毛泽东 1956年4月18日、3月1日至5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7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7页。

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论十大关系》已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会议。拟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的讲话都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和主要内容。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小组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这次体制改革中，党中央着重探讨了这样几个问题：

中央向地方分权。这是建国后党中央思考较多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问题后，周恩来对此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发挥。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体制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最集权就等于无权，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就是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从计划、财政、企业、事业、基本建设直到编制等问题都要扩大地方权力。

扩大企业自主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让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3天之后，即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中又提出，要使企业有“自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接着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工厂应该有自主权”。给生产者个人以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种自主权，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该是更好一些。

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之后，陈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索和研究。他深刻地分析了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了在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物价政策等方面搞活经济的若干措施。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

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个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指明了出路。

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在 1956 年 12 月，毛泽东讲到允许开设地下工厂，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之后，刘少奇在 1957 年春天南下视察期间，发挥毛泽东的思想，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问题，这也是对陈云讲的“三个补充”的发展。1957 年 4 月 27 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而计划又不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只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同年 5 月 7 日，他在北京对中央党校负责同志谈话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又说，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更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在这里，刘少奇已经模糊地触及到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是，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他中断了这个思想。

#### （四）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思索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扩大民主的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开展经济建设来说，工业化需要民主化，只有不断扩大民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党中央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在八大会议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对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思考的最大成果，就是提出了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可以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党中央提出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听取汇报时说，少奇同志讲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周恩来时这个方针的民主性质讲得更多。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个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他说，在我们国家，民主党派联系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党中央在 1956 年提

---

周恩来 1956 年 5 月 3 日传达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精神的报告。

出的这个方针，为在我们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也考虑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透明度。他特别强调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十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考虑。在八大期间。他对外国代表团就说过：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1957年4月30日，他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他在以集中精力研究问题为由作了解释之后，还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毛泽东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也赞同这个意见。八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为毛泽东安排的。这说明在斯大林问题揭露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

#### （五）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

建国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思想文化批判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压抑感、异己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愈益需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进思想文化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1956年是思想文化战线较为宽松的一年，也是党的思想文化工作较为民主的一年。思想文化建设的民主化，是当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56年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有这样几个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据会议精神，党中央力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700多名留学生回国作了大量工作。

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鉴于我国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状况和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强调科学在发展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希望尽可能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以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刘少奇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的谈话。



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即集中 600 多位科学家编制了全国科学发展的 12 年远景规划，以突破高、精、尖、新技术为战略目标，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出“双百”方针。除毛泽东、陆定一在理论上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或者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例如，1956 年 8 月，由中宣部会同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在青岛组织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就遗传学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摸索经验。1956 年 10 月 15 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一，讨论并批准了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试开现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学说介绍和批判的课程讲座的请示报告》，随后许多高校设立选修课，“开放唯心主义”。

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对外开放。在 1956 年 8 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周恩来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了对外交往。

但是开放的还很不够。1955 年接待了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外宾，比起我们的祖先来差得很。他说，在 1300 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昌堵区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就住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还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高，近 300 年来，西方文化高，我们要承认，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谈话中，反复强调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他举中国历史为例说：汉朝是这么做的，唐朝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其中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后来搞久了，就变成中国的了。他还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这些言论虽然都是些即兴讲话，但是可以看出，在文化的对外关系上，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

在 1956 年前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以全方位的姿态展现出来的。以上论列的只是一些方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焕发出的思想火花是绚丽多彩的，有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这次探索本来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准备起飞的发动机，从而使这次探索成为一现昙花，转瞬即逝。

---

周恩来 1956 年 6 月 28 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 1956 年 5 月 30 日接见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代表团时的谈话。

周恩来 1956 年 3 月 22 日接见聂思仁等人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56 年 1 月 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56 年 2 月 25 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56 年 9 月 27 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 三、1956年前后探索的局限性及真历史教训

1956年前后的探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毕竟相距了20多年。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现在的探索与那时的探索，既存在延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历史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简单等同，否认两者的区别，认为现在的探索早已有之，这也是没有辩证观点的非科学态度。

1956年前后的探索有这样几点主要的局限性：

（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方位缺乏认识。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20年即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据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似乎不具有阶段性，也不存在长期性。我们党在1956年的探索虽然在某些方面力图突破苏联模式，但从未想到更新这个观念，当时设想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即是根据苏联提出的以工业产值达到国民经济比重的70%为标准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工业产值达到70%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建成是一个综合指标，而非单项指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日益丰富。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认识带有几分天真的稚气，也有几分盲目性。

（二）1956年前后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这是那时的改革探索同现在的改革探索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那时改革探索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例如那时进行的以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主要是各级行政管理经济权限的划分，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首要地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的办法来调节和管理经济。那时确认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虽然也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从根本上要改变产品经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的改革探索与30多年前的改革探索相比较，不是过去的思想的简单继承，主要是根据当代历史发展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使其发生了某些性质上的变化，因此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曾经被视为思想解放成果的、对传统模式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在今天可能换位而变成改革的对象。但是，对它的否定，丝毫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三）就1956年前后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来看，也还存在一些缺陷，有的不准确、不完备、不彻底，有的在认识上发生动摇，有的内涵是随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似乎我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须改革和完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变化就是从对这个表述的不满发展起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在八大报告中不仅没有重申“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而且强调执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又说明认识在向后退。“双百”方针后来注入了多种含义或加以多种解释，使其完

全演变成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

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探索在理论上还有其不成熟性和不明确性的一面。

1956年的探索没有得以坚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能否说下面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发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1956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以后的基本形势。对于这个形势，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开始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罢工、罢课等闹事之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逐渐地改变了认识。对于大鸣大放所引起的政治波澜，用毛泽东的话说，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整风民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夸大了阶级斗争成份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对待作为主流的民主运动，这样，1956年的探索不能不被中断。

第二，批判“反冒进”，指导思想逐渐堕入“空想论”。在1956年，党的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速度问题，虽存在分歧，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同时为了准备召开八大，被掩盖了。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从而八大得以顺利召开，1956年能有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右派分子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问题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发难，把反冒进视为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大反“反冒进”，从而改变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陶醉，骄傲情绪、主观主义急剧发展，指导思想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入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1958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时堕入空想论。

“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越来越热昏的头脑，使党的领导人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许多认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水准，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是双重的“空想论”，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无论对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对年度计划，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生产翻番指标；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强制实行小社变大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空想论”的产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以后数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而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某些探索，但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总的指导思想却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继续1956年的路线。

第三，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在 1956 年前后，我们党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意味着过渡时期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始，再加上对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和三年困难而加深的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认识，还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错误估测等因素的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七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过渡时期不仅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历史时期（大约二百年内）都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这个理论完全改变了 1956 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1956 年的探索也就自然终止了。那时，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也自认为搞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探索。但是，那是与 1956 年的探索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对于 1956 年的探索没能坚持的原因，目前理论界也在思考。以上分析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继续研究。

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是相当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心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有某种隔膜，影响着去对世界先进文明进行探索。如上所述，中国虽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民主意识还异常薄弱，既有不懂得怎样运用民主权利的，也有视民主为怪物的；改变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就其激励奋发日强来说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它也容易导致产生急躁冒进情绪；背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包袱形成的民族自大意识，容易产生狭隘的虚骄心理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盲目性。这些都是探索中国之路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的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某些消极心态有了改变，现在，党清醒了，人民清醒了，民族清醒了，改革的探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相信，新的探索决不会重蹈 1956 年前后探索的覆辙：它将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美好明天。

（写于 1988 年夏，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定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原文载于《党的文献》1988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时期，很注重研究经济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作的大量农村调查，已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村经济的珍贵文献。到延安以后，他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看过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8月出版的《资本论》（郭大力、工业南译）外，还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大纲》等书。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学一点政治经济学。1958年1月，还把它列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四十条。本篇着重谈谈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

---

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1930年11月第2版。

河上肇著，陈豹隐译，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5月第2版。

拉皮杜斯、奥斯特洛维强诺夫著，张仲实、樊英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4月第4版。

## 一、积极倡导学习《政治经济学》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在讲话中，他提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消灭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只要全社会还没有进入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就不能实行产品调拨，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为了帮助各级干部纠正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11月9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夏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7月2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选。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计划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2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

这个本子由胡绳同志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下面对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加以介绍。

---

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并在日记中对当时读书的情况作了部分记载。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5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关于这个本子的情况，1960年3月7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

##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1957年2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一）关于反对官僚资本。这是毛泽东在1948年4月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提出来的。反对官僚资本，在政治上是推翻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它们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1949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主要是从它的作用上讲的。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这个“两重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所引起的革命转变。

（二）关于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解放战争时起，在老解放区就实行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对于富农，在老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1954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1954年9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正是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消灭富农经济与消灭官僚资本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因而也具有二重性，这是同一个思维方式的必然逻辑。事实上党对这两者的政策有原则区别。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从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毛泽东总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虽然把合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简单化了，但是他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互助合作运动作历史考察时，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生产形式的特点。

（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一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 1.2 亿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下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我们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是想说明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成功的经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也应当正确地认识走过的历史道路，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

### 三、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刊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贯彻了这个精神。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1955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下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到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毛泽东讲的这段历史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一）关于工农业并举的思想。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后有发展。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的错误，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农业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为了改变偏重于工业宣传的片面性，毛泽东指出：农业是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要大力宣传农业。到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工农业并举等一系列并举，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路线。但是在这以后，由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破坏，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安排是重、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捉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

“衣、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官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这个方针。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就引起过学术讨论，但没有人提出过决然否定的意见。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坚持了这个方针。只是在1958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才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现在有一股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坚定。他使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实际上是讲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属性，比斯大林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概念——主要是从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上来使用的，前进了一大步。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消费资料的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

---

薛暮侨在1953年《学习》杂志第九期上发表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商品生产仍然会在一定范围以内存在，价值规律仍然会对商品生产，特别是对商品流通保持其一定程度的影响。”（见薛暮侨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第15页。）这代表了当时我国理论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也是这么实行的。

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1959年3月30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三）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1953年12月中宣部制发的、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解释总路线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指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出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两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说明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国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虽然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基本思想没有变。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

我国的经济学界比较早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孙冶方在1956年《经济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就批评了价值规律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这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式而已，只是这规律体现自己的方式而已”。“否定或低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反之承认并强调这一规律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尊重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于光远在1957年《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商品交换的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下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开始在党内宣传“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了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以让历史去检验，这里不作评论。但是他的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接触了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这里没有明确讲共产主义，因为全世界的阶级都消灭了，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共产主义。

是否进入了，还要看其他条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谈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又一次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卫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因此，他的这个思想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也是有意义的。

## 五、从经济学谈到哲学，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1954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早就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人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种种评论，自然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下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这本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否完全正确可以研究，但它的提出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二）关于认识过程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后中，他比较多地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三）关于部分质变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

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最早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的，却是毛泽东。他早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实际上已经运用了这个思想。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更是自觉地运用这个思想来指导实际工作。正因为这样，在1958年初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他便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这是他对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

在这个时候，旧的质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

30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受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最早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他们在论述质量转化法则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他种质量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还指出：“这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6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地方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他说：“一定的质所包含的个个侧面，由于量的变化，通过其许多属性，形成许多局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即部分的飞跃）。”他举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变化为例，指出：“这两个阶段以及这两阶段之间的推移，都包含着许多部分的侧面的飞跃的变化”，“都可以说是全体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部分的质的飞跃。这些部分的飞跃，成为有机的联系而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准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总飞跃。”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有关的地方划了杠杠、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他写道：“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质变，和一过程内部的质变，其飞跃的形式也不同。前者是过程全体的质变，后者是部分的质变。”毛泽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书中的这些地方，既没划杠杠，也无批注。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比起 30 年代的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述来深刻多了。他不仅从对立统一关系上揭示了事物部分质变的内在原因,而巨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来说明这个思想,赋予了它巨大的实践意义。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里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 20 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60 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

前几年虽有个别文章量这个思想提出了异议,但哲学界不少同志仍然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

## 六、正确对待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左”倾观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中“左”的倾向不断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就是这个时期“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一则没有认识到这是指导方针的根本错误；二则庐山会议又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方向，因而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还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在政治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一）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句话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也在实际工作中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纠正“左”的错误的彻底性，不是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根本的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机”。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所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二）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仍下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问题，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费几十亿元、动员几

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三）关于物质鼓励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上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预，一些错误的、消极的现象是下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时产生的消极作用，他时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这个时期的思温上，实际上下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是清楚的，今后还要继续克服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同对待任何事物都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样，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毛泽东的失误。毛泽东本人说过：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吸取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大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写于1986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 从刘少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兼论毛泽东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这两个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混乱，是十分严重的。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纠正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多次号召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同时，要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人中间，率先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一、带头组织学习小组

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达海南岛，准备集中一段时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了解我国经济学界对一些重要经济理论的争论意见，刘少奇请求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两名经济学家参加他的读书小组活动。1959年11月2日，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负责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并富春、康生、一波同志：

我们昨日一天到达，不觉疲劳。此间天气同北京的夏天相同。

我们拟在此读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册，同秘书医生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按计划读书，并开小组会。但在这里还没有熟悉政治经济学古典著作的人，了解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的人也没有。因此，想请你们物色两个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其中至少一人又了解一些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即日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并作一些学习的辅导工作。如何？请你们务予帮助。他们来时，请带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若干经济问题的材料。

我们在此大约最少可以学习半个月，多则可以学廿多天，一本书，当然可以读完，并且还可能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作为经济工作的参考。

来人请带夏季服装。

祝你们工作顺利！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11月2日，杨尚昆等负责人经研究，提议派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

11月7日，王、薛二人前往海南岛。

11月11日，学习小组开始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学习小组读书讨论的，还有广东省委负责同志陶铸、林李明等。读书讨论会汗了八次，直到11月22日结束。在每次讨论会上，刘少奇都发表了意见。

这次读书活动，是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反思。

毛泽东肯定了组织读书学习小组的做法，1960年1月17日，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社会主义部分读一遍。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刘少奇的带动下，这以后，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集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亦简称《政治经济学》）的读书活动。

## 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中，刘少奇很注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在11月17日的讨论会上，薛暮桥介绍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四种不同的意见，即：（一）人们平等地从事劳动而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消灭差别的矛盾；（二）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斑痕和残余之间的矛盾；（三）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薛暮桥说，在学术界，多数同志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基本经济矛盾。

在薛暮桥的介绍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两个概念，是混用的，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刘少奇发言时也没有加以区别。

在薛发言时，刘少奇作了插话，认为“基本”矛盾问题牵涉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

在19日讨论这个问题时，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新的与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是存在的，思想战线的斗争还很激烈，但逐渐缩小，多种经济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后，主要的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是包括生产和生活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是全体人民的需要。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刘少奇也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表述提出了异议。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最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恐有困难，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满足。今天限制一点，明天就可以多满足一点。刘少奇的这个看法，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

刘少奇关于“基本”矛盾，实际上是主要矛盾的看法，尽管在表述上不太准确，但其思想还是党的八大决议的思想。

在八大决议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诊断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根本转变。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是肯定八大的思想的，他不仅认为我国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著名理论。但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规律作了错误的分析，因而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

在毛泽东的观点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变化后，刘少奇在那时也是跟着变了了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繁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

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里，过渡时期的含义已经变了，它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直线式的，有时也可能发生反复，形成曲线。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时关于主要矛盾的上述意见正是这样。

毛、刘二人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变化都是不小的，但是情况很不一样。如果说毛泽东由正确到错误的变化是一百八十度，那末刘少奇由正确到错误再回到正确的变化，则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度。刘少奇的变化，至少说明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说法并没有“根深蒂固”，对八大的思想的记忆还是很清楚的。当然，学术界认为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意见，对他有影响。

顺便指出，学术界和刘少奇在当时能发表与毛泽东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在庐山会议之后，尽管党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受到了很大破坏，但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还不是没有一点自由空气；尽管毛泽东已树立了巨大的政治威望，但他的一些理论观点要被人们完全接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把他的每句话都奉若神明的地步。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短的，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的思想统一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之下，学术讨论的自由空气也就渐渐少了。

###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虽然是由毛泽东完整地提出的，但是刘少奇对这个理论有特殊的贡献。

1951年，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记中；认为矛盾可以分为“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和“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内，而是就一个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却是前所未有的，在理论上，这一大功劳不可磨灭。

在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刘少奇在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运用他自己的习惯表达方式。这年4月，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发挥了他在1951年的思想，继续指出：矛盾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还说：对人民内部矛盾“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如果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使矛盾缓和，“妥协解决”，那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

在这次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在11月22日，也是最后一次的发言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指出：

对抗性的矛盾，从它的根本性质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从它的斗争形式来讲，这种斗争形式是有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对抗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对抗矛盾当作非对抗矛盾，但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的矛盾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如夫妻打架，夫妻本来不是对抗矛盾，但可以是对抗的形式，对抗一下，然后和解。对抗性矛盾，必须采取对抗斗争来解决，但在某些时期，可以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资产阶级愿接受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解决了，对抗矛盾可以和解。

在这里，不妨将刘少奇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同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作一比较研究。

一方面，从宏观上说，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们都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另一方面，从微观来看，就两人的立论、侧重点和表述方式而言，应当承认，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人所立的矛盾系统下完全一样。毛泽东是直接从政治着眼，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这是他立论的基石。在肯定了社会矛盾的政治性质之后，再从哲学上揭示和阐述其特征，说明它们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刘少奇的论述，则更多地是先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然后将其运用到政治领

---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2页、93页、9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2页、308页。



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矛盾系统的逻辑，比较多地是从政治到哲学；刘少奇的逻辑则比较多地是从哲学到政治。

第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过矛盾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问题，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时，却没有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他讲两类矛盾时，是同时强调矛盾的根本性质和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更深了一层，有助于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因为对抗性矛盾是从根本性质而言的，并非指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具有对抗的斗争形式者，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质的矛盾。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个方面，能强化将表现为对抗的矛盾作具体分析的这个意识，避免将采取了对抗形式的非对抗性矛盾误作对抗性矛盾处理。

第三，在论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毛泽东爱使用“民主方法”的说法；在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时，往往是将“批评或者斗争”同时并用的，即认为在人民内部也可采用在“批评”这个等级上或“批评”的意义上的“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则不同。他爱用“和解”、“妥协”、“调和”等说法来表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他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里往往是不包括斗争的，并且是相对立使用的“他认为“斗争”的方法只适用敌我矛盾，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用“斗争”方法，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实践证明，在政治上把“批评”和“斗争”加以区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整人的人正是钻了将“批评”与“斗争”混用的空子，在引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公式时偷梁换柱，既借“批评”的幌子搞残酷斗争，又把残酷斗争说成是所谓爱护性的“批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些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刘少奇的风格。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的重要补充；其中第三点还是对毛泽东的“公式”的重要修正。

#### 四、关于人昆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刘少奇一贯重视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上面提到的 1951 年那篇笔记中，他认为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并由这个矛盾构成“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形成“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面提到的 1957 年 4 月的那篇讲话，进一步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昔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这里是就全社会而言，不是就某一个具体单位讲的，可见，他把这个矛盾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从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个基本矛盾的角度，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 11 月 13 日的发言中，他在分析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时，说：正确处理劳动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集中的问题，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厂长可以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者，也可以用国民党的态度来对待劳动者。怎样使大家干劲十足，心情愉快呢？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和工人一起干（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劳动者就干劲十足，心情愉快。还说：重要的问题是讲劳动者相互关系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各个环节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一道干，劳动者情绪高了，生产力也就出来了。”

在 11 月 16 日的发言中，刘少奇还指出：公有制还不能保证同志式的合作和真正一致。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在农村、工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下车间，就有问题。我们现在是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 11 月 22 日的最后发言中，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个问题，应提到经济学上，提到生产关系上来理解。搞不好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还说：我们干部参加生产一般是做粗活，如果说要创造价值，是创造不了多少的，主要是为了去掉官僚主义。相互关系中有官僚主义，群众看了就不高兴。它妨碍着生产，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全发挥出来。

在这里，刘少奇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提高到经济学上来认识，把改善关系与发挥生产力的潜能相联系，是非常卓越的思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同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所发表的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性质是相对稳定的。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而在这 10 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

---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93 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3 页。

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不仅如此，刘少奇和毛泽东还都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忽视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忽视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这是苏联教科书的一个严重缺点。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把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关系，并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视角来认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的意义，这个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性。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克服官僚主义，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仍然是需要努力探索解决的重要问题。

##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1958年的“共产风”，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否定商品生产。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刘少奇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在19日的发言中说：商品的作用，商品存在的原因、性质、定义，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比较，哪些变了，哪些还没有变。先区别有何不同，然后再说统一性，有哪些是遗留下来的。相同于过去，区别于将来。将来两种所有制没有了，按劳分配变了，商品性质也要变。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与消费资料的商品性质有哪些不同，还有价值、价格与货币等问题，也要研究。

刘少奇对否定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是反对的。他明确指出：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批判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刘少奇论证了商品存在的长期性。

首先，刘少奇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共产主义。尽管“其最基本的性质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的半成品，但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有许多斑痕脱离不了，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仍要采用，如商品、货币、银行等等，这些虽然是旧的形式，但内容变了，还要加以利用。要“把它作为工具促进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如利用政党、军队、国家这些形式一样。“这些形式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要看条件”。

刘少奇还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的关系来说明商品存在的长期性，指出：新内容总是在旧形式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把旧形式冲破。现在商品货币的发展，还未完全冲破旧形式和抛弃它的外壳。社会主义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但还没有到抛弃旧形式的程度。

其次，刘少奇从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上进行了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因为有社会分工；二是两种所有制的存在；三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刘少奇不完全同意教科书的分析，认为社会分工不是商品产生的原因。他说：商品最初是在两个部落之间产生的。在一个部落内不发生商品关系。如果把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的产生原因，那么将来分工还要多，商品就会更发展。社会分工必然产生交换，但交换可以是商品交换，可以不是。交换在将来也是必需的，等价交换还是有的。他还指出：我们要预见到将来商品怎样消灭，但消灭还是将来很久的事。刘少奇同意苏联教科书所讲的两种所有制并存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两种所有制了，也恐怕还需要有商品。因为有些消费需要按劳分配，消费资料有价值，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因此，他强调：只要有按劳分配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我以为，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在党的领导人中，像刘少奇这样对商品生产问题作深刻分析的还不多见。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问题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他比较早地对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一书中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讲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与会的负责人一起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表示下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底，苏联修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修改了原来的观点，也认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都是能够流通的商品。在研读这个修订本时，刘少奇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要按价值计算，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并且，他开始考虑生产资料怎样供应的问题了。他说：生产越来越复杂，生产资料的分配是个大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担负这件事，是要出乱子的。

这是一个重要思想的萌芽。这以后，刘少奇负责指导生产资料流通的改革工作。在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期间，提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商业部门”，因此主张成立“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当然，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几年允许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流通的政策是不同的，其着眼点还是为了加强物资的统一管理，而不是放权分利，并使其商品化；但是，相对于长期实行的统一调拨的“死办法”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施。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分析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采取了商品形式的问题。斯大林既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也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在刘少奇看来，劳动力不是商品，但可以采取商品形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有剩余产品，而下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刘少奇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他批评教科书说：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很“心痛”，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这有什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什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词时，扭扭捏捏故意回避。

刘少奇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要采取商品形式，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当前的任务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在理论上要改变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规律的特点。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刘少奇在50年代未能提出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作肯定的回答，但也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一定的理论胆识。

当然，从总的方面说，刘少奇对商品生产的看法，并没有突破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框子。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为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社会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的性质，到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变了；价值规律对生产只有调节作用，而没有决定作用，过分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

值规律起作用；目前利用商品与价值规律，是为了消灭商品与货币，等等。总之，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这个观念上，不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因而把商品经济规律与计划经济规律始终相对立。

## 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看法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设了专章讲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在“共产风”的影响下，我们国家在那个时期议论共产主义问题也较多。在读《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也谈得较多。他主要谈了这样几个思想：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将是很长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个短暂的阶段，而共产主义则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漫长的历史。他说：共产主义有多久：长得很。假如地球存在一百万年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九十九万五千年，而有阶级的社会不过只有几千年罢了。他还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论证，指出：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以前的历史是不自觉的，真正的人类历史还未开幕。正戏还未上演，正戏是从共产主义开始演的。以前的历史是社会前史，现在是正史。阶级社会是短暂的，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很长的。

（二）共产主义社会将分若干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是漫长的，就不可能没有发展。有发展，社会就显出阶段性了。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都将分若干阶段。他说：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几个小阶段，共产主义也可以分几个小阶段。他在另一次发言中还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是低级阶段，将来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从广义的共产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低级阶段怎样向高级阶段过渡呢？刘少奇认为，要实现过渡，一个是产品极大丰富，一个是人民觉悟大大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要为了共产主义能愿意暂时牺牲个人利益。

（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将逐步实现。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是先满足基本生活资料，然后才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他说：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穿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一个早上都能做到，而是逐步的。他还举新产品为例说：新产品总会有的，而新产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总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当某一新产品普遍大量生产了，又有新的新产品出现，因此，在他看来，按需分配采取逐步实现的方式是确定无疑的。

在上述几个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表现了惊人的一致，甚至连表述的语言也几乎一样。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时，也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相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不知多少万年，这么长的历史都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毛泽东也认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中去。”

共产主义社会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未来。刘少奇、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否科学，留给历史去评判。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 七、读书研讨中的“左”的历史印记

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发表了许多真知的见，另一方面也没有超越历史，仍有不少“左”的观点。例如：

关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当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在这时，如果还要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末革命对象是谁？把握不好势必要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导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不能不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仍把这一条当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进行总结，反映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

关于物质刺激问题。刘少奇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光靠物质刺激，必须是政治加技术，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使人入懂得为社会主义做好工作，这是对的。但是，他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贬损或否认物质鼓励或物质刺激的作用，就有片面性了。他说：政治驾驭技术、物质，政治是统帅。机械唯物论是没有灵魂的唯物论，单纯强调吃饭、穿衣，不是政治挂帅，而是钞票挂帅，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可能出现“按酬付劳”，会引起许多副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说：物质刺激的办法，资本家很强调这个，并不惜培养工人贵族。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在这里，刘少奇把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或物质刺激）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既要教育劳动者不能只为别墅、汽车、漂亮老婆而工作，但是也必须给劳动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国和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关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问题。1958年“共产风”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急于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刘少奇一方面批判了急于过渡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不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需要使两种所有制长期并存。他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否一定要存在两种所有制？不一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但并不是一定要两种所有制非同时存在不可。集体所有制万岁，这是机械的看法。还说：集体所有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集体所有制势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在50年代末，我国的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对这种实际状况缺乏清醒的头脑，不是要求巩固集体所有制，而是批判“大力巩固”的观点，这样做，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由于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共产风”的批判很不彻底，急于过渡的错误倾向始终没能克服。从列年代到70年代，几起几伏，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巨大损害。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左”的指导思想，才真正解决了



这个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新观念来看，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有历史的局限的。

（写于 1987 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文献和研究》1987 年 第 5 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 艰辛的开拓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17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讲过的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我国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生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这样。

曲折的道路，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难以逾越的，是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经历的过程。迄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S形的弯路，当然弯曲的性质和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正错误的方法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毛泽东 1970 年 12 月 18 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

指 1970 年，这里系相对于本文发表的时间言。

##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的探索大体集中在这样五个时期：

### （一）1955 年底到 1957 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以前

这是探索的开始时期，探索任务的提出，首先是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结果。三大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蓬勃展开，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多次说：1949 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毛泽东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1949 年的胜利在他运筹帷幄之中，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迅猛，进行之顺利，则为他始未料及。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消灭剥削制度，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为它的实现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几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和完成，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像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呢？这是毛泽东在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则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二则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革命上，这样，包括“一五”计划在内，那些年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 年 10 月到 1956 年 1 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 1955 年 12 月他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1956 年 2 月中旬到 4 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还阅读了斯大林 1946 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苏联从 1921 年到 1940 年的 20 年内，增加了 1400 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快点。

---

毛泽东 1958 年 2 月 28 日和 7 月 22 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毛泽东 1957 年 3 月 19 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见中共中央 1956 年 3 月 30 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8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的十大关系，在经济关系中最重要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提出的工农业并举思想，既是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在考察了农业问题之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随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 （二）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前

这是探索的失误时期。反右斗争的开展中断了1955年底开始的探索。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又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不仅使党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此以前的许多正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这次失误是从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底和1956年初，有些部门和地方不顾实际可能，盲目地增加预算投资，扩大基建规模，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周恩来、陈云等发现问题后，建议中央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了这个思想。党的八大会议也贯彻了这个精神。这对于保证1957年的经济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毛泽东对于提出反冒进是有保留的。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20亿元。《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他批示“不看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等，是“右倾”、“促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搞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这属于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激烈地批评反冒进？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种路线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在他看来，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他主张前考，反对后者，甚至提出以后只能反有倾保守，不能反冒进。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有浓厚的“左”的色调，8月的北戴河会议把“左”的思想推向了高峰。这次会

---

毛泽东 1958年1月20日在南宁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58年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两股潮水似地涌向全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毛泽东从主观上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并且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1958年10月2日，他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像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了，其他东西部可以跟上来。1959年4月20日，他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但是，实践证明，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比这样的探索，既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大跃进”的许多成就是虚幻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具有空想性质。

### （三）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这两个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党内主要倾向还是‘左’”。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说“中央可以不讲，我个人可以讲，我一讲，我就没有包袱了。”

毛泽东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然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并不认为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因而，他对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教训时，他认为这是比反冒进更严重的错误，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于是不惜冒犯众怒，挺身而出“反击”，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尽管如此，“大跃进”的教训对毛泽东来说还是深刻的。60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没有重犯这类错误。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多次号召任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寻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亲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武昌会议期间，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因此，他再次要求与会同志读那几本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庐山会议开始时，他还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好好读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下来。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 1959 年冬天，才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在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

#### （四）1961 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 1962 年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

这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和新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在此之前得到一定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以更猛烈之势重新蔓延开来。“大跃进”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为了扭转困难形势，党中央在 1960 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 年 1 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没认识到三年受惩罚是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 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在随后 3 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这年春天，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谨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在毛泽东对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推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证。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是我们党所探索到的上述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第一批工作“法典”。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 1961 年 1 月的八届九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的。这对我们有利，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在这年 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提出，我们搞了 11 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全党全面总结经验的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这篇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经验。

#### （五）1962 年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接近尾声的时期。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个关节点。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认识，使他在这次会后把主要注意力又转到抓阶级斗争去了。这时期，他主要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

但是，这不是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完全不考虑了。他接受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冲击经济工作的教训，强调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不要干扰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1963 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之后，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时期已经结束，提出进行大发展时，他同意陈云等领导人的意见，决定调整时期从 1963 年起再延长三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些正确的决策，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复苏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也在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问题。鉴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大以后有了飞快发展，毛泽东也强调要学习先进技术。1964 年 2 月，他接见钱学森等科学家时说，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防弹道式导弹，5 年不行，10 年；10 年不行，15 年，总要搞出来的。这年 10 月，他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有可能再有 10 年，不仅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这年 12 月，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还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学习先进技术以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

加政治。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了  
这个思想。但毛泽东在应用上却欠妥当。他在听到大庆、大寨艰苦创业的事  
迹汇报以后，在 1964 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号召学习他  
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对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把这当成是适合中  
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经验。实践证明，除大庆提供了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寨提供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某些先进经验  
外，其他的经验不够成熟、不太科学，甚至还带有许多“左”的色彩。

随着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在 1966 年 6 月发动了“文  
化大革命”。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探索（  
尽管其间也有错误）也就基本结束了。



##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的基本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到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思想，做过系统的、深刻的阐述。这些思想是我们党花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凝聚着全党的心血和智慧，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在内。这里着重就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些基本正确的重要思想，作概要的介绍和分析。

### （一）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分析；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矛盾时，提出了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但是从全社会的范围内，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又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头三年，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遗留问题（如剿匪、反霸、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多属于敌我矛盾范围。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因为在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已使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际上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实践。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斗争的新时期；另一方面也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其他许多矛盾，主要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能否正确处理这个层次的矛盾比能否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劳动人民，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既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又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直接依靠力量。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也使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在历史处于转变的关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转变。因此，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个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确实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

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他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论，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害。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兴旺发达；反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受挫折，走弯路。这条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 （二）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指出过但没能坚持实践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指出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这一年6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的信中，还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后，他在195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后，他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同意八大决议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也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在这一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补充说：要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南宁会议上只提了技术革命，现在再加上文化革命，就完善了，随后，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务。这年12月，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1959年10月，他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过去几十年内，革命同建设同时进行，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之后，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从以上部分论列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上，从政治方面看，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第一，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不坚定。从上述论列可以看到，他在1956年以后就反复了三次：一是在1957年夏天将反右斗争扩大化，并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正确的论

断；二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并把这个斗争引向全国，冲击了当时的经济工作；三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了一段经济建设的恢复和调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到抓阶级斗争了，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在建国以后，他领导全党的 27 年间，真正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的时间就很有有限了。仅此一点，对于一个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错误，第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思想路线不正确。这主要指 1958 年这一段。这期间，他是全力以赴抓经济工作的。在一月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时，他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各级干部适应这个转变，它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抓经济工作的。但是，由于他不断地对反冒进问题的错误批判，结果自食苦果。他自遵义会议领导全党以来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批掉了。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一教训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都说明，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还仅仅是走了第一步；能否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不仅在于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且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三）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思想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它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鉴于有的东欧国家按照苏联模式，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1957 年 4 月，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

1958 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毛泽东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时，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在这年底到翌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时“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下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中国道路的优

---

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25 日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的谈话。

占和特点。

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对他本人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过去提出的思想的新概括。

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是他探索到的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思想，至今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 （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他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下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的，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坚定。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还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他批评“共产”风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

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矛盾，一个大问题。”

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提议，这次郑州会议拟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要加上价值法则的内容。后来文件中写上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一语。这次会后，他了解到广大农民普遍要求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所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情况。在3月下旬的上海会议期间，他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

---

这个方针的完整提法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犯了错误，但是经过这次总结教训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个概括，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

#### （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自主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在毛泽东讲的几大经济关系中，除了工业与农业两个产业是最大的关系外，就是最重要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但是，建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很大部分是因袭苏联的。因此，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

虽然在1958年“大跃进”中，一度权力下放过多，出现过分分散主义倾向，但随后迅即得到了纠正。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教训时，毛泽东认为，中央管得多，统得死，这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主要倾向，因此，仍然要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他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问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他还把我国同欧洲相比较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套。1960年3月，他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要把我们这个国家看成“联合国”，一个省就是一个“国”，我们中国是个“联合国”。这以后，中央和地方关系虽然几经调整，但地方的自主权仍较少。因此，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地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里虽然是就一部门的问题而言的，但提出的分成原则有普遍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也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问是不要了，不过形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如何程度，请你们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随便这么讲，不是很正确的语言，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么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请大家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对一长制的批评，被实践证明是虽有合理内核，但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暂且撇开这点，他在近30年前就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经济工作搞好，毛泽东还在探讨如何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1964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托拉斯问题的汇报时，他表示赞同刘少奇关于建立托拉斯企业的设想。他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人干什么？人要吃饭的，要消耗的，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还指出：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些意见，虽然还有不确当、不完善之处，但它说明毛泽东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只是他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堵塞了继续探索改革的道路，而且使国家的整个经济濒于危机。这是一个悲剧。

**（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三结合”**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后，就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除了依靠生产力本身的几个因素外，还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关系内部，所有制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他很注重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根据他的建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这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一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过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形式主义的缺点等。

毛泽东在1950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探索道路进行理论反思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经济，如果干部下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的合作。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对国营企业在解放后十年间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总结，然后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

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1960年3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再次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问题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地肯定了 this 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此后，这便成为了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个制度是毛泽东在改革我国沿用的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提出的，自然带有探索的性质。就其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指导思想来说，这个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管理现代的企业来说，这个制度是不完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企业管理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改变。

**（七）实现四个现代化，在 50 年至 100 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求索的目标。在 1953 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以后，根据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的意见，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说法，主要体现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 1957 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问题，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 1959 年底 1960 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 1964 年底 1965 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是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毛泽东考虑到它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作过多种设想。例如在 1955 年 3 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这年 10 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大约在 50 年到 75 年的时间内，就是 10 个五年计划到 15 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6 年 9 月，他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 50 年至 100 年的时光，在 1958 年“大跃进”期间，他一度将时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但经过困难时期以后，他不仅回复到了原来的估计，还认为可能更长一些。1961 年，他同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 年不行，会要 100 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 年 1 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继续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100 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在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后，1963 年 9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两

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十二大关于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规划，以及随后所讲的关于在建国 100 周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设想，正是根据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上述估计和规划而提出的。

上述七点，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问题所列举的比较正确或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这既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经济思想，也不是说这些思想都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些，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党的某些探索思想的历史发展，丝毫没有要掩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之意。在文中，笔者已多次指出他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以及他的一些有严重错误的理论观点。后面还将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因此，这里就不再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集中起来一一论列了。



### 三、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并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的探索，从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借鉴和沿用建国后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从汲取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探索思想等来说，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探索的继承，但是，若从其真正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和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政策，改变了不少僵化观念，对一些历史经验作了新的概括等方面来看，则不仅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有重大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生前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在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之后，1958年3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这年5月，他还指出：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十月革命是列宁做的，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也没有做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列举俄国党和中国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后，指出：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到了60年代，毛泽东已入古稀之龄，一方面感到人老体衰，精力不济；另一方面，想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的雄心未泯。1964年3月，他对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这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继续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毛泽东本人未能实现他提出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担当起了这个光荣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从宏观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把原来基本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向前推进所作的发展。例如，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理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它们不是在否定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恰恰相反，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理论向前推进了。

另一类是通过否定过去的许多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而作出的发展。这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突破了以往的传统观念，使人

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对社会的震动更大，理论意义更为深远。这里着重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的固定观念的几个重要突破，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某些理论观点的重要发展。

### （一）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所有制形式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在1953年刮“共产风”时，还出现了急于由集体与全民两种所有制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倾向，以为越是单一、纯粹，社会主义的“品位”就越高。撇开这种特殊时期的幼稚病不言，根据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也只存在全民与集体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不允许私有制形式的经济成份存在，党的领导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曾经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有所放宽。例如，周恩来提出，可以保留小量的私有制作为第三种所有制。陈云提出，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12月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也说过：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工人250万，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了1964年1月，他还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

毛泽东等人的这些思想，从现在的眼光看，无疑也是开明的。但是，它主要被当作个别、特殊问题看待，没被当作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来思索，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观念的灵活性，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党中央对这种多维的经济结构作了理论概括，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的新概念，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外，还存在着公私合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包括外商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这种多维结构，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同的。因为在那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全国占绝对优势；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主要不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它的必要补充而存在，而是按其自发趋势在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概念的提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列宁、斯大林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首次突破，那么，包括允许私有制存在，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提出，则是对马、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主观随意的，从主观意愿来说，虔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更希望维护传统的观念。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不仅在中国，还有许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共同地提出了多种所有制问题，实践要求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改变一些与现阶段实际不相符合的固定观念，扩大自己的外延，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对某些传统观念的改变，不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恰恰相反，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强大的活

力。

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处于分散形式的、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带来的问题，不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

###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提出集体所有制相联系，列宁、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已经突破了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观念。但是；这种突破也受到了当时历史的局限。例如，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过域内起调节作用。就毛泽东来说，一方面，他比斯大林的观点前进了，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规律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他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子，把它们同计划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对立。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即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还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加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营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番话，在政治上，是为他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作辩护；从经济观点看，则反映了他对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被纠正。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研究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之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它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论述。理论观念上的这一飞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会发生巨大影响；而且为那些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将另辟溪径。

### （三）共同富裕与先后富裕

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同坚持公有制一样，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同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只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一样，对共同富裕原则也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共同富裕被简单地视为“均富”，即完全平均，同步富裕，否认差别，反对“冒尖”。其实，这是粗俗的平均主义思想，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按照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差别、完全平均的社会，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这样。共产党人的主张是承认差别，缩小差别；由承认差别到缩小差别，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只能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努力缩短这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取消这个历史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共同富裕就会成为共同贫穷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清醒的。1958年刮“共产”风时，他曾视“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等等为共产主义因素。他很憧憬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用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的平均主义措施作历史论证。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在随后武昌会议期间，他对陈寿著《三国志·张鲁传》写过两段批语。一个是流传较广的1958年12月10日批语，讲中国农民革命斗争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中，也提到张鲁“置义舍”、“吃饭不要钱”等等，但在这之前的12月7日，他还写过一段话，对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大加赞赏。他写道：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这段批语，毛泽东当即涂掉了，这一方面说明他并不坚持、也没有要宣传这些思想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曾经是他思想的一个兴奋点。作为研究资料（也仅仅如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维轨迹。

当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回到张鲁时代去。在纠正“共产”风时，他对于“一平二调”是坚决反对的，已如前述。但是，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反对“共产”；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可太富，甚至认为“穷”（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比富好，对富裕之后存在着忧虑。1956年2月，他听取工业汇报，讲到“一穷二白”时，就曾表示过：农民要富，但不可太富。土地国有了，拖拉机、抽水机，大型的应当国家掌握，不能交给农民。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认为外国评论讲的“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讲到劳动报酬时，还说：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不好；在我国土改以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1960年10月，他接见斯诺时说：将来财富应该集中在公共事业上。个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有所提高，要提高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或者更多一点。大多就对身体不利，对人也不利。到了晚年，他的这些思想发展得更严重。1973年6月，他还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恩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是极而言之，有的甚至是反

话，需要辩证地理解，就其“穷则思变”，要革命、要斗争而言，也有其合理因素；但他对穷与富的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他的这种思想无疑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否定了这种错误观点，批判了平均主义思想，实行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依靠勤劳，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践上使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理论上对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

部分先富政策（“部分先富”似比“部分富裕”的表述更能表现动态过程。它强调了富裕只是先后之别，而不将部分人的富裕凝固化。因此还是采用“部分先富”的提法）并不否定共同富裕原则，而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原则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它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首先默认劳动者不同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技术高，劳动多，贡献大，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而先富起来，是这个原则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说，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共同富裕，只能经历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体质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我们国家，由于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和其它措施，部分先富政策不会变成血与火的剥削制度赖以复生的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所作的突破，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所作的发展，这里不一一阐述了。从这里，人们不能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但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它不仅要求理论的科学性，还要求实践的科学性。

怎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是科学的呢？首先，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无疑的。但是，仅仅承认这一条是不够的。无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成为科学的实践，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是容易的，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在我们党，毛泽东是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大部分实践中，坚持这个原则，先后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个原则，在主观上也想坚持这个原则，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由于受了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的束缚，没能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摒弃了那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观念，才逐步确立了这一条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再次给人们以非常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有一个从原则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从宏观体系和基本理论原则来说，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但是从微观方面看，它原有的某些原则、观点或结论，并不一定都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正确概括。它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由实践来修正、补充和发展。因此，当这些原则、观点或结论同众多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同搞社会主义的人们的长期反复的而不是个别偶然的实践相抵触的时候，更必须在这个十分简单但又非常根本的问题上进行选择。

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一切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探索的基本经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实践。

（写于 1986 年夏，原载《党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 一、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

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

1875年春天，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和拉萨尔派计划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由于爱森纳赫领导人起草的统一党的纲领草案，在许多地方采纳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随即写了《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通称《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等含混不清的空话时，谈到了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的分配；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人（例如老人和小孩）的需要不可能“平等”。就消费资料在各个劳动者中间的分配而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行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他说：“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开始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明确区分，以后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通用了），也没有使用按劳分配这个词。但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的思想。

马克思为什么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呢？是不是他认为这个原则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音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马克思所以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它们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权利。就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来说，一切商品所有者都适用同样的价值尺度，因此他们在价值尺度面前是平等的；就按劳分配来说，在劳动尺度面前，交换的双方也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

当然，等量劳动相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它是商品交换的一般原则，是和商品同时出现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手里，这个原则发展到了顶点，成为普遍的原则，并且把劳动力也作为商品，因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当劳动者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时候，在形式上同资本家是平等的交换关系。这个平等的原则虽然只存在于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内是对于剩余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但资产阶级正是用这个原则所体现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权利，取代了封建制度中的等级特权，使平等权利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标志。恩格斯说：“权利

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他们的政治口号的原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劳动还是交换的对象，还不能和报酬脱离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从社会取得的报酬，原则上是同他的劳动成比例的，还不能不保留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上平等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加以比较时，便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体现的平等权利，叫做“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平等的权利”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局限，从本质上说明了它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不能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纲领。

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劳动为共同尺度来分配消费资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则是不平等的权利。它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也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家庭负担。劳动者体力强弱不同，智力高低不同，赡养人口不同，因而在劳动成果相同、从社会消费资料中领得的份额相同的情况下，这一个劳动者所得到的，事实上就会比另一个劳动者多些或少些，其生活水平就会比另一个劳动者高些或低些。因此，马克思讲，这种“平等的权利”，“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下平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完全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它既撇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各不相同的特殊性质，也撇开了它们各自从属的不同的生产关系。如果要用抽象的概念来分析具体事物，就必须回到被撇开了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也就是说，如果运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抽象概念来分析按劳分配时，就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使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既没有否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 二、列宁对“资产阶级权利”理解的变化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在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正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内容，明确地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加以区别。他说：“‘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列宁指出这一点，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在劳动力买卖平等的幌子下掩盖着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的权利。这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权利，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与此不同，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则是以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在这里，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者的权利只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利’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有着根本的区别。

另一方面，列宁又不像马克思那样，主要在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所表现的形式上的平等的意义上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而比较多地阐述“资产阶级权利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权利”的特征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两个方面。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侧重于说明它是形式上的平等这一面，因而，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一点来加以定义，并以此把它同封建特权这样彻头彻尾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平等的权利加以区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地方使用这个概念时，则主要论述了它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方面。例如，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下不公平现象，而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分配消费品这一不公平现象，这就表明“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只是部分的取消。就生产资料由个人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这一点来讲，“资产阶级权利”已不存在；就消费资料实行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来讲，在不同等的人身上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没有取消。在这里，列宁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其侧重点已与马克思的原意不同了。他没有更多地去强调“资产阶级权利”的形式上的平等这一面，而着重突出“‘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这一面。

列宁还把“资产阶级权利”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他说：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还不够“完全成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人们不可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进行劳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规范，因而需要国家机构，一方面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方面“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是说，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强迫人们共同遵守“资产阶级权利”，以便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列宁的这个思想，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继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使“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本来从纯经济的意义上提出的概念，具有了政治色彩，列宁还根据马克思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并说：“和（半资产阶级的）权利一起，（半资产阶级

的)国家也还不能完全消失”。这里的“(半资产阶级的)权利”，无疑是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泛用。这样，就使这个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变为不确定、不清晰，从而，使本来就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变得更加费解。这个变化情况对毛泽东有较大的影响，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解释比列宁离开马克思的原意更远得多了。

### 三、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翻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始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讲了不少。从这两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论述来看，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主要表现在：

第一，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例如，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1975年底到1976年初的一系列谈话，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之类的话，但是他却忽视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大肆制造舆论，全盘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声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因素，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毛泽东始终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特权阶层。这是把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正常的的不平等，同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个原则破坏所出现的不正常的的不平等情况混淆了。因为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反对剥削的，实行下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是防止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这个原则的强制性，还有助于把绝对大多数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能够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地创造性地为社会劳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扩大社会财富。因此，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上，真正的按劳分配产生的劳动报酬的差别，是劳动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的差别。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的普遍提高，这种差别最后逐渐缩小（当然，如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在消费品分配上的人为的“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平均主义者的幻想）。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会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通过别的渠道产生大量占有他人劳动的不法行为。譬如，投机诈骗，走私贩私，贪污盗窃，或者依仗权势侵吞集体的或他人的财产而成为暴发户，无一不是对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践踏和破坏。这就必须通过国家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来保卫按劳分配原则，堵塞破坏这个原则的各种渠道。

第二，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的。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权利”只存在于分配领域之内，即“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是，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权利”的范

围扩大到分配关系以外。1958年，他曾列举过“资产阶级权利”在我们国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除了列举薪金制、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等属于分配关系的以外，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列举了许多。例如，他说：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下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在有的讲话中，又把三风五气（三风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猫鼠关系（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老爷态度，官僚主义，军衔制，等等，也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是说，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现象甚至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这样，他就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用滥了。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旧的传统习俗的影响，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必须纠正的不良现象。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现象，并指出它的危害，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但是他把这方面的问题一概地都说成“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把不同范围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

第三，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1958年秋天，毛泽东提出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就产生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意向。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同年郑州会议前夕，他的思想逐渐有所变化。在10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开始提出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的方针”。11月19日，在郑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权利”分为两部分，认为属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对于工资制，要适当的保留，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11月23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也说对于“资产阶级权利”要有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一部分有用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要“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在这里，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比最初企图全面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虽然有了改变，但是把“资产阶级权利”区分为有用的，无用的；一部分保护，一部分破除，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些话表明，他把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变成了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政策措施。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又一再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他在1969年4月13日九大开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所有制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形“左”实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体的话。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隶体，也个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厂群众手里。并且指出：领导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是

修正主义路线。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说法，但是，这里所论及的问题，不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内容（连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了），而且还把对待这类“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看成了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划分是不是“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他看来，既然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等“资产阶级权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展夺权斗争，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所以，他在分析了上述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1975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也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尽管他表示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这样的意思，但在他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仍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应予消除的弊病。所谓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说法，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因此，在他提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高潮。1976年初，为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他又指责老干部们的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等等，不仅把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问题看成是由“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再一次地从批判“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方面，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错误认识，怎样导致了他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想的、理论的根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就讲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按劳分配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利”（假如我们一定要继续使用这个普通人难以理解、马克思只在《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篇文章中使用过的概念的话），是和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样的分配制度尽管还不是按个人需要来分配消费资料，还没有消灭劳动者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它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对人的剥削，同以往的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制度相比较，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深刻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也不应当否定按劳分配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利”。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把按劳分配原则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要放弃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而下是为了换取社会给他个人的报酬。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工作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归根结底，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对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来说，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既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也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可缺少的。因为按劳分配原则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地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既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又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坚

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本文曾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党史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获一等奖，原载 1985 年 9 月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

## 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思想的再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加深理解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进行再认识，不是没有裨益的。

##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解析为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提出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最高阶段，并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但也没有将社会主义作明确的阶段划分。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明确论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革命家之一。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有一些带开创意义的重要思想：

例如，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发展阶段，会发生质变和革命，从而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启开了大门。

毛泽东是大哲学家，研究问题往往首先从哲学高度发表一些宏论崇议。1955年10月，他在会见工商界代表人士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进，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1956年11月底，他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同他交谈哲学问题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200年或2000年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会不相适应，一部分进步的人要求改变，另一部分保守的人不愿意改变。这样就会发生革命。他还说：就拿1万年来说吧，这里会有许多矛盾，需要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共产主义社会可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即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对抗矛盾。在这里，毛泽东用了“对抗”一词，显然，这是从哲学意义而言的，并不是讲的政治对抗。所谓“革命”，也不是讲的政治革命，这在后面将要提及。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1964年8月，他接见一些理论工作者时继续指出：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百把千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还说：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100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虽然是哲学的抽象议论，也不是在专门探讨共产主义问题时讲的，但还是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它能使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发展的视角、变化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未来的社会，有助于我们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教条化的倾向。

又如，从部分质变的观点出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

毛泽东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发展阶段时，实际上包



含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且是作为其大前提加以提出的。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之后，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还是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谈起的。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他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但这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的这几段话，包含有许多重要思想。它进一步说明了：1. 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一种预见，不能当做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先验模式；2. 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可能要经过许许多多阶段；3.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性和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否认阶段性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4. 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变化所引起的革命，其性质变了，它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而是指一种质变、部分质变，一种飞跃；5. 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小阶段，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时间更长；6. 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只有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极大提高，才谈得上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一些思想，不仅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就是列宁也没有明确讲过。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两阶段论，是一个比较新的思想。

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两阶段”论的明确概括虽然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这个思想早在50年代前期就已模糊地潜在着。1954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两段讲话都表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建成并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终结。

因为“建成”只是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按照当时采纳的苏联标准，如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70%，这个任务经过15年可能达到，“建成”之后还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才能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大国家。前述的“两阶段”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逐步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的。这里讲的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只是建成按照当时标准来看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再如，在对我国的国情进行初步分析时，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50年至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和时间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曲线。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的认识比较客观一些，上面提到的他在1954年6月的报告中认为，大概经过10个五年计划差不多了，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对农业和工业作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较多的了解，虽然也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但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他认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之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50年至100年时间。基于这样的认识，1957年3月，他在南下视察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讲话时，指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50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的思想的发展。不难看出，他已经接近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这个重要思想。可惜的是，他后来严重地偏离了这个思想。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过来，刚开始搞生产建设，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要把这个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

但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不再讲这些了，一度将改变面貌的时间缩短了许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60年代初才恢复了原来的估计，甚至认为时间可能更长一些。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我们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估计基本上是吻合的，多年来，邓小平一直讲用100年时间接近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是在1987年3~4月以后，才将赶超对象作了改变，即将目标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之更为切合实际。

1987年4月，他会见冈比亚总统、刚果总统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时，一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从三中全会到现在是第一步；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使中国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个人收入仍不高，但我国总体力量可进入世界前列。十三大报告把这个步骤作为发展战略肯定下来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还有一些好的思想。比如，在1956

年，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加以明确区别；在 1958 年，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除了在分配形式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外，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一个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容。上述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贡献。它既是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也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两阶段”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而言，虽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尽相同，因而不能将两者等而视之，但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

毛泽东在 1956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说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

##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失误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是一个有着矛盾内容的复杂体系，除了正确思想之外，随着50年代后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也有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他晚年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从理论上讲，无不与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对他的这些错误观点进行再认识，是防止重犯“左”的错误，克服“左”的倾向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超越阶段的空想论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能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当“左”的思想发展后，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空想成分越来越多。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萌发的超越阶段的空想论的产物。毛泽东晚年所追求的，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属于空幻的构想，这种构想就其超越阶段的特征来说，有这样几个主要之点：

1. 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还是较为清醒的。他曾经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可以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他批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认为在我国这样的政策可以搞得时间更长一些。1956年12月他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还指出：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可以考虑私人开大厂，可以雇工，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设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在他看来，在总体上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可以搞一部分资本主义，但是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他的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取消，而且连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不断地批评了各级干部中存在的急于过渡的倾向，但仍然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大集体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表露了要过早地将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意向。这是当时“左”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源之一。

2. 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后，供给制风靡全国。毛泽东很欣赏这种分配制度。他在1958年秋天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一再认为，过去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他的这个思想虽然有所改变，但对于人民公社的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等“七包”、“十包”的供给制或半供给制仍然十分推崇，甚至还宣传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来为人民公社推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作历史论证。直到国民经济进入

全面困难时期，1961年6月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才不得不取消供给制，将加入公社食堂的方式改为自愿选择（实际上公共食堂也随之解散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挫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越来越陷于贫困境地。

3. 不切实际地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基本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积极作用。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这个倾向比较明显。1958年8月，他在北戴河会议讲话批评工资制、批评资产阶级权利等问题时，强调过去战争年代给谁发过薪水？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他认为，要加班费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按钟点计算报酬不能算道德高尚。他不同意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赏重罚制度，认为这是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他称赞人民公社搞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要求各级党委对在实际生活中增长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大加推广。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批评苏联“教科书”讲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认为“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利益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否认了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

4. 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继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之后，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大讲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了。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和实验，也可以考虑先由一个省进入共产主义。到了这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过去把“共产风”仅理解为“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是现象性的认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其实质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县还制定2年、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虽然带头降温、煞风，批评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因而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只要几年就可以实现，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当时已开始准备这一过渡。吃饭不要钱是在创造过渡条件，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人民公社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当时为许多干部所接受的趁穷之势过渡可能有利、不然就难过渡的主张，实际上表达了毛泽东的看法。在武昌会议期间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认为即使我们先进入，也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在10年之后可能进入。毛泽东等领导的这些思想完全改变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我国国情的比较正确的分析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仅是要超越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而且是要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尽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

想”，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但那时实际上已深深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坐在“不断革命”的列车上刹不住车了。

## （二）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所谓“大过渡”论，是指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看成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是理论界的一种通俗说法。“大过渡”论是相对于“小过渡”论而言的。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视为过渡时期结束，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小过渡”论。苏联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的。我们国家宣布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也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的。

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是关于过渡时期的标准变了。1953年发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大约需要15年左右有时间完成过渡任务时，本来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标准（即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就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也提前完成了。因此，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仍然指出：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这里讲到“过渡时期”，即是指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巩固。在这里，毛泽东的认识已出现了矛盾，即：从生产关系看，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从生产力发展看，仍未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这个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造成的。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不再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谈论过渡时期了。这样，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关于过渡时期结束要有一个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思想，没有再坚持了。

二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终点变了。就生产关系而言，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就是过渡时期终结之日。这在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是清楚的。反右派斗争以前也一直这么说，尽管在党的文件中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说法，指出：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1958年4月，他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这些国家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说：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毛泽东的上述说法是否意味着当时我国又由社会主义阶段退回到了过渡时期呢？不是。他延伸了过渡时期的下限，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阶段也包括在过渡时期了。这里说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的建成，并非指进入社会主义而言。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已经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作了区分，其间的表述虽不明确，但根据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来分析

是清楚的。如果说在反右派斗争以前，他把过渡时期的下限定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那么，现在则扩大到“建成”社会主义之前了。这是关于过渡时期终点的第一个改变，也是毛泽东的认识由“小过渡”论走向“大过渡”论的第一阶段。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下限的第二个改变，是把终点由社会主义建成之日推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前已指出，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观点，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阶段的终结，还要经过一段建设历程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时间原来估计得比较长。但是在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由于陷入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提前建成，共产主义可以提前进入，而且认为建成社会主义与进入共产主义之间的时间最好短一点。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不是指低标准的（如工业比重占国民经济的70%），而是指高标准的。1958年12月，他接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认为，低标准是很容易达到的，要把标准提高点，使人民有个奔头。他说：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等等。因此不要过早宣布建成。此外，还有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以及国家职能等问题。国家作为镇压的职能不存在了，但仍有经济管理的职能。这就形成了所谓“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的思想。基于这个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改变了对过渡时期的看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还说：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显然，毛泽东持前一种观点。这就是“大过渡”论。这以后，毛泽东愈益强化了 this 观点。1963年6月，这个观点被正式载入了经他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建议”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他的认识就完全由“小过渡”论转变为“大过渡”论，完全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形成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首先，这是由他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形成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三大错误理论观点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三大错误理论观点，一是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是认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是认为在我国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消灭。这三个观点都是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理论的。既然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作为主要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被包括在“大过渡”阶段中也就合乎其理论思维的逻辑了。

其次，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某些论点作了不正确理解的结果。在马、列（主要是列宁）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词往往

是混用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认真分析，是能弄清楚作者的原意的，但是在那时，毛泽东为了论证其形成的错误理论观点，有时就难免对马、列的著作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理解；而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的理论根据，反过来又会强化其错误的理论观点。两者循环论证，互为依托，这就形成了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理论错误，包括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并存，超越阶段与混淆阶段共生；愈到后来，正确的成分愈减少，错误的成分愈增多、加重，并占主导地位；经过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以后，超越阶段的空想论不再坚持，但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却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剥离出正确思想加以肯定，剔除其错误思想加以抛弃，既吸收其“两阶段”论的合理内核，又从其超越阶段和混淆阶段的理论迷误中汲取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正确地认识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个发展，如果说在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时还不能看得很清楚的话，那么，通过十三大报告，它就生动、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对于这个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里仅举几条略作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预见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不发达阶段的构想奠置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使其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从而也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开始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理论。

前已指出，马克思、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没有具体解析，只有毛泽东较为明确地提出过“两阶段”论。但是，他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问题的，不完全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运动和我国国情作出具体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十三大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特定历史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就经济方面言，简单说来，就是“脱贫致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就需要的时间来说，可能是 100 年左右，甚至更长一点。这与毛泽东讲的使我们国家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大体一致。但是毛泽东没把这样长的阶段视为现在这样的初级阶段，而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阶段。这是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作为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加以强调，有助于落后国家强化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观念，有助于克服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超阶段的“左”倾急性病这一顽症。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了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纠正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虽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直接要素，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归根结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对一般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要考察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也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为依据。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无疑要看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特别是公有化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是社会主义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毛泽东在其指导思想正确时，对这些基本观点是很清楚的，也是坚持宣传这些观点的。就我们党来说，最早提出生产力标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个思想，在实践中对于中国人民曾经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从理论上说，它是我们党关于生产力标准这个卓越观点的原始表述形态，或者说，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很可能是受胎于这个思想，在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之后明确起来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很强调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甚至指出过：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又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从实践方面看，他在晚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直至10年动乱，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屡遭挫折，停滞不前，发展缓慢。从理论上说，他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两大失误，都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背离生产力标准的错误比较明显，自不待言；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又何尝不是背离！前者不顾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单纯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后者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要求。两者以不同形式都严重地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生产力发展标准的毛泽东，最后竟背离了这个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个不幸。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思想，从根本上纠正了忽视生产力发展标准的倾向。这不但因为它是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而且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摆脱贫穷和落后，除了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以外别无他途，从而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使其具有空前的紧迫感。邓小平说过，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说到底，就是指我国目前的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国家还不强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有利于我们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始终把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固有本质属性加以肯定，认为它的充分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从而把商品经济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改变了某些传统

---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

的社会主义观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是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看待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没有商品经济（即等量劳动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进行直接交换）的。列宁、斯大林承认了商品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它尽管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能发挥积极作用，因而需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利用”论，是把商品经济作为“外在属性”看待的典型表现。随着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发展，他连“利用”论也不再坚持了，越来越多地强调“限制”商品经济，越来越把商品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视为资本主义“溃疡”，因而推行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萎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完全改变了对商品经济的上述看法。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且是使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富裕的必要条件。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形态和机制。一般地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特殊地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商品经济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社会主义观念，也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运动轨迹。这种改变是极其深刻的。例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包括允许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的少量存在和发展；在分配形式上，废弃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原则，强调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包括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家或职工集体，允许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责任制，也允许有的企业实行股份制和将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改变过去单纯实行计划调节的做法，同时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建立新的市场体系，不仅允许发展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在内的商品市场，而且允许发展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些变化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们反映了我们党这些年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历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个新认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传统观念相冲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削足适履”，让实践去符合某些预想的理论原则，而应当让理论原则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之不断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构想是在 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那么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总结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探索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条可行道路。这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之下开辟的新的道路。它不仅是对毛泽东晚年的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和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

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它不仅具有辉煌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正确，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就能正确地反映我国的国情。反之，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错误，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也必然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总体上说，是对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正确认识，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当然，如同我国的改革还处在探索过程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也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十三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异常丰富生动的伟大实践，为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必将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指导中国人民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道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写于 1987 年秋，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增补和个别文字修改）

## 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_\_

历史就是这样，“似曾相识”。同 10 多年前一样，如何评价毛泽东，特别是他的晚年，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谈谈个人愚见。

## 一、正确认识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

晚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悲剧人物。他的思想既闪烁过绚丽的光斑，又出现了巨大的黑子。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研究，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积极的思想观点，也逐步建构了具有严重错误的理论体系，研究晚年毛泽东的困难在于，他的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织并存，甚至往往是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这就需要以审慎的科学态度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和剥离，如同艺术家在璞中琢玉那样，既要弃石存玉，又要变废为宝，即辩证地扬弃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在否定错误理论的同时，保留和发扬其正确的思想观点。对晚年毛泽东采取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或以一时的情绪而作的取舍都是不可取的。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完全肯定晚年毛泽东也是十分有害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包括他的晚年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评价。近 10 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站得住的，并且经受了自 1989 年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的严峻考验，因而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尽管《历史决议》对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没能展开地加以分析，但贯穿其中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仍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的根本准绳。

## 二、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对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既可以归纳三条五条，也可以归纳七条八条。在我看来，从宏观的同一个层面说，至少可以讲这么四条：

第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列宁也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类概念，但没有像毛泽东作这样明确的概括。这个思想尽管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那样丰富的内涵，但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固然还不很完善，在宣传中一度出现过“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片面性，有些也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这不是哪一个人提出的思想，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已被载入党的正式文献，我们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来否定它，而应当珍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

第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开拓。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的思想，都不能割断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所作的概括，但是这个思想却首先属于毛泽东。他从1956年开始就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道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强烈愿望，以及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辛开拓。比如：

——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发展战略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曾强调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初步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毛泽东犯了发动“大跃进”和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这些好的思想为新时期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些思想，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坚持，“文革”之中甚至背道而驰，但在新时期我们党却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并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表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意向。在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很想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主张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强调要使企业有“自治权”、“自主权”，

照顾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仅如此，他一度还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大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在那时虽然没有得以贯彻，有的甚至是昙花一现，但却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并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随后提出的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为了建设民主政治，一方面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另一方面也考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如党的主席不兼任国家主席，党内设名誉主席等，实际上开始涉及如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了。当然，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除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外，还提出了对外文化开放的问题，反复强调不要怕外国的好东西，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还主张对外开放采取多渠道，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学，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让他们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驰骋在中国这张白纸上。遗憾的是随后不断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中中断了这些思想，并发生了逆转。

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思想虽然还可以论列一些，但仅从上述思想而言也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没能付诸实施，有的没有坚持，但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前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某些准备。

第三，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了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后碰到的新问题。在马、恩的本本上没有。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在晚年也没有摆脱这个厄运，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真理性认识，而且其犯错误是由于跨过了真理所允许的限度，印证了人们常说的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陷入错误这个认识论的真理。晚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正确的、积极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之中，但有的也依附在毛泽东建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体系之中，需要经过艰苦的认识剥离才能分清。《历史决议》开始了这个剥离工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的思想，虽然主要是汲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发的正确思想理论，但也是对毛泽东的整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剥离之后作出的科学论断。10年来的实践证明，《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现在看来，这个剥离工作还没有完结，需要进行，这里所谓的“剥离”，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的，其实就是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剥离”不过是形象的比喻。



它丝毫不要求通过“剥离”把错的说成对的，而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一下，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错的东西究竟错不错？在错误中会不会包含有正确的因素，或者经过改造或转化后可能导致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如果有，就要“剥离”。从认识史的角度说，人的认识不会不受到历史的局限、知识的局限和认识本身的局限。提出“剥离”，要求认识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尽可能多一些全面性和科学性，没有什么坏处。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就是晚年毛泽东的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

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中期讲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美国的杜勒斯在 1957 年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后，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教育全党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但是这时，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自 1957 年 10 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作用的认识已开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把彭德怀同志与“帝修反的大合唱”联系起来分析批判，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党内的阶级斗争，云云。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就历史背景看，不能说与这些没有一点关系。这以后，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就交织在一起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固然主要是基于对国内特别是党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但他那个时期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做了某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随着与西方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毛泽东的这个被包裹在错误理论之中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分渐渐地被我们不少人淡忘了、弃置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方面似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内容不提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主要的，把它与和平共处绝对地对立起来不讲了。这既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性的一次活生生的表现。现在重新回顾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应当承认，它不完全是根据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所作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思考而提出的。因为早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逆流，毛泽东已开始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晚年毛泽东那里这两者固然交织在一起了，但还是可以分析和“剥离”的。从国际方面看，近 10 年来，世界形势的缓和确实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所引起各种尖锐矛盾暂时掩盖了。1939 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荡或剧变，使我们重新睁开了眼睛，清醒了头脑，认识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其实，和平共处与反“和平演变”，这是两个不同领域、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讲外交政策，后者是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要世界上同时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高举和平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就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就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与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不矛盾的，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我们“和平共处”、同时又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两手政策一样。毛泽东晚年关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以及由

此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展开研究。当然，这不是要去重复过去的反“和平演变”斗争，而是要总结历史教训，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来研究新的方针和政策。

第四，强调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坚决地与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到了晚年，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思想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同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一样，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与错误的内容并存。一方面，毛泽东把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都看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开展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并且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了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使执政党的建设经历了巨大的挫折，这些无疑都是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应当引为教训。另一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了执政党存在脱离群众、变质变色的危险，以极其坚决而毫不含糊的态度反对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以及党内存在的一切腐败现象和阴暗面，防止和平蜕变。他在这些方面的许多正确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鉴于目前党内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危害到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正确思想进行再认识具有十分紧迫的意义。

### 三、晚年毛泽东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主要失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有这样两条：

第一，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这个理论的具体思想内容，这里不赘述，只想谈谈如何再认识这个理论的问题。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后，是否要否定这个理论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这个理论作为一个体系，从总体上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历史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与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政策以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腰缠万贯”的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对于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以及党内的腐败现象，无疑要通过政策、法律、纪律来加以制约、管理和整顿，但是不能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因此，《历史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的。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恰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理论巨系统），也不是要否认或放松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和研究都淡化了，在我们不少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也滋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念，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现在强调充分认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要重新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和实践模式。它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对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心任务的认识不同，因而对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方法，以及其他各项任务的方法的规定也完全不同。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

争仍然是主要矛盾，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按照这个理论，就要倒转历史，重搬“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模式，其结果不仅会完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0 多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将把中国带回到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严重灾难的内乱之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危害一样，“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第二，关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把他描绘成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思想家，是别有用心。这个大是大非的界限必须明确。但是毛泽东晚年又确有某些空想成分，这是历史事实。实践模式就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农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市场调节被窒息，价值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被否定；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在全社会内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一度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毛泽东虽然领导全党努力纠正所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对超越历史阶段的一些经济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某些“空想”主张。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他憧憬的“空想论”模式，从而构成了晚年的悲剧。

晚年毛泽东的这两大错误的影响和危害是深远的。当然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前者危害的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大。但是，上述错误并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前已指出，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失误是相互交织的。不仅如此，有时还是交替的，在不同时期各占不同地位。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占有更大成分。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尖误和他的实践失误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那种不加分析地从时间的历史纵向和空间的领域横向两个方面，把晚年毛泽东与错误划等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何况从总体上讲，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其贡献远远大于错误。因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反复地认真研究，从中汲取教益。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

### 第三编

####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的比重较大。它不仅收录了已经发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哲学著作，以及表现其哲学思想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名著，而且在首次发表的一批文献中，大都具有较多的哲学色彩，这时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 一、应当充分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

重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哲学性著作，感慨甚多。但是，首先要倾吐的，还是浮现在脑际里的一个难以消失的思虑，即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给以充分的评价。

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思维的伟大民族。在两干多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卓越哲学家。如果说在欧洲有从赫拉克利特、德蒙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狄德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一大批属于全世界的哲学巨星，那么，在中国，也有从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王充、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直到毛泽东这样灿烂的世界级哲学家系列。这两大哲学系统，犹如双峰突兀，构成世界哲学史上的奇观。

如同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当然，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在政治上有严重失误，在哲学上有一些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是，与他缔造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焕发英姿，重新跻入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因而其功业是主要的一样，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他的科学思想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他在理论上、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就哲学而言，他的失误与他的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世界哲学的体系是多元的。在不同信仰的国度里的价值观念也是不同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坚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来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的。

##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大贡献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的评价，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精邃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见仁见智，不同的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对它的概括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从宏观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大体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作了重大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哲学的总结所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开卷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建党之初就已经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认识中国社会，寻求改造中国的办法。自此以后，他在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征途上，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也如饥似渴地寻觅马列著作包括哲学著作来阅读。特别是在到达延安以后，他“发愤读书”，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对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也进行了潜心研究。

毛泽东同志研究哲学，与旧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不同，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主要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而研究。他在批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4版时，曾感叹：“中国的个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犹如研究其他学问一样，他研究哲学，善于独立思考，联系实际，敢于怀疑，大胆创新，因而在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和阐述时，能提出新的观点，创立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代表，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代表。这个发展，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思想方面，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方面，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方面，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创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同其他任何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同志也要借鉴和汲取以前的研究者的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包括30年代的苏联哲学在内。但是，“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只要全面地比较毛泽东哲学思想和30年代的苏联哲学，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哲学思想，就不难发现，它们是毛泽东同志攀登哲学高峰经过的阶梯。就拿非议较多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来说，无论从其整体性、系统性、还是深刻性来看，“两论”都有其独到之处，在许多方面高于前人。

因此，任何贬损和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意义的说法，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郑重态度。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绚丽瑰宝，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璀璨明珠。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在实践活

动中真正溶于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强调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列宁也称唯物辩证法为伟大的认识工具。但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的局限性，没能创立把哲学应用于实际工作的方法论体系。中国革命斗争异常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强调了有无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革命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方法论系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从理论上说，它丰富、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实践上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地应用，提出正确的路线，制定正确的政策，规定正确的方法，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党的许多工作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 60 年代前期号召学哲学时，他曾说过：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还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的呀？那就没有用了嘛。他还强调，要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应当说，毛泽东同志把哲学应用于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融合，这样的哲学是“活”哲学的典范。有的同志轻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看不起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说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视方法论，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系统，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也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要。这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其他哲学无法相比的重要优势。这个优势不仅没有降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身价，反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还需要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对哲学的研究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新的科学方法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不是相悖的，可以用来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某些方法，使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使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逐渐为人民大众所掌握。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哲学又一个特殊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十分强调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毛泽东同志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结合。首先，他把哲学通俗化、中国化了。他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来说明抽象的哲学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而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他的许多哲学思想能够广为流传和被群众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他特别注重宣传哲学和普及哲学的工作。还在延安研读哲学时，他就认为，哲学只有和实际相结合，为群众所掌握，才有生命力。建国后不久，他就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应当加强这项工作，“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解放哲学的思想。他说：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还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随后，他在我们党的一些会议上，在一些谈话中，都穿插着讲些哲学问题，并为破除哲学的神秘性作了大量宣传。在1963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还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太难和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把它看得太黑暗，就不容易进门，还是要破除迷信。同时他指出。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如提出入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番道理，提出：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锐利武器。在毛泽东同志的长期号召和带头讲用下，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当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活动在一段时期内走了弯路，发生了偏差。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以后，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引发的哲学解放运动，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发生了巨大的威力。

近些年来，哲学界对于编写哲学普及读物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读物还在社会上发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应当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却没有花大力气来倡导。哲学有重新回到只属于哲学家们的课堂和书本的趋向。因此，在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性著作，重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的时候，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 三、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没能正确地阐述和运用好物质与精神、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等矛盾关系，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矛盾等的正确途径。这是他晚年在政治上严重失误的哲学根源。

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离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来看待。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文革”10年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绝对化，无限地加以拔高，这种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已为历史的实践所否定，不应当再重新捡拾。但是，如果不充分地估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予应有的宣传和研究，那也不能说是对于我们民族珍宝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这是就哲学对于实际工作的意义而言的。就哲学工作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不关心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来讲，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了，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为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而鼓与呼！

（原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论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其他单位合作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专集系列中的又一部著作。它收入了毛泽东从 3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写的批注和摘录，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谈谈我学习和研究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

## 一、毛泽东的读书批注和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毛泽东从早年求学时代起，就对哲学存在浓厚兴趣。他批读过大量中外哲学书籍。由于战乱，他读过的许多书籍已经散失。现在编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读书批注有 10 件（即读 10 本书的批注），其中 8 件是延安时期的，另外有 2 件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批注各书的时间，有的有明确记载，有的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作出推测，还有个别的，连推测出大致的时间跨度都有一定困难，有待于继续考证。

毛泽东研读 10 本书的批注，可分两类。第一类，比较重要的，是延安时期读 5 本书的批注。从批注篇幅看，这 5 本书上的批注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全书批注文字的 95% 以上；从批注内容看，它集中了读书批注中的主要哲学观点，是这本书的主体和精华所在。第二类，余下的 5 件，是延安时期读 3 本书的批注和建国以后的 2 件。在这几件中，毛泽东批注的文字较少，只有个别件上有重要观点，且已发表过。这里先介绍属于第一类的 5 件读书批注的情况。

（一）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于 1931 年在苏联出版。两位主要作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西洛可夫可能是该所所长。另外，这本书的全部 6 位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

1932 年 3 月，日本学者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同年 9 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以上海笔耕堂名义出版。到 1935 年 6 月印行了第 3 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学术界颇受重视，对传播马列主义哲学理论起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是在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部书的。1936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李鹤鸣即李达。信中提到的译著，可能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这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亦简称《教程》）。若如此，说明毛泽东读到《教程》（指中译本第 3 版）的最早时间当在 1936 年 8 月 14 日以前。但是。从毛泽东的批注看，他详细、认真地批读《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并写下大量批注文字，则在这以后。毛泽东对这本朽的部分章节可能批注了四遍”。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末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 11”；第二行是“1937. 4.”。这可能是毛泽东在第四次批读这本书之后注明的批读时间，即第一次批注可能是 1936 年 11 月，第四次则是在 1937 年 4 月 4 日批读完毕。这本书近 600 页，27 万字。第一次铅笔批划，每页都有，说明是逐页批读的。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7 页。

根据批注笔迹分析，比较大的可能是每批注一遍有的是一种书写工具，因为重叠批划的情况较多。而已较有规律，似不像同时用几种不同的书写工具进行批注，当然也不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

最后一次用毛笔字的批注文字较多，说明他经过多次研读已产生了很多想法。全书批注文字 12000 字，绝大部分是最后一次批读之后写的。

毛泽东读《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批注文字，从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这四个层次：

1. 评论性批注文字，即对原著内容的评论，如“对”，“此例很好”，“不甚清楚”等等。这样的评论文字近 200 字。
2. 提要性批注文字，即对原书内容的提要、概述，说明毛泽东在琢磨、凝聚一些思想。宝类批注，占全书批注文字的四分之一，达 3000 多字。
3. 结合中国实际的批注文字，即联系中国实际写的批注。其字数虽不足 2000，但涉及面较广，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阐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等。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4. 理论发挥性批注文字。毛泽东对《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许多观点加以引伸、发挥，写下的批注文字达 7000 多字，超过全书批注的一半。这部分批注最能说明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怎样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又高于和深于教科书；既显示了毛泽东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也表现了他的哲学理论水平。

从文字内容看，毛泽东对《教程》（中译本第 3 版）的批注多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上，尤其集中在论述辩证法三大法则这一章里。这部分的批注文字达 9000 多字。《教程》（中译本第 3 版）讲辩证法三大法则是从质量互变法则开始讲起的，毛泽东的批注却以对立统一法则的居多。据统计，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的批注有 1600 多字，并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批注有 1500 多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则有 6000 多字。从这里也可看出，毛泽东是特别重视对立统一规律的。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讲辩证法时，首先讲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论，决不是偶然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

（二）读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下简称“米丁本”）的批注。这本书为沈志远翻译。他在“序言”中说：“这部著作在目前苏联是一部流行最广的大学的哲学课本”。中译本于 1936 年 12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译“米丁本”有 34 万多字。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读，不同于《教程》（中译本第 3 版）。他不是每页批划。在全书 491 页中，留下批划符号的有 186 页，将近全书的 2/5。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集中在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内。在其他各章节，既无批注文字，且连批划符号也很少。

毛泽东读“米丁本”写有 2600 多字的批注。从内容看，批注最多的仍然是对立统一规律部分，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批注的重点仍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没有留下明确时间，但从批注内容看，有些话与《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只是批注的有些观点在“两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据此推论，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同对《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一样，是后来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批读此书的时间，当在

1937年7月以前。

（三）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的批注。《社会学大纲》初版于1937年3月。李达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讲授经济学、社会学。这本书原是他讲授社会学的讲义，1935年曾铅印成十六开大字本，1936年定稿后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在《社会学大纲》出版之前，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致函易礼容问及李达夫妇，对他们“甚表同情”，并望易礼容“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这个信息可能没有转达到。据易礼容回忆，他没收到该信。但是李达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在《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书寄给延安的毛泽东，请其指正。

毛泽东对李达寄赠的《社会学大纲》十分称赞。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据李达的亲属和助手们回忆，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10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毛泽东批读《社会学大纲》的时间，在他写的《读书日记》上有记载。从《读书日记》看，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整整用了两个月时间。即便除去其间“没有看书”的24天，实际批读这本书也花了一个多月。每天少则读1页，多则达47页。全书854页，44万字，毛泽东平均每天读25页多，近13000字。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划也是密密麻麻，各种符号均有。从批划笔迹分析，有相当多的部分，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第一遍划的是细铅，第二遍划的是粗铅。因为粗铅的批划有一部分是压在细铅上面的，批注文字也有用粗铅去描不清楚的细铅的。

《社会学大纲》共有五篇。毛泽东批划的重点在第一篇“唯物辩证法”内。不仅批注文字集中在这篇里，连粗铅、细铅重复批划的许多符号也都集中在这里。这篇有385页，接近全书的一半。在其他四篇里没有批注文字。在最后两篇里连批划符号也没有。全书有批划的达640多页，33万多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在批划较多的第一篇里，毛泽东的批注文字集中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前三小节里。全书批注文字约为3400字，其中近3000字写在这三小节里。这三小节是讲哲学的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的，这些内容是以前读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没有专门讲的，毛泽东甚感兴趣，作了详细批注。

（四）读《哲学选辑》的批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是1939年5月出版的。这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在1938年9月底六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提议组织的新哲学会在延安成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里虽然没有专讲哲学，但在毛泽东看来，辩证唯物论哲学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学习马列理论，首先要学好哲学。他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1939年1月，他致函何干之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年2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新哲学一事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193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选辑》就是为了满足干部学习的需要编辑出版的，也是新哲学会（艾思奇是负责人之一）配合学习运动所进行的工作。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也是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起的表率作用。

《哲学选辑》荟萃了延安出版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它是从四本教科书中选材汇集的。它的绪论“哲学的党性”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它的第一章“唯物论和唯心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选自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它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选自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它的第四章“认识的过程”，选自米丁等编《新哲学大纲》。编末还有两个附录，其一为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全书的序论；其二为艾思奇本人写的“研究提纲”，以供读者更系统地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生部基本理论，作为研究的参考。

《哲学选辑》有57万多字，从批划情况看，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三遍。第一遍是用黑铅批划的，第二遍是用毛笔批注的。全书500多页，几乎是逐页都有黑铅批划符号，批注文字也主要是用黑铅写的，毛笔的批注文字不多。批注多集中在“绪论”第二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和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第二节“机械唯物论”以及第三节“主观唯心论、马赫主义和直观主义”中。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划的，毛泽东对《哲学选辑》中收录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划不多，只用黑铅批划了为数不太密集的直杠、浪线等符号，没有写下任何批注文字。

在《哲学选辑》中，毛泽东对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批注文字较多，对艾讲的哲学观点发表了较多意见。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文字约为3200字，其中写在“研究提纲”中的就占了三分之二。

（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教程》的中译本第4版同第3版内容一样，准确地说，是第4次印刷。延安时期，在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教程》是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批划得最多的一本。他至少是第三次批读这部书了，而第一次批读又不止一遍。就遍数而言，这可能是第六遍了。在《教程》的中译本第4版上也留有两、三种批划的笔迹，说明到了40年代初，延安的书籍还甚缺乏，有的书在一些同志之间仍然是辗转批读。

毛泽东这次似为重点批读，前几次批注较多的部分，这次批注较少。全书的批注约为1200字，大部分写在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约870字，占全书的2/3以上）。

毛泽东批注《教程》（中译本第4版），没有留下明确的时间。根据批注内容推断，应当是在1941年3月以后。因为毛泽东在这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里写有“三月参政会”几个字，而三月参政会是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既有这样的批注，读这本书就只能在这年3月初之后。

至于在3月初以后多久，能否作进一步断定呢？也可以作点分析。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对“中国主观主义”的批注文字特别多，在全部批注中达20多处，可以说是贯串全书批注的一根红线。这里所谓的“中国主观主义”是专有所指，即王明机会主义的代名词。王明的错误

路线，就认识论根源来讲是主观主义。此外，毛泽东的批注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部集中在上面讲的第六章内。这又为考证他批读这本书的时间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内陆续展开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评。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阐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各地高级干部学习。9月29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关于中央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规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11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发给各地高级学习组的“理论研究材料目录”中，也将该书第六章列入了。这两个通知将李译《教程》第六章列为重点学习材料和毛泽东对该书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以第六章为重点相吻合。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批注《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时间，有较大可能是在这一年的9月前后，而又以左9月之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按一般情况，只有他本人先批读过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将这一章列为重点。因此，毛泽东读《教程》（中译本第1版）的批注时间，很可能是1941年3月至9月之间。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材料看，毛泽东读这本书《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很可能是他延安时期读书批注中较晚的一次。1936年8月以前，毛泽东就读了《教程》（中译本第3版），到1941年3月至9月，又读《教程》（中译本第4版），前后经历了5年时间。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这5年内，毛泽东批读了9本书，达200多万字，其中重要的至少批读了两遍。这说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实践了“发愤读书”的诺言，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哲学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长期刻苦读书、进行细密精深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下面再介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另外五件读书批注的情况。

（一）读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的批注。《思想方法论》于1937年1月出版。毛泽东只在这本书的一页上写有的40字的批注文字。批读这本书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目前没有注明读该书的批注时间。

（二）读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批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李达等翻译后于1930年6月初版，11月再版的。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没有留下具体时间，考证起来也有一定困难，所以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没有注明时间。当然，根据批注内容也可作些推测。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语不到10处，其中一条最长的批注写道：“中日战争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形式即国民党民族联盟问题，八路军战略问题，党的发展中新旧党员各种倾向、干部政策等问题。”从这条批注看，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间在抗战爆发之后是无疑的。有些批注内容也能查到准确的时间，但要确定毛泽东的批读具体在哪一年，就费斟酌。据查党史资料，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涉及到发展党员



的倾向问题，但措词与毛泽东的批语又不完全一致，不能作为充分根据。关于干部政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期讨论较多，陈云作过关于干部政策的讲话，洛甫和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这个问题，但是不能说在这之前就讲过干部政策，因此根据干部政策一语，也很难断定一个具体时间。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批读此书的时间有可能在 1938 年 3 月以后，但目前的根据尚不充足，这里将这个很不成熟的推测提出来，供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三）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1938 年 9 月 12 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博古是根据《真理报》所载原文翻译的，当时没有署名斯大林著，但不久出版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即将该文收入。博古译本于 1938 年 12 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博古赠送了一本给毛泽东，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泽东同志惠存，博古”。毛泽东即是在这本书上写的批注，时间当在这之后不久。因为 1939 年 5 月出版的《哲学选辑》收入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博古的这个译本，除个别译名有所改动（如昂格斯改译为恩格斯）外，其他无变化。毛泽东对《哲学选辑》中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划不多，没有写下任何批注文字。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博古送他书后即已看过。在博古送他的书上批划密集，全书 52 页（22000 多字），毛泽东几乎在每页上都划有直杠、浪线等符号，也有不少问号，并写有 200 多字的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文字。既然已批读过一遍，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第二遍再读时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批注当然会少些，以至没有。由此反过来推论，毛泽东阅读和批注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时间，当在 1938 年 12 月以后不久。

（四）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的批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 1964 年 10 月出版。毛泽东读这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的分析写了近百字的批注。该书认为，一方面，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另一方面，华严宗又唯心主义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缘）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批道：“何其正确”。毛泽东还写了一段较长的批语，论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批评书中的某些分析离开了客观辩证法，与书中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相矛盾，毛泽东写的这些批注没有留下时间。

（五）读李达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的批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原本就是《社会学大纲》。1961 年夏天毛泽东与李达相会在庐山，他提议李达找几个助手将其 30 年前的《社会学大纲》修改后重新出版。经过 5 年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了内部讨论稿，毛泽东即在这个稿本上写了近 300 字的批注，具体时间也不详。毛泽东写的较长的一条批注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另一条批语是针对书中根据斯大林的观点讲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李达认为，两种发展观对立的第一点是“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毛泽东对此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他在延安时期对博古译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情况，看来他对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是有一定保留的。

除以上 10 件读书批注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入的一篇读书摘录（即 1937 年 9 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所写的 3000 字摘录），是目前

所见到的唯一的一篇毛泽东读哲学书的摘录。这个摘录，如毛泽东在 1937 年致艾思奇的信中所说，还对原书中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此，他专门写了 200 多字的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与他的某些摘录性的批注很相近。因此，这个摘录又不单纯是“抄录”，实际上是摘录形式的批注。在这个摘录后，还附有 1937 年毛泽东就此给艾思奇的上述致函。这两件，连同上述毛泽东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尽管以前已经分别在一些出版物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和书信集中发表过，但为了便于对毛泽东的哲学批注展开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将其重新发表还是有益的。

最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入的《读书日记》，是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毛泽东读书情况的记载。这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毛泽东的读书日记，尽管只记了 2 个月，但它却记载了毛泽东读李达《社会学大纲》、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和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三本书的读书时间和读书进度。读《社会学大纲》的批注时间，就是根据这个《读书日记》确定的，因此，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将其作为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附录发表。

这样，《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共有 13 件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毛泽东读 10 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 23000 字，再加上 3000 字的摘录和近 1000 字的日记，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属于毛泽东的文字总共约为 27000 字。

## 二、《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对“两论”与苏联哲学著作的关系发表了不少看法，有的同志还做了这样那样的比较，这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流行的某些“看法”，澄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开阔思维、把“两论”的研究引向深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指出，有的形式主义的比较，使认识偏离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批注”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科学比较，通过批注与教科书原文的对照，对“两论”与苏联哲学的关系获得较为客观的全面的了解。

从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看，根据目前的材料，只有头两本苏联教科书，即李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教程》和沈译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两论”有直接的联系。据说“两论”也吸收了米丁编著的《新哲学大纲》的思想营养，但目前却没有找到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因此。这里只能比较“两论”与上述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认识。

首先，应当承认，“两论”吸收和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理论作了发挥、论证和说明，对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涉及到人们所说的苏联哲学模式问题。对此，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能采取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它毕竟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功绩不应当抹煞，不能围为它有缺陷和后来的教科书超过了它就否认它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的作用加以绝对比，这个体系本身毕竟很不完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因此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更不是最佳模式。随着教条主义的流行，这种模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曾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少东西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因而起过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和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两面性，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不能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实际上采取辩证的态度。首先是吸收和利用，其次是扬弃和发展。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都要利用在此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一样，毛泽东在“两论”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也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他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批读，干什么？就是要从中汲取思想营养。通过他写的批注文字可以看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下简称《教程》和“米丁本”）中的不少观点和分析，使毛泽东很受启发，并吸收了其中有见地的一些思想，成为自己著作中有机的一部分。就“两论”分别来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吸收了《教程》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的观点，关于认识过程的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阶段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等。《实践论》还吸取了“米丁本”关于实践活动的多种形式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不能了解认

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分析，等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吸收了《教程》关于主要矛盾制约其他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观点，关于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观点，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关于各个过程和过程的各个方面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和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分析，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吸收了“米丁本”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分析和对外因论的批判，关于对各种运动形式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对具体矛盾做具体分析的模式举例等等。以上这些，是毛泽东的“两论”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表现的某种承继性，或用哲学语言说，是一种“同一性”、相互联系性。

但是，对“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比较，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其认识就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除表现“同一”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的批注，更能清楚地看到，“两论”虽然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并非照搬照抄，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两论”的主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概括，批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的概括和分析时，“两论”虽然借助了苏联哲学教科书，某些观点受胎于苏联教科书，但是，它在总体上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特点，没有学院气，没有书斋味，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同时，由于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因而“两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重大发展，并表现了自己的许多重要特色。总之，“两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堪称独立的科学著作。具体说来，“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有这样四方面的区别或特点。

第一，“两论”的框架体系比苏联哲学教科书严密、顺当，内在逻辑性强。就《实践论》来说，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出发，既概述认识过程的唯物论，又论证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比较系统他说明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脉络清楚，递进的层次分明。而《教程》对认识论的阐述则分为四节，不仅相互之间不甚连贯，就是专讲实践论的前两节，其内在逻辑也远不如《实践论》一目了然，过多的枝蔓掩盖了它的主线索。“米丁本”第五节讲实践论，是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讲起的，不如《实践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讲起顺乎逻辑。“米丁本”的这一节，较多他讲了实践与认识的唯物论关系，而对其辩证法关系（包括认识的两个阶段等）未展开分析；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更未涉及。再从有的同志提到的对《实践论》有较大影响的米丁等编的《新哲学大纲》来看，该书第八章“认识的过程”是讲认识论的，分了八节，但没有一节专讲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八节主要是从物质

---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这四节是：一、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之统一；二、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三、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四、真理论。

这八节是：（1）经验的认识，感觉；（2）表象；（3）概念；（4）判断；（5）推理；（6）分析和综合；（7）归纳和演绎；（8）形式论理学的批判。

与意识的关系方面来讲认识论问题。这样，苏联几本哲学教科书的认识论体系都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实践论这个基本思想，因而有重大缺陷。《实践论》克服了上述各书的缺点，抓住认识论的核心和基础，构造体系，独树一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矛盾论》在结论上也优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米丁本”只在“对立体一致底法则”一节中分析了这个问题，没有分小节，而且讲得比较杂乱，眉目不甚清楚。《教程》与“米丁本”不同，用了七节篇幅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但这七节的内在逻辑也不很清楚。与这两本书的论述相比较，《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分节论述，既吸收了《教程》中分节的优点，其结构又比《教程》严谨、顺畅得多。毛泽东根据列宁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依次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诸方面进行论述，表现了鲜明的层次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从而，同《实践论》一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教程》和“米丁本”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我国第一本通俗哲学著作，被毛泽东被誉为“真正通俗的而又是有价值的”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这两本书在当时都发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些通俗哲学著作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讲哲学不够。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谈到这种状况时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语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之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比，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个评论是符合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

它的主要内容是：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在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的特殊运动的发展形式中存在着各种矛盾；科学研究既要抓住一切事物和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的一般之点，还要把握某一事物及其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发展的特殊点；对立的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对立的一致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冲突是矛盾的个别的特殊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提出的对立的一致的法则的唯物的改造；《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辩证分析；列宁把对立的一致法则视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意义。

这七节是，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统一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对立的互相渗透；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均衡论。

《矛盾论》在1952年4月发表时，删去了原稿第一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同辩证法的矛盾律”，把“结束语”扩充为“结论”，作为单独一节。

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页。

转引自《中国哲学》1980年第1期第364页。

原载1938年4月1日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现载《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87页。

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具体状况的。

毛泽东的“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因而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作出的榜样，已为中外哲学界所公认。也正如艾思奇所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一方面运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是“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这一点，通过毛泽东写的有关批注能够看得更加明显。

从有关的批注来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与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结合起来，赋予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以科学的含义，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实践论》以“知与行的关系”来说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说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等等，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范例。在这之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开垦中国哲学史这片处女地的学者还不多。毛泽东的“两论”不是专论中国哲学史的，但它把两者加以结合的思想与方法，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专家学者以启迪和示范。

(2) 用中国古诗、典故、成语、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使抽象的哲学观点通俗化，而且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在对《教程》的批注中，这个特色更明显。例如，毛泽东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与量的关系。他批注道：“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说明量变引起质变，他还批道：“人多成王”，“王子筷子集散”。“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为了批评“外因论”，他举例说：“‘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了说明辩证否定的观点，他举例道：“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在“两论”中，毛泽东发挥了这个特色，大量列举中国事例，用适合中国人民习惯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提供了经验。

(3)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贯穿在毛泽东对《教程》和“米丁本”两书的批注中，也贯穿在延安时期他的其他哲学批注中。在对《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

矛盾，用革命去解决。”毛泽东还结合中国实际，分析对立转化为同一的情形，写道：“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国共对立部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争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这些批注的用语，还带有某种朴素性，还未经过去粗取精的加工制作。在“两论”中，这种原始的痕迹不存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论述成为有机的结合，浑然一体，用语精当，表达准确，其科学性大大增强了。

第三，“两论”中的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比苏联哲学教科书具有较大的明确性、概括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这一点，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能够看得更为清楚。比如，“米丁本”讲旧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是这样写的：“费尔巴赫（即费尔巴哈——引者注）在认识问题上也发挥了形而上的观点，照他底见解，人底本质是在于他底躯体、他底机体、他底感觉和思维的能力，费尔巴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惟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底产物，他丢开了人和社会底关系去观察人，所以他始终没有理解到实在的、行动的人，而永远抽象地去了解人。因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照费氏底意见，认识是不变的。永远如此的肉然之同样不变的反映。这里要顺便指出，丢开人类底实践活动、丢开他底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不仅是费尔巴赫底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这段活要说明的意思并不复杂，但所用的文字不算少。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面作了概要式的批注：“马克思（即马克思——引者注）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段批语明确简炼，一语破的，后来基本上成为《实践论》的开头语。又如《教程》分析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举例展开阐述的，没有作一般的概括性的说明，写了300多字。毛泽东在这300多字的上端写了概括性的批注：“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这就把《教程》以举例方式所做的“个别”分析，推进到抽象的“一般”分析，完成了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对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阐述，使之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教程》对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相互关系还有一段精辟议论：“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写的批注，先是将这段话作了概括：“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

---

关于感性认识的特征，《教程》是这样写的：“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的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关于理性认识的特征，《教程》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369—以

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接着，对这个思想又作发挥，写道：“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这段批注，比起《教程》来，更明确、更深刻。《实践论》也吸收了 这个思想，并在文字上加工得更加完美，成为说明两考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

毛泽东对辩证法问题的批注——许多被吸收到了《矛盾论》中——，像这样比苏联哲学教科书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的思想也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两论”在吸收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先说《实践论》。

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这个中间环节，将《实践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运动的推移过程时，提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的思想，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运动的全过程的理论；同时还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须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类的认识运动，包括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认识，都“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理论。《实践论》最后阐述的关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有同志说，这个规律是艾思奇最早提出的。应当提出，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确实有这个思想的原形，功不可没。但是，他没有对此作理论的论证，只是举了若干例子来通俗地加以解释。《实践论》吸收了 这个思想，不仅文字表达精当，而且作了理论阐述，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因而其贡献是重大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例如，把“矛盾的普遍性”作为与“矛盾的特殊性”相对立的概念明确提出来。在《教程》和“米丁本”中，都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根据列宁的思想，虽也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客观事物的过程自始至终地存在着矛盾运动，但是没有抽象出“矛

---

这里说一下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米丁本”认为：“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的内部自身的动力，“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实质”。毛泽东对此作了旁批：“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寻的。不明内部，即无从了解发展。”《教程》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及依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认外的矛盾的作用”，但“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毛泽东写批注对此作了发挥，强调内因的作用，指出：“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矛盾论》提炼这些思想，产生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著名论断，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在此之前一年，艾思奇也有这样的思想。

艾思奇的表述是这样的：“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会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



盾的普遍性”概念，毛泽东在对这两本书的批注中也没有概括出这个概念，只在讲矛盾与对抗时，使用了“矛盾是普遍的存在着”的说法。到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才进一步抽象出了这个科学概念，并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新概括，这就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五种情形，是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论述加以系统化，并结合中国革命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情况展开地加以阐述和概括之后，形成的新思想。《矛盾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诸种情况的精辟分析，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中最富有特色的创造之一。

再如，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教程》在这个范畴内只是举例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并且没有展开。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写了在他对该书的整个批注中最长的一段批语（达 1200 字），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展开地作了阐发，提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那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这些批注把矛盾的互相转化思想贯彻到底了。《矛盾论》对这些批注思想作了科学的阐发，从而把《教程》的观点向前推进了。这个转化的思想，既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同时又具有不可限量的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都自觉地应用了这个思想。

此外，《矛盾论》中提出的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关于同一性的两重含义以及具体的同一性与幻想的同一性的区别的思想，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也都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有的还是第一次提出的极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在他此前的读书批注中还没有形成，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两论”从基本方面说，是个理论创造工程。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承认或忽视“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它的意义加以任意“拔高”，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如果采取虚无主义，否认或贬低“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两论”不应当仅仅看成是毛泽东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对于现代世界哲学所做的贡献。

### 三、读书批注中的其他重要哲学思想

这主要是指毛泽东读其他哲学著作时写的批注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也主要是上面提到的读另外三本书的批注中的观点。摘其要者有这样七点：

（一）关于哲学派别的划分。按照传统划法，首先是分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对近现代哲学家，在唯物论阵营内又分形而上学唯物论（包括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唯心论则分为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苏联教科书也是这么划分的，并没有提出新的标准。只是在表述时没有严格地将每个哲学家分别归类。《教程》在批评德波林时，认为德波林派的唯心论表现出形式主义即形而上学，向着理性的唯心论、黑格尔主义的方向倒退。毛泽东在1941年3月以后再次批读这本书时，在这段议论的上端写了一条批注，指出：“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德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科之中，只是最后一种是正确的。”这条批语，就其把德波林派列为“唯心形式”即形而上学唯心论来看，是对书中蕴含之意的概括，但是就其提出四个哲学派别而言，则是比较独特的新见解。在一般教科书上，没有这样划分的。至于在人们的思想中，当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考虑的。据说，50年代时苏联哲学家也有过这样看法，认为与唯物论阵营相对应，唯心论也可分为辩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两种，即与毛泽东是一个思路，但是这种分类一直没有得到公认。我个人认为，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看，将唯心论分为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比其他划分能更准确地揭示唯心论表现形态的基本特征。从哲学史看，这样的划分能说明绝大多数唯心论哲学家的基本立场，而“唯心辩证”和“唯心形式”的标准则缺乏这种普遍适用性。因为属“唯心辩证”的哲学家很少，而“唯心形式”的标准不易把握，大部分唯心论哲学家无一下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当然，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分类标准，对于研究哲学家们的某些特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这是列宁的一大贡献。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都引述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思想，对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进行了分析，作了一些正确的阐述。但是，这些分析又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往往只分析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觉到思维这两个阶段。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也沿袭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认为“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一般地说，这表达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但是这种说法不完全，因为人的认识到思维理性阶段后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从思维到物质的过程，还需要回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再认识。因此，毛泽东对李达的这段话作了批注，写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李达还有一段话说：“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此又写了一段批语，指出：“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两条批语，既是对李达书中观点的重要补充，也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的重要补充。

这两条批语，也不能说是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时才产生的新观点。因为在这之前写的《实践论》，已经阐明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他根据列宁

的上述思想，实际上已经把认识的全过程分解为了三个阶段，并且特别强调第三阶段“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的作用。这两段批注，是《实践论》观点的继续，同时这样对认识过程加以具体分解，也把《实践论》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认识过程推移的辩证法思想。《社会学大纲》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不单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是辩证法，并且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也是辩证法’。‘认识是思维对客观的永远的无限的接近’。……”毛泽东尽管不是第一次读列宁的这段话，但他仍然在引文旁划上了三道杠、两个同心圆圈，在引文上端还划了一个大圆圈和两道短横线，并且还写了一段批语：“将来认识的将是一个别有天地世界”。这段批语，不是就微观的某个具体认识过程而言，而是讲的客观认识过程。它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坚持认识运动的辩证法，那末人类的认识就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进入“一个别有天地世界”。

（三）关于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在1941年3月以后，毛泽东研读《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对这个问题批注较多。国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割裂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毛泽东针对这一错误倾向指出，“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等等，在批注中，毛泽东对普遍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还作了发挥。《教程》对普遍与个别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话：“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对于普遍与个别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给与唯一正确的解说。概念是外界在人类思维上的直接反映的构成的形式，……个别的概念与一般的概念，都反映这个世界。……个别与普遍、特殊与普遍，……不是当作具有自己的存在的独立的对象而在外面互相对立的东西，……离开个别没有普遍，离开普遍没有个别”。应当说，这些是讲得不错的。毛泽东也划了些符号，但是他对这样的论述还不满足。因为这主要是从其客观实在性的唯物论角度写的，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先提出问题：“谁是决定的东西？”接着写道：“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还以战争为例指出：“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所谓“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是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程中，只有通过无数“个别”的抽象才能产生“普遍”，没有“个别”就不可能抽象出“普遍”，这是讲的认识的唯物论。所谓“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是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的，即用“普遍”的理论原则去指导实践，去认识作为“个别”的具体事物，这是讲的认识的辩证法。这里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决定”，就说明个别和普遍各自的作用来说是明确的，是试图在唯物论基础上揭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些批注的文字表述是有缺点的，一是有把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割裂的味道；二是把实践过程的“决定”同认识过程的“决定”加以等量齐观，似不妥。因为实践过程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说普遍对个别起决定作用。

批注中的这个缺点，后来在《矛盾论》公开出版时加以修正了。《矛盾论》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里增加了原来在“讲授提纲”中没有的一段话，这就是关于人类认识的“两个循环”问题。《矛盾论》指出：人类的认识是

通过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每一次循环都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而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在人类认识中这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从思路看，这里的“两个循环”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1941年的上述批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的表述修正了上述“两个决定”的缺点，对认识运动的概括比较全面和准确。

（四）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关系。列宁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是认识三大规律关系的指导思想。但是正如他所说，这需要解释和发挥。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仍然是按照恩格斯讲三大规律的顺序和观点展开阐述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改变了恩格斯讲的顺序，首先讲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中最基本、最主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法则”，这比起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教程》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三大规律的内在关系并没有按照这个观点作论述，视三者为平行关系的色彩还未抹掉。米丁著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比前两本书又前进了一步，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若干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发现和具体化”，但这个论点没有展开。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把《新哲学大纲》的观点向前推进了，明确提出在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包摄着”其余诸规律和范畴。他写道：“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因为在对立的统一发展过程中，所谓‘飞跃’、‘连续性的中断’、‘向反对物的转变’、‘质量间的转变’、‘旧物死灭与新物发生’，都是必然的形态，都是对立的斗争的发展，都是由对立的转变而显现，都是由对立的统一去说明。”在讲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及辩证法范畴的各节中，李达都贯彻了这个思想，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些观点很重视。他对李达著作的批注虽然文字不多，只在李达讲上述关系的另一处写有“包摄着”三个字，但在李达所论各处，却批划有各种符号，表示赞同。因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跟李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矛盾论》提出这个观点之后，没有对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社会学大纲》所发挥的也许正是毛泽东想发挥而没能发挥的。在读《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三大规律的关系，但却表明了他用矛盾的观点来解释质变现象的意向。他写道：“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建国以后，毛泽东把这方面的思想作了发挥，比李达讲得更为明确，更加彻底。在60年代前期，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5年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后，毛泽东读这本书写的批语就是其中讲得较为透彻的一次。毛泽东的批注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

---

“发现”可能是“表现”的误排，但没有产到俄文原版书，不能最后断定。

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己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这条批语近 300 字，概括了他在近 30 年来所凝聚的思想。与《社会学大纲》相比，他既受了其影响，又对其中的思想作了新的阐发。尽管哲学界对三大规律的关系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对于深入研究三大规律的关系，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至少也是一家之言。

（五）关于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在对列宁观点的把握和理解上，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成列宁的观点，并在《矛盾论》中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和发挥。当时，他比较多地是从运动的相对静止（量变）状态和显著变动（质变）状态的关系上进行分析的，认为矛盾的斗争存在于这两种状态中，并经过质变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因而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些分析，包括同一的条件性和斗争的无条件性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又是充分的，没能完全消除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说两者同时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1939 年 5 月以后读《哲学选辑》时，在对艾思奇的《研究提纲》的批注中，毛泽东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绝对性的含义，也就是说：斗争的绝对性不是讲的某一具体矛盾，某一具体的斗争形态；若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统一性倒可能是绝对的。因此，毛泽东继续指出：“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这几条批注说明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状态下，矛盾的统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就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列宁提出的这个思想。这里的批注是对《矛盾论》的重要补充。

（六）关于中庸思想。这是论述质量互变法则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1939 年 2 月，毛泽东在致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中对它持肯定态度，视之为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他说：“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这里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反对“过与不及”。毛泽东继续写道：“‘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有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下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

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时。对中庸思想的想法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此前对中庸思想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艾思奇很可能是知道的，并且也可能是同意的。正因为这样，他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中写道：“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并列看待。”但是，毛泽东批读到此，对艾的观点却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上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这是从政治上揭露中庸思想维持剥削制度的本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这就既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毛泽东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这里只能从他对中庸思想的评论本身来分析。1939年2月，毛泽东把中庸思想视为反对极端的正确思想时，似偏重于认识论。后来对“研究提纲”的批注，则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两相比较，后者的认识似比前者深入了。在批注里，毛泽东对中庸思想还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死硬派思想”，一是“折衷派思想”。他写道：“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毛泽东的这些分析都是比较深刻的，对中国哲学史、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有一定价值。

（七）关于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在较早的批注中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尽管他写的不少著作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列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但是从延安时期将近5年的读书批注中可以看到，随着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其在主观上要发展理论自我意识也逐渐地由隐变显。1941年重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他写的批注反映了这一点。《教程》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写道：他们“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在此批注道：“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教程》谈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时写道：“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毛泽东又批注道：“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这两条批注不长，但是它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发展理论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经验异常丰富。自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党中央不断强调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注意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革命斗争水平。就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看，他当时在全党起了最重要的带头作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斗争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实际上对马列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遵循着这条道路，毛泽东终于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教训，只要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也一定能创造出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理论。这应当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写于 1987 年夏）

## 毛泽东“哲学笔记”的诞生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记事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写有大量批注文字，其中有些已经散失，有些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和中央档案馆。

能否像出版列宁《哲学笔记》那样，将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批注编辑成书公开出版，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界、理论界较为关注的事情。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从1979年5月到1980年4月，对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一部分批注作了初步编辑。1985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按照正式出版的要求，在初编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有关文献，重新考辨批注文字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着手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的通力合作和中央档案馆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辑文献，除个别件外，系据这两个单位收藏的原件刊印。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同属读书札记，编辑的要求和体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列宁《哲学笔记》的主体部分，是以十本“哲学笔记本”上的文字编辑而成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的则主要是写在书上的批注文字。如果将“批注”宽泛地解释为“笔记”之一种，把《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称为毛泽东的“哲学笔记”也无不可。经过三年的工作，广大读者瞩目的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 一、艰难的考辨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辑入了毛泽东研读 10 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在延安时期，理论书籍甚缺，人们辗转借读，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他批读过的书上就有其他人的批注文字。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对书上的批注文字笔迹进行考辨，将毛泽东的批注与其他人的批注区别开来。既不能把毛泽东的批注漏掉，也不能将不是毛泽东的批注编入。

毛泽东批读过的 5 本书上有多种不同的批注笔迹。有一条批语：“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字体秀气规范，不似毛泽东遒劲豪放的书法风格，在初编时没有收入。但在复查时发现这几个字的运笔走向、间架结构又很像毛泽东写的，于是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许多相同的字逐一比较，并请熟悉毛泽东书法的同志鉴定，最后肯定这句批语为毛泽东所写，将它补收入集了。

考辨，不仅要考订哪些是毛泽东写的，还要辨认所写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批语，主要是用毛笔和黑色铅笔写的，也有用红蓝铅笔和解放前流行过的原子笔写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批语，大都是书写流畅、具有独特风格的行书，不少字带有草体的韵味。行书字体较易辨认，行草字体辨认较难。再加上年代久远，翻阅摩挲，纸张发黄变脆，有的字已褪色模糊，有的字已略见残损，使辨认更加困难。有时需要反复探讨，多方考辨，并研究文意，才能确定。

毛泽东写的读书批注，绝大部分没载明时间。这也属考订之列。由于资料缺乏，不少读书批注的时间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来作推测。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内标有某某年以前，或某某年某某月的模糊时间的原因。例如，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4 版）的批注，没有留下时间。毛泽东写的批语中提及了“三月参政会”，这个会是 1941 年 3 月 1 日至 10 日在重庆召开的。据此，批读时间可以初步定为在该年 3 月以后。但这毕竟是孤证。进一步分析批注内容，发现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观主义”的批评特别多，计有 20 多处。这里的“中国的主观主义”是专有所指，即王明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王明路线的错误，就认识论根源讲，是主观主义。1941 年 9 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王明路线，毛泽东讲话的基调就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次会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规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这与毛泽东的批注以第六章为重点的情况相吻合，这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批注时间，有较大可能是在 1941 年 9 月前后，因此，将毛泽东批注该书的时间定在 1941 年 3 月以后是可靠的。

## 二、读书风貌的展现

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有其独特的风貌。由于延安时期的书籍大多为竖排，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大多竖写在所读书籍书页的上端，也有写在边白中缝或下端的，还有少量批语写在字旁行间或段末句尾。这些批语，有的是对原书内容的复述、提要、概括和发挥，也有的是对原书观点的臧否、提问或补正，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阐发的重要思想观点。毛泽东还爱在所读的书上圈点勾划，批有各种各样的读书符号。有的书页上，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些批划符号，虽然不像批注文字那样明确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但也反映了批注者的某种思想情绪或意向，以及他那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

怎样来表现毛泽东的读书风貌？这是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碰到的一个问题。在编辑过程中，逐步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既要如实地生动地反映毛泽东读书批注的风貌，又要照顾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排版印刷规范。

（二）既要突出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尽量完整地体现毛泽东的批注思想，又要充分反映毛泽东所读书籍对其批注的影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之间的关系。

（三）既要忠实于原件，尽量保持原样，又要讲究科学性、准确性，对讹误衍漏要加以订正，对批划符号要有所取舍。

根据这三条原则，编辑这本书采用了以下办法：

对照排印。将毛泽东写的批注文字与原书有关段落对照排印。凡原书为竖排、原批注为竖写的，一律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化字。没有标点的批注文字加了标点。批注文字除写在字旁行间的排在原处外，写在书页其他地方的一般排在书页的左边；长段批语和照顾对应关系的少数批语居中排印，毛泽东的批语疏密不均，有的批语十分密集。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第三章《均衡论》一节的书页上，毛泽东的批语密集无间，几乎没有空白之处。为了表现对应关系，除将大段批语排在左边外，还不得不以居中方式将一些批语排在相对应文字的下面。一般来说，原书文字长、批语文字短，但也有一些地方批注文字长于原书文字，在编排布局上，右边出现大片空白就是这个缘故。

字体区别。这是与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不同的。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批语、笔记和原书文字，在字体上一般没作区别，均排宋体，有些黑体和其他异体字，是用以表示列宁的不同书写文字或字体，而非区别原书内容与列宁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习惯，将毛泽东的批注、摘录、书信和日记文字，一律排为宋体。凡原书文字均排仿宋体，这样，勿须看内容，仅凭字体就可确定哪是毛泽东写的文字；既方便读者，也有利于研究工作。

对应文字力求完整。凡编辑中确认为毛泽东写的文字，均无一遗漏地都编入集中，与批注文字有关的对应文字是略辑还是详辑？编辑中经历了一番认识的变化。最初采用略辑，以为这样简明扼要，利于突出批注文字。随着编辑的深入，逐渐感到对应文字简略了，一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不利于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的脉络和对应文字对批注文字的影响。后来确立对应文字的选辑以能否完整地表现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的关系为原则，即基本上采

取了详辑的方针，并庄意处理对应文字的删节与联结的关系。这样，对应文字由初步编辑时的 8 万字增加到近 25 万字。

脚注说明。这是关于编辑的技术性说明，或补遗，或释疑，或明义，或校订。字旁行问的批语，除以宋体表示外，多有脚注，以期读者注意。如“批注集”第 250 页，在对应文字行问有一宋体“最”字，字号下大，行距间隔也不开阔，稍不留心就易忽略。这里加了脚注：“毛泽东在‘根本’二字前边补加了一个‘最’字”。这就不仅指出了“最”字的位置，而且含示了毛泽东的观点。原书说“对立统一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毛泽东加一“最”字，意即“最根本的法则”。这就弥补了原书文字的疏漏。

文字订正。毛泽东的批注是边读边想信手写在书上的，并非正式文稿。用词遣句有时未加修饰，且有不少讹误衍漏。怎样对待批注文字中的错误？对此，经慎重地反复考虑，不外三种选择：一是机械地保持原样，不做任何改正；二是不留错误痕迹，完全改成正确写法；三是既保持其原始风貌，又作必要的文字订正，前两者都缺乏编辑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不可取。唯有第三种办法，即目前采取的办法，比较顺乎人意，近乎情理。按照这个办法，对毛泽东写的文字作了上百处订正，分别以不同的编辑符号加以显示。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真实、可信、亲切、生动。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有这些差错，是不是说毛泽东读书很粗心呢？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只要翻翻“批注集”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经常对原书文字进行校勘。从接触到的原件看，这种校勘是较多的，仅仅辑纳在“批注集”中的，毛泽东对原书文字、标点的勘误就近 40 处。

符号选辑。毛泽东在批读的书上划的符号很多，有的书上的批划符号遍及全书，无一页没有。是全辑还是选辑？对此也反复考虑过。若全辑，就要把毛泽东读 10 本书上划的符号都编入。这样收，一是篇幅过大，非目前这样一本书所能容纳；二是批划符号的篇幅远远多于批注文字的篇幅，会冲淡批注文字；三是也无这个必要，因为一般的批划符号毕竟没有明确的思想意义，编辑的再多也不能增加批注的思想内容。因此，作了选辑的处理。选辑符号的原则是：凡毛泽东划的问号全部辑入，因为问号多少表示了批注者的某种意向；凡与批注文字和问号相对应的原书有关段落上的各种符号均辑入。此外，其他地方划的大量符号均不辑入。这样选辑，“批注集”中的批划符号也是不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书上的批划符号，从笔体辨认来看，似是读一遍批划一次。有的书页上的批划符号往往与批读的遍数成正比。

### 三、力求简略、准确的注释

毛泽东的批语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涉及到一些人物、事件、术语、典故，还有一些引文等。对于这些的注释，考虑到这是本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主要的读者对象会具备相当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因此决定注释以简略为原则：

1. 一般读者熟悉或易于查询的人物、事件、名词、术语等不注，但像“张友仁”、“普列斯特媾和”、“理神论”（即自然神论）等这类为专业读者也不太熟悉的人物、事件、术语等，尽量作注。

2. 鉴于毛泽东读的哲学书籍是30年代的译本，许多译名、译文与现行译文有较大出入，在注释中，尽量将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哲学家的旧译文注出新译文；将人名、书名、地名，以及某些名词术语的旧译法，往出新的标准译法。少量未查清的，暂不作注。

3. 对毛泽东批注中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上的词语，尽量查明出处，引全上下文意。虽不解释，读者亦能理解。如毛泽东批语中引用的“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二句，注明这首明代民歌的全文，读者就会明白毛泽东是借此来生动地说明辩证的否定观。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引文注释，不仅仅是查明出处，还需要对引文进行研究，以便注释文字写得贴切、准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文字和毛泽东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为了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对这段引文的注释，不仅注出了出处，而且介绍了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一个易受无赖福斯诺夫玩弄的女人，而快嘴桂嫂的典故，意在形象地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不易把握的高度抽象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在此处写的批语：“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也就容易理解向知情人调查，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注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询问熟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同志，还询问曾在延安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活动的同志；不仅讨教于一些专家学者，也向有关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系的人了解。毛泽东在批注中曾写道：“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也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说”。孙鸣九，即孙铭久，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过去未听说他有著述或演讲涉世，很难查其出处，必须问他本人。恰逢他在1987年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过访问本人，使这句话得到了证实。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只是辑入了目前搜集到的读书批注。随着党的文献收集工作的深化和扩大，随着档案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许会发现毛泽东的新的哲学批注。我们期望，若干年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补卷或增订本，将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

## 《实践论》、《矛盾论》——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在 1842 年 6 月写的一篇时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抒发这一见解时，还是一个年仅 24 岁的青年。他何曾想到一个世纪以来，这一见解成为了哲学家们反复引述的至理名言。事实上，每位伟大的哲学家、著作家在他们成为伟大的思想家、著作家之前，他们讲的话、写的书往往不引世注目，甚至也未被自我充分认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驶，随着社会实践的检验，当初不起眼的言论或著作却成为了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时，何曾想到要荟萃时代精神的精华？列宁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后人整理成《哲学笔记》的那些书札，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时，何曾想到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地，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矛盾论》时，自认为他的这个讲义是不好的，“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但是，曾几何时，《实践论》、《矛盾论》两个篇章，在延安，在中国，在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在讲了上面的后之后接着说，一个时代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正是这样，无论就其内容和表现来说，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实践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 一、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异常卓越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这个世界级的文明大国落后了。自 1848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入侵瓜分下，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国家、启蒙民众、振兴华夏，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求索富国强兵之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但却一个一个地失败了。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开始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国家的命运，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主要是根据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革命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虽然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给落后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指明了远大的方向，但是它毕竟没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极其微弱的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斗争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就中国而言，又不是一般的落后国家，而是一个具有 2000 多年封建专制历史、自然地理幅员广大、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民人口众多、农村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落后国家。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相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力量没有取得民主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其特殊，革命过程极其复杂的国家里如何进行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是世界现代革命运动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 20 世纪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谈到这个情况时曾说：“你们面临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在每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由你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成立的年轻的党。它成立之后不久即投入了蓬勃发展的有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它处在幼稚时期，既无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又缺乏实践斗争经验，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扑朔迷离的变化态势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因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尽管在一个时期或局部范围内取得过若干胜利，但在全局上却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把革命力量引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省际交界地区，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逐渐地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明晰的正确认识，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思想，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后，又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样，在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30年代的中后期，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包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这样的重要思想，已经有了基本认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是要从哲学上进一步对于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以便指导日后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客观世界”。“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斯诺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情况进行过采访，他写道：“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我们说“两论”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不仅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意义上而言，而且就“两论”的内容本身来看也是如此。

第一，“两论”的主题是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如上所述，旧中国社会矛盾深重，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尖锐性、曲折性为世界罕见。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只是在经过不断地挫折和失败之后才逐渐被认识。这个认识过程，说到底，就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即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就产生了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样，矛盾问题、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两论”的主题。《矛盾论》可以说是当年中国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形态。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有层次地展开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的基本经验。《实践论》则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解决认识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阐述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17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斯诺在中国》第283—284页。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认识论上的升华。

第二，“两论”的分析对象，主要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两论”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在论述哲学原理、原则时基本上是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的。这不仅在为写作“两论”进行理论准备的有关读书批注中十分突出，而且可以说贯穿在“两论”特别是《矛盾论》的通篇之中。拿《矛盾论》来说，它以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各个阶段的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为例证，来研究事物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仅从其联结上，而且从其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强调必须时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样，“两论”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三，“两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新思想，也主要是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结果。《实践论》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包含了对中国革命经历长期的艰难曲折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的哲学概括；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既是对在此以前的有关哲学思想表述的进一步的逻辑发展，更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中国革命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比较，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过程的哲学抽象。《矛盾论》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科学概念，既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运动的最普遍法则的通俗化，也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异常复杂的矛盾运动，并使之成为东方世界的各种矛盾的焦点这一现实土壤；对矛盾特殊性的五个层次的精辟分析，既是对有关哲学论述的系统化，但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矛盾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的哲学概括；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思想，不仅是使矛盾的互相转化的思想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地位的转化在哲学上的反映。“两论”再一次证明，哲学思想的发展不单纯是哲学概念的演绎和推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其逻辑发展的实践基础。



## 二、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的哲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传统，但是“左”、右倾错误却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相继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指导思想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亡的境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开辟了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后期，他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不断地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多次被排挤出领导岗位。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却没有来得及批判。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严重地存在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面对着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指导思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来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果说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么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彻底清算。写作“两论”便是承担这个任务。历史要求它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发表“两论”时写的题解明确指出：《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写的。

在“两论”中，毛泽东从哲学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归纳，并逐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第一，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本本主义、将马列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

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具体国情、省情、县情，陷入主观主义。毛泽东在 30 年代初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方法。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揭示了错误路线在认识论上的表现和特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指出：一切“左”的和有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上述两种错误，在世界观上，不是唯心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有的错误思想。”

第二，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哲学上另一个突出表现。《矛盾论》为什么着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他们既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指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的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在分析王明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入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认识运动的次序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再以一般的普遍共同认识为指导，去进一步认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但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类认识运动的这个正常次序，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这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4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5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43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49 页。

第三，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哲学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不了解客观事物在对立中存在同一，在同一中又有斗争，而且对立与同一还能互相转化；不了解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因而，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么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在第一次革命战争后期）；要么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既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也不能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后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就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正确地阐明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指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到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属于党内矛盾，在政治上不能与反动派等量齐观，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有相通之处，毛泽东所阐述的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第四，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又一个特点。他们不懂得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或者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或者对矛盾总体或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下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表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前者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后者是思想方法的表面性，不知道本质地看问题。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批评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为了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强调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事物时，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事物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这既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既不能分清现象与本质，也不能分清特殊本质与共同本质。因而对于具体矛盾不能作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质的矛盾不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

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批判，彻底揭露了其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本质，对于分析一切政治路线错误的哲学根源都有指导意义。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然升华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在共产党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早期著名活动家大量翻译、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思想，形成了后人称为的“早期传播热”。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相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把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宣传唯物史观放在首要地位的。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多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介绍和阐述马列主义观点的论著也多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贡献之一，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家和革命家们的高度重视。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唯物史观能提供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因而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求。当然，由于受理论素养和翻译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和论述难免不充分、不准确、不全面，其翻译也往往要通过日译本或俄译本作为中介，并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这样，其理论内容不能不显得比较粗糙和单薄。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代的水平相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带有明显的幼稚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公开或秘密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影响较大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新哲学大纲》（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重点突出了唯物辩证法。不仅在翻译方面如此，而且在撰写介绍、论述性的文章和研究著作方面也如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比较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哲学读物。宣传唯物辩证法成为哲学界的一种时尚，如有的文章所指出：它“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之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是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为社会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展开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最新的思想资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反思。“两论”的写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升华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译介型上升为著述型。“两论”问世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已有20年的历史，但基本上属于译介性质。30年代出版的几本哲学读物，虽然反映了著作者一定的主体研究意识，在某些方面甚至获得了独到的创见，具有著书立说的特点，但是，从某些方面看，无论《大众哲学》还是《社会学大纲》又都没有完全脱去译介性。作者著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提出这一任务本身，也就从总体上规定了他们的著述不能不具有这种性质。他们对某些哲学观点的阐述，对一些问题分析的思路，都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种影子存在。毛泽东写作“两论”虽然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些观点，但是，谁也下认为“两论”是译介性著作。因为毛泽东写作“两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肩负有更重要的使命。从“两论”本身看，它不仅有许多独特的哲学思考，而且结构体系也自成一统，别具特色。作者的主体研究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两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哲学理论上都是独创精神极强的科学著作。

第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通俗普及型上升为理论研究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20多年中，特别是30年代，中国进步的理论工作者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普及工作，起了重大的启蒙教育作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本书到1938年2月就印行了10版（到1949年解放前共印行了32版），直接推动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同其他通俗普及性读物一样，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论著也有它们的弱点，如阐述的某些哲学观点不够准确、周密、正确和深刻，甚至个别哲学观点还有错误（如艾思奇在与叶青辩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实践论，差别不是矛盾等）。毛泽东的“两论”发挥了《大众哲学》这类通俗读物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弱点和缺点。“两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深层次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把深奥的哲学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等形式表达出来，既朴实无华，又妙语连珠，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理解。“两论”在叙述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功，诚如国外的评论所言：毛泽东著作的特点，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两论”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它对哲学通俗化所作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普及工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深刻研究，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水平提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中学理型上升为现实型。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进行的。由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能直接联系现实，否则，会招致各种迫害，甚至杀身之祸。这些进步文化人由于其经历所限，也使理论传播与社会现实斗争的联系不能不受影响。因此，当时的哲学读物，甚至像《社会学大纲》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也基本上属于学理性的研究著作，

带有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何干之 1937 年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评述哲学界的状况说：“一九二七年以来，新哲学是登场了。但那时只偏重哲学原理的输入，而所翻译的书本也只有几本古典著作和几本以机械论或观念论（唯心论的旧译名——引者）的观点所写的入门。这几年来，国际上最良好的读物，又渐渐有中译本，有一部分思想家也开始做通俗化的工作了。不过大家翻来翻去，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在他看来，哲学必须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和社会各种势力的动向，都在“哲学的烛光”下，“照出它的原形”。他呼问：我们的思想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并感叹道：中国社会的现实“赋与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两论”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应运产生的。由于毛泽东兼具理论与实践双向结合的优势，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两论”一改以往哲学传播的学理专著的面孔，以整个时代为背景，对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作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两论”没有丝毫的学究习气，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代新风。

第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日常生活型上升为总结革命经验型。

“两论”问世之前，为了破除对哲学的神秘化，让广大的普通群众都懂得哲学的基本道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进步理论工作者曾运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些哲学道理。这种把哲学大众化、生活化的工作是过去没有人尝试过的，甚至也不被人屑于尝试。但是，这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李公朴评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类读物把哲学生活化。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哲学就在自己身边，从而变成广大群众的生活指南，起了一般哲学教科书不能起的巨大作用。“两论”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但是它不单单是把哲学生活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哲学具有了直接的革命意义。“两论”以解决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为目的，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教导人们不单单是要正确地认识生活，而且要敢于打破旧生活，建设新生活。在中国，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由于是在延安，没有国民党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革命性是大大地增强了。

第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经过一段译介之后，到 30 年代前期，已经出现了一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就拿影响较大的、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而言，应当说，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著作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建构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见解，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仍然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诠释性著作。这是作者本人也不讳言的。“两论”出手不凡，产生那样大的轰动效应，正在于它不是诠释性著作。无论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还是辩证法，都有重大的理论创

---

《国民周刊》1937 年第 1 卷第 13 期。

李公朴 1935 年 12 月为《哲学讲话》写的序。《哲学讲话》1936 年 2 月再版本第 1 页。

造。“两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的一个显著标志。



####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在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惊人之语时，还说过另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哲学家——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凝聚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智慧，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经验的产物。他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转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早年求学时酷爱哲学，花了不少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信仰唯心论。这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读书批语《〈伦理学原理〉批注》，以及当时的一些书信中都有明显反映。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回忆他早年学习生活时说：“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经过十月革命的冲击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随着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他的哲学信仰也由唯心主义，经过二元论，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本人谈到这一思想转变时说：“一九二二年夏天，我们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第二次飞跃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这是由写作“两论”实现的。这次飞跃是他投身革命近20年，根植于人民大众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毛泽东积极地领导了湖南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先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又致力于农民运动，并对上海、江浙地区，特别是湖南地区的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状况进行了实际调查。他在大革命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范例，这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初步结合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标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先把革命武装从城市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他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著，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几篇论著虽然是政治性论文，但却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思想，其对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深刻剖析，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的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如果说 1929 年 12 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已经有了若干理论哲学的议论，初步地提出了要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提倡洗刷唯心精神的调查研究的唯物论思想的话，那么，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则堪称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它首次从认识论上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意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搬外国经验以及上级领导指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而且已经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1936 年 12 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是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他的军事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一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初步地建构起了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初步地阐发了他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因而可以说是“两论”的前导。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是因为他论述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发展变化，认为除了人的头脑（思想）是研究的主体之外，一切都是客观的实在，强调主观指导要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才能充分地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动作用，“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样，他正确地把握了主观指导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是因为他分析了战争规律知识的来源和认识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提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强调制定正确的战争计划的过程就是对各种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过程，执行战争计划的过程是检验、修正、补充原有计划的过程，因而是进一步丰富认识的过程。这样，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规律认识的解剖，分析了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实践的辩证推移过程。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是因为他探讨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强调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意义，认为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坦途。并且，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作了具体分析，从而孕育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以及矛盾的诸种特殊性的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还阐述了全局和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一方面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另一方面全局和局部可以互相转化，“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能造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败局，从而实际上产生了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不难看出，“两论”的许多思想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写作“两论”就如同经过十月怀胎，将要一朝分娩了。

但是，“两论”不是毛泽东自身哲学思想的简单的延伸，而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如同分娩孩子是飞跃一样。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如果说第一次飞跃是哲学信仰的飞跃，那末第二次飞跃则是哲学理论的飞跃。这次飞跃表现为：

第一，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毛泽东长期戎马倥偬，无暇从事纯哲学理论的研究。他虽然富于哲学思维，头脑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能不把日常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由革命实践提到首位的政治、军事以及党内斗争等方面的问题。他写的上述许多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较为具体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党建等问题作具体分析，因而一般属于应用哲学性质。而“两论”则属于理论哲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哲学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它虽然也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内容，但为的是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做较为抽象的哲学概括，而不是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哲学思想作指导去分析具体问题。毛泽东说过：“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一度没有战事，党中央不再处于敌人直接包围的严峻形势之中，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安定的和平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既有较为充实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在延安能搜集到30年代出版的许多马列著作和其他理论读物）“发愤读书”，博览群书，于是，他积极从事哲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实现了由应用哲学向理论哲学的飞跃。从毛泽东的哲学认识史来说，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也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

第二，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上面已经指出，毛泽东在“两论”以前写的许多文章，多属于应用哲学性质，不仅如此，这些文章所反映的，大多是毛泽东某个方面的哲学思想及其某种程度的深化。从横向看，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较多地从政治视角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主要是从军事视角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从纵向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我们所知道的，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反对本本主义》孕育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雏形。这就是说，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只是初步形成，至此，他既没有阐发自己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工作是随着其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而完成的。“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领域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像两座高峰一样矗立起来，使以往的某些哲学体系相形见绌。如果说在此以前，毛泽东尽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写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哲学论文，但人们还难以将他称之为哲学家的话，那末，“两论”的创作则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第三，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前已指出，毛泽东在“两论”以前的论著多属于应用哲学这个层次。这除了是指不属于纯哲学，而带有其所应用的范围的鲜明色彩，如政治哲学、军事哲学外，还

包括这样的意思：那些论著，无论属于政治的还是军事的，都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在分析问题，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尽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述具体问题或得出具体结论，推进和发展了在此以前这方面的具体思想，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本身却没有有什么发展。“两论”的飞跃意义在于，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结果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这是“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做的伟大理论贡献。

（写于 1990 年春，原载 1991 年 6 月出版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

## 哲学明珠诞生记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 一、“发愤”之作

一部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史书上的杰出人物不乏其例。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管史书上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但大抵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慨极深，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当然，毛泽东既没有蹲过大狱，也没有成为残疾人，但是他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发愤之作”，那么“愤”从何来呢？这还得要从毛泽东创立江西中央苏区根据他讲起。毛泽东自开辟井冈山道路后，历经艰险，终年转战，穿插于闽西、赣南之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不小地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面对这块红色的土地虎视眈眈，无可奈何。但是，“这边独好”的“风景”不长。随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是些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留苏学生。他们能背诵一些马列词句，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动辄以“拿本本来”唬人，狂妄地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喇地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曾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就挂着当时中央苏区“国家主席”的虚名养病、视察、蹲点、督导，或者“随军行动”。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丢个净光，进行“战略转移”。他心疼，他愤怒，但无能为力。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这就是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前，他坐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冷板凳。这段经历，他刻骨铭心。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薄、讥讽，他没有忘记。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反杜林论》。他后来对外国人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7页。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中国哲学》第1辑所载郭化若文：《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

种意义上说就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他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发愤攻读哲学书的情况有生动感人的记载。他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 二、“如饥似渴”地读书

毛泽东那时读书可以说“如饥似渴”。他读的哲学书籍大体有这么四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从早年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直到列宁的《哲学笔记》节译本，还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第二类是外国的哲学教科书和通俗读本，这主要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第三类是中外哲学史家的著作（包括介绍他们哲学思想的读物），有些书他早年就读过，这时又进一步研究，如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第四类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写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他特别欣赏李达和艾思奇的书。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出版后，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也有很高评价，读后还作了3000字的详细摘录，写信对艾说：“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当时读书有一个习惯，爱在书上勾画、批注。书页的天头、地脚、边缝、中空都圈点、批注得密密麻麻。他对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翻译的上述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研读了多遍，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四遍，共写了12000多字的批注。这是目前见到毛泽东读书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他对另一本米丁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作了多遍研读，写了26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的这些批注，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还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这两本书是在1936年到1937年7月以前读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是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准备的一部分。

### 三、在抗大讲授哲学和“两论”的出版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之后，1937年4月，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去给学员讲授哲学，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共讲了100多个小时。他对斯诺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可以腾出时间来收集准备在抗大讲课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的基本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斯诺写道：“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总结了革命的经验，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几小时就讲完了。”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年9月印”。《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稿虽然是比较简略的“提纲”，但这两节看来是根据记录作了整理，已不再是“提纲”，而是完整的论文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单独地油印过。毛泽东还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过人。

《实践论》、《矛盾论》问世后，在各抗日根据地陆续传开。有的地区还将它出版。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这“两论”作了修改，特别是对《矛盾论》作了较大修改（他本人一直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写得好，对前者甚为满意，对后者不大满意），于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其收入在内。为了说明他写作“两论”的缘由，他还写了较长的题解。这个题解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这种错误思想（还包括经验主义）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两本书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不仅使他个人遭受痛苦，更重要的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害。因此，他发“愤”，不是发个人之“愤”，而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发“愤”著书。

《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发表后，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的哲学总结，又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原载《书与人》199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另外更换了毛泽东的两幅批注手迹）

---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页。



##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之管见 ——从《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谈起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研究专著就出版了 40 多本，这是建国后从来没有过的。目前，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了，这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这里，从新编本出版这个角度来谈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看法。

## 一、怎样看待《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出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后，有的同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难怪，因为《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大部分著作已经公开发表过。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应当看到，这个《毛泽东著作选读》还是有它的新意的。这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的68篇著作中，有17篇是《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中未曾编选的。在编选的1958年以后的7篇著作中，有5篇是新发表的。在全书新发表的著作中，有的是很重要的著作。如开卷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从内容来说，它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是毛泽东同志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作，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哲学思想，对广大青年进行理论教育、世界观教育、共产主义教育，都有重要的意义；从编辑上说，选这篇文章为开卷篇，突破了在此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陈云文选》等选集都以1926年的文献为开卷的模式。是不是这些领导人在1926年以前就没有能选的好文章呢？不完全是。如周恩来同志在1922年8月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也是说明周恩来同志的世界观转变的。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同志以犀利明快的文字说明了只有用共产主义的革命办法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选集》不是不可以用这篇开卷，但那时受了《毛泽东选集》开卷篇时间的束缚，没能突破这个框框。这次《毛泽东著作选读》突破了，对于编选文献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重要意义。

第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修订和新写了一批题解和注释。对有关著作的出版和修改情况作了必要的说明；对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考察，订正了一些重要史实。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在1951年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时曾作了个别修改，即在讲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时，加写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一语，此处修改，字数虽不多，但对思想史的研究造成的影响却很大。为了说明事情的原委，《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此处写了一条注释，公布了1929年决议所讲的这句话的原文，即是：“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这样，就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还了历史的原貌，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见篇后附注）。全书的注释近500条，计6万字左右。其中许多注释都是在查阅和研究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之后写成的。因而，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当然，《毛泽东著作选读》主要是供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用的本子，这样的读者对象决定了它的选编内容和要求。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个本子不够用，还必须翻阅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其他专题集子等。

## 二、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要充分 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

前已指出，近几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势头。同时也遇到了如何把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问题。有些同志反映，已出版的有的著作，在内容结构上，在观点和思路上，给人以某种相似的感觉。在现阶段，这是很难避免的，不必苛求。但是，应当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资料的限制，对现有的文献资料研究不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党的领导人的文献资料的编辑发表工作抓紧了。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说，这几年出版的“选集”和“专题集”，每年都在10本以上；而且每期《文献和研究》都要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材料。这个数量虽然不能说是很大，但也不算小，不过与广大研究者的需要来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为了适应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今后，无疑需要继续编辑出版更多的文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深入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出版的许多文献，不仅对于研究党史、政治思想史是重要的，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重要的。

例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它编选了372封书信，其中反映毛泽东的重要思想和活动的书信占一半左右，而直接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关的，约占六分之一。这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批难得的资料。拿1944年8月毛泽东同志致秦邦宪同志的信来说。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包括经济方面的特征。但是，当时的论述侧重于生产关系上，主要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致博古的这封信，则从生产力的状况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是机器，不是手工”。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因此，“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的任务”。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十分强调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对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唯物史观有重要价值。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曾经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通信集所讨论的思想的中心点是辩证法。《毛泽东书信选集》虽然不能与之简单类比，但它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却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其他各种选集，如《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刘少奇选集》下卷里，有一篇不大显眼的文章，即《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是刘少奇同志读邓子恢同志和高岗的两篇文章时写的笔记，过去既没有发表也没有传达过，是在编辑《刘少奇选集》时找出来的。在这篇笔记中，刘少奇对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认为矛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还提出要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矛盾当作非敌对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矛盾看作敌对的矛盾。根据这个总分析，他认为国营工厂内的管理机关与工人

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在这里，刘少奇同志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的视角，而是就一个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在党的领导人内，就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材料来说，这是比较早的。这是他对于两类矛盾理论的一大贡献。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如果不研究刘少奇同志的这篇笔记，应当说，是不完全的。举此一例，足见研究其他领导人的文献，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出版后内部发行，1985年经过修订后公开发行）。这本书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涉及的史实和理论观点，力求运用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叙述、分析和说明。全书有40多万字，不但是学习《历史决议》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近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也提供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珍贵资料。该书有14篇文章，直接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3篇，其他还有5篇也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许多文献资料都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在文献的出版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加强对已经出版的这一系列文献著作的研究意识，提高对这类文献的利用率，是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途径。

###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要与 党史研究相结合

目前，我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由哲学工作者组成的，主要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一支是由党史工作者组成的，主要从毛泽东思想这个大的思想体系的视角来开展研究。这两支队伍各有各的优势。一般他说，哲学工作者理论思维能力较强；党史工作者掌握文献资料较多，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发展变化过程了解较透。

从文献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深入一步，这两支队伍应当汇合起来，加强横向联系，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素质。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要加强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获取思想史方面的营养。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搞哲学的人，最好掌握、精通一门具体的科学，不要使哲学在概念里绕圈子。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来说，除了各人根据自己的喜爱去研究一些学科知识以外，最好还要熟悉一下党史、现代史。这对于提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是有好处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理论著作毕竟有限，大部分是运用哲学的著作。他的许多哲学观点都体现在分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的著作之中，体现在他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决之中。因此，熟悉党史，熟悉一些重要史实的本末，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理论观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演变。如果把抽象的哲学理论观点喻为骨架，那么，与它相联系的党史和思想史资料就如同血肉，两者有机结合，形体就丰满了。经过这样的结合研究之后，写出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就不会再显得干巴、空泛，而会是有血有肉、生动具体的。

目前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已经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一些重要的党史研究刊物经常发表党史、思想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经常翻阅这些刊物，会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

#### 四、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不成熟想法

上面讲的充分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和加强对党史的研究，都是为了达到深化研究的目的，此外，还补充讲几点：

1. 专题研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不少了，几十本概述性的专著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后要在继续进行体系研究的同时，应当加强专题研究。目前这方面的著作相对他说，还比较少一些。是否可以加强这样一些薄弱的专题的研究：如主体性思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思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思想；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战略与策略的思想；过程论思想；方法论思想等。

2. 断代研究。如果说上面是横向的研究，这就是要从纵向的研究上来加强。目前已有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抗战时期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这些还不够。除继续开展对这些时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外，还要加强对毛泽东在其他时期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在建国后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包括他晚年哲学思想的变化。不研究清楚晚年和早期的思想，有些问题的脉络不可能搞清楚。人们都爱谈论毛泽东的悲剧，尽管这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但只有把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研究清楚了，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说明。

3. 交叉研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仅仅固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圈子，要开阔视野，开拓研究领域。除了上面讲的搞点党史的研究外，还可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特别是对他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毛泽东同志在苏区时期就开始注意研究经济问题，延安时期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一文，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虽然有严重失误，但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对目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仍有借鉴作用。熟悉了他的经济思想，会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此外，还可进行更广阔领域的交叉研究。

4. 比较研究。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仅仅限于研究毛泽东个人的著作，还应当研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既求同，也求异。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有密切关系，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尤其不可缺少。当然，比较研究还可在更广、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除了与当代领导人进行比较外，还可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作比较研究；除了与国内的思想家作比较研究外，还可与国外的思想家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应当注重那些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内在联系，因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反之，在一些外在现象上随意的进行比较研究，不一定能取得有益的成果。

5. 现实研究。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样，都要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是对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不能脱离当前的实际。一方面，脱离了实际，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观点形成的实际过程相悖，这就不能真切地领略和掌握毛泽东同志

的思路，也就会影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脱离了实际，不仅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不能对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哲学概括，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这样的研究必然缺乏生气，缺乏活力，缺乏时代感。过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简单地围绕着“中心工作”转是错误的，也给许多哲学工作者带来了不幸，在一些同志中间还存在着“余悸”和“预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是研究工作者，就应当有研究科学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研究现实问题，从而推动和活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6. “新潮”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既要面向现实，也要面向世界。面向世界，首先要放眼世界，站在这个高度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视野会更开阔，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当前，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在研究。日本学者、欧美学者，资料搜集得比较全，研究的课题比较细，有些研究成果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此外，在国外曾经有较大影响的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新的科学方法也传到了国内；一些外国学者，包括外籍华裔比较感兴趣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国内也成了“热点”。这些思潮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的冲击。这是好现象。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不能将这些“新潮”“拒于国门之外”，恰恰相反，应该加强对这些“新潮”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运用系统论等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加强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也会使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获得新的推动。对于一切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关的新思潮，我们都需要加强研究。

历史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到了向新阶段飞跃的关头。我们必须调动各种研究手段，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效应，努力实现这个飞跃。

附注：根据编辑毛泽东早期著作集的同志考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语虽然是在修改时写上的，但是毛泽东早在1921年11月21日，以润之署名发表在《劳工周刊》纪念湖南劳工会成立周年特刊上的《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最后呼喊的口号中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说明这个用语当时在国内已流行开来，毛泽东接受并运用了它。

就此而言，建国后的修改是个纯粹技术性问题，不存在人为拔高毛泽东的思想认识问题。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

##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述评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过许多巨大的贡献。他提出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对教育干部学习理论、增强哲学修养、提高政策水平、改进工作方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党中央重新号召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作一番历史考察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对它进行科学的评价，而且有益于探讨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途径。



## 一、思想商定论的核心——立场、观点、方法论的溯源

思想方法论起源于立场、观点、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应该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那里就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不断明确起来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任務主要是建构哲学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短文和通信中，应当说，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他们经过批判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包括杜林哲学和其他庸俗唯物主义，总结 19 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吸取现代科学文化成果，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与其他各种旧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哲学不是一堆死的哲学知识，而是活哲学，即用他们的哲学理论来分析历史和现实社会，揭示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改造世界的任务和如何进行改造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有恢宏的理论体系，又具备科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虽然他们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一再声明，他们的哲学既是理论又是方法，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恩格斯在 1895 年 3 月 11 日致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讲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不仅指通常所讲的辩证法是方法，也包括唯物论是方法；不仅辩证唯物论是方法，也包括历史唯物论是方法。马克思明确他说过：“从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和社会物质基础来分析精神观念的产生这种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恩格斯也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那种仅把辩证法看成是方法，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似乎不是方法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当然，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阶段，如何用理论去指导革命实践的任务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而，他们主要从理论的认识高度上指出了他们的学说的方法论意义，而不可能就他们的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展开论述。

列宁走上历史舞台时面临着与马克思、恩格斯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环境。一是在列宁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相对的高潮，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任务提上了具体日程；二是列宁所处的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和北美国家，而是资本主义不太发展的俄国。在落后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0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10 页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2 页。

答案，需要从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革命任务、制定革命策略。对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内部出现的意见分歧，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尽管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但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便为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进行诡辩。在这种形势下，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如果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意见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还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

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并犯有严重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 30 年的理论和实践，要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简单的、粗暴的情绪化态度。在理论方面，就其捍卫列宁主义这一点来说，虽然也有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但不能全盘否定。正是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发挥了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进一步强调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第一次提出，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指出：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就在于列宁“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还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以上述思想为基础，斯大林进一步概括出了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样，斯大林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立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恩格斯早在 1847 年 10 月就已指出：“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引者）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6 页、460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04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98 页。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72—273 页、220 页、222 页。

《斯大林选集》十卷第 570—571 页。

条件的理论概括。”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指出：唯物主义“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继续强调这个思想，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斯大林也有不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论述。这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斯大林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已经贯穿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把立场、观点、方法三者并联在一起加以提出，而且明确地提出思想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思想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2页。

《列宁全集》第4卷第361—362页。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 二、思想方法论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比较多地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读物为中介的，20年代中期以后是如此，30年代在延安广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也是如此。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则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已为实践所证明。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阐释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论述较多；二则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并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虽然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三则苏联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斯大林和苏联党实际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指示；四则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理论如考茨基、卢卡奇等的观点在列宁时代，在苏联的哲学论争中已处于被批判地位，在中国被翻译的少，了解者少，信仰者更少，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和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主要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渠道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

就毛泽东而言，在他认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从他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他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以及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读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一点便明白无误，不必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不是采取学理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知识，而是同时把它当成方法的。也就是说，不是作为死哲学来接受，而是作为活哲学来认识的。他在回顾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有些过于简单化，不很准确。但是，这一段话说明，毛泽东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是很注意“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的。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一些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之一。所谓“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思想方法论的初始形态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他后来形成“思想方法”概念和提出“思想方法论”的萌芽。

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就是如上所述，抓住“阶级斗争”四个字，去发动社会各界群众进行反对地方军阀政府的斗争，发动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随后又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的。这是他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尽管他参加了建党，在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以及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都担负过一定责任，但是他领导革命的雄才大略、理论卓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方法功能，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自上井冈山开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显露出来的。

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初期，一方面，由于马列著作还没有大量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由于戎马倥偬，毛泽东无暇系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于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指导，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 1929 年 12 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他强调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随后在 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哲学论文中，他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初步地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这篇论文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尽管这时他还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这个概念，但已经开始强调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待马列主义理论，努力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这是很明显的。

“思想方法”这个概念，就目前国内著名学者的著述来看，艾思奇是使用较早的一个。他在 1936 年 10 月就著有《思想方法论》一书。毛泽东在延安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并作了少量批注。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已经收录。但是，艾思奇讲思想方法论，更多的是从认识的形成过程，即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这样的辩证逻辑的视角来提出问题的。与毛泽东从更广阔的视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提出思想方法论不完全一样。如果说，艾思奇阐释的思想方法论基本属于狭义的，那么，毛泽东视野中的思想方法论则属于广义的。今天，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思想方法问题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思想非常活跃。他在 1937 年 7、8 月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毛泽东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典范，是教育党的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经典教材。我们对于“两论”的理解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单纯认为它只是哲学理论著作，而应当看到它同时具有深远的思想方法意义。如果忽视了后者，就不可能充分估量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它的无限生命力。学习“两论”，不能采取学理主义态度，只作为理论知识来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思路，即作为思想方法论来学习。事实上，毛泽东写作“两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教育干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两论”的题注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两论”的重要准备著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篇著作阐述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际上是教育干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

思主义的方法，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讲授“两论”时发挥了这个思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和第三章，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还说，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他随后（1937年9月）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批评自由主义时，就强调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论”。这是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的一次重要发挥。“两论”的创作和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既是他的哲学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思想方法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升华。这为他在整风运动中明确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写作“两论”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理论，那么，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则是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干部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初步地形成了他的“思想方法论”体系。

延安整风，一般他说，是从1941年开始。但是，严格他讲，它的准备阶段或者说思想发动阶段则从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了。这次全会揭开了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序幕，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显然，这些思想是承续了斯大林的观点。但是，他不是简单地重复斯大林的观点，而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光辉的命题。也就是说，他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由于毛泽东的带头学习和大力倡导，延安的党政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延安的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陈云在1987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回顾当时的情景说：那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在中组部成立了6人学习小组，除他外，还有李富春、陶铸、王鹤寿、陈正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2页。

这是原发表稿的表述。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修改为“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人、王德。从 1938 年开始，坚持学习了 5 年。毛泽东先后三次同他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和培元帮助他们学习。当时延安十分缺乏教材。为了满足学习的需要，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出面编辑《哲学选辑》一书，荟萃了当时延安能找到的中外新哲学名著的精华。延安开展的这些哲学活动，其目的都不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按照毛泽东的倡导，通过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许多干部包括重要领导干部，通过这次哲学理论的学习，思想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陈云曾多次讲到他在延安期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受到的教益。在 1987 年 7 月的这次谈话中，他继续回忆指出：“我个人的体会，学习哲学，可以使入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正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的熏陶，陈云在 1939 年 12 月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指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他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在迄今公开出版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中，比较早地使用了“思想方法”这个概念。

随后在 1940 年 1 月，中共中央专门以文件形式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号召“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把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列为“高级课程科目”，1941 年 5 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不仅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整顿学风、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应该“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抛弃那种“不是为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那里找立场找方法，而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的错误态度，强调要学会“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从目前查到的文献看，毛泽东明确地使用“思想方法”概念是在 1941 年秋中央政治局整风期间。1941 年 8 月末，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党整风学习的领导，由中央负责同志组织成立了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9 月 26 日，中央又决定在各个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各地方和军队主要负责人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 20 年的历史，以总结历史经验。9 月 29 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写信，明确提出在学习和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针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指定将当时在延安流传的一些马列重要著作和介绍马列理论的教科书，作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为了宣传和贯彻这个精神，一月之后，毛泽东于 1941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他从思想方法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

---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62 页。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89 页。

1948 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937 页、934—935 页、933 页。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作了修改，增加了“找观点”的表述。

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强调不要做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他说：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样，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强调掌握思想方法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1942年初，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在当年2月1日和8日分别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号召全党干部端正学风。他指出：所谓学风，“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又把思想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中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学习“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这里的“思想科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而提出的，这样的概括不单纯是为了在行文上与“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提法相对应以求得协同，而且表明了中央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以什么作为中心环节的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学习研究，并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研究“思想科学”，也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方法论何等重视。

根据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在作完《反对党八股》报告后不久，召集了一个有在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他提出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以便帮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整顿党的学风和文风。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参加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这本书编成后（主编为艾思奇），毛泽东又亲自审看。这是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好书，在延安印行后，对教育干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1949年春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由毛泽东编审），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被列为其中之一。这本书在各老解放区出过好几版，全国解放后还出过数版。

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化，他把哲学视为方法论、视为思想方法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对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作了许多阐发，丰富和充实了从抗日战争以来建构的方法论系统，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41页、942页。

温济泽同志当年参加过这本书的编辑。1983年，由他主持对这本书做了修订，以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新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广大群众和干部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 1955 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根据毛泽东强调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思想，陈云在 1957 年 1 月对国务院系统的干部讲话，明确提出：

“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他还指出：“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重要的。”从延安整风以来，陈云一向重视思想方法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能保持清醒头脑，没有跟着风头犯错误，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为了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年之后，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又在 1959 年 4 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这里虽然讲的是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使较为抽象的思想方法变成较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使思想方法论扩展到一个新的实际的层次所作的思考。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段话简要他说明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具体关系。从理论上讲，方法论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环节，包括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思想方法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而言，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要求人们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并从中引出理论、计划、方案、决策和办法。世界观在向方法论转变时，首先直接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变为其他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世界观转变为具体方法的中介，也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它侧重于要求将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决策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两者相比，思想方法对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因此，可以说，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问题。

到了 60 年代前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还在 1953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就说过：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 年 3 月，在天津会议上，他进而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 年 5 月，他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 年 8 月，他在北戴河的一次哲学谈话中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他要求全党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一年 12 月中央领导同志的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5 页。

《陈云文选》（1956—1985 年）第 38 页。

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刘少奇说：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接着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嘛。当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即包括总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上指整个哲学。此外，认识论还有狭义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狭义的认识论只是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是指前者。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为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方法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也使强调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根据。

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倡导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从理论上讲，强调思想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更加活生生的体现出来。从社会实践的效用看，强调思想方法论更能使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使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陈云在 1987 年 7 月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再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

###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方法功能的历史原因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并加以特别强调，也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异常无比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理论，是立足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设想和阐发的。列宁所在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地缘关系、文化传统方面却与欧美国家比较接近，有不少相通之处。俄国的无产阶级在接受、理解和运用马、恩的革命理论方面，比其他地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地要方便一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俄国落后，且地处亚洲东方，其文化传统与欧美相距甚远；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薄弱，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农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革命的直接敌人，不仅有本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相对于幼弱的革命力量而言，显得异常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比起俄国革命来说，更需要开创精神。既然在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没有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就只能根据马列的一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这就要更加艰苦地学习、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无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了22年的武装斗争才取得胜利。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没有第二例，在所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搞地下斗争时间较长，但搞武装斗争的时间并不算长。而我们党搞地下斗争的时间比搞武装斗争的时间更长。我们党所进行的，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环境都是难以想象地异常艰苦，斗争是空前异常地残酷。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斗争，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以及由此派生的领导方法和其他工作方法，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

第二，这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致使中国革命受到过极大危害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著作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从中学到了如上所述的怎样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等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志不忘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由于斯大林的大党沙文主义以及一些错误的指示，特别是通过扶植王明等人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来贯彻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做法，使中国革命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濒于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反对和纠正受共产国

际和苏联共产党所支持的党中央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正是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办法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些坚持错误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用斯大林之矛来攻斯大林之盾，因为王明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路线。尽管苏联党对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不满意，但是毛泽东对上述思想的强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实际上也是把列宁、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向前发展了，并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当年在我们党内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是我们这后一代人无法感受到的，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却有深切的体会。说延安整风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因为它解放了党的思想，破除了对教条、本本之类的迷信。从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到整风运动，其批判矛头都是一个，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就是在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理论成果。

第三，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理论准备较差、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而探索出来的一条带有补课性的、使其后来居上的学理论的“捷径”。

中国共产党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她不是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再成立，再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相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相当短。从李大钊赴日留学寻求革命真理，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党在 1921 年创立，不过几年时间，比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要短得多，后者所经历的时间几乎是前者的一倍，再则，中国那时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全译本的重要著作比较少，也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最先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但时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 1918 年冬。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更晚一些，如他本人说，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是在 1920 年。随后，他就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这个缺点“仍未完全克服”。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在理论上是如此，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也是如此。拿俄国而言，列宁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详尽的调查研究，其他人也有这方面的著述。在这之前，俄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过考察。这些都为俄国无产阶级认识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革命的政

---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39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20 页。

策和策略提供了有益的文献资料。与此不同，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毛泽东对这一点感触尤深。他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泽东所以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外，从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的文化素质看，也是很差的。在高级干部中——更不必说一般干部，上过大学，有较高文化学历的极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这样文化程度的干部也算佼佼者，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参加革命时不仅没有学过什么马列理论著作，连识字也不多。但是，他们有较强的革命觉悟。为了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生活，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参加革命后奋不顾身，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努力工作。他们不是先学好了理论再参加革命的，而是先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增长革命才干的。他们是在于中学，边于边学的。对于大批这样的干部，要让他们像进学校那样一本一本地去学理论著作，熟悉理论知识，然后再去工作，这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干部是我们党的顶梁柱，离开了他们，许多工作就没人干了。又要他们做好工作，又要他们掌握马列基本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学习基本理论时，强调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尽管马列著作中的不少具体的概念、知识、材料一时搞不清楚，但是掌握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就能够融会贯通、一通百通，积累经验，提高本领。我们党有那么一大批老同志，文化学历虽不很高，但却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岁月能打败从军事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秘诀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陈云那样强调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那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也是整个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个党，尽管总的来说不少干部的文化素质不高，理论修养的基础不深，但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度过重重困难和挫折向前发展，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而且也概括了我们这个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虽然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来的学习经验，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普遍意义，至今仍是我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南。

第四，我们党强调学习思想方法论，也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出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的历史时代，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救亡意识。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自勉。与政治上的激进意识相适应，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强调探求“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对于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特别赞赏。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如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听课所做的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所受的思想熏陶。无论对于国学还是西学，他都强调以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反对简单地照抄照搬。他虽然潜心研究中外古今的大量典籍，但

一贯反对死读书，主张活读书，提倡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而他注重社会考察，经常到长沙附近各县去“漫游”。1918年在一师毕业之后，许多同学纷纷出国留学探求新知，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在1920年3月致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说明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对于学习中西文化，包括外来理论，就已经有了要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滕陇意识。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的青年学子的思想略高一筹之处。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种思想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已指出，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便把“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去进行革命斗争了。他读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他的同代人中虽然不是最多的，理论素质也不算最高的，但是他掌握了思想方法这个法宝，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另辟溪径，不久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毛泽东的这个经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很不一样。马、恩无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创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领导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支部和工人运动，还参加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并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理论活动方面，即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也是事关千秋万代的伟大功业）。列宁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的工作，但他不幸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的一生独具风格。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是在实践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他专门从事理论著述的时间不是很多，除早年求学和专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时期外，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建国后他没有集中地专门进行理论研究。50年代末，他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本来是想腾出时间进一步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的，但实际上没有安下心来，因而他要写新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实践家，其次才是革命理论家、哲学家（这不是说他的理论贡献不如他的革命实践，也丝毫不存在要贬低其理论家、哲学家地位的意思，而只是就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比重进行比较）。他研究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这一经历决定了他不更加重视思想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中国共产党40多年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不能不对全党发生重大影响，因而，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个人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来说属于偶然性因素，但由于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关于哲学的主体性、实践性思想总要在实践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加以强调，这就不能不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个人的偶然性体现出来。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尽管在一定程度或一定形式上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并不影响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 四、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的 几个观点的辨析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有哪几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坛，评论不一。视角不同，参照系不同，看法自然不同，这不足为怪。但从全方位的要求来看，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观点。（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二）矛盾分析，全面联系；（三）依靠人民，群众路线；（四）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里不准备对这几个基本观点逐一地展开论述，只想就围绕这几个观点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 （一）为什么要包括矛盾分析的方法？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支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既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自然无疑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三个基本观点，这一点勿须赘述。但是，作为毛泽东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决不仅止于这三点，还必须包括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上讲，矛盾分析方法是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在方法论上的要求。既然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那么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就不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科学地认识和掌握这一方法，对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原则，防止和克服主观片面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看，他特别强调矛盾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矛盾论》中，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精辟的阐述；尔后，这一观点愈益强化和深化。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他多次指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不能平列，甚至认为三个规律实际上是一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其他如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可以在核心的矛盾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且不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但按照这一观点，作为矛盾规律反映的矛盾分析方法，不能不是他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从毛泽东对思想方法的界定看，他也是把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的。他在1941年10月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时，在讲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后，就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第二条来讲的。他说了这样一些意思：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说起来大家都晓得，但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的同志在观察与处理问题上，常常容易只强调一面，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方面，就不能只把一面当全面，把局部当全体，而必须找出矛盾的对立，

这就叫做分析。在 1943 年 10 月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在其他许多地方，毛泽东都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来对待的。

从毛泽东的实践看，他始终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来运用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是通过对旧中国社会的矛盾分析，先是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随后开创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并通过对中国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各种政治力最的矛盾分析，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先是提出了《论十大关系》，随后提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不仅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或实践方面看，矛盾分析方法都是毛泽东的基本的思想方法。

## （二）为什么要包括阶级分析的方法？

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毛泽东的基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的历史的反映。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经过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地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这就是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迷离混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科学的阶级估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方法。

不仅如此，阶级分析方法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前已指出，毛泽东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它去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并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杰出篇章。在 1941 年 10 月的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也是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来对待的，他回顾自己掌握这个方法的经历说：小时候长住乡村，看见人就只知道是人，不知道有阶级。后来读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回去再观察就变了样子，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如果忽视团结小资产阶级，不照顾民族资产阶级，不把中间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就是极大的危险，就不能胜利。对农民还要分析，对工人也要具体分析，不加以分析区别，也会犯策略上的错误。据此，毛泽东指出，分析社会的事物的特性、特征、特点，它们的共同点与区别点，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几十年来，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完成



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错误，在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消灭之后还要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对60年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发动“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绝不能因他晚年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犯了错误就否定阶级分析是他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正如不能因他晚年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否定实事求是他的基本思想方法一样。何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还会激化到暴力冲突的程度。因此，我们仍然必须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处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坚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怎样认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与作为思想方法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与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两者是一致的。前者是就指导思想而言的，后者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或者说前者属于世界观系统，后者属于方法论系统，但内容都是一个，即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必须正确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但是，两者也有一些区别，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往往较多地指群体、组织、政党或代表这个群体、组织、政党的领导人，而很少就一般的普通个体而言；作为思想方法；则既可以指群体及其领袖，也可以指一般的普通个体。例如，我们在习惯用语上往往说，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但对于一个不居领导地位的普通的张三、李四，则很少说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往往说他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或者说坚持求是原则。其次，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是讲总体的，管较长时间的；作为思想方法不一定是就总体而论，管的时间也不一定很长。两者不一定是同步的。例如我们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作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论问题了，但是就我们每个人而言，包括党的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并不等于部完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作为群体的思想路线解决了，作为个体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在另外问题上又没解决，在老问题上解决了，碰到新问题又没解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是一次性的，不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认识，不断解决。再次，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才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方法，则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因为就方法论而言，要求取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共产党人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资产阶级政治家也需要运用好的思想方法，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就某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决断。如同某些自然科学家在世界观上反对唯物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却信守唯物主义一样。只是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实事求是，而他们冠以别的称谓，或使用别的概念和表述方法罢了。

在当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仅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任何外国的任何思想理论都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列主义理论不能照抄照搬，对其他任何理论也不能照抄照搬。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有些人搞全盘俄化（或苏化）不对，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搞全盘西化更是完全错误的。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议会政治论，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论，是一种新教条主义、新本本主义思潮。从思想方法论的视角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是一

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于这种崇拜西方的本本主义，要像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反对本本主义那样坚决反对，甚至还要采取比当年更为严重的步骤来肃清其影响。

应当指出，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决不是闭关锁国，自我孤立。对于中国的实际，既要分析它的内涵方面，还要分析它的外延方面；既要分析它的历史状况、当前状况，还要分析它的外部状况、将来的发展状况。我们说，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 50 年代前期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并不等于说要重新完全回到 50 年代去，历史毕竟进入到 90 年代，无论从中国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状况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自己的，即使是一个时期正确的东西，也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搞经验主义、教条主义。50 年代的某些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不适应 90 年代的新形势，不能完全固守不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还包括要向前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总方针。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一个动态的、前进的、开放的、耗散型的思想方法。掌握这样的思想方法，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 （四）矛盾分析方法是否为线性思维方法？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科学方法渐渐地被移植到哲学上来，成为思维辩证法研究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对其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企图用系统论等取代矛盾论，有的贬损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是线性的思维方法。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直线性思维，提倡非线性、立体性、球面性思维。例如《矛盾论》，通篇贯穿了这种思维方法的特点，特别是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具体分析，堪称这种思维方法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矛盾论》是一部完整的高层次的系统论。说《矛盾论》过时了，企图用系统论取代矛盾论，这本身就不是非线性思维，而是十足的直线性思维。就毛泽东说，在《矛盾论》之后，他多次强调了非线性、立体性、球面性思维方法。1938 年 3 月，他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批评直线性的、平面性的认识方法，说，有人来到延安，看见山依旧是山，没有高楼大厦就批评这里没有建设。这是平面的看问题。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架照像机。他没有看见政治的建设，经济的建设，也没有看见军事的建设。对一切问题都要历史地联系起来看，不能孤立地看表面现象。1938 年 12 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展开他讲到曲线思维，指出：中国的河流都是朝东流的，然而也都是弯曲的，决没有一条直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弯路，而不是走直线；不管大事小事，总是采取曲线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的。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叫做走“之”字路原则。毛泽东虽然讲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作为对客观规律正确反映的思想方法，也是非线性的曲线式的“之”字路原则。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 1942 年 3 月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古今中外法”，要求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这是对立体思维的形象比喻。建国以后，在党的八大期间，他继续强调了立体性思维。他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说：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观点看农村，才知道“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1957年11月，毛泽东接见外国代表团谈话，进一步谈到了球面思维问题。他说：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譬如划一个圆圈，它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形的，但是把圆圈切开来，每一部分都是直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直的线，这是几何学上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对平面说的，而不是对球面说的。球面则不同，在球面上可以有許多线都是直的。地球上的经线不是都相等么？我们必须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这里虽然讲的是客观事物的球面问题，但它也说明了毛泽东认识问题的方法是球面思维而不是平面思维。列举上面数例，足以说明毛泽东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法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贬损的那样直线化、简单化、僵硬化。在他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时，他的思想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

#### （五）坚持群众路线是不是狭隘经验论？

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多年来不大宣传这个观点，也不提倡这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似乎这个观点过时了，这个方法也过时了。就方法而言，坚持群众路线被认为是“狭隘经验论”。这是一种糊涂观点，需要加以辨析。

首先，要正确地看待群众。即对群众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一想到群众似乎就是落后、愚昧、芸芸众生。毛泽东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矫在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是，“群众落后论”从思想方法而言也是一种片面性，应当克服。毛泽东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倒是一句真理。这里的群众就带有广义的理解了，外延很宽广，包括除主体自我之外的属于人民范围内的各个阶层的所有群众。它不单纯指张三、李四等群众个体。在认识主体自我之外，成千上万的群众作为一个认识群体，其中什么“能人”都有，才干多种多样，智慧无穷无尽。群体智慧在一般情况下无疑要超过个体智慧（超常个体在特定情况下发挥的超常智慧除外）。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体自我深入到群众的海洋中去，总结作为认识客体的广大群众的经验，发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群体智慧中汲取营养。这样的认识论，这样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狭隘经验论”，恰恰相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和科学手段。

其次，要明确认识主体的移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说，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原因。但是，讲坚持群众路线，这里的“群众”是作为认识客体存在的，因而还有一个认识主体问题，即谁来坚持？这就是某个具体的认识主体，例如从事某项工作的某位领导干部或管理专家。如果说坚持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会产生狭隘经验论的话，那就是这个具体的认识主体本身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认识主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个思想加工厂，不是照像机。他的加工设备不健全，加工能力不够高，没有进行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因而才产生有像狭隘经

验论这样的错误认识，如果这个认识主体是一个好的现代化的具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思想加工厂，即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善于加工处理信息，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汲取群众的聪明才智，那他就不会犯狭隘经验论的错误。因此，说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是狭隘经验论，是没有根据的。

再次，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在工作方法上还要完全采用最初那种纯粹手工业方式的调查手段。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引进现代化条件的操作手段，采取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并不要求机械地沿袭和照搬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规程。但是，改变某些具体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并不等于说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过时了。这是不同范畴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仅不反对改变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相反，如果采用一些现代化的先进统计方法和信息技术，使调查研究的手段不断完善化，那末，这还会使坚持这个思想方法获得更加全面的科学认识。

最后，坚持群众路线，并不排斥、妨碍智囊团、顾问团、咨询小组一类参谋班子发挥作用。这两者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坚持群众路线是讲的思想方法的根本原则，设立智囊团之类则是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法。只要明确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立足点或思想方法是什么，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不难解决的。一个时期，有用智囊班子、参谋班子代替群众路线，否定群众路线的倾向，这是唯心史观的精英政治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反映。其实，坚持群众路线与使用智囊班子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有的地区对这两者的关系就处理得比较好，既坚持了群众路线，又充分发挥了参谋班子的作用，逐渐实现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交流发达的状况下，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然要发生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原则。

#### （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土哲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探索哲学体系、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在一系列哲学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思想，而且深入到研究更为思辨的元哲学等问题了。不能说所提出的一切新观点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可能有严重的理论错误（至于涉及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属于政治性问题了，是另一回事），但这些年来哲学发展的主流是好的，提出问题开展研究是应当欢迎的。何况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高技术时代，科学方法论盛兴的时代，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现在来提倡、宣传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太土气了？又由规范哲学逆转为非规范哲学了？这又是一种糊涂观念。

思想方法论土不土，有一个参照系问题。毛泽东经常问他身边的同志，我们是否住在天上？我们算不算神仙？中国人算不算洋人？身边人都作了否定的回答。毛泽东开导他们说，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别的天体，他们是天上，但在别的天体上看我们，地球也是在天上；既然在我们看来往在别的天体上的算神仙，那么从别的天体来看，我们也住在天上，也算神仙，也许还是唯一的神仙；同样地，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因此，洋人这个迷信也要打破。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道理，活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灵。就“土”与“洋”而言，这是由于参照系不同而产生的，并非固定不变的，是可以移位的。一方面，要老老实实承认许多外国的洋东西比本国的土东西要好，例如在技术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就有不少洋的比土

的先进，我们要学习、引进、吸收，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外国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拿过来；但是，另一方面，崇洋意识、自贱意识也要反对。近百年来，我们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后，在打破封建社会的长期封闭性的同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在一部分人中滋生了媚外心理，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如鲁迅所讥讽的，连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土哲学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确实讲过，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但这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词，而不是自贬之词，丝毫不认为洋哲学比土哲学高明。因为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洋哲学，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观点，批评了我国的哲学教学。事实上，不仅毛泽东的“土哲学”不比“洋哲学”差，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也不比“洋哲学”差，如周易哲学、孙子兵法这些“土哲学”不正在世界上“走红”吗！洋人比我们中国人对这些“土哲学”的兴趣更浓。中国的许多“土哲学”正是目前世界哲学研究的“热门”之一。当然，在毛泽东哲学里，包括他的思想方法论，在个别具体问题上确有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从总体上说，是自成体系、别具一格的。如果不是出于自损自贬，说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土哲学”也不是不可以，像毛泽东本人自谦那样。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哲学，正如黑格尔哲学带有日耳曼民族的思辨性特点一样。因此，提倡学习毛泽东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不是什么逆转，只是强调学习他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至于一些具体论述，个别论点，完全可以引进规范术语加以准确、严密的阐明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完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论。

#### （七）思想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是什么关系？

简言之，思想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是对立统一关系。说它们是对立的，是因为它们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问题。思想方法论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则如前所述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产生的具体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因而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无法取代。说它们是统一的，在于两者都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殊途同归；再则，两者具有互补性，如前已指出的矛盾论实际上是系统论的哲学基础，系统论的方法也丰富了矛盾论的认识。因此不能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既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取代思想方法论，也不能因有思想方法论就贬低、否认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作用。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具有开放系统功能，它能不断地吸收这些新的具体科学方法论来丰富、补充和完善自己。毛泽东本人谢世了，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个研究任务。

以上对毛泽东的一些主要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其指导思想在于对毛泽东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思想方法论予以基本肯定。这是针对前一个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包括他的思想方法论否定过多而不能不作的必要的辨析，以期矫在扶正，而不希望发生新的另一种倾斜。当然矫在可能导致过正，甚至会发生某些过正，但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新的过正是可以防止和制止的。肯定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方法，对他的某些思想方法作必要的辨析，并不是说，他的所有的思想方法都绝对正确，没有一丝的不科学之处或包含某些错误的成分，例如他晚年强调的“斗争哲学”之类。即使在理论上

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在实践运用中也有失准、偏离正确方向的，何况在理论上已有某种偏差，在实践中运用就更会发生错误。任何真理都有一个“界限”或“度”，把真理再向前推进一步很可能陷入谬误的深渊。我们既要反对因毛泽东晚年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而否定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要反对因肯定阶级分析方法而把他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当作正确的加以维护。“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先生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这个话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毛泽东最初肯定“斗争哲学”，是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上来讲的。但是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视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因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自此以后，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的思想方法，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是惨重的。因此，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要作具体分析。列宁说，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灵魂，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灵魂。

（写于1990年春，收入本书时有个别修订）

##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历史透视

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多少年来，它对教育干部学习理论、增强哲学修养、提高政策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纪念建党 70 周年之际，重新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探讨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的历史考察。

## 一、“思想方法论”概念和立场、 观点、方法的思想

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功绩之一，是使思想方法论成为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问。但是，“思想方法论”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或使用的。

就目前涉猎到的国内文献看，就马克思主义学者说，瞿秋白使用“思想方法论”概念较早。1923年。他由苏联回国后即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工作。1924年6月，他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作《社会科学概论》的报告，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谈到了思想方法论。他说：“哲学的发展每每是当代阶级关系的反映，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然而哲学的分化已经只剩得认识论、逻辑学、互辩律——综合各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其实是‘科学之科学’，哲学可以说没有了。不过这种综合的总科学——总宇宙观及社会观，必然存在的，还要日益精密的发展进步。”在这里，尽管有的表述还不很准确，但“思想方法论”概念的内涵是明确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同义语。

艾思奇也是较早使用“思想方法论”概念的学者之一。1936年11月，他出版的《思想方法论》小册子，可能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第一本关于思想方法论的专著。它与作者的《大众哲学》可视为姊妹篇。如果说《大众哲学》主要是以日常生活来举例说明较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么《思想方法论》则多是从方法论角度来浅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明白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什么，并且能够实际运用”，因而“要对这种方法论给与一种解释”。为此，作者“从本体论、认识论、论理学等各方面讨论了思想方法论的问题”。他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些基本观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思想方法论就是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克服错误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历史发展到当今，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去代替它；思想的方法论与行动的方法论是同构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一定能够转化为正确的行动的方法，并要用实践来检验；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最高级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要求“背诵经典”，而要求“把原则在具体事实中去活用”，“在客观事实中去发现活的真理”。不难看出，尽管艾思奇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具体化为思想方法论的若干原则，但他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当作思想方法论来认识所进行的理论命题的转换，及其阐释问题的视角，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延安时读了《思想方法论》这本书，并作了少量批注。艾思奇的上述观点对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研究思想方法问题，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不能不发生一定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论在形式上不能割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思想方法论研究的历史联系，那么，作为其内容的核心思想，除了直接根源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外，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

---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89页。

《思想方法论》（1937年版）第145页、17页、137页。

《思想方法论》（1937年版）第33—34页。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1—452页。



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一脉相承。

毛泽东倡导思想方法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针对从中国共产党内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产生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提出思想方法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不是单纯地从理论视角来讲思想方法问题，而是紧紧地围绕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来加以阐释。这是一个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斗争状况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思想方法论的本质内涵，也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讲的思想方法论的重要区别。它既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深刻性，也展示了这个思想方法论的伟大革命意义。

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亦并非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讲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不仅指辩证法，也包括唯物论；不仅指辩证唯物论，也包括历史唯物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阶段，如何用理论去指导革命实践的任务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展开阐述其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列宁走上历史舞台面临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对的高潮时期，在资本主义不太发展的俄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上了历史日程。这需要从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革命任务，制定革命策略。对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内部出现的意见分歧，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派采取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诡辩。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如果准认为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意见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

斯大林虽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在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进一步强调正确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第一次提出，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不要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应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来应用，掌握它的实质。他还概括出了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提出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立场问题，是它的阶级性、党性原则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观点，即唯物主义“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从他们的思想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4页，第2卷第398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273页、220页、222页，《斯大林选集》上册第571页。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轨迹来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这个思想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把立场、观点、方法三者并联在一起加以倡导，而且进一步提出思想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思想基础。

## 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的提出 和最初的思想方法论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算很早，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最初也不是很多。早年的毛泽东既受过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教育。但是，贯穿在毛泽东求知过程中的一根红线，是追求真理，寻找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或学习思路，他能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五花八门的主义，进行推求比较，迅即抛弃一切非真非善、不能拯救中国的学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探求正确认识方法的思路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毛泽东是在 1920 年底至 1921 年初才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如同过去求知那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对它不是采取学理主义、教条主义态度，而是不仅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知识，更重要地是把它当成一种方法。他回顾说：1920 年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有些不很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就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这个回忆说明，毛泽东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毫无书生气，一开始就能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所谓“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他后来倡导的“思想方法论”的萌芽。

毛泽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之后，就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使他一方面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写的一系列论著，不仅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于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指导，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创立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进行了一些哲学问题的思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功能，逐渐地形成了一些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文献主要有四篇：

一是 1929 年 6 月 14 日致林彪的信。当时正值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红四军党内军内的思想比较混乱，高级干部对一些重大方针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身体不好，请求离开前委并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和休息一段时间。林彪当时是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的，曾写信表示挽留。6 月 14 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介绍了红四军党内一年来争论的情况，阐述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仅认为四军党内的争论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他说：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一些错误观点泛起，是“历史上

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如果要讲毛泽东何时使用“思想路线”概念的话，这可能是最早使用。毛泽东还从哲学认识论上对形式主义之类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时四军的一个重要争论是军委与前委要否分权、党代表与前委书记要否分开。毛泽东是反对“分权”和“分开”的，认为“分权”和“分开”论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看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这里，毛泽东的哲学道理讲得虽不甚充分，但表明了他注重求实、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

二是 1929 年 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诸多错误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这个决议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也初步地展现了他的某些思想方法。他着重阐述了两点：

(1) 反对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这里讲的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古田会议决议原稿也是用的“唯心主义”提法，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才改为“主观主义”），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毛泽东说：“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障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还指出克服唯心观点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单纯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定性上要求的，也是总结了他以往实践活动的经验。在大革命时期，他对农民运动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调查。他对大革命运动所持的正确方针就是受了这种调查的深刻影响。他在八七会议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他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都是在此之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在井冈山开展斗争，以及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他都坚持调查研究。古田会议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对大革命以来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

(2) 注重群众路线。毛泽东多次讲过，群众路线的思想来自列宁。“不过他们没有这个话，总是讲依靠群众”。我们党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的。（1928 年 11 月李立三同江浙地区负责人的谈话和 1929 年 9 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都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提法。）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一切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决议之下，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正是贯彻“九月来信”的精神。虽然这时主要是在工作方法的意义上使用“群众路线”的，但也蕴含着思想方法的意义。

三是 1930 年 1 月 5 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是毛泽东致林彪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对时局前途的悲观思想，帮助林彪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不仅从诸多方面说明了中国国情，还具体分析了林彪对时局悲观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毛泽东阐述了四个问题：（1）正确认识主观力量与客观条件的关系。他认为，林彪对时局悲观是小看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统治阶级的政权、武装也是弱的，这是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原因。（2）正确认识形式（现象）与实质的关

---

1948 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553 页。

1958 年 5 月 17 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系。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若从形式上看，革命力量大力削弱；若从实质上看，它不仅具备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物决然的是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方法”。有悲观思想的同志则是没有掌握透过形式抓住实质的思想方法。（3）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诸多矛盾关系。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革命高潮如何认识，“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并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十多种矛盾关系。这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卓越运用。（4）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批评了对革命的悲观情绪之后，还批评了急躁情绪，指出：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不要作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中国革命“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高瞻远瞩的思想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单纯是党史文献，也是毛泽东的最早的思想方法论论著之一。

四是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最早讲思想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作。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态度。具体来说，它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在于：第一，毛泽东既批评了“以为上了书本的就是对的”的“唯书”观念，也批评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执行领导机关指示的“唯上”态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执行决议，因而在实质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阐明了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和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思想方法的地位。第三，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群众路线的作用，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样，群众路线就具有了重要的思想方法意义。第四，毛泽东批评的“本本主义”，也包括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和神圣化倾向，针对这些倾向，他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第一次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初具雏形。

### 三、《实践论》、《矛盾论》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系统的建立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最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刻苦，其哲学思想走向成熟，是在延安时期。经过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反思和总结，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他实现了其哲学思想的第二次飞跃。在五四运动前后，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他的第一次思想飞跃。在延安时期，以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论著为标志，则是他由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的飞跃。这次飞跃，是他长期投身中国革命斗争，根植于人民大众，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其哲学思想的飞跃，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系统。

《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两论”不单纯是哲学原理性著作，同时也是思想方法论著作。“两论”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在于：

第一，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系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很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因此，他写作“两论”，既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基本原则的哲学根据。“两论”不是脱离实际的纯粹抽象的哲学理论著作或学院式的哲学教科书，而是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方针，通过阐述哲学理论教育干部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因而它阐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系列哲学观点本身，或是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是为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三，展示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革命功能。“两论”前的哲学读物，包括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等书，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来讲哲学理论或思想方法论不够，仅做到了哲学的通俗化而没完全做到哲学的现实化。“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两个特点，因而也充分地展示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革命功能。

第四，开创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写作“两论”，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时，努力赋予它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两论”不仅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树立了典范，也使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两论”之后，毛泽东继续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哲学问题，他的思想方法论思想也在继续发展。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时期。他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干部，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若干原则，初步地形成了他的“思想方法论”系统。

延安整风的思想发动阶段从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用马列主义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并明确地提出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命题，他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显然，这个说法是继承了马、恩、列、斯的思想。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与方法的思想，强调必须坚决地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并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原名《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运用的关系，严厉地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主观主义者。他在解释什么是理论家时，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当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这不仅使长期不完整的提法完整化，而且概括出了思想方法论的精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毛泽东逐渐地形成“立场、观点、方法”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建构思想方法论系统的过程。在整风运动开展以前，毛泽东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论”的概念。整风运动开展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党的思想领导，在1941年8月末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9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毛泽东提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9月下旬，中央又决定各地成立高级学习组，在研究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这以后，“思想方法论”的提法被广泛运用。

为了教育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论”，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他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把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具体化为思想方法。他阐释的主要观点有：

（一）一切要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已阐述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就解决了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出发的问题。在这篇报告中，他解释说：理论、观念、概念、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看，实践是证明真理的标准。这叫做唯物论。但有些人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主观幻想出来的“理论”出发，或者从马恩列斯的本本里找些道理，把外国的东西生硬地搬过来当现成的用，不加以研究消化，不管行得通行不通，造出许多乱子来。他指出：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的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必须坚决反对。

（二）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毛泽东说，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要看现实的各个方面，不能只看一面，把局部当成全体，犯片面看问题的错误。对现实的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认为，对立和统一，分析与综合，这叫做方法论。找出矛盾的对立，叫做分析。将一部分一部分

---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27页。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42页。

的分析再加以综合，这就是对立的统一。真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把客观实践分析清楚了，就能获得真理。这样，毛泽东通过对分析与综合的解释，把认识论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为了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做调查研究最根本的是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继《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了阶级调查问题。他回顾自己掌握阶级分析方法的经历说：小时候长住农村，看见人就只知道是人，不知道有阶级。后来读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回去再观察就变了样子，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农民还要分析，对工人也要具体分析。他批评不重视调查研究的状况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那样的神气，却连人家地方有多大小，究竟强弱如何都不知道，这是一种危险。这种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闭着眼睛捉麻雀，不但要亡党亡国，而且要亡头。据此，他指出，分析各社会阶级的特性、特征、特点，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与区别点，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四）不要做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理论是要学的，但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还说：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很容易的，但只会读不会用，就是把它背个烂熟，那连一文钱都不值。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学而无用就叫做“无的放矢”，我们要做“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放中国的“的”，这样，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目的和在中国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在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虽然没有对所有的思想方法一一展开阐述，但是已经建构起了思想方法论系统的初步框架。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毛泽东继续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层面上阐发他的思想方法论，使初步建立起来的思想方法论系统逐渐地得到充实、深化和完善。

关于矛盾分析的方法。毛泽东继续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如果不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有些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因此，他告诫全党同志，对于任何问题都应取分析态度，“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关于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精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他把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相统一，认为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不仅使长期只被认为是普通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具有了认识论意义，而且使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了。这样，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既具有实践论的基础，又具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系统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

1943年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235页。



关于独立自主的方法。通过整风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强调了独立自主政治原则的思想方法意义。他说：“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他要求强化独立自主意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开展全方位的研究，为制定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准备。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是把思想方法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的。在1942年2月底的一个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毛泽东将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规定学习“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学习材料”。虽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学问，但把思想方法论视为思想科学不能说没有道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议并负责编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读物。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广大干部通过整风学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空前提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四、建国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发展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发展朝着两个不同层次的纵深方向进行：一是向着哲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强化和扩展了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一是向着实践的运用方面，充实和丰富了具体的领导工作方法。这样，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既更富哲理性，又更具实用性。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宏大工程，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这既有实践与理论的背离，也有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反映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不以曲折的形式向前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成果有：

（一）通过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个讲话（简称“两个讲话”），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这两个讲话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巨著，也是思想方法论原则卓越运用的煌煌大作。

首先，“两个讲话”，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的典范。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几年在一些领域、许多方面仿照了苏联的一些办法。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借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先是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接着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理论。“两个讲话”堪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

“两个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在这以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失误的总结和对我国社会实际的分析，指出：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进行认识的思想方法总论。根据这样的方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初步地建立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系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等等。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两个讲话”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对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卓越运用。毛泽东首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从认识论上说，这个方针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来共同进行的思想，因而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在政治上也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思想方法论上说，则是在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事实上，“两个讲话”贯穿了“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的思想，生动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论。

“两个讲话”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独立自主思想方法的具体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也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的必然结论。这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两个讲话”的独立自主思想表现为：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一些初步设想；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为中国所特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个讲话”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将思想方法具体化为工作方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比较早地就重视工作方法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先后提出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健全集体领导、书记要当好“班长”以及“弹钢琴”、讲究领导艺术等工作方法。建国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毛泽东从1958年春天开始不断地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除了有正确的路线之外，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他先是在1958年1月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年之后，1959年4月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他强调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有：一切经过试验，通过典型示范，推动面上工作；抓两头带中间，开展评比，激励先进；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开展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开现场会，就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多谋善断，听取不同意见，谋于广大群众，抓住时机，善下决心，当机立断；留有余地，考虑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有备无患；波浪式前进，在工作上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有快有慢，有张有弛；等等。

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还对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关系作了理论的阐述。他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从理论上讲，方法论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环节，包括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思想方法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而言，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求站在正确的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46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理论、方案、政策和办法。世界观在向方法论转变时，首先直接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变为其他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世界观转变为具体方法的中介。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它侧重于要求将理论、计划、政策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两者相比，思想方法对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起着决定作用。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工作方法的实质仍然是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关系的思想，为思想方法论的深化和细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在思想方法理论上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思想。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是毛泽东对思想方法理论作哲学思考比较活跃的时期。他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他说：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大胆创造。当然，由于那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夫实，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离，毛泽东所想的、说的、做的不一定都对，也出现了把科学当迷信破除、把真理当谬误批判的错误，特别是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那时发生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思想方法不对头），对于那时的理论与实践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大跃进”错了，就一切都错了。就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而言，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说，他强调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还是可取的。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他能在哲学王国里自由翱翔，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实现某些思想方法理论问题的升华。

首先，毛泽东阐发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方法论原则。例如，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认识客观规律，逐步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1960年6月的《十年总结》中，他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有一些形而上学，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逐步地克服盲目性，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为了获得这个“自由”，他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他继续倡导群众路线，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在1964年9月致刘少奇的信中，他对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新的表述，指出：简单他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认识论与真理论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了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意义。

其次，毛泽东还对哲学本身从总体上作了一些反思，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还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出：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在1960年3月的天津会议上，他还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以后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年5月，他在

杭州会议上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的一次哲学谈话中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他要求全党应该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同年12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刘少奇说：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当然，这里讲的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即包括总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上指整个哲学。此外，认识论还有狭义的研究对象，即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毛泽东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是指前者。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强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为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方法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也使他强调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根据。

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倡导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论系统，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从理论上讲，强调思想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更加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从社会实践的效用看，强调思想方法论更能使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使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具有异常无比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在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如何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现成答案；另一方面，我们党又有理论准备很不充分，干部的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度过了重重困难和挫折而向前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昂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有什么奥秘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掌握和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陈云在1987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不仅概括了我们党在毛泽东的教导下长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揭示了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而且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原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做了少量增补）

##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

在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地转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巨著，同时也是思想方法论原则卓越运用的煌煌大作。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体现了革命时期的思想方法论，那么这里所研究的两本著作则可以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至今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 一、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 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参照苏联的办法。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实际上是当时我们党的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先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大多基本上采用苏联模式。对于苏联经验，经过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之后，虽然中央领导人已有一些辩证思考，但在实际工作的不少单位看来，参照就是照抄照搬。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认为，第一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抄”；第二不满意，搞经济建设已有几年了，苏联的好经验对我国的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抄”过来后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建设。他说：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和苏联建设工作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后，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重申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论原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批评教条主义说：“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他列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时还指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的“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通过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和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于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对于这个思路，他一直比较满意。他后来多次说过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

---

毛泽东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19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298页。 487

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在主要的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确定后，毛泽东又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政治关系。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于 1957 年 2 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讲话，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理论。这部著作从思想方法论视角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 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失误的经验教训的分析和对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否认并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他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方法总论。根据这样的方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所谓《论十大关系》，就是分析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十大矛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五大经济矛盾。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主要属于政治矛盾系列。《正处》讲话对客观现实存在的政治经济诸矛盾作了进一步分析，在更高层次上概括了《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初步地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系统。

这个理论系统的基本观点是：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斯大林晚年虽然羞羞答答地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矛盾，但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言，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正是这个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是根本不同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彻底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来说，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来解决。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定矛盾，在实践中则混淆矛盾。毛泽东批评这种错误指出：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和“要分清敌我”，实际上已蕴含了区分两类矛盾的思想。在《正处》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

---

毛泽东 1956 年 6 月 28 日在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56 年 9 月 27 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盾，属于非对抗性。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矛盾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愈益上升为主导地位。在上述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除“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外，其他四种政治关系和五种经济关系方面的矛盾，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或“总题目”，刘少奇则直接称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表述不一，基本意思却是一个，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还要作具体分析，例如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虽然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正确政策，实际上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矛盾角度看，就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和劳动人民内部这两个层次的矛盾，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尽管这个理论还未公开提出，但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正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

（四）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从哲学理论上说，这是在《矛盾论》中已经阐明了的思想方法原则。在《正处》中，毛泽东把它运用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对敌我性质的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则用民主的方法。为了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强调要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一系列具体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处理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对于解决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毛泽东都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墓本直针是 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卓越运用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名义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他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仍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力量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前面已经指出，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组织路线；既是工作方法，也是思辑方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高度统一。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来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所有能参加的人都参加这个事业，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动力来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强调广大工农群众是基本的依靠力量，同时又广泛地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包括要处理好建设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关系，因而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是这个方针，从认识论上说，又体现了视社会主义实践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来认识，因而它更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政治上也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思想方法论上也是在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说：

“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又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说《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体现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还不仅仅是从“基本方针”和“总题目”而言，也贯彻在其具体内容中。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强调“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上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思想；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强调“一要看，二要帮”，“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的思想；又如在《正处》中，强调“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的思想；对于国情的认识，强调“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

---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329—330 页。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299 页。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 年 7 月。

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等等，无一下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论的生动体现。

#### 四、强调走自己的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具体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的三位一体。独立自主，最根本地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而要完成这项事业，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独立自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的必然结论。

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中的独立自主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根本对立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追求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其所付的代价异常沉重。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的老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既是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对苏联工业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后总结出来的，在《正处》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的这个比较说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形成的思路。

（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初步探索。建国之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思想，就是要改革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经济体制。随后，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三）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苏联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党制，我国实行什么体制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是一个需要明确的大问题。《论十大关系》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在此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正处》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的，

---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也体现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而且是参政党，在世界上像这样特殊的政党政治体制是罕见的。

（四）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双百”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在《论十大关系》发表期间和《正处》中提出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我国的科学文化领域也受到了苏联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仲学派，例如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的李森科学派，禁止西方的摩尔根学派；在学术讨论中，对不同意见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严重影响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正处》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之后，不仅受到国内的干扰，在国际上也被曲解。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舆论，都把它视为“自由化”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这个方针。尽管在五十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并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正确方针。

## 五、从宏观上另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我国的阶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现实之后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马、恩的本本里没有讲，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错误。在《正处》中，毛泽东坚持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对我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评估，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从国内来说，还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从国际上看，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的上述这些论断还是有客观依据的，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战略性的思考。虽然在这之后他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地偏离了正确轨道，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那与《正处》是两回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几十年来阶级斗争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汲取了毛泽东在《正处》中阐发的正确思想理论。

有一种说法：《正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这是对《正处》中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的误解。从思想方法上说，它既忽视了《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又将《正处》中的论述与《正处》之后的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混淆了；并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的核心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它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主要任务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这里关于主要任务的论述是由主要矛盾的思想引发的。因此，不能说，这些思想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毛泽东所以没有沿用“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因为在“八大”之后党内外已经有人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提出异议，理论界也在争论它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时这个表述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有缺陷，需要改换一个更为科学的说法。出于这样的考虑，也包括要继续对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进行观察，毛泽东较为合理的选择是，阐发“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实质，而不采用其具体表述。

能否说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断，就意味着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不能。因为关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激烈性，以及“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说法，是对阶级斗争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近两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事变使我们更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以及它的长期性、曲折性、激烈性等，并不意味着就承认它是主要矛盾。我们现在也承认其长期性、曲折性等等，但并不承认阶级斗争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反右派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之后的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6月正式发表《正处》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只有三个月，但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三个月。就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越，超过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步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因此，也不能把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前移上溯至《正处》。“源头”论，既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实际。

《正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分析，当然也有不完善、不周全、不准确、缺乏量化分析的不足，但是总的来说，基本的理论认识在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原则。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



## 第四编

### 略论毛泽东 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个人持质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过程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届绝大多数领导人也可谓一代英才。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创立史时，我们不能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要由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卓越结合，创立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呢？这不能不说，与他个人的经历、品格、气质、学问、胆识、智慧、才干、修养和经验等等有密切关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史，着重研究其创立的各种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是需要，但是只研究这一方面而不研究创立主体的主观因素是不全面的，也回答不了上述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个人的一些基本特质对创立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试作一些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与研究同仁们切磋。

## 一、毛泽东与中国农民的天然关系，有利于他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家祖辈务农，父亲精明能干，发迹为亦农亦商的富农。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度过的。他从小参加农田劳动，主要农活样样都会，13岁时就几乎被当做一个整劳力干活，是个农家好小子。他在家乡农村生活了17年，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并开始思考农民问题。他看了《三国》、《水价》，能提出书中怎么没有写农民这样的疑问。两年后他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这些达官贵人。湖南农村同其他地方一样，农民生活困苦，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在毛泽东家乡附近，就先后爆发过湘潭和湘乡农民的造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即毛泽东17岁那年，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还波及到了韶山。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了，但使他深受震动。在母亲善良慈爱的品德的熏陶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下，毛泽东自幼就同情贫弱。这件事更驱使他后来做事要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中不乏农民出身者，在政治家和理论家中或生长在农村，或从事过农民运动者亦有之。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像毛泽东这样的经历者几乎没有。这个身世对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极大影响。因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诚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就是解放农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可谓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在家乡生活17年的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打下了深厚基础。

---

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党的七大的报告。

## 二、毛泽东极高的领悟能力，有利于他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学习马列理论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能刻苦学习理论，不断从中摄取营养，获得理论武装。他是在 1919 年 12 月第二次从长沙到北京以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才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但在当时他并没有决定自己的信仰。他同其他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也受到其他种种新思潮的冲击。1920 年 3 月 14 日，他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当时的许多种主义中，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们较多地拿来作比较和选择的是这五种主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种主义中，供选择的不再有原来的资本主义，而都是要替代（至少是矫正）资本主义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种种主义加以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最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 1921 年 1 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随后，函告在法的蔡和森等，说陈独秀等已在组织共产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样，他就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此以后，他对这个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并且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在井冈山和长征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如饥似渴地找马列书籍来读。他说过，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到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他就“发愤读书”，异常刻苦地研读马列理论，特别是有关马列哲学的著作，他早年就喜爱研究哲学，这有利于他的抽象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写了大量的读书批注，仅现存的延安哲学批注和摘录文字就有 26000 多字。

毛泽东学马列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学得刻苦但不死板，没有学理主义、教条主义习气。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里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不大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又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特质，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

---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我们不能将毛泽东与列宁简单类比。但如果毛泽东不具备这一基本品格，就很难创立毛泽东思想。

### 三、毛泽东学员中西，通融古今，为他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毛泽东的家不是书香门第。但他进过私塾，读过洋学堂，既受过6年的国学灌输，又受过7年的西学教育，他酷爱读书，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成为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10多年“寒窗”之中，他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严译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的英雄豪杰也异常敬仰。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青黎的进化论、日本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泡尔生的新康德主义等等，都在他那计算机似的大脑里兼收并蓄起来。但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毛泽东更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的传统文化。在他的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以后，这些文化知识并没有成为他思想进步的障碍。他对书一贯不死读，而具有批判意识，并把读书作为寻求真理、获得正确认识方法的一个手段。他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这样的读书方法，逐渐培育了他对以往文化知识实行改造制作、去粗取精的能力，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他读过的古今中外书籍，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般都可能涉猎，但像他这样去驾驭和运作知识，则不多见，这又是他的过人之处。

毛泽东思想及其基本理论无疑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而使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思想文化来源。

#### 四、毛泽东注重社会实际调查，对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决定意义

1913年下半年，20岁的毛泽东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转向推崇王夫之、顾炎武等主张“践履笃计”的“实学”，注重“求实”精神，萌生了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的思想，1917年暑假，他邀同学“游学”，步行千里，考察长沙周围五县的历史地理，了解社会风情民俗，调查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使他对社会实际问题 and 国家实际状况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次年，他在师范毕业后，不仅积极关注和思考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当许多同辈青年出国留洋时，他谢绝了许多人的再三劝说，执拗地要留在国内，尽管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友旅欧勤工俭学。其实，他当时也并非不想“出洋”。但是，他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了解清楚，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这样考虑问题的思路是他的一个显著优点。

毛泽东要对这个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国地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以后，即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从1921年手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抽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社会其他各色各样人物。他写的调查报告等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还没有另一个人像毛泽东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特殊品格，加上上述其他特质，决定了从主观条件方面说，主要由他创立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的。

（原载《党史天地》1993年第11—12期，收入本书时修订了文内标题）

##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 集体智慧的结晶

### 一、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的观点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在党的七大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本人从来不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他个人智慧的产物。早在 40 年代初期，当毛泽东思想概念被提出的时候，他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在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他还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是坚持了这个观点的。1960 年底，他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在文件论述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的地方，亲笔增加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语。1964 年 3 月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也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79 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被看成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因为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党领导下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国革命的理论就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伟大的革命理论，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样的总结既不可能是毛泽东同志、也不可能是别的同志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历史的革命经验，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在领导党和人民的实际斗争中，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对革命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同志经常把自己和中央领导机关形象地比喻为创造精神产品的加工厂，认为思想、意见、计划、方法都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自己写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产品，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 二、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同志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我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在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之后，就各自地在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自从党成立以后，许多领导人都在探讨。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和反帝反封建等问题有过重要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入研究，大大地发展了我们党以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些不太系统、完整的思想；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对党的许多领导人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科学总结。

第二，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被毛泽东汲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的内容。例如，1929年秋，周恩来同志主持下，陈毅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其中不少重要的思想内容被毛泽东同志吸收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之中。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等文章中也加以吸收。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其他同志一起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加以理论概括，形成为完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张闻天同志1948年9月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是我党最早比较展开地分析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经济构成问题的重要文献。他论述的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也加以吸收，明确地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形态。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为毛泽东同志提供过这种形式的思想资料。

第三，他们参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些著作就是毛泽东本人和他们一起合作写成的。我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党的领导人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陆续地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周恩来同志比较早地参与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自从井冈山会师之后，就始终并肩战斗。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地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同志参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形成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经过了党中央的集体讨论，特别是有关党的路线、重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决策，凝聚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例如，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同志吸取大



家的意见修改定稿。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就是在1958年初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由毛泽东同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共同汇集起来的。他本人谈到这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形成过程时说得很明白：“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第四，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这些或那些方面的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作了精辟的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去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例如，周恩乘和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论述，周恩来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刘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论述，朱德同志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等，有许多内容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这些论述既贯彻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根本原则，也同毛泽东本人正确地论述到这些问题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此外，党中央一些关于总结革命经验，提出重大理论原则，制定重要政治的、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发生过重大影响。

### 三、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

一方面，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历史决议》说的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说明：第一，对党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虽然其他领导人也做过概括，但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概括起来的。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某些卓越见解，毛泽东同志吸收之后都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他的著作之中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引述。第二，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内容虽然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科学著作中也有反映，但它的主要内容却反映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大量地是他本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独立写成的。《历史决议》论列的43篇著作，只是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代表作。还有许多没有列上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的所有科学著作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

（原载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收入本书时做了增补）

## 再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笔者在一年多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就这个问题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但言犹未尽。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还因为对《历史决议》这个论断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既然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就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还应当包括其他领导人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思想，它除了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之外，还体现在其他领导人的有关的科学论述之中。另一种意见认为，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和人民的集体经验，吸收了其他领导人的正确思想，这是就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著作的来源而言的，而不是就毛泽东思想的组成而言的，因而强调毛泽东思想只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不包括其他领导人的有关的科学论述。两种意见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两种意见的分歧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问题，实质上是对党的集体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历史决议》说：“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指毛泽东思想——引者）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就把这两者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也是对“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正确解释。因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总战略和各项政策，既然是共同制定的，那么，它除了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外，也不可能不表现在其他领导人的科学著作之中。根据《历史决议》的这个正确解释，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科学论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 一、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上看

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上看，党和人民的集体经验、集体智慧是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长河的源头。毛泽东同志在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集中了党和人民的智慧和经验（包括其他领导人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了关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自己曾经说过的这样的意思：我的思想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他常说的所谓精神产品的加工厂，也是同样的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除了加工来自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原材料、人民群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提供的思想半成品以外，还应当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汲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卓越见解（例如，1949年3月写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经济纲领的论述，就汲取了周恩来同志1948年6月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朱德同志1948年8月写的《门才干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张闻天同志1948年9月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刘少奇同志1949年2月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讲话等材料中的许多深刻的思想），也应当包括在毛泽东同志与其他领导人共同研究讨论后以他的名义提出的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决策，以及主要由他执笔写成的著作（例如以前文章中提到的《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等）。

## 二、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来看

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来看，它并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和科学论述，还应当包括党的其他领导人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思想和他们的有关科学论述。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作如此界说，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这是它与学术思想史上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重要区别。《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表示过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这样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应当包括其他领导人的思想。1960年编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建议编辑刘少奇同志的选集，刘少奇同志不同意编他个人的选集，提议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既收入中央发表的文件，也收入毛泽东同志之外的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文章。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也体现在其他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文章中。无论编辑刘少奇同志的选集，还是出版中共中央文集，都是为了宣传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为了突出某一个人。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才同意中央的决定，编辑出版他们的著作。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过程来看，尽管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演变而来，但在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却一直是把毛泽东同志当做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来看待的，而并不完全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只体现在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著作之中。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较早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看做“思想体系”的，也是代表全党最早地肯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他认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又说：“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此外，他还明确他说：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述，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还应当包括在党的许多文献和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论著里。这就是说，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上，还表现在毛泽东思想的组成上。正如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一个集体，而不只是一个人一样，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也是革命领袖们的共同的科学思想。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实际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共同的长期斗争中朝夕相处，他们的许多思想观点互相启发，彼此补充，对不少问题有着共同的认识，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基本理论。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并不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包揽无遗的百科全书，它更多地是从总体上，在主要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的总结，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包括异常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各个

方面的经验。比如，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刘少奇同志在党员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方面所进行的论述，对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理论作了重要补充，两者结合，相得益彰，构成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再如白区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都在白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我们党开辟白区工作的杰出代表，积累了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他们的著作中，总结的如何建立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利用矛盾、反对主要敌人，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上层斗争与基层斗争相结合，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相结合等一系列关于白区工作的基本理论、原则、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但白区工作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军；白区工作经验是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的一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到中国来，不仅学习武装斗争的经验，也学习白区工作的经验，在许多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总是推荐周恩来同志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关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的情况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更是这样。例如，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科学文化工作、知识分子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论述，刘少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论述，陈云同志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论述等等，或者对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许多观点做了重要补充，或者丰富了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观点做了精辟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观点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加上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便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比较充分、比较丰富的内容。现在有的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认识，这是与没有把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许多卓越思想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有关的。

不仅被毛泽东同志肯定过的其他领导人的有关正确思想应当纳入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就是当毛泽东同志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其他领导人根据他所倡导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尽管被毛泽东本人所否定），也应当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为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贡献，不能以毛泽东同志个人在某个时期的肯定与否为转移，而只能看它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是否给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内容。有的领导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正确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那里发挥出来的，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内容，从理论的分析上也可以想想：既然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背离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所犯的 error 不应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把其他领导人符合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正确思想看成是毛泽东思想呢？表面上，这是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逻辑。只要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就应当承认，即使是毛泽东同志在某个时期反对过的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正确思想，也应当算在毛泽东思想之列。

有的同志提出疑问，如果把其他领导人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正确思

想都列入毛泽东思想，那么，哪些领导人的正确思想算，哪些领导人的正确思想不算？扩大之后，似乎就没有了界限，不好把握。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做出科学的总结，是一件异常艰巨的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只有那些革命经验非常丰富、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很高的领导同志或思想家，才有较多的机会和条件进行这样伟大的创造。我们党 60 多年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后的历史证明，在理论上，能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并使自己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正确思想汇入毛泽东思想长河的党的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周围的战友们。把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看作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同时把其他领导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论述也看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不会影响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证明了我们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提出集体智慧这个概念的本来意义上，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 三、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来理解

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来理解，我们都承认毛泽东思想会向前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既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发展，也包括他的战友、学生和后继者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发展，无疑是毛泽东思想，那么，由他的战友、学生和后继者所作的发展，算不算毛泽东思想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正如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也还是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同属一个道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学生和后继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情况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既然肯定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也还属于马列主义，那么，由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学生和后继者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特殊贡献，使毛泽东思想本身得到的发展，就更应当纳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内。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学生和后继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只包括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著作。毛泽东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源远流长，下会凝固，不会没有发展。事实上，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实践上，在理论上，都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

任何一个革命理论，只有不断向前发展才会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作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也是这样。一方面，它的基本原则——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会永远起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每一个创造性的总结，这个结合所表现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某些理论也会发生改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做好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把毛泽东思想体系推向前进，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

（原载《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 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从而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是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还是在取得政权后进行建设，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群众去夺取胜利。

## 一、群众路线思想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富有特色的创造，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依靠这条群众路线，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国内外统治者的重重压迫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当然，群众路线同毛泽东思想的其他观点一样，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和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曾明确地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十大政纲中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但是，从目前查找到的文献资料情况看，当时的中央文件或中央负责人的讲话，都还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李立三同志在1928年11月根据六大的路线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虽曾提到“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用语不太明确。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下，起草（陈毅同志参与执笔）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这才使“群众路线”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一节中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30年3月，在《中央给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切工作中应尽量采取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指出：“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的艰苦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愈加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翟秋白、张闻天等同志，对此都有重要论述。论及的方面，也从军民关系推广到各项工作，认识到从红色区域的建设到白区秘密工作，从工会工作到农村工作，从经济工作到肃反工作等方面，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

见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1933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同志在所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所做的农民调查报告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在这些论述中，他事实上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方式与方法。1933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倡“群众化的方式”。同年，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提倡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严厉反对只凭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认为“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对于各种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胜利，对于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的条件已经成熟，通过延安整风进行了这个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认真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成为党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作为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的，是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他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确的认识，只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革命斗争中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千百万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保证革命工作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群众中来”，不是简单地直观反映，而是要能动地进行科学的抽象，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种科学知识，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也就是说，把群众意见化为领导的正确意见，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经过“集中起来”之后的领导意见，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对实际运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认识过程并没有完成，领导的意见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实、提高。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才算完成，一个新的认识过程重新开始。由此可见，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是领导思想逐步提高和发展的过程，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

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做了精辟论述的。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着重论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说明了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 二、建国以后群众路线思想的深化 以及在工作中的教训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他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提出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农业合作化高潮有“左”倾急躁情绪就否定它的理论价值。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的重要意义。他提醒全党注意：“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正在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95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党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认识到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全党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提高了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严重地破坏了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在纠正当时“左”的倾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在1959年3月的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信中还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在庐山会议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和综合平衡问题一起，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但是，随后开展“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认识没有坚持下来。到了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一年4月，他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且提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的作风。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联系1958年以后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

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所导致的恶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的艰巨努力，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推动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写于1982年，原载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有个别文字改动）

## 再论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的统一性

1983年3月，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我在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分析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时，曾提出：“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做的重大发展。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10周年之际，十分欣慰地读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辑录的《向群众的实践请教》短文。这是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同志的一封信上的批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他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关系问题。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想法，进一步阐述这两者的统一性。

## 一、提出调查研究和群众踢线 思想的历史的统一之初探

长期以来，在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思想时，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文虽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往往把它们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过程；在讲群众路线时，只一般地阐明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而较少地深入分析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其实，从认识论角度看，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从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这两个过程，在认识论上是同一的。在从理论上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党的历史上看看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是怎样提出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问题的。

调查研究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作方法，在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了。但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自觉的领导方法，并当作认识论问题来看待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1929年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除了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泥坑”。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来了。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思想。这是一篇同时提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

当然，在这之前（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已经同时提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问题。它指出：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方法提出的。从时间上看，这个思想，在“九月来信”中比“古田会议决议”讲得早。但是应当指出，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听取陈毅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和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的调查研究活动之后而作的指示。陈毅同志在汇报中介绍情况说“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因此，“九月来信”中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既是源于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就群众路线问题而言，“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论述又是源于“九月来信”。

---

调查研究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这里所讲的调查研究，主要指到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状况进行的实际考察，即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这是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33页。

见1948年东北书局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9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从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来看，群众路线的思想比较早就有了。但是，就目前已查到的材料所知，“九月来信”是我们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文献之一。这篇文献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在讲到红军筹款和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工作方法时，接连指出：不要红军单独去干，要“经过群众路线”和“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

从党的思想史角度看，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在强调调查研究思想和群众路线问题的历史作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篇文献同时讲到两个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党把这两个问题同时提到的最早的两篇文献。

自这以后，在党的文献中，同时强调这两个问题的情况比较普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往往跟强调调查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农村调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制定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此同时，他写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也反复阐述了切实力群众谋利益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道理，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党的革命活动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工作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对于历史、对于工作环境、对于敌、我、友各方面的关系，均应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以便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全党提高了对调查研究工作认识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4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并且第一次指出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这样，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就不仅被看作是方法论，它的认识论意义已得到了明确阐发。

从党的实际工作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也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党的工作取得胜利，无一例外地都是调查研究 and 群众路线贯彻得好的时候；反之，则往往是这两者受到削弱或破坏的时候。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建国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既没有进行充分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又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呼声。因此，在60年代前期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同志认为，就思想作风而言，不注重调查研究，不走群众路线，是50年代末期犯错误的最严重的教训。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和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这年5月的广州会议上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信，分析“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前几年缺点错误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抗日战争期间和解

---

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的思想来自列宁。他在1958年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群众路线那个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列宁的；不过他们没有这个话，总是讲依靠群众。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39页。

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走马看花，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政策，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讲的没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包括了没走群众路线在内。

在 1961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后，党的领导作风有了转变。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纷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从而使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逐步发生了好转。毛泽东同志写的《向群众的实践请教》的批语，就是为了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改变领导作风，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问题，要求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这里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思想的继续。

## 二、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论列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的上述思想，似乎只能说明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外在联系，其实也显示了这两者的内在统一性。我们说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是统一的，从认识论上讲，就是因为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向社会实际作调查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实践也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占居主要内容。向社会实际作调查，主要是向群众作调查。党的领导人在最初强调向社会进行实际调查和提出群众路线的时候，尽管当时没有明确讲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这一点都是明确的。前面提到的陈毅同志在1929年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在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中也是将切实作调查工作列为红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条。毛泽东同志以后在讲调查研究的时候，也总是强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认为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才能做好向社会的实际调查，并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实践的。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接见拉丁美洲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学习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说：要亲手做调查工作，不要假手于人。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到农民中去调查，要和农民穿得一样，说一样话，要跟他们一道生活，不要装模作样。这样，他们才会向我们讲真心话。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一次说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第二，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是目的本身，从认识论上说，是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保证实行正确的领导。

“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倾听意见，收集反映等等，这也就是向群众进行调查的过程。由于群众受着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的限制，群众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不系统的。领导者作为“加工工厂”，不能不对这些形成正确认识的“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工制作。1964年4月，毛泽东同志接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要从群众那里发现。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领导机关是一种对群众供给的原料、材料加工的工厂。有会加工的，有不会加工的。会加工的工厂是马列主义的工厂。我们向这样的工厂学习。要是没有群众的原材料，我们的脑子就不会想出任何东西。因此，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過程。

“到群众中去”，对于领导者有多方面的要求。从认识论上说，就是把已经形成的认识再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离不开向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因此，一次又一次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对于领导者的认识来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和使认识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

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作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从认识论上深刻他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又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生动他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而，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关系所做的精辟的阐述。

第三，说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是同一个过程，不仅是说的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说的同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是说，具体到认识领域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过程，既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加工制作，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首先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否则，是无“米”之“炊”。不仅如此，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之后，还要既对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检验，看其是否正确；又要让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通过一定的方法表达出来，使获得的思想观点不仅有好的内容，还赋予其一个好的形式，这都要求“到群众中去”。因此，通过社会实践获得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不仅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意义，并且说明了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种统一性也表明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 三、新的历史时期，坚持调查研究 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性的意义

我们说实行群众路线和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前面已经一再强调，这是从认识论方面而言的。若就工作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实行群众路线不仅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还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完成党的工作任务。为了获得正确认识而专门进行的调查研究，一般地不承担这样的具体任务。再者，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毕竟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以这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必然带有与其相联系的一些具体特点；而专门的调查研究，尽管也要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但在为了获得正确认识这一点上，则具有更加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尽管有这样一些具体差别，但是把握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性，不仅在哲学理论上，而且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 1977 年 7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指出调查研究，但谁都知道，实事求是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所以，这里实际上讲的，仍然可以看成是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党特别重要。这是因为：首先，10 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践踏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就要从根本上端正思想路线，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入手。这就不能不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粉碎“四人帮”10 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四人帮”的影响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彻底消除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一定时期内既有极端的紧迫性，更是一个经常的任务。因此，需要不断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深入开展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极其复杂的创新的事业，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靠（有的已经靠）提倡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来解决。我们懂得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过程实际上存在的统一性，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就会把坚持这两者看成是获得正确认识，实现正确领导须臾不能离开的。从而，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制定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全面改革，并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跟过去的战争年代，跟建国以后的 50 年代、60 年代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巨大变化，就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它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

工具，在领导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把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作为科学领导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继续坚持；另一方面，在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行群众路线的具体工作方法和要求上，都会相应地发生许多变化。例如，要求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计算工具和测试手段，把静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更有效地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考察分析，实现由一般经验型领导向更加科学型领导的转化，为四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写于 1985 年，重要内容载于 1986 年 11 月出版的《国防大学学报》第 3 期）

## 再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其中贯串毛泽东思想各个基本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可以说是财富中的财富，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毛泽东思想体系，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之后，理论界对这一新概括充满了研究兴趣。1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长盛不衰。经过多种角度、多个侧面的研究，对它的认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丰富了。

## 一、重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颇具匠心的设计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在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时，为什么在论列毛泽东思想的六个基本理论之后，还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单独出来作为贯串各个理论的活的灵魂来安排？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阐发毛泽东思想，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一个颇具匠心的新颖设计。

一是从理论本身的要求看，突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因为前述六大基本理论无一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切实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当然，这里的应用不是“唯书”至上，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它的精神实质，以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而且善于和坚持把它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这个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突出。这种概括方式，既如实地反映了党的工作的哲学指导，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点。

二是从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上来看。林彪、“四人帮”歪曲、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或把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话奉若神明，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或引用毛泽东同志某些片言只语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其流毒之广，危害之深，不是随着林彪集团被粉碎和“四人帮”垮台在短期内就能消除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就没有端正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邓小平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要把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话绝对化，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其实质就是强调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的思想。过去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同样存在一个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历史决议》突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批判“句句是真理”论和“两个凡是”论，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内容的由来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能不考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的由来。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当然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人们熟悉的恩格斯的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已说明了这个意思。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也严厉批判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基础——辩证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斯大林尽管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犯有严重错误，但他第一次提出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们，除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外，对立场问题论述的更多。斯大林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论述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刻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比较多地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为中介的，这在延安时期非常明显。毛泽东本人说过，他是首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的。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则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为实践所证明。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阐释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论述较多；二则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并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虽然中国比俄国落后，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但是他们的一些思想和经验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启发，包括斯大林讲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毛泽东早年读《共产党宣言》时，悟出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思想，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强调的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把他的这个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工作和革命斗争等一切活动之中。就理论著作言，《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作报告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显然，毛泽东这里的观点与马、恩、列、斯的思想一脉相承。

---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70—571页。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27页。

在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实际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倾向。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2月1日，他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马恩列斯曾经反复他讲，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主义者“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还说：我们要的理论家，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从毛泽东上述原发表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借鉴了列宁、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并且将马、恩、列、斯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固定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这不仅使长期不完整的提法完整化了，而且也成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灵魂。《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结构的设计和把“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概括，继承了毛泽东本人的思路，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发展历史。

### 三、毛泽东对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阐释

让我们来看看在抗战以前，毛泽东本人对“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个基本点的阐释。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毛泽东本人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

我们都熟悉《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在这篇哲学论文中，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三个基本点的雏形。这篇著作虽然着重讲的是调查研究工作，但却实际上提出了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初步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实事求是的思想很明确。还在这之前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已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个思想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得到了进步发挥，讲得更加充分，并在事实上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他提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即是一要反对“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唯上”态度；二要反对视马克思为“先哲”的“唯书”的神秘观念，强调“努力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使政策和策略的内容“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形势”。

关于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的思想一样，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有这方面的许多思想，甚至使用了这个概念。他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但是作为立场、观点、方法论来阐释，讲这个问题还是在这篇著作中比较充分。他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指出：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这说明毛泽东已把群众路线看作是获得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始孕育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

关于独立自主，尽管在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著作中蕴含着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的思想，但是形成明确的独立自主意识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走什么样道路的过程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首次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前期，我们党内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还“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所谓“本本主义”就包括对他们错误指示的迷信。这样领导中国革命怎能不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对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比，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一中批判。这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对于中国革命后来实现由挫折向胜利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延安时期直至建国后，毛泽东对这三个基本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使它的具体内涵更加丰富。

#### 四、关于实事求是

关于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在三个基本点中讲得最多的。

首先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可视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大视角，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理论论证。《实践论》强调认识要以科学的革命实践为基础，揭露“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矛盾论》通过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批判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阐明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辩证法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时，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显然，“实事求是”在这里主要是作为思想作风提出来的。一年以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基本线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这里所要表达的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但还没有从思想路线的意义上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名言和“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口号，这可以说使其增加了思想方法的意义。

一年多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第一次对借用的“实事求是”这个古语的涵义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报告通篇着重是讲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的，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的界定就是在以前的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个高度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对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和基本内容的准确地、完整地表述。这样，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在哲学理论上就是唯物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毛泽东思想对它的规定说，则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统一。包括毛泽东在内，人们经常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意义上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它的内涵是相通的，要求是同向的。1941年12月底，毛泽东应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的请求，在指示中央党校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之后，又题词“实事求是”就是在综合的意义上讲的。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既要在思想路线上，又要在思想方法和思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523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2页、707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想作风上全面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因此，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

正因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思想方法（主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意义上理解）和思想作风（主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上理解）的“三位一体”。在主要从思想路线的意义上（当然也会涉及到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阐明实事求是之后，毛泽东在1953年10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时（这是他唯一的一篇以“思想方法论”为题的专门报告），讲的第一条思想方法就是要一切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的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后来，在1945年“七大”报告中概括党的“三大作风”时，毛泽东首先提出的第一条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样，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得到了充分阐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认真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因而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事求是的思想仍有所发挥和丰富。特别是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在1961年再度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发展。

## 五、关于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得也比较多。这个思想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要求的。即使在思想路线上不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但在指导思想，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工作这一点也是明确的。至于在实际工作中的路线、政策和作风是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回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的路线是全面抗战、进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种客观形势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势必对群众路线这个基本点要作更多的阐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著名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辉煌运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一是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二是提出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延安整风开展后，我们党进一步对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在理论认识上实现了三大升华：

一是毛泽东在1943年6月为党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正确领导方法和以此为基础而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奠定了被视为“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基础。

二是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论到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时，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群众路线，作为第二大作风提出，并且对其多重含义作了深刻论述。首先，毛泽东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使群众路线成为“三大作风”的政治基础，其次，毛泽东从思想作风方面提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或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这是对群众路线作为思想作风的具体要求。再次，毛泽东还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他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

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里讲的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行动准则，实际上将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是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继续阐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不仅作为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来认识，而且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新高度。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为了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具体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七大”以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建国以后，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首先，毛泽东在理论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他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他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并且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此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对群众路线思想还有两次重要的理论概括。

一是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时，对群众路线的含义作了新的界说。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他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时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共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显然，这里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上述论点加以综合了。这样，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由党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1096页。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5页。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除了阶级和人民利益以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观点，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群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了”。邓小平的这次概括是对群众路线思想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

二是刘少奇在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联系 1958 年以后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难看出，这是对邓小平的上述表述的进一步概括。他还指出：1958 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刘少奇的上述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对群众路线的正本清源。

---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 17—18 页。

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00 页、401 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04 页。

## 六、关于独立自主

由于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日两国三方（日本、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扑朔迷离。为了处理好打日本与反摩擦两方面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运用和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毛泽东阐释了它的多方面的涵义。

从政治斗争看，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

从军事斗争看，毛泽东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八路军作战方针。这是与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相适应的战略作战方针。它要求战争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由，可以执行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对国民党的关系而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同时，就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来看，在上下级的指挥关系上也有一个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因此，这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里，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带有方法论意义。在抗日战争中，全面地支持这个方针，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巨大发展。这是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从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上看，毛泽东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在1939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必要。”这实际上蕴含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这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在对待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运用。

从经济斗争看，为了克服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现的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他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2页、161页。

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是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体现。

最后，从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发展看，不受共产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思想的继续发展。事实上，红军长征开始后，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经中断。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决定中国党的军事路线和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会议，也是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随后，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一般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共产国际又明确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严重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实际上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建设上的具体运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作出的决定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随着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独立自主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国内关系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确立打退国民党军事进攻正确方针的基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恃仗美国政府支持，发动内战。苏联顾虑重重，没有明确表示站在我党一边。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还说：“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这里虽然讲的是对待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应采取的方针，但实际上揭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本质涵义。

第二，从国际关系上强调各国人民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二次大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制造冷战，叫嚷美苏间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惧怕战争的情绪和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毛泽东指出：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还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11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

敌的。”这里实际上再一次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点联系在一起分析问题第三，从建设国家的角度提出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比如，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就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尽管许多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套内容。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1957年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思想。1958年夏天，毛泽东进而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63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1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具体阐发，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独立自主的深刻涵义。

第四，从外交上说明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交往中的基本方针。筹备建国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施加的一切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以上用较多篇幅介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多层涵义。不难看出，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的多方面展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上述三个基本点的涵义也愈益明确和丰富。并且越来越使人们感到这三个基本点是立场、是观点、是方法。当然，毛泽东在讲述立场、观点、方法时还讲过其他一些内容，如辩证分析、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等等，但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说，从贯串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能够被称为“活的灵魂”的精髓来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或是派生的，或属较低层次，或者不能同时视之既是立场，又是观点，又是方法，具有“三位一体”的特性的。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322页。

## 七、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及真相互关系的阐释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在阐发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认为这两条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也是培养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最主要的学风。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同志坚持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对独立自主原则也非常强调，并且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提出来了。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的这个论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阐释。这三个基本点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从不同侧面来强调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立足点。对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一般不会发生歧义；对独立自主原则，人们有时往往拘泥于它的某一个侧面的涵义去理解，这就不能把握其真谛。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根本的是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心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的事业无疑是国际的事业，应该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但是任何革命总是在本国范围内的，因此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立足于自力更生。从小平同志的上述阐释就可看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样，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确定，就不仅是因为它们门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且还由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使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四大”建构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异常丰富，在“十四大”报告中就论列了9个方面。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没有“活的灵魂”呢？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两个理论体系是相通的，其“活的灵魂”也是共同的。因此，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搞好，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这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必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拓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继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54页。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做了少量删节和个别文字修改）

## 第五编

### 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述评

国内研究毛泽东已历时半个世纪<sup>①</sup>。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有过不少著述宣传和介绍毛泽东。但是，把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近 10 多年来，无论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即事实上的“毛泽东学”）已经创立起来了。宣传阵地在不断扩大。专门的研究期刊先后创立。有关毛泽东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所、室已达数十个（湖南党史界和上海社科院还相继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各种学会组织几乎遍及全国省市一级。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专著有 300 多本，发表的论文达 6000 多篇，一些学者的著述已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对毛泽东的研究也在走向世界，逐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与其他许多学科发展的状况相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3 年是毛泽东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最好时期。

---

<sup>①</sup>此文系 1991 年 12 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 一、毛泽东研究发展概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有关的研究和教学部门先是对林彪、“四人帮”歪曲、肢解、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进行批判，接着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努力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后，研究者们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毛泽东研究的各个领域深入地拨乱反正。

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由于毛泽东晚年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思想还能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如何反对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对这些问题，一段时间众论纷坛。1979年3月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还有1981年4月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科学论著，澄清了许多是非，推动了毛泽东研究。

与政治任务的要求和学术研究的起步相联系，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政治性的批判著述较多，学术性的研究著述较少；生平介绍性的读物和纪念回忆性文字较多，理论性的著述较少；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研究著述较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和著述较少。

**第二阶段：**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至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后的1984年。这是毛泽东研究的开拓发展阶段。

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精邃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使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历史决议》指引下，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3年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前后，毛泽东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开拓性发展的喜人局面。所谓“开拓性发展”，就是指：第一，以《历史决议》为指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各个领域普遍展开。前几年较少涉猎的一些领域，如毛泽东的经济、军事、党建、教育、文艺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著述。学术空气异常活跃，研究势头愈趋旺盛。第二，宣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专业刊物与学会相继创立，一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献身毛泽东研究事业的专业队伍逐渐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动态》于1982年率先在上海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随之在四川出版。这两个刊物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理论阵地。从学术活动看，早在1980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就已成立，以后逐年都召开一次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



1981年和1983年召开过两次，都在理论界有较大影响。毛泽东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的学术讨论会也在此期间先后召开。1983年1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第三，毛泽东研究的著述获得了空前的“大面积丰收”。从报刊发表文章的情况看，1981年至1984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3年来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发表最多的年份。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3000篇，以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为契机，1983年到1984年则把毛泽东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两年发表的研究文章近2000篇，出版的研究著作达50本之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第一次“毛泽东研究热”。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一）阐释性著述较多。《历史决议》作为党的纲领性文件不可能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论述。《历史决议》发表后，围绕着它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断和一系列观点，涌现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的论著，对宣传《历史决议》的思想观点起了很好的作用。近些年来有贬低这类著述的倾向。殊不知这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较好的诠释性著述也是科学著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1985年修订），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论及的基本思想（包括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哲学性著述较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毛泽东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在每年发表的毛泽东研究文章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大大多于研究毛泽东其他思想的文章。出版书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四年发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将近同时期全部毛泽东研究文章的1/3，仅1983年一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就达20多本。其中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理论视角，是全国最早全面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汪澍白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索》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1981年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集基本代表了这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三）体系性著述较多。对毛泽东某个方面的思想或整体思想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是这个时期的出版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研究的由零到整、由浅入深的进步表现。由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肇始，引发了一大批“毛泽东思想概论”一类著作的问世，对于探索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的教学和研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四）领袖群体研究的著述较多。随着《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编辑出版，不仅开拓了各个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从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视角出发，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党的早期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巨大贡献，从而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第三阶段：1985年至1989年政治风波前。这是毛泽东研究出现某些曲折的所谓“双向”发展较为突出的阶段。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社会思潮上，对毛泽东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双向”，在“基本否定”与“主要肯定”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甚至深刻的对立。这对研究界也有一定影响。《历史决议》发表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

---

它的原本是1980年版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与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状况相类似，毛泽东研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某些明显的曲折，尽管曲折不是全局性的。这个阶段的所谓“双向”发展即是：一方面，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其他毛泽东专题文集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文献的披露，绝大多数研究者继续遵循《历史决议》指引的方向，使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极少数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带有错误倾向的著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但是，前者是主流、于流，后者属于支流，有的是潜流。

这个阶段毛泽东研究的主流作品，与前几年相比较有这样一些新的气象：

从研究思路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辨理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辟溪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者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看，在解析性研究之外，继续强化了综合性研究，无论在体系研究、专题研究还是断代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些新成果。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较为显著，不仅强化了对毛泽东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了某些比较研究。有将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比较的，还有将毛泽东与国外思想家们、与国际共运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的。不少比较研究经过求同、求异分析，拓展了对毛泽东一些思想的认识。有的还引入了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尝试着运用系统论等新的科学方法来开展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健康的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而且有利于表现毛泽东思想作为开放思想体系的特点。过去单一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研究开始转向开放式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

就研究对象言，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在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他本人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正确思想方面，研究重点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思想、改革思想以及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已成为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初步成果。

就研究成果言，这个阶段发表的研究文章虽然有所减少，但出版的各种著作达 70 多部。并不少于前一阶段。这些著作中，有三方面的比较突出：第一，思想研究史类的著作成为一个热点。不少学者转向系统考察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出版了这方面的多部著作。第二，介绍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性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面世。如果说 1986 年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还属于“严肃音乐”性作品。那末 1989 年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类读物，则被喻为“流行歌曲”类作品。这类读物仅 1989 年就出版了 10 多部，其中较好的，对于介绍伟人毛泽东的凡人生活、破除长期存在的神秘色彩或一些讹传起了一定作用。第三，翻译国外的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较多。自 1983 年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情报交流会召开后，不少单位加强了对国外研究信息的搜集，组织翻译了一些著

作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于 1986 年率先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其第一本施拉姆著《毛泽东》的中译本发行 50 万册。其他译著蜂拥而上。这个时期出版的译著达 10 多本。这些译著对于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信息起了一定作用。

这个时期的错误倾向比较突出的著作（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的讲演、谩骂文字和纪实文学作品当另论，不在此列了），可以《论毛泽东现象》和《实践主义批判》等为代表。前者虚构出所谓毛泽东“仇父恋母情结”，通过“精神分析”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诋毁毛泽东的政治品格；后者主观随意地对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进行所谓“比较”研究，全盘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

**第四阶段：1989 年政治风波后迄今。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整顿发展阶段。**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加强，毛泽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得到了遏制。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变形论”、“无用论”，以及其他低毁毛泽东的言论受到了批判。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更加沉稳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毛泽东选集》1—4 卷修订本（即第 2 版）的出版，以及纪念建党 70 周年学术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为了迎接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一个新的“毛泽东研究热”正在兴起。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研究成为主要热点。毛泽东研究界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研究也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随着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著作和谈话的陆续出版，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实研究已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政治任务。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和对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归纳，江泽民在纪念建党 70 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可视为新时期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既吸收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又为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政治指南。围绕着这些文献展开阐述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研究论著有了显著增加。在提交全国纪念建党 70 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毛泽东研究论文中，这一方面的论文占 2/3 以上。

（二）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自延安时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大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少著作来阐述。每个时期的论述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有不少论著来试图进行说明，但是产生较大影响的论著并不多。在纪念建党 70 周年之际，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概括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堪称育较高理论价值的毛泽东研究的科学论著。

（三）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东欧、苏联形势的剧变和国内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再次成为热门课题。社会上有不同看法，理论界的认识也不尽然相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在总的方面应当继续坚持《历史决议》的评价，至于个别理论观点可以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认识和研究。逢先

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为研究晚年毛泽东也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文献资料；他的另一篇专论《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提出的重新认识反和平演变理论的意义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影响。龚育之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的文章，提出的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四）研究性专著竞相推出。在前些年长时间研究的基础上，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性著作。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虽不是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但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成功与失误的精湛分析达到了目前研究的较高水平。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7卷比较详实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长期从事毛泽东传记研究的李锐，在过去出版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基础上，经过增补、修订，于近期推出《早年毛泽东》，用比较丰富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和活动。还有一些专著都具有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特色，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五）综合性研究辞书、丛书方向倾斜。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填补了毛泽东研究史上辞书类的空白，堪属严肃著作。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同时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研究的一大批“辞典”，“大全”、“导读”以及研究丛书相继问世或即将推出。其中不乏颇具匠心的佳作。但是有的“导读”一类工具书缺乏严肃的社会责任意识 and 严谨的治学态度，质量偏差，错误迭出；有的辗转抄袭、拼凑组合，缺少科学的研究精神，在读者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六）研究队伍中加入了大批新生力量，一些青年学子崭露头角。长期以来，毛泽东研究似乎只是中老年学者驰骋的领域，“青黄不接”的呼唤甚为强烈。但在1989年以来，高校青年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热。不少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10多年来，全国高校、党校和科研机构培养的近200名专攻毛泽东思想或哲学思想的研究生已成长为一支生力军，活跃在各种学术论坛上。仅今年，39岁以下申请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题者，就占这个课题总申请数的1/3。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思维、方法和其论著已受到瞩目，后继无人的状况正在改变。在这些人中，将会涌现出一批毛泽东研究的跨世纪的中坚。

## 二、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

这方面的内容，在上面介绍研究情况时已经涉及到一些。有些进展带有突破性。比如《历史决议》等政治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严格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内容的概括，以及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总结等，是很重要的突破，自下待言。这里所讲的“突破”，主要指研究界在研究内容和思想上获得的新见、新识、新意。就此而言，也不能将毛泽东研究的所有领域取得的所有突破性进展进行全面的论列，只能就若干领域的若干重大进展作点概略分析。

###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

在“文革”前，对毛泽东早期实践活动还有几本书予以介绍，而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则几乎是片空白。“文革”时期更不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了思想，这个新的研究天地才得以开辟，并取得了巨大成果。

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1、实事求是地研究了中西文化的“诸子百家”对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出生于湖南农村，早年受过6年的国学熏陶，也受过7年的西学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他的思想不能不发生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发展起主导作用，并把毛泽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论述他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以及程朱理学、明清实学的思想脉络关系；有的学者还从流传于民间的诸如风俗情感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民俗文化”与传统的“典籍文化”的关系来研究毛泽东的早年思想，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湖湘文化”的思想家们，包括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徐特立等，对早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影响问题。论及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有的强调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有的偏重于分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强调早年毛泽东有二重文化性格特征，认为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内圣与外王、重心性修养的理学与重经世致用的实学、具有渊博学识的典籍文化与富于创造精神的民俗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等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对立统一。对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有的学者还作了较深层次的分析，认为韶山时期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长沙求学时期接受新学，中西文化兼收并蓄；长沙求学后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近代文化在其思想文化构架中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纳入了被改造过的西方文化观念。这样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大大地深化了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认识。

2、翔实地研究了早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历程。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很少。10多年来除了个别史实未查清和对思想转变的分期有些不同看法外，总的说来对这段变化历程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早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分为两个方面：从政治观而言，是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从哲学观而言，是唯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两个转变虽有区别，但又有联系，基本上是同步的。这就是认为：毛泽东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前，在政治上是一般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者；在湖南师范求学阶段，其政治态度已开始升华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其哲学观已过渡到“心物二元论”；从1918年一师毕业到1921年7月建党以前，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飞跃，在哲学观上

实现了从“心物二元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转变。也有论者还以 1920 年前后划线，又将这一段细分为两段，前一段为“初具共产主义觉悟”和“向唯物主义迅速转变”期，后一段则由“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对毛泽东思想的转变，研究界的分歧主要在对转变的具体时间的认识上。一是所谓“夏天说”，主要根据毛泽东本人说过的到 1920 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二是所谓“冬天说”，根据是对目前见到的历史文献材料的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只能在 1920 年冬天以后。三是所谓“过程说”，认为他的思想转变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突然实现的，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过程说”的上限与下限的时间界定，尽管也有不同说法，从方法论上讲，似较符合实际。还有论者认为，在“过程说”的前提下，可把 1920 年底至 1921 年初视为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时间。

## （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纵向研究，考察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在这 13 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目前已基本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有：

1、澄清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决议》发表后，研究界对这个问题说法颇多。《历史决议注释本》（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设有一条注释，还有其他文章，专门对此进行了考察，指出尽管有的同志较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或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作为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被确认下来还是在 1945 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这两个文献充分吸收了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们的意见。因此，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只是出于个别同志的创造，更应当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

2、拓展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长期以来，“一源论”居于主导地位，即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理论渊源。随着从文化学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撞击融合而形成的。其论据是，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往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来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文化形态上看是一个重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合流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两源论”虽然拓宽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但是没有对“两源”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具体分析，这显然是一大罅漏。为弥补此缺陷，近年又有论者提出“有主次的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尽管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完全认同，但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的学者还认为，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新的传播领域，实现了其从西方形态到中国形态的转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而言，结束了中国文化以自我为中心运动的历史，找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途径。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精神旗帜。

3、多层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断，许多著述翔实地考察了党的领导人们——既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也包括早期的李大剑、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被毛泽东吸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的有些著作就是党的领导人们共同讨论写成的；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的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的观点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这样的总结丰富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改变了长期固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单一性、封闭性的旧识，使人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组成或发展诸多方面来了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科学思想体系。

4. 深刻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容。研究界对《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全新的概括充满了研究兴趣，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基本点的研究，1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经过多方面探讨，研究者们或运用档案文献进行历史考察，或从哲学、政治、党的建设等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基本上说清了为什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并且一致认同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地提出了这三个基本点的雏形。

就三个基本点本身来说，一是考察了实事求是既是思想路线，又是思想方法，还是思想作风的多层含义，基本讲清了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即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完成，其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认识，它要求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这就改变了一个时期中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二是提出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相统一的思想，论证了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不仅是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同一个认识过程。这就不仅从根本上说明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也强调了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三是论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正确道路，因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的思想。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探讨了“独立自主”思想的多层涵义，既有“根本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说，也有“二重涵义”、“三重涵义”甚至“四重涵义”说。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其科学内

---

“根本意义”说，即是上述的“必然结论”说。“方法论意义”说，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意义，认为它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二重涵义”说，即是强调在国内革命和建设中国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国际交往中，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力。“三重涵义”说，即是强调在国内统一战线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在国际、党际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和在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四重涵义”说是“根本意义”说加上“三重涵

涵。

5、基本理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初步地建构起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体系框架。毛泽东思想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出版的几本毛泽东思想史专著及相关论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特征、基本原理、组成部分、体系构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发展标志、历史分期、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等基础性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出版的专著已由 50 年代中期的将毛泽东著作串讲勾连起来的“思想发展史”转变到了具有异常丰富内容的思想史著作。有的专著能根据大量历史文献分析每个阶段思想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同时期各领导人思想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有关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贡献和各个阶段之间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等。进行这样阐述的毛泽东思想史专著在著作的档次上提高了一大步。尽管研究者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标志以及历史分期等具体问题上还有意见分歧，但这正可构成深化研究的一个动因。

###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

由于毛泽东是大哲学家，其哲学著作具有特殊魅力，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需要它作为认识工具去分析，因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比起其他领域来更为显著。50 年代、60 年代在大学课堂里只能开设毛泽东单篇哲学著作的专题讲座，而不能系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种教材琳琅满目，仅“概论”类就有数十本之多。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比对毛泽东的其他任何思想的研究都更早地形成成为专门的学科。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有：

1、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定义。尽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早在 50 年代后期已开始使用，并广泛地进行了宣传，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科学界定。《历史决议》发表前后，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 1981 年 10 月的桂林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龚育之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表述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个定义得到了与会者认同（习惯上称桂林定义）。大家认为，它比较好他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也能比较好他说明与毛泽东个人、与党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之间的关系——因而能比较准确地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此后，有的研究者还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多重涵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定义的意见，如可以界定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这些定义虽还在争议之中，但与桂林定义并不矛盾，可以视为其扩展和具体化。这些年的大多数教科书都采用桂林定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明确化，是它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

2、正确他说明了《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曾几何时，少数国内外研究者大肆渲染，或说“两



论”是抄袭之作，或说“两论”是拼凑的平庸之作。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有关的原始档案文献，研究者们通过客观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首先，不必讳言，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思想资料，但是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辩证方式来吸收这些资料作为营养，并非简单的抄袭使“两论”成为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因为“两论”的主旨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批判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分析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比较，“两论”无论在框架体系还是立论分析上都有许多明显的特色，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两论”从根本上说是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工程。这样，一时沸沸扬扬的议论终于沉寂。

3、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只是由于对“发展”、“贡献”的不同理解，研究者们有这样那样的概括，但是从总的方面看，都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至少有三个序列的贡献：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在本体论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方面，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方面，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比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入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在实践活动中真正溶于一体。这个创造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在实践中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其成为革命取得胜利、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论者还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既具有这个哲学的显著特色，又具有其他哲学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价值所在。近些年，对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毛泽东方法学”、“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体系正在建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第三，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在异常广阔的领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的结合。毛泽东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使之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宣传哲学和普及哲学，使哲学成为群众千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开创了千百万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奇观。

研究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时，也没有忽视研究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短时间内有些认识难于趋同。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对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一定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不能成为贬低、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巨大贡献的理由。

4、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的工作成绩斐然。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史的体系

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那末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工作则已进入成熟阶段。目前这方面的出版物已形成三个系列。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通史系列。除已出版的几本外，同名多卷本的著作将有几部同时间世；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断代史系列。除有多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史著作外，还有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专著多部。像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这样的专题研究论著的系列也正在形成。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系列。这类著作已多达数十本。三个系列的著作没有完全模式化，不少著作还有些特色。目前似不必在体系构架上着急定于一尊，可以通过教学实践，通过历史淘汰，进行最佳体系的自然选择。

####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开发最早的领域之一。经过数十年研究，一方面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另一方面认识的进展不显著，从思路说，多为平面式的研究，缺乏立体思维，在长时期内，论著多为介绍性、宣传性读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之一。

1、考察了似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是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国情的一个理论创造。过去以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彻底解决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特别是1939年到1941年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时的许多论述，异常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例如，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各自进一步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制定了相应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实行“三三制”原则，不断扩大争取中间势力工作中的争取对象；形成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强调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把斗争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等等。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

2、初步地建构了以研究武装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学科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起步虽然较早，但是体系的建构主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基本明确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定义，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强调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而且凝聚了全党全军和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集体智慧，并对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理论的著作。第三，基本统一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奠基时期，从遵义会议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科学体系形成和确定的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第四，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包括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的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理论等五大部分。对这几个部分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构成了这些年毛泽东军

事思想研究的主体。第五，初步地总结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主要特征，如东方大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长期、复杂、广泛的战争实践等等。这些年的研究也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渐渐形成较为独立的分支学科。

3、基本理清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且著述很多。其重大进展在于，第一，既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杰出理论贡献，又开创性地研究了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因而正确他说明了这条道路的开辟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明确了“工农武装割据”同“农村包围城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权形式，后者是讲道路方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无疑须经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但是认识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不等于就认识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核心是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六大以后的党中央虽然有了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因此两者不能混同。第三，考察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即：井冈山时期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赣南、闽西时期基本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以后他在实践上始终坚持这个思想；到了抗战时期，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标志着革命道路思想在理论上的成熟。

4、深入地研究了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艰苦认识过程。任何一种革命理论的创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尤其如此。这些年的研究，一是突出了把毛泽东的认识放在中国共产党整体认识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还是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认识，毛泽东都下一定是最早提出问题的人。姑且不论党的其他领导人，就是陈独秀，在党创立之初也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形成比较全面、完整和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正确解决了的，当属毛泽东。比如：关于农民问题，他不是最早从事研究的，但在大革命后期，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通过对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并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思想。二是突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认识过程才形成科学理论体系。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实践所以会“左”右曲折，与理论认识上发生的曲折密切相关，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党中央经历8年“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在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天然鸿沟”的“二次革命论”，则是党内右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毛泽东正是总结了这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才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开始较为全面地提出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正确思想。有的研究者还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仅从30年代后期始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到40年代后期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整整花了

10 年时间，可见理论时认识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

5、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价值。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前者研究较多，对后者研究较少。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倡导“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概念，并多角度地对其展开了研究，有的论著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阶段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在理论上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重要补充，在实践中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模式。有的研究者还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刘少奇的一些思想既源于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有的思想比毛泽东深刻，有的则不如毛泽东正确。有的研究指出，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说，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它的理论光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也存在一些罅漏，如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在时间衔接上的模糊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等，有的研究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比较，批评了那种认为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如倒回去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误倾向，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某种“血缘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向前看，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完善它、发展它，而不是把它绝对化、偶像化。

#### （五）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研究者对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进行历史反思，因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不能不产生一些看法。这是目前毛泽东研究中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领域。尽管如此，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还是有一些重要进展。

1、考察了由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引起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路的变化。这是在 80 年代后期兴起的课题。不少研究指出，毛泽东原来的思路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整个国家一举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到了 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严厉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论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不是在将来等工业化完成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指导思想就由“将来突然转变论”改为“现在逐步过渡论”。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的思路变化过程，并对两条思路的关系作了初步比较。有的提出“背离”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确认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有的提出“等同”论，认为两者完全一致，后者还是对前者的发展。更多的研究者赞同作具体分析，认为两者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面（如两者的过渡性、目标和任务、转变的方法和规划转变的时间都是一致的），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

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的认识变了，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起点和实施步骤变了。这样的分析避免了简单化倾向，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变化是相吻合的。

2、考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这是过去不甚清楚的一个问题。薄老在他的书中以聆听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酝酿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作了回顾。他通过强调几个重要的关键时间，说明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和完善的。薄老指出，总路线的提出确曾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就开始酝酿这个问题了。斯大林则是在一个月后的10月24日接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参加苏共十九大的代表团回答刘少奇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才表示赞同的。这就可以排除一个时期盛传的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国际背景”、是“斯大林建议”的等等流言。不少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是突发奇想，并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从而基本上说明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

3、正确他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历史始末。建国后，毛泽东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先后发生过几次争论。第一次是1950年春围绕富农问题，第二次是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第三次是1955年夏围绕浙江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研究界对这几次争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即认为这三次争论都不是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由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起步、巩固和速度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引起的工作方针的争论。薄老认为：前两次争论涉及农村土改后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主张趁热打铁，改变私有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缺点，但他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像薄老这样明确的意见，过去从未有过。这了对结建国后的这一大历史公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第三次争论，薄老也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指出：在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邓子恢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毛泽东则强调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发展生产力，并且似乎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不顾生产力的状况，改变得越快，越能发展生产力；在加快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方面，邓子恢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毛泽东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对这种积极性并没作具体分析。薄老的研究深化了《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从理论上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实质。

4、科学地总结了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和党的工作，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历史决议》精神，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工作失误，这是研究的必然趋势。近些年出现了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倾向。广大研究工作者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片面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全面考察，并较深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失误的教训，不少研究认为，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

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在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上，既过分地估计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也过分地夸大了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忽视了农村个体经济对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认识上，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忽视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还有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就党内生活言，缺乏民主机制，错误地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堵塞了言路，颠倒了是非，人人恐右，“左”倾思想急剧膨胀，从而人为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本来要求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在不到 4 年时间内超前完成，留下了不少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混同的两个问题。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理想效应。就评价历史言，尽管发生了 1955 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的方针性错误，但还没有构成毛泽东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何况从 1956 年春天开始毛泽东也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现的工作失误。因此既不能因有 1955 年下半年的错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也不能把 1955 年下半年的错误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错误相提并论。

#### （六）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的研究的重大进展

一个时期在一些人中流传着“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错误的”说法，为了批评这种说法，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们逐渐转入了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入考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使毛泽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或一度被重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初步形成了正确研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的方法论。

1、提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 1956 年 4 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到 1966 年 5 月爆发“文革”之前，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比较突出的年代。“文革”也可说是探索，但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失败的探索，不能与这 10 年的探索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提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指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主要包括 1956 年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思想，1959 年庐山会议前 9 个月的纠“左”，1960 年冬天以后的 5 年经济调整。另一个趋向是指那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主要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也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还指出，就毛泽东言，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更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他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这就需要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 and 剥离。这种艰苦的认识剥离既受到我们认识的局限，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不能一次完成，需要持久地进行。

2、考察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贡献。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个艰辛开拓的过程，其理论贡献大致包括：（1）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并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2）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3）认同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同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1958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提出了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些根本方针，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5）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要求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努力开辟“中国工业化的道路”。（6）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开设地下工厂，搞一点私营经济，认为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又搞资本主义。（7）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8）迸发了社会主义发展两阶段论的思想火花，即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10）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11）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战略。（12）强调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13）有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和“一国两制”的思想萌芽。（14）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全方位、多侧面的分析把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3、对毛泽东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作了缜密的科学分析。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这主要是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具体表现是：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否定物质利益原则；以“穷过渡”的方式，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二是阶级斗争方面，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否定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最后导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即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要不断地采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某些阴暗面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有的研究还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极其复杂，对之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应当是辩证地扬弃；不能只把错误看成是纯粹消极的破坏性因素，而应当善于变废为宝，把错误当成正确的先导，把反面经验同正面经验一样也看成是宝贵财富。

4 正确地论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探索的关系。一个时期的舆论过分强调，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这种观点不全面。一些研究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对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的探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新时期的探索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所进行的探索。因此，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毛泽东的探索可视为新时期探索的“前奏曲”。有的研究还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和提出，来说明新时期的探索不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简单继承，而是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之后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的发展。通过这种研究，既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联系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也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的“早已有之”的观点，使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 三、开创毛泽东研究的新局面

新时期毛泽东研究的13年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在本文第一部分“发展概况”中已经提及，这里着重讲这样几点：

（一）研究方向的个别偏离。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治倾向的背离，一是学术观点的偏颇。两者既有性质上的区别，但又有一定联系。除前述外，诸如论证毛泽东是乌托邦主义者、农业社会主义者、现代农民领袖，毛泽东思想从文化学上看是道德主义十斗争哲学十民粹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儒学化，等等。这些虽然是个别论者的观点（情况也下尽同，要作具体分析），但一个时期中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思想混乱。这类倾向的影响不能低估。

（二）研究思路的不够开阔。研究思路的拓展是这些年的一大进步。同时也需要指出，一是有较为开阔的思路的研究者还不普遍，二是研究思路的开拓还有广阔的余地。一般来说，青年研究人员的思路较为活跃，但是受到知识和阅历的局限；中老年研究人员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基础，但有时往往受到某些陈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过细的专业分工造成的知识结构的偏狭是影响思路开阔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有的学党史的缺乏哲学抽象思维的概括，有的学哲学的对党史资料不很熟悉或有其他知识欠缺，这需要两者结合，取长补短。

（三）研究课题的过多重复。这些年发表论著可谓盛况空前，虽然是喜，但也不能说不包含有忧，即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者不少，有的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是“积木式”的研究。出现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的需要，“热点效应”等等。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都很难避免这种现象，但从扩大研究层面，提高研究水平计，应当尽量解决这类问题。

（四）研究方法的滞后和步入误区。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扩展推动了这些年的毛泽东研究；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单调、呆滞又不能适应毛泽东研究的时代需要。同时，在改进研究方法、开阔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有的研究者在引进国外学者的“反映综合法”、“动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精神分析法”等等“方法”时，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学到了些皮毛，没有真正掌握其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因而也出现了偏差，有的甚至步入了误区。比较研究流于现象性的简单类比，“精神分析”陷入缺乏任何史实根据的唯心论胡诌。所谓“仇父情结”论，除政治倾向问题外，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五）研究格调有的流于庸俗。这主要表现在个别纪实性读物和生平活动性著作中。有的作者追求“猎奇效应”，大肆搜罗奇闻秘事，不作考证，不辨真伪，随意披露，对毛泽东形象造成的损害不亚于那些政治倾向性不好的作品。

以上只是从研究的基本方面而言。若具体而论，这样那样的问题能罗列不少，这里不作赘述。为了加强毛泽东研究，除上述问题需要纠正和有些属于非研究者主观意愿所能决定而不能苛求外，不揣冒昧，还提出凡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毛泽东研究的指导思想，增强研究的责任意识。毛泽东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决不单纯是对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平

和思想的研究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形象和政治威望，甚至直接影响到当前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团结的问题。作为毛泽东研究者必须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对具体的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是对于关系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必须坚持两个《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毛泽东研究者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二，加强毛泽东思想的现实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需要加强。无论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还是观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都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智慧、经验和力量。就研究毛泽东个人思想言，既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那些与当前现实直接相关的思想和他认真探索过的问题，如改革思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反和平演变问题等等；更要研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有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弄清他的正确经验和失误教训，从而使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

第三，加强对毛泽东问题的难点研究。这里有的与现实相关研究有关，有的属于思想史研究内容，有的与研究方法相联系。诸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与晚年的错误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与晚年悲剧，毛泽东研究的文化视角与政治视角的结合，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学术性，但政治性也很强，如能正确他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研究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第四，重视毛泽东晚年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晚年研究在相当时期都将是一个热门课题。但是研究晚年毛泽东有异常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需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动机与效果、偶然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错误的理论体系与合理的内核因素、实践的近期效应与远期影响、一个思想观点的实在意义与泛化意义，以及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等等。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里不能有任何马虎、片面、粗心大意，甚至凭想当然下结论，而应当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才能真正有利于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加强评介研究。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是评介没跟上是个缺点。对于国内的研究论著，目前还处于介绍性、推荐性的评述阶段，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的研究译著的有影响的评价则是寥若晨星。随着科学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信息、著述和有关评介都需要加强。好的评介著述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

毛泽东研究是项光荣的研究事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笔者曾经讲过，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问，也可称为“毛学”。目前我们正是在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作为毛泽东研究者，能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这项事业，不能不谓之“三生有幸”。现在距离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还有两年时间。虽然毛泽东的诞辰纪念年年都有，但是这次 100 周年诞辰纪念，无论对于全党还是对于毛泽东研究界都非同寻常。我们难逢这一历史性的纪念，有责任开创出研究的新局面来，为发展“毛泽东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 1992 年 8 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

## 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

### 一、如何评价国外的毛泽东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外的毛泽东著作译本已有 20 本左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一套《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现在已出 6 本，计划到明年出 10 本。我们主要是想系统地介绍一下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推动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其他单位或出版社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译著，有的书很畅销，有的书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很值得研究。例如，就理论分析的深度而言，像迈斯纳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原名为《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还是有一定功力的，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毛泽东的，而是从自由派学者的立场上研究的，像民粹主义问题，是他的一个重要论点。但他的有些理论分析和研究视野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在哲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是弗朗西斯·科的《毛泽东的辩证法》，提出了研究的新角度。在传记生平方面，有特里尔的和施拉姆的毛泽东传，还有即将出版的竹内实的《诗人毛泽东》，也有点特色。《诗人毛泽东》不是以史料和理论分析取胜，因为讲毛泽东的诗词，我们国内学者最有权威，竹内实讲诗的历史背景和对诗的理解不可能超过我们。但是，一个外国学者联系中国革命历史背景来讲毛泽东诗词，有一番韵味，具有可读性，也是不容易的。这些书在国内都有些影响。但是有些书的有些观点和整个的治学态度，却是很难盲目地吹捧的。如有的书，根据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材料，包括开了什么会议，哪些领导人出席了，哪些领导人没出席，哪些领导人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哪些领导人坐在毛泽东的右面，加以一番推测，“研究”当时的权力斗争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研究”谈不到多少科学性，很难说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然而，有时候，这样的著作被吹捧得还不低。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即究竟怎么估价目前国外对毛泽东的研究状况？我个人看法，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的有些研究对我们有启发。比如说，他们比较重视毛泽东的思想渊源的研究。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这个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思想，在这方面的研究著述比较多。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在过去的著作中也涉及到，但是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的历史渊源关系来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当然，“一元说”，“二元说”，或者“三元说”，在目前理论界还是个有分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应采取单一的说法。除强调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这根大树的主干）以外，同时也要认识到，比如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这样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看作是有主次的二无论或者二元说。这种概括值得研究，尽管它表达得不一定十分准确和科学，但是它比过去那种一元论、单元说好像丰富一些。这种研究是对我们过去研究的补充。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国内这些年的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再比如说，国外学者比较注意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个新的思路。过去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毛泽东比较多，这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长期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把研究的空间局限住了。因为毛泽东毕竟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学问家，在党的领导人中，

是古今中外学问之集大成者。他的许多思想横贯中西，通融古今，从文化学方面来研究毛泽东可以拓宽研究领域。在这方面，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国外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另外，他们注意心理分析研究。这样的分析如用得适度、恰当，对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力度，分析深层次的东西比较细致一些，深刻一些。这样的分析就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描述，而且使我们的认识有立体感。过去我们不大注意心理分析，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最后，从研究方法来说，他们注重比较方法，而且运用得较广、较活，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他们也进行比较。当然这样的比较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科学的，但也有一些比较研究具有一定价值。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是应当推广的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无论从研究思路、研究视角、还是从研究方法看，国外学者起到的好的作用，我们要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的不好的研究思路，或者是消极的，甚至是严重错误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国内的研究也有影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权力斗争”说。这是国外学者比较广泛运用的，在好多书里面，都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内斗争当作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来分析，这是资产阶级学者比较典型的研究方法。这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遭到了严重扭曲。当然，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要作具体分析。当党犯错误的时候，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内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的正常的、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传统，这是令人痛心的。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进行权力斗争，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党同他们的斗争，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权力斗争”。党犯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是很难完全用“权力斗争”解释清楚的。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单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就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国外学者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研究。这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关系。这对我们国内的影响不小。

再一个就是心理分析、精神分析，过分地渲染、夸大领袖个人性格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毛泽东一生的成败的影响。实际上，这是夸大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不排除偶然性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把偶然性放在适度的位置上来认识。个人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的确会对历史人物发生一些影响，但是对于历史来说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把个人性格等其他方面作为决定因素来分析毛泽东，就会把毛泽东的形象歪曲了，有些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说明。这也是国外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方法。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还有一个消极方面就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材料，往往进行臆测、臆断的主观主义的任意性分析。这种方法对作学问来说是不可取的。也有的学者掌握材料不少，但偏于追求秘闻逸事，获取猎奇效益，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因而也不能作出客观的科学分析。这样的研究往往会使结论出现偏颇，或者走上迷途。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都存在。既不能把对我们有启发的、积极的方面抹煞掉；但是也应当看到，消极方面的冲击也不小。这是我们在今后的毛泽东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种倾向性问题。这跟改革开放一样，要开门，不能关门。完全不看国外学者研究的东西，搞闭目塞听，这对我们研究没什么好处。研究总是要具有开放性，但是开放之中也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使毛泽东研究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民粹主义

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有民粹主义倾向，如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概括，把民粹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来认识了。再比如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著的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这种观点？这是需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同行们共同研讨的问题。要澄清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搞简单的“大批判”，而是先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讨论。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本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界定不一样。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被泛化了，加进好多他们自己的意思，框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中。比如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一是反对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第二是崇尚农民，依靠农民。简单地说，一是反对知识分子，二是依靠农民。这种对民粹主义的界定是按他们个人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去框的。还有把党的群众路线看成是民粹主义的，认为群众路线依靠农民，而农民是群众的主体，还有对平均主义的看法，也都框到民粹主义里去了。从思想史来看，民粹主义是有本来涵意的。既然讲民粹主义，就要在其本来意义上使用。被泛化之后，把什么都框进去，就乱套了。当然，这不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这里首先要将民粹主义概念搞清楚。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比如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观。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粹派和自由派相结合，民粹主义发生了演变，走向反动。列宁对民粹派问题研究得比较深，作了非常深刻的批判。我觉得，列宁对当时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可以用来借鉴研究当前关于民粹主义的一些议论。从民粹主义的本来意义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民粹主义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的，把当时俄国的农村公社看作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天堂，竭力维护那种村社制度。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农民有份地，民粹主义者希望保持那种份地，不希望发生分化。但事实上，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保持那种初始分配的份地制度，富裕农民和贫穷农民的分化比较突出。他们企图阻止这种分化，维护农民的小私有制度。

第二，维护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民粹主义要保留小农私有制度，就必然维护反映在生产方面的小农自然经济状况。反对大工业改造小农业，也反对现代化生产。

第三，反对与现代工业相适应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而不是用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全面分析资本主义。

第四，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妄图使整个社会经济都变成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

第五，民粹派的世界观是英雄史观，把群众看作是群氓。他们是救世主，“到民间去”拯救农民。他们不是真正地把农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主人，而认为他们自己是历史的主人。当然，还有其他特征，但这几点是比较基本的。

### 三、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

搞清楚了民粹主义，再来看毛泽东在这几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与民粹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国外学者把毛泽东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新的运用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不一样，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化。他们这样看，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而毛泽东似乎不依靠工人阶级，只依靠农民；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毛泽东把革命中心转到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却是农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逻辑理论体系，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家之说，在逻辑上能构成理论体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逻辑理论体系，它是世界观，是方法论。我们之所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在于它的逻辑自身的同一性在起作用，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体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所在。我们所以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如果简单地照抄照搬，比如说像王明路线，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挫折。那倒似乎不存在所谓“民粹化”问题，但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仅从逻辑理论体系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这也不是研究这门改造社会的科学的科学态度。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他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是我们和国外一些学者发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关键。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怎么看，不同观点的反差比较大。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的重要失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单纯看作是逻辑理论体系，而没有从逻辑理论体系背后看到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由于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标准不一样，当然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其次，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来说，跟民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妨从前述几个特征来加以比较：

（1）毛泽东不维护农民的私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分给农民以土地，主张“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搞社会主义，在土改之后，必然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对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观的最有力的批判。一个是维护它，一个是不维护它，这是根本不同的。

（2）依靠农民的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动力来依靠，但不是盲目崇拜农民的自发性，而是强调改造农民。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灌输，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灌输，来改造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社会成员。这是与民粹主义根本不同的。

(3) 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态度是很鲜明的，认为中国需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不是像民粹主义那样，害怕资本主义，绕过资本主义，从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几个报告中，对于怎么样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讲得比较开放。

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中，他说：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我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从整个世界来说，它是向下降。但世界上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好处的。比如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南美还有些农业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这样的性质。这个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要一般他讲资本主义。我们自己又在那里搞资本主义，这怎样解释？英、美资本主义也做过好事，他们打过法西斯，但压迫人民是不对的。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

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是讲利用外资的，对现在我们利用外资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讲到发展工业问题的时候，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在这里讲利用外资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

在1948年的土改运动中，对于怎么样维护工商业，照顾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纠正当时“左”的倾向，毛泽东也发表了一些言论，都强调在中国需要发展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

(4) 毛泽东的理论不是借助于抽象的道德观念，而是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1939年他在抗大有个讲话，说，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还缺乏一点东西，就是生活教育，就是怎样吃饭，怎样生活，讲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等，讲的比较少。我们的教科书应当讲这些东西，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养牛、喂猪等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吃饱了饭，可以开会上课，不穿衣服，冬天就要冻死。一切东西都是从经济上发生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统统要以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作为基础。这就是说，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在上面造房子；有了经济基础，其他的法律、政治、艺术、教育等等，才能建筑起来。我们的教科书中，就要把这部分补进去。这段话很朴实。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了。这说明他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不是民粹主义的东西，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 1944 年 3 月关于边区文化教育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呢？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经济不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就是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段话讲得多好啊！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现在的后来说，坚持了生产力标准。这和马克思、列宁是一个思想系统。

(5)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不仅不反对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对发展现代工业相当重视。他在 1944 年 5 月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我们呢？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他欺负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还说：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会，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

毛泽东还指出：边区这五年来开始有了一点工业，但是这不够，还需要大力发展。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就是没有新式工业。这些论述说明了毛泽东对于现代工业采取的正确态度，这些思想和民粹主义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6) 在毛泽东的思想正确时，他反对平均主义也是很鲜明的。在 1942 年 4 月党内整风时，他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讲话：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加以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在 1948 年 4 月的晋绥干部会议上，他也对绝对平均主义作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若干方面跟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加以比较来看，在思想体系上，在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的。

#### 四、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上面的比较研究说明了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不仅如此，还应当指出，毛泽东本人对民粹主义有许多尖锐的批判。这里再介绍几个材料。

一是大家熟悉的 1944 年 8 月毛泽东致博古的信。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一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二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富农消灭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这方面是太急了。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在七大召开之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其在七大作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也明确地批评了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这两个材料说明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大就是要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民粹主义相对立起来，划清界限的一次大会。

三是 1948 年 7 月，经党中央审定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在这个材料中说：“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四是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上有个批注。这个报告说，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来满足群众要求。毛泽东指示批道：“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五是 1948 年 9 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的那种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混同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在这里，毛泽东区分了两者的界线。

还有一些材料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至此，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民粹主义，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一个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认识，再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来分析，最后再来看毛泽东本人对待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态度，这基本上能够得出结论，可以划清大的界线。

## 五、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 民粹主义有无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根本上划清了这个界线：毛泽东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晚年犯的错误，指导思想里面有没有与民粹主义相通的东西，或者说成分、因素、或者叫因子？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明确了毛泽东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空想成分呢？在书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要加以科学的解释，把它说清楚。一些论者得出错误结论就在于没有把握好这样的问题。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晚年犯错误的时候，对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在掌握上存在着矛盾。他正确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能坚持历史标准第一，用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历史，使道德标准服从历史标准。但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道德标准的作用，偏重从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他的许多讲话来看，道德因素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影响了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也影响了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上所述，在1949年以前，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很明确，要求予以大力发展。这是对的。不能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发生了巨变。原来很不发达，一到革命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到达顶点走向反动，到了非要消灭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在解放前后的二、三年或者五、六年，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但是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却比较大。大家知道，1950年，对山西发展合作社问题，刘少奇有一个批示，毛泽东也有一个批示，两个很不一样，说明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开始变了。在提出总路线的时候，显然毛泽东低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到后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看得越重。的确，经过三反五反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危害日益暴露出来，因此，要限制它要改造它，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农村来说，土改以后在一些地区出现两极分化，有了剥削现象，成立互助组和初级社，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短时间内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经济成分，就值得研究了。以后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的自留地都归公，这就更成问题了。

当然，毛泽东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也不单纯是从道德观念出发，也强调了它们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是，由于对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特别是对改造这种落后状况的艰巨性缺乏充分认识，单纯强调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没有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在改变我国异常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时，也还有相当大的潜能可以发挥，因而实际上没有能真正完全地坚持生产力标准。应当指出，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些不一样。刘少奇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主要是把资产阶级当作生产力的代表来看待，是从生产力标准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毛泽东在正确时，也能强调这一点，但当他犯“左”的错误时，就不能完全把握这一点了。这是他的弱点或局限性。

这里涉及一个如何对待总结经验教训与评价历史问题的关系。两者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提出建国初期的问题，是为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认识过去的上作失误，避免再犯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原来的历史评价。这是两个问题。我们走过的这一段历史道路，包括土改、总路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指出，尽管有失误，有偏差，但总的来说，应当予以肯定。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在有这么多人人口的大国里，进行这么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很不容易的。不能设想，也不能这么来要求，不发生一点偏差和失误。之所以对这种社会变革要加以肯定，第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重大破坏。尽管许多工作很粗糙，不怎么理想。包括农业合作化伤害了一些中农的利益，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重大破坏，到 1957 年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向前发展了”。

人民公社化不是属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内容，是提高公有制地位的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有的论者用公社化的诸误来否定合作化的方向，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澄清。第二。

是没造成社会的动乱。建国初期的这些变革，尽管对人们的震动很大，社会反映强烈，但总的来说没出大乱子，比较平稳。仅从这两点来说，我认为就应当维护《历史决议》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我们要充分看到三大改造的缺陷，包括毛泽东的那些过急的作法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而不是否定历史结论。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有的研究论著，在我看来，就把这两个问题混淆了，把我们对历史作进一步要求来总结经验教训的尺度，跟对历史问题作评价的尺度混为一谈，要求一些决策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就形而上学了。为什么说这是两个问题呢？可以打个比喻。评价历史问题就像看待小学生考试，及格分数线是 60 分。达到这个标准就应当说是及格，合乎要求，尽管离满分——100 分还差几十分。100 分是高标准的要求，谁都希望达到。但是没有达到 100 分怎么办？这就有一个掌握尺度的问题了。正确的态度是，不能因为孩子没有达到 100 分而否定他已经及格了。但是有的家长往往不这样，一看到孩子得 60 分就不满意，一个耳光打上去，责问孩子为什么丢了那么些分？把孩子打得痛哭流涕。这就缺乏基本分析。一个好的家长应当是首先肯定孩子已经及格这个基本事实，然后再帮助孩子找出毛病，使他逐步改正错误，达到高分，甚至满分，这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孩子上学考试都存在一个不能用高标准去否定及格标准的问题，同样，对待历史也应如此。总结经验教训是用理想化的状态来要求的，是从今后避免再犯错误这个视角来提出问题的，这跟及格没及格是两回事。不能用这个来代替对历史的评价，因为评价历史使用的是及格标准。所以，我认为，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要加以区别，这两个标准不能混淆。如果混淆了，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错误。一种是用理想标准来要求历史，否定建国初期走过的历史道路；另一种是把及格标准当理想标准，认为那段历史是 100% 正确，不承认有缺点和失误。谁说就给谁扣大帽子。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我提出这个问题，丝毫不是要否定这段历史过程，而是要对这段历史加以正确认识。这既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除了偏重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的问题以外，毛泽东在犯错误的时候，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些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因素？比如说，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尽管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他后来犯错误的时候，却又搞了平均主义。

因此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像道德观念问题、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问题、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等，在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与民粹主义相通之处，或受其影响？这是要很好研究的一个问题。当然，从划分阵营界限说，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混淆。

## 六、毛泽东研究中的几个倾向性问题

从关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国内外有些论者的研究所以得出偏颇之见，甚至错误之论，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问题。

1. 从研究思路来看，过分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把一切问题统统归结为文化现象，有“泛文化主义”倾向。前些年流行一个很时髦的概念，所谓“毛泽东现象”。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现象”？

笔者翻了一些论者的著述，如坠五里雾中。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概念。为什么会时兴这个概念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图用文化现象解释一切，过分依靠文化学视角的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文化现象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分析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单纯用西方文明和中国东方文明这两种文化的冲撞所能解释清楚的，更应当着眼于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点，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当然也要反对把阶级斗争观点扩大化的倾向）。仅用文化现象来解释毛泽东，就容易忽视或模糊毛泽东的一些本质因素，对一些历史问题难以作出科学说明。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有些论者的“现象主义”倾向或者说形式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批判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呢？剖析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有形式主义的或现象主义的倾向。他们不是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揭示本质，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而往往是罗列现象，在现象表层作比较研究，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辨伪、考订等区别现象材料的真实可靠性的工作都未认真去作，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那篇文章里，讲得很清楚，“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问题作科学的结论，就不能仅限于去罗列现象，根据现象作结论。

3. 从研究心理来说，有的论者有盲目的反传统的“时尚主义”或“时髦主义”倾向。同经济建设一样，文化发展也要对外开放。既然是对外文化开放，进来的就会既有积极的、进步的东西，也有消极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对于进来的“新鲜”东西要作分析，同时对于过去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要作分析。但是，有的研究者对于外国的和传统的东西都缺乏科学的分析，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传统都错了。实际上，有的传统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科学的，我们应当继承，应当坚持；有的传统是错误的，歪曲马克思主义，扭曲了社会主义。对这样的传统，我们要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从解放思想的角度，用实事求是的尺子来加以衡量，将其抛弃。如果不作具体分析，盲目地反传统，把过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当成简单化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好的东西一概不要，这是错误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一面是盲目地反传统，另一面则必然是对外国的东西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盲目地照抄照搬，实际上是新的本本主义。这样的研究是很难得出科学结论的。作学问是个“慢功”，研究毛泽东，从作学问来说也是如此，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有的研究者想急于求成，一鸣惊人，往往搞些缺乏科学性的“时尚”、“时髦”的东西，一时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但最终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少许修改）



## 毛泽东思想在当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备忘录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惊雷，响彻祖国辽阔大地，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新的生命力量，为中华民族奋斗不已的振兴富强事业带来了巨大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由衷而热烈地拥护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它正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姿英发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一个时期，对个别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或疑虑，可以而且应当允许。这也给我们宣传理论战线提出一个重要任务，即：要对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科学地加以阐释，大力开展宣传。这种阐释和宣传应当是广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在笔者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广为宣传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 and 路线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最新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 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矢志不移的毕生事业

小平同志比毛泽东同志小 11 岁，但他们却几乎是在同时代开始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不同的经历，使两人在本世纪 20 年代时天各一方。从 30 年代初起，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书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共识，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卓越代表，小平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当时党内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领导者的打击。1943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谈及此事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占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小平同志没有参加当时中央的会议，但是他与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通过整风运动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小平同志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1943 年 11 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说：我党自从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一直胜利地发展着，这使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些年是很幸福的。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同年底，他在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军区反省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1945 年 3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夕，他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

小平同志不仅竭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一二九师将士英勇抗日，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工作成绩卓著。他有一句名言：“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同志十分欣赏这句话，在延安作报告时号召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1944 年 7 月底，毛泽东同志指示各根据地首长汇报、回答关于执行三三制、减租、大生产、拥政爱民、拥军优抚、军队建设、民兵、民众团体、城市工作、沦陷区工作等项情况及问题。对小平同志报告的本地区工作情况，毛主席甚为满意。1944 年 12 月 25 日，毛主席电复小平同志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问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吃得透、用得活、把握得准。在指挥作战上，他与刘帅一起领导刘邓大军建立了赫赫功勋，先是

实现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从内线打到外线，由防御转为进攻的战略转变，后是在战略决战阶段取得了领导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伟大胜利。有的军事家评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小诸葛”。在领导新区土改时，他善于调查研究、明确政策界限。毛泽东同志赞扬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建国之后，小平同志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和总书记。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卓越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阐述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的重要文献。60年代初期，他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总结了我们党领导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的初步经验，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大胆尝试，对当时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条例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最喜欢邓小平的报告。简单明了，解决问题。他在小范围还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我是主席，为统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60年代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

——“文比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生逆转，先是同意打倒小平同志，后来经过长时期思忖，还是认为他政治思想强，过去解放了半个中国，能贯彻自己的路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让他复出，接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小平同志在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虽然触怒了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晚年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已背离了自己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但却是真正地坚持和巧妙地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领导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竭力挽回和缩小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使长期陷于动乱和瘫痪的国家出现了新生的转机。后来，小平同志尽管再次被打倒，却对维系民心和党心发挥了重大影响，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进程起了特殊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新时期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小平同志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我们说，小平同志矢志不移地坚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体现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而且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10多年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准确地说，这10多年，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放射出了异常耀眼的光彩。

---

毛泽东1948年2月17日批转邓小平《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的按语。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毛泽东同志生前就有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强烈愿望。他在 60 年代初多次说过：现在学的《毛选》都是以前的古董。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还说，我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并在 1956 年前后形成了不少对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的思路 and 思想（这些好的思路 and 思想成为新时期小平同志进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在晚年，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就其主观愿望来说，不能不承认，他还是在努力开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如何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还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自以为他的许多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背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同志生前没能完成的夙愿，小平同志接过来努力实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3 年间，小平同志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历史的“自我”。小平同志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而是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低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告诫全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建国以后他犯的错误不能完全算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我在中央工作也有一份责任。这种从大处着眼、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怀。具有特殊经历的小平同志表现出来的这样明确坚定的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国家这些年政治稳定，没有发生像一些国家那样的制度剧变，除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小平同志超越“自我”，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坚持不坐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率先传、帮、带。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他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份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他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表现了小平同志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对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在此前提下，无可否认，毛泽东同志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起，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应当总结的深刻教训。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总结，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克服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造成的影响。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超越。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以后，也已进入高龄状态的小平同志，

还如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理论，其中“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更是一种超越。这样的超越，在马克思主义 100 多年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第三，超越了某些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是科学的，不在于它确定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应当是“万古不变”的，恰恰在于这些原理、原则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由实践者不断加以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小平同志的超越在于，他不囿于社会主义的固定观念，通过总结 70 多年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近 40 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论等等。这些思想理论发展或改变了几十年被公认的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它们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巨大飞跃。特别是正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许多国家纷纷“改换门庭”，社会主义运动似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呈现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景象。这个超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二、南方谈话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与毛泽东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和建设道路的大思路完全一致

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既反映了小平同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思想，同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又具有异常突出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标志着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这些新观点的新高度，使一些同志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并对南方谈话的性质发生怀疑，对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忧心忡忡。不同的议论不少，归根结底是，如同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姓“社”姓“资”一样，也怀疑南方谈话本身有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指出这一点，似有言辞过重之嫌，实际上不过是将一个时期潜行着的思潮显现出来罢了。

对南方谈话的疑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个谈话的误解，甚至曲解。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平同志，几十年如一日都在追求、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如他自己所说：四个坚持，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两个容易发生有的倾向的重要历史关节。一是在70年代末。当时，离粉碎“四人帮”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扭曲，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着“三信”（信仰、信念、信心）危机，思想极度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二是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前后。在这场政治风波前，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异常活跃，制造各种舆论，妄图将改革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在政治风波以后发生了一些国家的剧变，国际上密布着反社会主义的乌云，我们国家承受着所谓“经济制裁”的巨大压力，如果中国步一些国家后尘，就可能发生走向资本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正是在这两个重大历史关头，小平同志作为“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勇敢地捍卫了社会主义事业。在这10多年间，小平同志在主要批判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和批判。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既讲得最早，也讲得最多，而且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

就南方谈话本身而言，虽然重点是放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提高效益，要求更加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上，但是丝毫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意思。如果说南方谈话的前半部分是在论述党的基本路线所包含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点，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侧重阐释基本路线所包含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点。南方谈话讲后者的重要性的份量和力度丝毫不亚于前者。小平同志不断强调：“要坚持两手抓”，抓两个文明建设的“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对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他特别指出：垮起来容易建设难，花了几十年时间的建设，要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还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这也说明一个为社会主义奋斗了一辈子的年近九旬的老翁，信仰仍然异常坚定，非但没有忽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方向问题，而且还在为此弹精竭虑，真可谓鞠躬尽瘁！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南方谈话的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其后果难以预料，如同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难以收拾一样。其实，这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毛主席发动“文革”有多少人赞成？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是少数人拥护，多数人反对。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多数人拥护，极少数人不赞成。它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南方谈话更是使大多数人欢欣鼓舞。所谓“后果难以收拾”，这是一种主观假定。坚持改革开放，是不是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样可怕，难道还不清楚？尽管以发展的眼光，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们国家一些方面的情况还很不尽如人意，还有许多消极、腐败、丑恶的现象需要根除，但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世界瞩目”，这是主要方面。南方谈话的精神是推动这个主潮流向前发展。在工作中一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乱子”，但有了10多年的经验教训，只要不断地健全制度、完善政策，坚持兴利除弊、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对南方谈话的疑虑，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改革开放政策不断产生的疑虑的继续。新的疑虑，固然与一个时期某些舆论的“误导”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左”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这种“左”的思维定势，如江泽民同志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说：还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一种看法，是往往把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观点对立起来，“以毛非邓”。这是一个时期的一种隐形现象。就毛泽东同志晚年而言，如前所述，他的许多重要观点是错误的。邓小平同志将其纠正是一大功德。如果还固守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非难小平同志的正确观点，这是违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的，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就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观点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并且，也如前述，小平同志是竭力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求把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就是致力于此。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思路，与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在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40年代曾经说，他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多，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在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里虽然讲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这四个字，诚然不很准确），但是毛泽东同志通过对这四个字的深悟，却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就是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到了延安时期，他便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把实事求是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真传。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还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同毛泽东同志的思路是一脉相承啊！

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奉行书本主义，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就是惨重的教训。在马列的本本上，既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没有说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共产党仍然可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既没有将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也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曾经被怀疑为“山大王”、“民族主义领袖”。历史证明这些怀疑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不是背离了马列主义，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同样，在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好的思想和思路，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曾经也被怀疑为“自由化”的理论。而历史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破除了对苏联的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理论。

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是破除了本本主义，既从中国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也参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建设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结果。南方谈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想，更是破除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过去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摒弃了过去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不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而实现的认识的飞跃。尽管这些新认识遭到一些怀疑，但历史将证明这些新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将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继 80 年代中期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 40 年代，毛泽东同志曾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这里的多当然是打引号的，不是说对真理的认识多了，而是指会背诵的教条多了——引者注）。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精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大多的亏。

---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文选》第 194 页。

见毛泽东 1941 年秋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稿。



在 50 年代，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并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要教育干部从实际出发多想问题，不要死啃经典著作，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南方谈话提出的新观念，反对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从实际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不是没有裨益的。

南方谈话强调“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这虽然是讲的领导方法，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实践论。这与毛泽东同志倡导“一切经过试验”，边干边学的思想和“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思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深圳的主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准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重犯 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对于 1958 年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从认识上讲，在于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单凭热情蛮干。这是永远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在 1958 年初，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和发挥的创造精神还是不应当抹煞的。小平同志强调敢冒风险、总结经验、坚持正确、改正错误的思想，正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大跃进”的教训的。

去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尽管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是想维护社会主义，担心改革开放偏离了正确方向，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就其认识观的方法论而言是不可取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问姓“社”姓“资”，而在于怎么问法，允不允许试验？有的同志将这场争论比喻为是先起名字后生孩子还是先生孩子后起名，近乎嘲讽。但这场争论的实质确实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唯心主义先验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对立。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曾经被判定为姓“资”的事物，其实姓“社”。这 10 多年来已在不断地“脱帽加冕”、平反改正。难道还要继续造成这样的“冤、假、错”案吗？南方谈话虽然对这段“资”、“社”争论的“公案”做了结论，但是要克服先验论的影响却不是简单的。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在全党开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仍是一项重要任务。当然，这个教育应当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来进行，而不应当搞学院式的本本主义。

有一种议论认为：“南方谈话还是‘猫论’那一套”。真令人不敢相信，“文化大革命”结束 16 年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仍犹在！所谓“猫论”，理论界对它有不同的界说。或褒或贬，毁誉参半。贬者认为，“猫论”即“实用主义”论。这种观点的最早发明权属“四人帮”。在 1975 年“批邓”时，“四人帮”为攻击小平同志，把他在 1962 年困难时期就恢复农村生产问题讲的一段话污称为“实用主义”。对南方谈话的这种议论，也是持贬的口吻，旨在说明它的“实用主义”性。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不妨将小平同志当年的那段原话摘引如下：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

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任何人只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段话，就不难看出，它与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前些年，薄一波同志曾经问过小平同志，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小平同志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这说明小平同志当年关于“黄猫黑猫”的一段话体现的是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方针、政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南方谈话关于判断改革试验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1962年这段讲话的思路的继续和有关思想的发展，当然也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发展。

南方谈话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解放思想，贯穿了解放思想的精神。这是南方谈话充满生气、催人奋进之所在。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似乎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这种成见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说，人们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所实现的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解放思想无非是强调要从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时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解放思想既不是与实事求是对立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外加分。两者都是为了实现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即是说，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反之亦然。

理论的分析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的认识思路与小平同志的认识思路都是这样。曾记否，在党的发展史上，每次确立、端正或完善党的思想路线，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延安整风破除对教条主义的迷信，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那时在理论上既是思想最解放的时候，也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情况也是如此。1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讲实事求是不能与讲解放思想相割裂，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6月9日在中央党校说得好：“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不解放，脑筋不换，一切工作都很难推动。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正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

---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见6月15日《人民日报》。

### 三、党的基本路线一万年不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如果从思想路线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那么从政治路线上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是一个法宝。当年在《论十大关系》被广泛传达之后，毛泽东同志曾说，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对于5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评价不算过份。当然，那条路线还是初步的，后来既没能坚持，又步入了误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被视为新时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奏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那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基本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路线。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南方谈话的基本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此热烈拥护南方谈话，最根本的，就是它明确指出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下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要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不答应，已把他们唾弃。“左”的观点，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也不放心啊！一个时期，人民忧虑，就是忧虑这条基本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南方谈话后，党中央重申坚持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人民吃了定心丸。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13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唯一正确路线。人民希望它长期不变，小平同志也多次说过长期不变。就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非常时期，他仍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这些话稳住了国家的形象，给人民以鼓舞。但是，这个“几十年”究竟有多长？过去讲过七十年。这次南方谈话是讲一百年。为什么要一百年不变？显然，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大约历时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到了那时，即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显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才基本解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使我们国家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何认识，在小部分人中间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南方谈话这样强调基本路线，更不会不引起异议。这里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与政治态度有关系，有的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从党员个人言，应当“允许看”。从全党来说，总的认识都要统一到南方谈话和党中央有关决议、精神上来，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说

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的一种观点。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根源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分析，必然影响对基本路线的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正是基于《历史决议》对上述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确认。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是主要矛盾的论据之一是：每个社会都存在这个矛盾，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论据之二是：现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正在或已经形成。

诚然，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的共同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可视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但是，并不是在每个社会形态里都把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有条件并且能够自觉地把它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解决。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存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但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把这个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私有化，剥削比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个矛盾具有更为突出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0年代中期以后，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我们长时期听惯了“社会主义好”，对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现状不甚了了。猛一听小平同志的这些尖锐批评，曾感到刺耳。但仔细一想，又都是大实话。小平同志讲这些尖锐的话，就是因为上述主要矛盾过去没有解决好。也如小平同志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承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发展经济为根本中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任务。

至于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估量，《历史决议》已经作过明确的论断，即“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年的历史发展，包括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没能推翻这个结论。新的资产阶级是否正在形成，还是已经形成？这既关系到对国情的科学分析，也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正确估量，没有处于统览全局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得妄论，更不得轻率地宣传（在一定范围内研究是可以的）。退一步说，即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是否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上升为主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1页、23页。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3页。

要矛盾呢？一个阶级从形成到它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既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今天形成，没有其发展的相应条件，明天就是主要矛盾。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可以属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正确地运用政策来调节，也还可以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不是不能做到的。当然，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有一个政权得失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各级政权不是被私营资产者所控制，而是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私营资产者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但在现阶段只是个别现象，不应当夸大为普遍性问题。如果对这个形势不作正确的评估，片面夸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性，那末岂不又要陷入阶级斗争的重点在党内 党内已形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并且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怪圈”吗？这是这条思路的理论逻辑。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必然会得出“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结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正在于此。《历史决议》以来党的历次重要文件对现阶段上述主要矛盾的确认，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纠正。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太惨重了，中华民族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坚持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不动摇，是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的理论擎柱。

“经济建设是基础，不是中心。”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又一种说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建设是基础，无可否认。但是这种说法认为：是基础的下一一定是中心，作为中心的还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无可非议。我们承认，政治是中心，但不同时期的政治内容是不同的。在革命时期，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就是政治，它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中心。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中心任务。小平同志讲：“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又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育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小平同志把“基础”与“中心”的关系已经说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曾经大量论述过的思想，不仅在建国后为厂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强调过，就是在战争年代，包括抗战时期对日作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比较紧张的岁月里，他也反复指出过。1941年8月，他致信主管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谢觉哉同志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好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许多的部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181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3页、21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队、机关、学校的首长不大管经济工作，“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在战争年代有时有的地方况且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和平时期反而下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说不通的。毛泽东同志对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直到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

“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改革开放必须从属于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对基本路线的又一种诘难。如何说清楚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不应当回避的问题。从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形成来说，四项基本原则在先，改革开放政策在后。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两个基本点思想提出有先后，并不意味着先提出的重要，后提出的次要。一方面，小平同志固然说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四项基本原则能坚持得住吗？结果也“将成为空话”。“四人帮”的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发昏的胡话，不仅严重扭曲和糟蹋了社会主义，而且实际上与800年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没有两样，或者说程朱理学的逻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新理学”，它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科学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就其重要性而言，丝毫不亚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存在从属关系。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那末坚持改革开放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且是在新的历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5—56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1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5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6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0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16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6页。

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使四项基本原则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两个基本点也不存在哪个第一、哪个第二的关系。就序位排号来说，无疑有第一、第二之分，但这不是等次的第一、第二。若就小平同志对基本路线最早的表述而言，实际上是先讲改革开放的。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次序的先后与地位的轻重是两个问题。

两个基本点不仅有外在的“互相依存”关系，还有内在的“互相贯通”关系。就四项基本原则说，它既制约了四个现代化的性质，也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否认，“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提出“两种改革观”是这条思路的发展，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对于“两种改革观”如何作出实际的界定。哪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哪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与改革开放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认识联在一起了。对改革开放中的姓“资”姓“社”的判断错了，对“两种改革观”的联系实际的分析很难不发生偏差。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持严肃慎重态度，既不能否定这个理论认识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忽视把社会主义改革观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加以批判引起的不良影响。就改革开放政策言，如十三大指出的（小平同志说过，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动），“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既使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理解，也使四项基本原则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新的发展，从而使四项基本原则具有的巨大的潜在的优越性在实践中能够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四项基本原则对人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会随着改革开放精神的贯通而不断增强。

两个基本点的这种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关系，说明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歪置起来。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或由于形势的影响，或由于贯彻执行中出现偏差，比如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不是两个基本点本身的问题），可能在一个时期要侧重强调某一个基本点，过一个时期又可能偏重宣传另一个基本点，以纠正某种缺点，克服某种失误（但亦不能搞片面性，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宣传重点和日常工作重点的变化问题，不影响两个基本点固有的同等地位。所谓两个基本点的“重点论”，仅是就此种情况而言的。这里的“重点”是能互相转化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把两个基本点中的某一点长期固为重点，那就不是辩证法。

“经济建设是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是中心”。这是近两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乍听起来，“两个中心论”似乎是使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完善。实则不然。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要不要抵御和反对？要！强调反和平演

---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37年2月—7月）第40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99页、117页。

《十三大以来》（上）第15页。

变的重要性，不放松警惕，也没错。但是要把它提高到“中心”的位置就不对了。正如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一样，它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因此要重视，但是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实际上没有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反和平演变中心论”是两条不同的思路，不可能并列共存。提出“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只能削弱、损害甚至否定“经济建设中心论”。

前两年，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思想谈论较多，其中不乏正确阐释的论著。但个别宣传有一定片面性。我们知道，在50年代中期，杜勒斯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总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同志迅速作出反应，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视角来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为之制定对策，是很有远见的，不愧为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家、思想家。对这一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淡忘了，是一个教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也不是没有局限和缺陷的。第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毛泽东同志把庐山会议上的不同意见看作是“帝修反大合唱”在党内的反映。随后他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不能说与庐山会议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以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又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直至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体系的一项内容，第二，毛泽东同志把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在防反和平演变方面取得有效的成果（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来解决），而且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反和平演变”论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几年来，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包括这次南方谈话在内，都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论述。现在我们党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它作为“中心”来对待；二不再搞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而是分内外、有层次地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地进行。这都吸收了过去的教训，是个很大的进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和反对不了和平演变；重新闭关锁国，停止改革开放也不行。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至少一百年不动摇，这才是真正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正确的路线。

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是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呢？不是的。无论肯定与否，都有具体的内涵。说毛泽东同志有深邃的战略眼光，这个肯定具体的。比如，鉴于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以后几代身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这既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积极的思想，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



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这段话太重要了，是小平同志反和平演变思想的集中体现。说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也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与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思路。并且，小平同志讲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连语言都像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经验证明，再好的政治路线都要靠干部去落实，没有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忠诚、能干的干部，一切都将落空。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无论从长治久安来说，还是从落实南方讲话而言，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南方谈话在这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上述“四化”标准优于毛泽东同志选拔干部的思路，更为开阔、全面，有利于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当然，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几十年来，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和考察制度，没有摸索出有利于“四个化”人才涌现的竞争机制。小平同志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高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科举制维持了封建社会上千年，政务官、公务员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上百年，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一个好的人才制度、干部制度，使之长治久安？在这方面，也应当像小平同志说的，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前已指出，南方谈话的大思路渊源于毛泽东同志。其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变这种表述方式也是源于毛泽东同志的。在60年代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之后，毛主席决定坚持纠正一些“左”的农村政策，如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允许种自留地等30年不变。后来“左”的思想重新发展，这些政策没能完全坚持。但是，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好的。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对一个方面具体政策的长期不变的思想，扩大和上升到了对总政策和基本路线的长期不变。这不能不说是既有继承又有创造。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应当是“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是，又如小平同志强调的：“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 四、南方谈话中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认识的新发展

前已指出，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成果。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毛泽东同志没说过，甚或是与之对立的。其实，它们也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的思路和思想的发展。

（一）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的深刻概括。这既是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阐述过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同志相关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状态的经典表述。小平同志所讲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矛盾。既然如此，那么怎样界定改革的性质呢？从总体上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为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要解决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使实践中还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完善起来。但是，从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看，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不是只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而是具有严重的影响。这种具体制度中的弊端使生产力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是愈来愈赶上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与它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到了如果再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小平同志讲的改革就不只是一般细微的、枝节的属于量的变化性质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经济政治体制，建立起体现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政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而也是一场革命。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在“文革”中被搅乱了的一个问题。《历史决议》对此已作了澄清。所谓“改革也是革命”，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只是一场内乱），而是指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解放意义的革命性变革。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中期谈过不少。1956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的意思：现在我们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也是相适应的。过一个时期，这二者之间也还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二百年或者若干年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总有一天会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尽管与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不是一类），也需要采取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社会会有许多阶段，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

1985年3月21日、28日新华社讯。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性质的矛盾，会有对抗性的矛盾，会有多次革命。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也讲过类似的想法，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说法虽属即兴发挥，有些观点和提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开放性的，能给我们以启迪。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革命的观点，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路是吻合的。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这是凡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步曲”式的发展。第一步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不承认到承认。这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同志讲话后解决的。第二步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反对到赞同。这是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才统一认识的。第三步，就是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讳莫如深到认同宣传。这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才真正实现的理论上的突破。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的看法一直是明确的。早在1979年11月，他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同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专利。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即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到1990年底又说：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在这里，小平同志是把“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这两个术语通用的，事实上也是同一个意思。本来，其他领导同志讲话对此也没有严格区别，时讲“市场经济”，时讲“市场调节”。但自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后，“市场经济”，就成了贬义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说法一律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调节”是允许的，“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也许因为汉语语言文字的组合特别丰富，两者硬是被分割开了。“市场调节”可以姓“社”，“市场经济”只准姓“资”。这次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才使“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得到了解放，也算平了反，正了名，不再专姓“资”了。毛主席过去常说，我们有的同志神经非常脆弱，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同志无疑没有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他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讲商品生产姓“资”姓“社”的一番话，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很有帮助，这里不妨重温一下。是年11月6日，他说：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个公社（公社这种组织虽已不复存在，但不影响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引者注）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忌讳它干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11月10日，他又说：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

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下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毛泽东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下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为什么怕，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在这个讲话中，他多次强调，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批评一些干部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很可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思路没能坚持。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不断强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之类加以限制。这就走向了错误方面。当然，就是在毛泽东有这个好思路时，他也没有想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的思想还是在计划经济的天地里翱翔。这也是他不可能超越的历史局限。

在我国，对商品生产（包括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似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概念的内涵究竟有多少区别？真的属于三个层次？对此，经济学家们可以去写专论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三个概念的思路是相通的。我们只要将上述讲“商品生产”之处改为“市场经济”，毛泽东同志讲的思想不就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讲的意思吗？两人的思想和思路是多么相似啊！当然，理论认识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概念置换。它主要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时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50年代末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到9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尽管两者思路相通，但却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认识的飞跃，理论的发展，同我们走过的实践道路一样，也是非常艰辛的。

毛泽东同志也谈到过计划问题。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这是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计划”状况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属于特殊状况，那末，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计划不完全合乎规律”的情况则带有一般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既然存在“自发性和自流性”，目前在我们国家，这种“自发性和自流性”比50年代不知突出多少倍，因此，更不应当迷信“计划”。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否定苏联教科书上讲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论述，但是他不把计划看得那么神圣，则是明显的。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沿着毛泽东同志的以上正确思路走下来，小平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 80 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又是共产党人，又是长期实践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居然“没有完全搞清楚”，初听起来难以理解。实则确系如此。君不见，我们的一些教科书，一些大块文章，条分缕析他讲社会主义，往往离开了其真谛而不自觉。在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前，有多少人讲过这样的内容？在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以前，有多少人讲过这样的意思？这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的批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深思这个问题。我们愧对老祖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徒子徒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完全念到“真经”啊！

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呢？1986 年 9 月，小平同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关于发展生产，小平同志讲的很多。他多次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关于共同富裕，小平同志也多次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也是强调了这两点。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的概括，也不是不可以加上其他一些内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现阶段来说，由于前述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异常尖锐性，这样的概括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里没有谈“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了，也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实际上，有些原则已经包括在其中，如没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可能实现最终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做概括的优越性在于：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奋斗目标，讲得不玄奥、不空泛，朴实易懂，对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其他一些原则，有的事实上已包括在小平同志的概括中，有的则是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而必须坚持的条件和手段，并不是目标本身。一个时期的某些宣传误导就在于，没有突出主要矛盾，过于强调一些手段和条件，而忽略了目标本身（对国家而言）。这就不能不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概括，是否“离经叛道”了呢？没有。这里仅举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5 页、52 页。

1986 年 9 月 14 日新华社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4 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21 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9 页、99 页。

两例。一是列宁 1918 年 5 月在苏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二是斯大林 1935 年 11 月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说：“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国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曲折正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没能实现上述要求。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实际上是对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的理论抽象，以期切实汲取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和沉重教训。

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难了。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打仗一样，“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一面，即存在“同一性”。长时期内我们讲“斗争性”较多，讲“同一性”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宜简单化。就思想方法言，确实有好些人不理解“同一性”，包括斯大林在内。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 1 月批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时说：“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完全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这种提法是根本错误的。”人们对这段话比较熟悉，在理论上似不存在异议。但是若联系实际工作来看，对这段话就不一定都完全理解了。如果把这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改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一些同志的思路不正是像毛主席所批评的吗？当然，“同一性”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也有许多复杂因素。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列宁讲得较早且较多的一个思想。）小平同志这段话的哲学根据不就是承认“同一性”吗？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活的运用。当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看法，从哲学上说，除了有承认“斗争性”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个承认“同一性”的问题。

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从哲学上说是承认“同一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除了“吸

---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71 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75—3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348 页。

收和借鉴”这一层关系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层关系。在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既讲过前一层关系，也讲过后一层关系，并且一度从政治上还讲得较为开放。例如前几年披露过多次的，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约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时曾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有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夫妻店。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国家投资有困难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谈到“社会需要”，还有其他条件，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见，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同一性”是一种特殊的同一性。

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同志讲得更多。他在 1956 年 6 月会见一个东欧国家代表团时曾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作过比较。他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在毛主席讲了前面那段话后，少奇同志还对主席的思想作了发挥。他在同年 12 月底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 52 次会议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57 年 3 月，他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我是社会主义，都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他，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 30 多年前讲的这些话，直到今天听起来还是那样新鲜，好像是针对当前的情况讲的。小平同志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少奇同志曾经提出过而没有付诸实行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在 50 年代，社会主义刚刚建立时，不害怕资本主义；到了现在，社会主义发展了，似乎反而“害怕”起资本主义来了。这个历史现象值得研究。当然，改革开放以后，些腐朽的东西滋生了，出现了一些“乱”，有的社会风气不好，各种犯罪活动在增加，甚至过去绝迹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又死灰复燃，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确实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这就是首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同时发挥我们的政治

优势，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廉政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方位建设，坚持不懈地狠狠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始终两手抓，两手硬，这样就能逐渐地使社会风气得到好转，遏制住腐朽、丑恶现象的滋蔓。小平同志说：“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在发展经济、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只要我们头脑清醒”，牢牢地掌握政权，对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还要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可以采取包括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在内的比较灵活的政策，但这并不是提倡“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自觉遵守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纪律。我们追求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步骤分先富后富，而不可能是同步），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共产党人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这样宽广而崇高的情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路线正确，政策对头，长期坚持下去，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在下世纪中叶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赶上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经过若干年，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跻身于世界最先进的民族之林。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上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的一些重要观念和重大政策上，也体现在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上。诸如“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文章、讲话“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等等。无不酷似毛泽东。如果说在南方谈话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脉络关系，在有些同志看来还不是很清晰，那末南方谈话后，这种“一脉相通”的关系就再明显不过了。只要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将不难发现，说南方谈话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就不仅仅是历史的逻辑，而且也是理论的逻辑了。当然，南方谈话中发展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延伸式发展，而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这就是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这个大思路之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同时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有如前述的毛泽东等同志的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但没有展开的思想和思绪，提到了一个较为完整、更为宏观、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阶段，再加上添进了不少毛泽东同志过去没有的、只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能提出的思想观点，建构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的崭新的理论系统。这样的发展在思想史上属于质的飞跃。割断历史，认为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继承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样，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毛泽东等同志那里早已有之，否认其巨大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错误的。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要反对这两种倾向。

从个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角度看，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座丰富的精神宝库。尽管有一部分不好的库藏（如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前有某些“左”的成份，这以后开始向“左”的系统发展，“文化大革命”



爆发后形成“左”的理论体系），但主体部分是好的。如果说林彪、“四人帮”就理论认识言是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左”，并将其推向了极端（姑且不论他们怀有的险恶政治野心），那末小平同志则是向前推进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多次讲过：说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你们中间就有百来个将来的马克思。他对中央党校的学员讲：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建国以后，他在50年代也讲过：学习马克思，要超过马克思。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根据这个思路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同志应当感到欣慰，小平同志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中国共产党争了气，笔者也多次宣传过，学习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东。通过南方谈话，不难看出，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代表作首推《新民主主义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著作，将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颗璀璨明珠，无论就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言，南方谈话都可以说是当今的《新民主主义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沿着南方谈话和党中央有关决议、决定指引的方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写于199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前后，同年10月做了少量文字改动，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3期，曾获《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杂志社颁发的优秀论文一等奖）

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 一、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从宏观的历史视觉来看，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的二十八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在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对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一部分。放开视野，从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来看，这是属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头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 1955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的偏差，尽管对某些改造步骤有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但从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上看，毛泽东对这个转变时期的探索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和平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赎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第四个时期，是从 1957 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步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遗憾的是，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并且由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论不断升级，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

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也愈益偏离正确轨道。他的主要注意力愈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在 1963 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到 1966 年 6 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第五个时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进行“探索”。但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探索，是陷入“误区”的探索。因此，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无疑要否定；但并不是说这十年间，他没有提出任何积极思想和主张。

综观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但其正确和成功是主要的。在理论上，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仅就理论贡献论列以下主要几点：

——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后者提出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

——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他批评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严格加以区分和正确处理；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如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使其既具有无产阶级真正的国家政权性质，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创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形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以及由此提出的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思想具有的战略远见；萌发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初步构想：初步强调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基本认同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的根本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 1958 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其他各种关系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上一度允许私营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又搞资本主义”；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上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要求通过改善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到六十年代前期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继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性的方针；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和在全社会内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方面，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几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参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的某种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煞，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心血和智慧（有的还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凝聚起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它。

## 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

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是认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由此形成人类认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在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看法在国外也有。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思想混淆：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没有加以区别。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这两者的关系时，实际上涉及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分清这三者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两者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经过《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科学界定之后，确定只有毛泽东正确的那部分思想才属于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往往忽视这种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和界定，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没有这个区分和界定，不仅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能清楚明白、理直气壮地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区分和界定，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就能正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它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只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或者说，只有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有的同志对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往往只是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比较，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的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不能用来说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这两者的关系。

但是，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而言，两者存在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这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 1、理论的创立者的连续性。一般他说，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具体他说，这是以两个历史巨人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这两代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存在着连续性。邓小平、陈云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都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的事业，并在中央担负相当的领导责任，或是某地区、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就是要完

成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如邓小平讲的，“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或没有纠正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

2、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里说明的理论思路是指大思路或根本思路，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思路。就具体思路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会有所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言，则是一致的。这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个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反复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而他本人就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又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些言论，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两者的连续性。就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而言，邓小平的大思路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3、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说，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特色”。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还是强调这个特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多次讲过：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解决他们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发生的新问题。“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天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的一个重要特点。

4、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无疑的。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过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渊源。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准备了某些基础。只要将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内容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思想观点相比较，就不难了解这两者之间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两者理论内容的连续性，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4页。

绝不是说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全部是过去都有的，从毛泽东那里可以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也不是同过去的完全一样。正如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内存在某种“遗传因素”一样，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境下吸收营养，发生“变异”，成为具有新质规定的新的思想观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用僵化的固定眼光来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

### 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友屡关系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会有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可以用来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另一层关系——发展。这种发展关系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经历若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阶段性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展和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这个结合，以后还需要这个结合。随着形势、任务和认识的变化发展，这种结合的科学成果也必然发展。历史过程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点上，就不能不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末，同样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还姓“马”，但是这两个时期理论形态的变化，却呈现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这种阶段性的飞跃，亦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1、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卓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革命展开的。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认识到了党的工作着重要点要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如前所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能一以贯之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并在相当长时间越来越严重地走入了歧途。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才真正实现了这个战略转移，并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逐步地形成、充实和建立起十四大所论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改变了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革命的成套理论，没有领导建设的成套理论的看法。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例如，毛泽东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从哲学上提出部分质变观点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在某仲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再如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 1956 年冬到 1957 年春都有很多精彩的议论。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资本家拿出定息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尽管主要是对个别特殊问题的认识，还没当作一个普遍性问题来思索，但也表明了当时思想的开放性和政策观念的灵活性。可是，这个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像流星似的闪亮了一下，转瞬即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时，把毛泽东曾经闪现过的上述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来规定，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等新概念。这是理论认识的一个很大的飞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被看作天经地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区别姓“社”姓“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建设的某些理论也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也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良，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谈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

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的飞跃。

前面三点是就具体内容进行的分析，这是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作总体比较。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一些广为宣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越来越从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离去。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远了，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讲得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由短变长了（因为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会有多长现在更无法预测）。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中承认商品交换，再到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由完全不承认市场经济到只承认市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辅助调节手段，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由强调公有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只承认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存在并共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只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到承认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其他分配方式可以作为补充而存在，包括允许一定量的剥削，如此等等。

怎样认识这些观念的变化呢？这些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先辈始料未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并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即所谓“由高到低”、“由纯变杂”等），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去掉了许多不符合现阶段实际的虚幻成分，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深深地扎下了根子。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来看，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总体上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同时又没有、也不可能完结对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放型的思想体系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原载 1993 年 12 月 26 日《文汇报》，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兼谈“西柏坡精神”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的本意和广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94年底，中宣部牵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他层次的这类讨论会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但如何认识这条道路的起点，迄今仍有不同意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也不必独尊一说，应当百家争鸣。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不同看法，恐怕有一个对历史起点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对历史起点的界定也就不完全一样。首先，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多次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还说，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话的意思已很清楚。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在这时开始具备雏形。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已规范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这条新道路的许多“中国特色”逐渐地全面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为这条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它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为这条新道路作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论证：既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这条新道路逐渐形成的12个基本理论观点，又明确地把党探索出来的这条路线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总结，它不仅对反映这些年来历史经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体系作了新的概括，而且把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称之为是继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就既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又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从本意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应当产生任何歧见。

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成熟之后，无论是思想理论观点、历史文化，还是科技发明，往往要去追根溯源，研究它的演变进程究竟是从什么开始的。例如，报载湖南大学号称千年历史，说岳麓书院是它的前身。乍听起来，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为湖南大学建校于本世纪20年代。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其主要理由是湖南大学所在地的岳麓书院建于宋代，那时的书院相当于近代的大学，故湖大称有千年校史。这就是

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这样去分析问题，认识其渊源，弄清来龙去脉，从中探索一些奥秘，从研究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意义。我认为这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不是从本意上，而是在广义上解释事物，即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把它扩展了。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是不是可以往前追溯呢？当然是可以的。

这两年流行一句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成于邓小平”，大家都很清楚；“始于毛泽东”，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始于毛泽东”的“始于何时”怎样认识？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暴露出来。鉴于苏联历史经验，从《论十大关系》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意识也异常明显。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照搬苏联经验（不是全部），经过一段建设实践，特别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来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从1956年开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八大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有不少相似之处。1956年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新道路的前奏曲。所以一般说始于毛泽东，是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或《论十大关系》，这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头的追溯方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追溯到西柏坡。理由是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当然，那时的思考远没有像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初具雏形。也可以说，与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还不在于一个层面上。但是，后来的许多思想可以从这里找到根子。打个比喻：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有6000多公里长。讲长江，一般是从四川的宜宾到上海流入东海这一段，宜宾以上不叫长江，有金沙江、大渡河等多种叫法。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绝不是从四川宜宾算起。如果那么算，长江就没有那么长。长江6000多公里的长度是包括它的源头的。过去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麓。前不久的一份资料又说，西藏的一个湖泊才是长江真正的源头。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把长江加长了1000多公里。我们追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到1956年是一段，可以成立；再往前，又追到西柏坡，也不能说不能成立。如果成立，这可谓源头的源头。显然，这两种追溯思维都是从广义上考察的，而不是从本意上讲的。这样的认识方法，它的内涵就有了变化。

## 二、“西柏坡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溯到 1956 年八大前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有如上述，我不反对这种看法，并认为作这种探索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里，着重阐述另一种观点，即把历史源头追溯到西柏坡（包括在这里召开的上述“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认为“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不必非此即彼。

为什么说西柏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 （一）三大战役与三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的这场战争，还应当追溯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连绵不断。就外敌人侵说，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国内，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还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当时还没想到和平时期有多长，现在看来已有 40 多年了。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 109 年的战争，已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且在可以见到的本世纪末或更远一点的将来，不会有新的大战争，世界性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中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局部动乱的可能性，但像过去发生的军阀混战，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是应当充分认识它的意义的。

再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还在 1944 年 6 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已把应否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指出如果我们现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提出了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他甚至还指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此后，形势发展极快，中央作了进驻城市的准备。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首先就是争夺城市。那时，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还在延安，没有回到各个根

据地。在这个新情况下，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帮了很大的忙，动用美国飞机，把林彪等送出去，后来到了东北；邓小平等到晋冀鲁豫，回到太行。解放战争打了两年，特别在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犹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既然如此，党的工作重点就不能不着手转移。毛泽东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因此，他还指出：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过去革命 28 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的全面性的建设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进行。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思想上是明确的，如 1956 年党的八大所宣布的。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党的认识有很大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不能不说，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转变，为党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 （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

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只占 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 90% 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党的任务就是使我们的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工业国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从根本方向上说，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党的创立。党的纲领，在一大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直到七大，都还长期停留在理论阐述，属于理论认识王国中的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 1948 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

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基础差，属于国家经济的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今后要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利用它，又要有所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 1948 年九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 1953 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析是对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

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党预计需要 15 年左右时间，结果是提前了，1956 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选择的道路。应当说，这也属于“中国特色”，而且是最早的、带有根本性的“中国特色”。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法和道路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就广义言，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在现阶段，简言之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面已指出，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在 1948 年九月会议和 1949 年七届二中的全会上，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党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是明确的。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西柏坡也明确了。邓小平在 1979 年作“四个坚持”的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个“一贯”的起点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这一条不成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着重讲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方向这一条，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一般以为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早提出的，其实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这年 6 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的 8 条的第 3

条，就已规范地表述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指出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他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出那么多丑闻，搞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西柏坡，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明确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全党形成共识。在西柏坡，毛泽东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压力，提出不要与马恩列斯平起平坐，马列是主干，我们的东西是枝叶。所以，当时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划掉，不作宣传了。但七大决议在那里，七大党章有明文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疑问。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思想，当时没有，这个不能含糊。但如果不讲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50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西柏坡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随后提出“一边倒”的政策，但这不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分析问题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不是的。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从本意上讲，当时没有现在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是追根溯源，从广义上去理解，上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胚胎，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西柏坡精神”，应当放宽视野。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此。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源头的分析，是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的。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这样的分析，可以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揭示得更丰富些，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



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值得继续挖掘。这也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

### 三、执政党建设与两个“周期率(律)”现象

在西柏坡时，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指能否巩固胜利，它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两个务必”，强调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80年代以来，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在西柏坡时，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其实，“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问题，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气味。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跳出黄炎培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现象(尽管它的本意有具体内涵，但人们已在泛义上使用它了。这里也讲的是泛义上的)。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个别想一般，这些人的腐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党的前途的忧虑。

这两年来，我想，“周期率(律)”现象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对共产党执政考验的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说得严重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要使国家富强，这是对的。但后来又认为群众不可太富，对富裕之后存在忧虑。所谓“富了事情就不好办；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忧虑。“富变修”，更是这种忧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富裕对立起来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合乎逻辑的，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如果社会主义与富裕不能兼容，社会主义就没法搞，只能是贫困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那还有谁把它作为理想去追求？为它去奋斗甚至献身，事实上，贫穷的社会主义是站不住的，最后非垮不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努力改变国家的贫困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提高，正在由温饱状态向小康状态迈进。那些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十分富裕的先进典型，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与富裕是能够兼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方面，谁也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现实生活的另一面，也确实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富裕之后，还能不能艰苦奋斗，不断进取，保持一个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上、花天酒地、骄者淫侈、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的丑恶现象都滋生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朝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形或扭曲。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律）”现象。

这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存在，都说明社会主义的路很艰险。邓小平和陈云都曾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他说：建设艰难垮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政治性嘱托。执政关、富裕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闯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主义的江山照样会得而复失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将来能不能最终完满解决？现在还不能打保票。对前途应当讲两句话：一是充满信心，二是存在忧虑。所谓两个“周期率（律）”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一个是权力腐蚀，一个是金钱腐蚀。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

#### 四、弘扬“西柏坡精神”与 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丰富，那么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也不能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路线上讲，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坚持以“西柏坡精神”作为探索源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来说，在现阶段，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改变，不能动摇。对这条基本路线动摇了，改变了，发生逆转，我们国家是个什么状态就难说了。这里确实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我们要高度警惕扭曲和逆转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潮。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这里也包括“西柏坡精神”不能丢，包括“西柏坡精神”的这个重要内涵不能丢。

从共产党的建设这个角度讲，那就是要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必须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包括江泽民最近多次强调的“要讲政治”的教育，继续探讨如何走出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对第一个“周期率（律）”现象，毛泽东有明确答案，就是靠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把党放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把党的领导层放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遗憾的是他没能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现实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距离。在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还不那么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特别是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思想，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对于探讨解决第一个“周期率（律）”现象是会有启发的。

对于第二个“周期率（律）”现象，这是毛泽东看到了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的有些观点不很正确；另一方面也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包括要解决这个“周期率（律）”现象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穷的，但其“左”的指导思想却使他不认为有那么穷，引发了“富变修”的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实际上就成了认为穷也会“变修”。显然，这是说不通的，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都包括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有所躁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匡正时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教育。邓小平说，前几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想也包括这个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强教育，使党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不断追求进步这样一种革命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就国家来说，既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真正做到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也如邓小平说：“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作者附注：拙文发表后，1996年6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教授来函对文中的个别引语作了指正。现将他的意见发表如下：昨天看到党刊3期的大作，颇有见地，尤其周期率（律）问题，很值得深思。文中对用黄、毛对话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及民主“新路”，很重要，过去我写东西也是把这两句后打一个引号，其实应该是两个引号。康有力公车上书中也有。我在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时，才查到了原文的出处。这是《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说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意是很明显的。另外黄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任老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

对于守和同志的指正，深表谢意。我查了《左传》，校对了原文，确如守和同志所说。现据此对拙文做了订正。

##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一、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3 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这是百年一遇的盛大纪念。广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出版了 30 多本专著，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陆续出现了几次高潮，如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1983 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90 周年之际，1989 年冬党中央再次号召全党学习哲学之后，再就是这一次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比较这几次研究高潮，以 1993 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高潮规模更大，专题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整体研究水平更高，发表与出版的研究著述更多。除在各种学术团体和党史、宣传部门举办的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上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论文参与研讨外，10 月下旬，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同其他 24 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暨第七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是近几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汇报和交流。尽管会期较短，但仍收到近百篇论文。12 月下旬，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5 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是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规格最高的研讨会。在与会的 110 多篇论文中，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有 20 多篇，几乎占全部论文的 1/5。这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实力和水平。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出版的许多专著，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从影响和效能来看，从总的方面说，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不少著述颇具匠心，其研究视角独特，立论新颖，文献资料丰富，理论分析深刻，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研究的智慧，集长期研究成果之大成。具体来说，主要的研究及收获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毛泽东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有新的概括。《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视角提出：毛泽东同孔夫子一起可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孔夫子是代表几千年旧制度的大思想家，那末毛泽东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时代、奠定新思想基础的大思想家。他留下的久远的思想价值主要是：把主体能动性和客观求实态度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相统一的辩证理性，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相联系的严密逻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化气质等。

《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还研究了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个人特质，指出：他出身农家子弟，与中国农民有天然联系，最了解农民，这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个必备的重要条件；他对马列理论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善于把握它的精神实质，这是进行伟大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他一贯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对于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决定意义；他勤学博览，大量汲取中西文化知识，特别是谙然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第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宽。历史观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有影响的研究著述不多。《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一文对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内容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1）对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什么是主宰宇宙和人类社会真理的认识上；（2）是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3）是否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该文还指出，分析毛泽东的历史观，需要从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和他指导革命的实践去理解，而不能只从个别词句中去理解；更不能把历史研究过程中发生过的简单化和公式化弊病，归结为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方面的著述陆续出版了多本。《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中通过发挥这种方法论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其成为革命取得胜利、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从思维方式角度探讨了毛泽东哲学的变革，指出毛泽东对促进中国思维方式的重要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对一些具体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阐述的一些问题拓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有些新的信息。此外，《毛泽东关于“质的安定性”的辩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开创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等，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第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的论著又有新的成果。在 10 多年来的大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论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出版了一批反映当代研究水平的论著。《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特征》认为，作为在中国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理论特征：一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哲学理论；二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三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系统，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书文字较为简明，概括较为准确，在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是近些年来在这类出版物中在整体水平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部著作。毛泽东的领导哲学思想是近几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毛泽东领导思想论纲》对这一课题的体系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一定的力度。

第四，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现实问题关系的研究给予了新的关注。如何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现实问题，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 1993 年底的全全国性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人选论文中，有几篇论文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文，既从中外哲学史的发展，又联系当前改革现实中存在的思想误区，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作了较有新意的阐述。该文摆脱了语录书讲的著文方式，从当前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把解放思想与追求思想

上的“绝对自由”加以区别，认为端正思想路线既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也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可靠保证；要警惕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而不可分割，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都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分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认识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由斯大林的“和谐动力论”到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认为“矛盾动力论”虽然是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认识的真正开端，但“改革动力论”的提出才使这个问题在理论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实践方面有了根本性的解决。还有的文章注意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第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大了新的投入。这个问题既是前几届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一个重要重点，更是第七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主题。在这次会上广泛研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认为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次会议还就如何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在哲学上的错误）对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取得了共识。这就是：纠正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纠正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双重决定”论，确立生产力标准的指导思想；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纠正绝对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确立通过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哲学思想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而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力图从哲学角度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 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天地广阔。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的过去，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研究将跌入低谷。当然，高潮不可能年年有。但是否会跌入低谷呢？在我看来，不会。应当说，随着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活动的开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加强，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至于今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方向，根据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看，我想，主要应当朝这样几个方面展开：

（一）深化和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15 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果，为进一步演化和拓宽这个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出版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年谱》（3 册）、《毛泽东文集》（2 册）、《毛泽东军事文集》（6 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 册）等总计约 800 万字的原始文献。《党的文献》也发表了不少主要文献。此外，一大批回忆录和纪实作品披露了许多材料（真伪需要鉴别考订）。不断消化这些文献资料，广泛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营养，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是深化和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研究的空前少有的机遇。有志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者应当像小平同志讲发展经济要抓住历史机遇那样，努力把握好这个机遇，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新水平，获得新硕果。

（二）要坚持三个“面向”，即小平同志讲到教育时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 1987 年第 3 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三个“面向”方针虽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实践的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在这次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全国论文评选中，有一些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同志的论文未能获得最终通过，尽管有许多原因，但是就我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与这些论文的“教科书化”，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院气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在理论上没有新意，又没有运用新的文献资料，再加上脱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气息，那它怎么会产生社会影响，得到读者的青睐呢？应当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国粹”。但是同有的国粹如京剧之类一样，也面临一个“市场”会不会萎缩的问题。要弘扬国粹，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那就要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为毛泽东本人所说，哲学是一种方法。我们要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复兴问题，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只要与人们所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不仅有广阔的天地，而且将爆发出勃勃生机。

（三）要进一步地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这支队伍同时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生力军。这几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关系的研究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仅要继续研究这两者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为这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根据。《邓小平文选》第1卷和第2卷的修订也将在近年内完成，将进一步丰富其文献资料。尽管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从十二大以来就已不断展开，但是取得显著进展和重大突破，还是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评价之后。因此，高水平的研究的时间还较短。《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仅只一、二个月，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研究刚刚揭开序幕。要落实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还需要花大力气。这里既有观念转换的问题，又有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反差问题；既有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的思想需要澄清，又有一些新的矛盾和实际问题需要正确他说明。这些都需要加强深入的研究，特别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从哲学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来讲清楚邓小平理论的若干问题。加强邓小平理论研究，不仅是当前中国政治的需要，而且也扩大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和运用范围，因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科建设本身也是有益的。

（四）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拓宽研究思路。15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说是过去几十年很难比拟的；但是从质量上看，有巨大社会影响的高档精品力作还不是很多。这里有客观原因，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受到原始文献资料匮乏的限制。但是从有的研究者主观方面而言，与某些研究方法的陈旧，研究思路的单调，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课题的重复，以及研究著述的某种程度的雷同性也不无关系。这是妨碍毛泽东哲学思想取得新的跃进的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从整体上说，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更上一层楼；从个人看，要在毛泽东哲学思想领域有一定造诣，这里首先要注意“四戒”。

其一，是力戒内容空泛。目前有的“毛哲”论文言之无物，既无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又缺乏有力度的理论分析，较多地进行单纯的概念推理，使读者无大收获。内容空洞是写文章的一大忌，更何况“毛哲”论文乎？

其二，是力戒知识贫乏。有的文章提供的信息量太少，除了“毛哲”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外，不能给读者以更多的东西。尽管“毛哲”的基本理论分析和表述是清楚的，但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资料的、理论的，信息都甚贫乏。这与知识结构没能及时地调整有一定关系。“毛哲”既然是一门学问，研究“毛哲”也需要博学多识。根深叶茂，才能硕果累累。对“毛哲”的高级研究人员来说，如何多方面地充实自己，广泛的吸收知识营养，这是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三，是力戒思路俗套。有的同志特别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写讲义、教科书驾轻就熟，思维定势已经形成，写的研究论文往往也教科书式。这是写论文的又一大忌，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科书系列的形成及其丰富多采的各种出版物的面世，是这几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巨大成果，对于宣传、教授和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写研究论文与写教材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要求。写论文切忌照搬写教科书的思维定势。有的同志往往忽视了这种区别，这是一。还有的论文，尽管不是教科书式，但分析问题的思路也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研究视角、新的表述方式，没能独辟蹊径，因而其论文不能显示出特殊的价值。这是不

少论文流于“一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提高研究水平需要克服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是力戒文字呆滞。一篇论文应当有好思想，新见解，还需要讲究词章，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来加以表达。搞哲学理论的同志比较擅长抽象概括，论理性强，但一个较为普遍的弱点，是文字功夫不深，认为只要通顺就行了，不大要求文字的生动性、活泼性。因而写的文章往往较为枯燥，于巴。这也是影响文章的可读性的一个因素。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这个告诫值得我们警惕。当然，这里讲的生动活泼是以内涵的科学性，准确性为前提的。那种浮华词藻的堆砌和生僻难懂的“新名词”、“新概念”的搬弄，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生动活泼。前几年一度出现的这种偏向也是需要引为鉴戒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任重道远。目前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能否像经济发展有一个长远规划一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本世纪末也要达到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呢？我以为，是应当提出这样一个奋斗目标的。比如说，提出“三个一批”的奋斗目标如何？即到本世纪末，出版一批“历史巨片式”的研究巨著；涌现一批“院士级”的研究专家；形成一批“硬骨头六连式”的研究队伍，老中青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弘扬光大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目标还可以加以充实和调整。我想，从现在起，一切愿意投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同志们都应当努力攀登研究的新高峰，实现“三个一批”的目标，来迎接伟大的二十一世纪。

（写于1994年春，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并且有少量修改）

